

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随州文史研究系列丛书

永恒的神韵

包毅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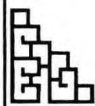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包毅国 男，1955年生于湖北随州。现为随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先秦历史学会会员、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成员、湖北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著有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专著多部，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等各类文章数百万字。



永远的神韵

包毅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随州文史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 肖伏清

副主任 江崇嵩 包毅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虎 文 勇 包毅国

江崇嵩 孙光安 肖伏清

肖春明 李 虎 谌述文

蒋天径 黎 兵

主 编 包毅国

副主编 文 勇 蒋天径

总序

肖伏清

“文史”是文化和历史的浓缩。文化的解说很多，既简洁又好理解的是，梁漱溟先生的“生活的样法”。余秋雨先生认为自己对文化解释也很简洁，掌握“生活、价值、共同体”三个核心词就行。他的解释比梁漱溟先生的解释复杂，但准确、丰富、全面。历史是一个民族辉煌的记忆，或者说是这个民族历史的光彩符号。“文史”作为政协专门的工作机构，工作方针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这个方针告诉我们，文化与历史要服务于今天和未来，从民族过去的生活中寻出文明的价值，营养现实社会生活，传递于未来社会。

这套随州文史研究系列从“随”字的起源开始，解读“随”来源于一座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山。“随”字的最早写法是“卩”和“人”，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表示一座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而落。它通“坠落”和“陨落”。这座山远古就叫“陨山”，今天这座山里流

出来的水仍然叫“涇水”。由此追溯这座山的诞生，归结于地球的板块碰撞，地球的板块碰撞是地球内部结构的调整，不同岩层错位交接，就会发生化学变化，出现新的元素。随州处于地球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的交接处，这种地球内部结构的调整，带来随州地表各种微量元素优于别处，随州许多农产品标注富硒、富锌等，说明这片土地能很好地实现宇宙深处的能量转换，为生命的成长提供最优质的物质资源。

从随州普普通通的丘陵、蜿蜒曲折的河流之中感受到，随州具备极强的宇宙深处能源的转换能力。这种能量转换其实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接受宇宙深处的能量，它是人类农耕文明的起点。适合农耕的地方不可能在高山大河，只能在能够亲昵、能够接近、普普通通的圆融山丘。农耕生活需要整体的力量，这就促进了家、家族、部落整体力量的发展壮大，这是人类文明走向天下大同的趋势。进而，他们从随州出土的文物中，北斗七星图案、太极图形、二十八星宿图案，准确判断出随州的先民一代接一代仰望天空。前总理温家宝同志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人只要仰望就会深入思考，只要思考就一定有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思想使人自身的精神能量所激发的勇气和智慧，一定超过自我衡量和预期。

炎帝神农文化其实就是创造性思想，这种创造性思想诞生于随州，与随州所处的纬度有关。人类文明多诞生于北纬 28° — 34° 之间，这个数值的中间值是 31° ，随州地处北纬 $31^{\circ}19'$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北纬 30° 探索》，就是专门探索文明的起源等重大

问题。现代科学解释了这个纬度线是清晰地观测到北斗七星四季运行的重大天象的最佳所在。地球纬度低，因地表大气层抖动，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地球中高赤纬带的人们，看到北斗七星四季运行规律的时间很短，高纬度带的人们看高纬度带的恒星，没有指示方向的作用。

“随”是一个很普通的汉字，但与随州有着深厚情谊的人，却从中读出了，这是一个长江与黄河地域交接的专用标识，炎黄两大氏族集团融合的特殊印记，这个印记和标识隐匿着一个民族最珍稀的融合元素。地域的交接，就必然带来不同地域所产生的文化相互间的吐纳吸收、容纳融合，相互间的尊重和认同，让一个共同体越来越大，无数个小的群体走向更大的群体，这才是一个民族成为统一体的根本。56个民族是因为这种认同和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的家庭的，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永恒的主题。农耕文明的最大优势就是融合，这种融合就是相互包容中求同存异，能让整个人类和平相处，是一种符合天道的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

随州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的神奇在于发现。发现要有耐得住寂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尽管清冷、孤独、困苦，但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深入、全面、系统进行研究，执着地去发现。这套随州文史研究系列，就是随州文化人依据随州的风土人情依托，随州的地下文物支撑，随州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孕育，当然也依据对文献记载梳理的大发现。他们研究出来的炎帝神农精神，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文献中

的片言只语，更不是文明的碎片，不是毫无准备，也不是时髦拼凑，更不是自卖自夸。

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先，祖先的生命来源于那片山水。故土实际上就是另一个层面的父母。对于许多不是随州籍的人来说，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成长之地。俗话说：“生只沾了个边儿，养才大于天儿。”对于更大范围的人来说，随州是东方农耕文化的发生发展之地，随州地域文化中蕴含的本源性、融合性特征，能够让人们更清晰地认知中国文化。实际上我们说爱国，就是从热爱自己最熟悉的故乡开始的。

我们说爱国的这个“國”，从字的构造中就能理解这是持戈保卫自己生存的那片土地。往往我们以为安全是军人的职责，与普通民众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国家最大的安全，是文化的安全。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不能推卸的神圣职责。这套随州文史研究系列的出版，会让随州人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有深刻认识，能从心灵深处生出感恩情怀。一个人怀着这种感恩情怀，就会生出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天下情怀。具备了这些情怀，就一定会明白今天的社会制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有清晰认知，从而产生一种文化自觉，具备文化自觉的生命品质，就是高品质的人生。

2014年2月

（作者系随州市政协主席）

(代序)

包毅国和他的“随州之梦”

李炳银

2010年10月，因为要随中国报告文学采访团赴湖北随州。行前，热心联系此事的包毅国先生，为了使我们事前更多一点对随州的了解，寄送来他的学术散文著作《随州之梦》。我在接到这部显然是对随州的历史文化有着很深入细致的追踪研究的著作时，对作者包毅国先生就产生了钦佩和尊敬。

一个人爱自己的家乡，这很正常。但是，爱得这样的认真执着，爱得这样的有情感和文化精神却并不是很多。这很让我感动。待到我们一行落地随州之后，包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表现的是那样的热情、随和、认真和不失分寸，他的生理形象和文化品格表现，立即就给我留下了很明晰的印象。在几天的接触之后，我不光读了他的书，还直接真实地读了他这个人。

包毅国先生有一个梦，这个梦不是通常的一般梦幻，这是一个让人心灵颤动，精神振奋的梦，这是一个文

化厚重，意境深邃的宏大梦想。有了这个梦，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在不少的时候，梦想其实就是理想。一个人有了理想，就有了幸福。为这个理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不屈不挠，坚毅顽强，甚至将生命都融入其中，这就是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精神的表现了。

在向我们讲述这个梦的时候，包毅国就像山间一道明澈、光亮、清淳、甘甜的溪流，滋润着人心，濡养着灵魂。浮躁和喧嚣被倾诉般的流动洗涤得清新和沉静。这讲述是一种张力，一种力度，一种韵致，一种生命状态。当一个人把全副生命融入这种溪流般的流动，你会感受到这种流动就是生命的状态和意义，体味出生命的节奏和旋律。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先生，也是一位倾听包毅国述梦的人，在细细品味这道山间的溪流般的陈述之后，他沉思良久挥毫为包毅国写道：“随州之梦，乡土之爱，艺术之境，文化人生。”

包毅国先生的这个梦，缘于一个很小很小的起点，这就是他对家乡的爱。他生在中国中部一座叫随州的古城，他在这座古城里长大成人。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从古城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了随州的乡村中学当教师。那是一个不太尊重知识和文化的年代，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21岁的包毅国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知道自己家庭背景，打了一辈子铁的父亲和靠帮临工的母亲是没有能力帮他改变命运的。于是他想到了写作，这是一个不需要金钱和权势扶助的活动，也是他这样的人，一个优雅纯粹的选择。他希望用写作作为台阶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他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向他的文化人生，开始他后来人生的又一种光灿的境界。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

已经走进写作行列的包毅国觉得自己是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为先祖立传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这时起，他开始认知这位伟大的人文始祖。这种认知，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走向。从乡村教师，到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到文化局专业创作员，到文联副主席，再到今天的随州市政协副主席，他对文化始终有一种痴情。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用心用力的人。包毅国在可能平庸的时候奋起，人生的轨迹也就得以改变，并很有声色。

为了追寻这个深远而纯粹的文化梦想，包毅国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文字中倘佯，像一个敏锐而似乎长有鹰眼的猎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相关的信息；他像当年的神农一样，在广袤的随州原野行走，探访发现任何可能说明这个梦想的相关消息；原野上道路坎坷，山高林深，河流水网密布，行动时常被各种各样的阻碍拦截，他尽管常常感到精疲力竭，汗流夹背，饥寒交迫，可是他总会感到，在前方不远的地方，就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于是，他再次奋起前行，将所有的曲折、委屈和艰难摔到身后。他像一个质朴、勤劳和认真的农民，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持续地挥洒汗水和真情，在排除杂草的同时，用心地护佑每一棵禾苗，再用心血浇灌它渐渐地成长，直到开花和结果。工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主意真，铁杵磨成针。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搜寻和考察之后，他终于接近了梦想的天地。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和灿烂的表现让他惊叹，这里曾经的庄严和先祖的创造辉煌令他这个后裔感到自豪，他开始将自己的发现和梦想追求陈述给人们，期望和大家一起分享！

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最早的文献记载来源《左传》。《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是依据什么作出的这

个判断？仅仅是依靠展禽“坐怀不乱”的道德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包毅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艰难地探寻！久之，他才觉得在这种探寻意义不大！因为传统公认的的信史时间是公元前841年，文字成熟的历史也只有3500年，而炎帝神农所在的“炎帝时代”，目前已形成的共识是在仰韶时代的晚期和龙山时代的早期，即距今5500年—4500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5000年。炎帝神农时代与可以相信的历史相距几千年。如果我们进入这种历史文献的考据之中，极有可能陷入一种误区。在记忆恍惚的古代，就是文字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可能会遮蔽历史的真实。如果把文字形成的文化体系称之为传统的话，它只能是文化小传统。因为孕育并催生这个传统的宇宙天地万物，才真正是文化大传统。当我们在文字小传统中找不到真相时，我们只能从这种文化大传统中去认识历史的真实。

包毅国先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艰苦的探索，他已经感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探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这种探寻其实是在求证中华文明的起源。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人的平均寿命为20.3岁—20.8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文明的出现是漫长的过程，它需要一点一滴地长时间积累。这个过程是创造——积累——再创造——再积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种积累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堆积过程。历史的真实就隐藏在这种历史的堆积之中。这种堆积是文化细胞的发育成长过程，它构成的形态就是文化生态。它是一种深层的、内隐的、相对稳定的，需要长时间累积，达到一定厚度，才发生质变的生态。有了这种文化生态，才诞生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

包毅国先生开始的探寻是排他性的。这是对故乡的爱。他觉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随州人就应该有一种宗子责任，看来这是一种很狭隘的爱。但这种狭隘让他执着地找到了大量有利于随州的证明。

首先他从《中国救荒史》读出，天地宇宙赋予人类一块最好的土地。这部著作中引用了隋唐年间326年的全国灾荒记录。这是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赈灾记录。这里面全国县以上建制灾荒动用国家赈灾粮款有完整记录。随州在326年时间中经历2次水灾，10次旱灾。即163年一次水灾，32.6年一次旱灾，而全国县以上建制区域平均为2.7年一次水灾，2.4年一次旱灾。我们虽然不排除有欺诈哄骗朝廷赈灾粮款的事情发生，但在中国古代这种欺诈哄骗是灭九族的大罪，所以这个记录相对比较真实。这就是说，一个人按活60岁计算，生在随州，人生幸运可能只遇到一次灾荒，不幸运，最多也只是遇到两次灾荒，而生在随州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遇到23次以上的灾荒。在中国古代，什么叫灾荒？那不仅仅是饥饿和苦难，而是人相食，饿殍遍野。

随州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必然被早期人类开发。随州境内的56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充分说明了这点。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而其中最核心的元素是精细的稻作农耕。稻作农耕需要平整土地，修筑堰塘，这就需要聚集众人的力量。聚集是人类产生文明的根本因素，荀子认为人能驾驭动物是因为人能群（《荀子·王制》）。聚集必然产生两大元素，聚集之初，需要一个领袖式的中心人物来谋划，他必须肯吃点亏，能让别人沾点光。包毅国先生从随州的语言遗存中找到了“揽憨”的土话。这个土

语的本质就是自己吃亏、别人沾光的意思。“揽憨”其实就是勇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领袖精神。你为一个族群“揽憨”，你就是这个族群的中心。你为一个民族“揽憨”，你就站在这个民族的最高处。其二，聚集之后，必须以众人的利益为大，这种聚集才紧密，才长久。那么，这就是民本主义，人文思想的源头。稻谷的种植还必须选择近水、向阳、通风的地方。这种顺应天地自然的选择，实际上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发源。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首先需要人的诚心诚意，今天，随州仍流传着“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俗语。“诚”是稻作农耕的根基，也是道德文化的源泉。其次，稻作农耕时间漫长，荒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这漫长的时间，需要人心的安定，社会的稳定……

包毅国先生通过对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解读，又亲身行走在随州的山水大地，从而，清晰地认识到了随州这片土地在5000年前后，稻作农耕文化生态已十分成熟、稳定。而且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领先于周边地区。他虽然不能证明5000年前后这里的原住先民叫炎帝神农，但包毅国先生能够用有力的证据说明随州的先民在5000年前后创造了中华民族成长中最核心的文化生态。唯有文化生态累积到一定厚度时，它就会成长为成熟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当它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生态时，任何强大的力量，都难以摧毁和改变这种文化生态。

包毅国先生为了弄清形成随州文化大传统的背景，他还和地质学家交朋友。明白了随州山水起源于“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的碰撞。这一刻，苍天震惊，大地颤栗，在石与火的狂欢中，大地在塌陷、褶皱、隆起，塌陷的是盆地，褶皱的是丘陵，隆起的是高山。这次碰撞的结

果是秦岭之南，长江之北有了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这两大盆地的边缘矗立起了无宗无脉的褶皱断块山块，这就是巍峨雄奇的大洪山。大洪山中有几泓清泉，沉着而深厚地为人间输送着汨汨清流。它们欢快而酣畅地流淌。厚道而执着地为丘陵岗地，平原提供着滋润和濡养，它的名字叫涇水。这条涇水把大片大片的土地联结为一个整体。因为稻谷的种植，这片土地必然产生一个勇于“揽憨”的英雄。包毅国先生认为在真实的历史研究中，历史文献虽然处于末的地位，但它蕴含着真实历史的影形。就是说，这个领袖式的“揽憨”的文化英雄的名字叫炎帝神农，在口耳相传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英雄的名字没有变异。鲁国的大夫展禽认定这些口传就是历史的真实，《左传》用文字记录了展禽的这种认定。其实历史的真实也是这样，凭着涇水流域良好的地貌和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日照，丰沛的降雨，“揽憨”的炎帝神农把众多的家族聚在自己身边，开发这片很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涇水流域就这样连结成一个整体，这个小整体进入大水系寻找更大的成长空间。这就是文明的成长过程。

文明成长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吸纳和融入。包毅国先生通过文字起源分析流传于随州的民间传说蕴含着真实的历史。这就是“随”字。“随”字的左边是一片土地表示大山无石之陆（《说文解字》），右边是一片经过经营的肥沃的土地，中间是画的“足”。这是一个会意字，是讲两块土地融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字来源于“炎黄之战”传说。相传惨烈的战争使炎黄两族都遭受重创，于是两族都希望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你在南方代我行使中央天帝的职责。”炎帝应诺，愿意跟从黄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他把自己的故里更名为“随”。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也表明，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涵既有鲜明的南方文化元素，也有北方文化诸种元素。已故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认为这种状况为交互作用圈。张光直针对中国史前文化这种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向国人介绍了两个英语概念，一个是interaction sphere，用汉语讲，它就是“互动领域”，张光直将它译为“交互作用圈”；一个是area co-tradition，可以译成“区域合作的传统”，张光直称之为“地域共同传统”。并说明，这种交互作用圈或地域共同传统是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想一想，强势的文化生态是难以放下身段，吸纳和融入异质文明的。而善于融会贯通才是文明健康成长的根本。“随”是炎黄融合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符号和标记。炎帝神农代表着稻作农耕的长江文化，黄帝轩辕代表着粟作农耕的黄河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的融合首先是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比印度的恒河，中东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埃及的尼罗河大得多的完美而足够的空间。其次是旱作农耕的强悍和豪迈与稻作农耕的精细及和谐形成互补，为一个民族性格的强健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最重要的是炎黄的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随”的出现，统一就成了一个民族永恒的主题。尽管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有过分裂的历史，但分裂的双方时刻都对抗着，为统一做着准备。其实这样的分裂就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统一。

包毅国先生生在随州，长在随州，他认为自己报答这种生养之恩的最佳方式就是深入研究，精确把握这片土地的历史。历史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一个民族的辉煌记忆和光彩符号。无数的辉煌记忆和光彩符号垒砌在一起，就

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热爱家乡看起来是小爱，但它是大爱的起点。它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情感。祖国的字面含义就是老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爱炎帝神农就和爱国家、爱民族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情怀就是家、国、民族、天下情怀。事实上，炎帝神农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相对完美的成熟的东方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后世的思想家、学问家只要去认真梳理先祖创立的文化生态，就站立成中国文化的一座又一座高峰。当政者只要把这种文化生态调适到最佳继承发展状态，他就会写下中华民族最辉煌的篇章。

这时，包毅国先生做起了又一个梦，这就是建立一个平台，认知炎帝神农的价值。有了来自古代的文化信息和传说，就会有足够的认知，方能实现文化认同，唤醒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这个平台不是某党、某派、某集团所独有，而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宗庙之思。在国家民族的宗庙里，面对共同的先祖，政治的歧见可以搁置，阶级的冲突可以淡化，历史的恩怨可以放下，共同承担民族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就会被提起和认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华民族不可置疑的共识，不同政党、不同派别、不同的利益集团，无论政治立场、观点、路线差异多么大，都把民族复兴作为当然使命。民族复兴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复兴的前提是意识到衰落，必须正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已经严重伤害和崩塌，成为碎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中国被迫从自己的天下体系进入西方构建的世界体系。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只要不甘心灭亡，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体系。我们不甘心屈辱地进入这个体系，并希望改变这个体系，不

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进入，只有进入了，你才能改变、才能主导，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希望。而文化复兴则是为民族复兴提供理论根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文化复兴好比一个丧失主见的人恢复主见。炎帝神农文化曾经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理解并能够接受的思想源泉。在炎帝神农故里建立国家民族宗庙，是因为随州这片土地上具备和谐、稳定、奋发、统一、宽容、诚实、厚道的文化生态，这是中华民族核心的精神元素，它是一个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民族宗庙的构想就不仅仅是随州城市文脉发展的规划，或一座城市文化主题的设想，更不是依据历史文献的记录在这里建一个吸引游客观光的旅游景区。它不再是一个故土情结的问题，而是在谋划与追寻国家民族最深刻、最持久、最核心的稀缺元素。从这些稀缺元素中吸取足够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最有说服力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说一个伟大民族拿不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价值观，那么面对强势的文化就可能丧失自信，迷失自我。看一看强势的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在比经济、军事更重要的地位，就必须要对中华民族自己的价值观作出战略思考。这就是说，国家民族宗庙就是建立一个传承东方文化的平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效的思想源泉，促进伟大民族精神家园的形成与稳固。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而炎帝神农稻作农耕文化生态中蕴含着人类文明中最完美的文化元素。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思想界就是通过精细的稻作农耕文化生态中提炼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虞书·大禹谟》）的思想观念。这八个字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的主题。

以高尚的德性聚集力量，认识天地自然，尊重天地

自然，顺应天地自然，就是利用，厚生是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提高，惟和则是人类的和谐世界。今天，人类面临的霸权、强权、恐怖、争斗，生态的危机、精神的危机、经济的危机等等，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八个字里找到出路。中华文化通过国家民族宗庙这个平台，通过对传统的追寻和现实的推进来向人类贡献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这就是包毅国先生的“随州之梦”。

在包毅国的“随州之梦”正酣之时，包毅国遇到了一道生命的坎坷，他无法选择和无奈地作了胃切除手术，手术的压力和化疗的苦痛难以言说。他说：“如果用语言表达是生不如死四个字！”这时，是中断还是坚持，两个同样有力的声音在向他呼唤。中断了，会有有益于身体的康复健康；坚持下去，会使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怎么办？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意义，是简单的肉体生命延续，还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更加久远的文化内容？经过沉静的思考，他才体味到生命的意义，是对文化的领悟，把这种领悟传递下去，就是文化生命的延续，或者说是生命的再生。把握好短暂的人生瞬间，就是生命的意义。于是，他在漫长的化疗过程中，以少有的沉静、从容，细细梳理着炎帝神农文化。他知道，搭建国家民族宗庙这个平台，必须夯实理论的基础。

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创造历史。创造历史需要生命的伟大，思想的激情。我们的睿智往往如云月雾花，流星闪电，朦朦胧胧，稍纵即逝。当智慧的花朵一闪现，我们就及时地抓住它，这可能就是契机，我们抓住了契机就等于把握了未来。

包毅国先生觉得文化发展是需要实力的。经济的强力支撑，是强大的根本。如今的强势文化从骨子里看不起

中华文化，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综合实力支持。东西方的文化对话还没有真正开始，只有中国的经济真正强大起来了，有了足够的实力，这种对话才是平等的。因而选择随州建国家民族宗庙是支持中国强大的一个主要支点。祭祀是重大的政治活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愿意到宗庙拜谒先祖的华人必然是精神强健的精英阶层，他们在这里拜谒先祖，中国中部有70%的农民，近70%的农产品。如果这一地区的农民每人每年有一万元的消费支出，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是多么巨大？目前，中国的东南沿海虽然发展很快，但那毕竟只是中国的边缘。正如一面大鼓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必然是重重地擂击这鼓的正中央。鄂豫皖湘赣晋的中心点就在随州。我们知道，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力，建立国家民族宗庙可以巧妙地把政治资源转移到中国的最需要推力的区域。

随州有宝贵的、高品位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们是国家民族宗庙中具有代表性、核心性、特色性的文化元素所构成。国家民族宗庙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题文化，构成城市的生命体系和原创精神，凝结城市的品质和气质。让随州以卓然自立的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品格和灵魂，这也许不仅是随州之梦，它更是中国之梦。

宗子有继承先祖遗产的权利，但能把先祖的精神文化发扬光大的人才资格享受宗子这一称誉。这就是说，要做好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就必须担负起传承东方文化的责任。宗子的高贵和荣耀来自于牺牲奉献和默默地承担！

包毅国先生在构想这个国家民族宗庙时，就兴奋得

忘记了苦痛。他觉得苍天没有让他的生命之火熄灭，是老祖先在冥冥中保佑他。因为他在为老祖先记录和书写一篇大文章。于是，他把这个宏大的构想一篇一篇整理出来，通过中国随州网展现出来，有一定的点击率以后，这时包毅国把它们编辑成《随州之梦》，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自费出版。在了解了这些用心血换来的文化研究成果却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出版时，我感到有点遗憾和辛酸！

这时，他年轻时的一个文化朋友，湖北希望实业集团的周振超先生正在开发涑水河上游的琵琶湖，希望把这个景区建设成国家民族宗庙的一个桩基，为建宗庙作出贡献。包毅国先生认为国家民族宗庙由中心祭坛，中华文明园，世界华人园，寻根园等建筑组团构成，包括现代工业园区都是宗庙的建设基础。它是随州城市发展永远的文脉。于是，包毅国先生就奔走在湖北希望实业集团和《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之间，促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基地授牌琵琶湖，在涑水上游的琵琶湖建立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基地。于是，从维熙、何西来、柳萌、傅溪鹏、张胜友、蒋巍、韩小蕙、谢克强等这些文化界的名人组成的采风团走进了随州……

包毅国先生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他总言自己一生文化上没有多少成就，没有资格做这些大师们的学生，唯有自己心中有那浓烈的文化情结，才有资格站在大师的面前。著名散文家、《小说选刊》原社长、柳萌老师说：“毅国，千万莫这样说，作家靠一时的灵感和才气可以成篇、可以成名，而你是用文化功力在写，我读这本《随州之梦》，就觉得你是够资格享受文化学者的称誉，文化学者是靠大量的文化累积，是需要一个人用一生对文化的尊重才能获得的。”何西来老师亲切地说：“把文化融入生

命，让你的孩子为你敲击文稿，并有意空出一些段落让他填写并充实，逼迫他认知敬重炎帝神农文化，《随州之梦》以儿子的文章为序，这是一代接一代地尊重文化，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人类文明永不衰竭的根本。”何西来再次应邀挥毫题写了“建设国家民族宗庙，发掘炎帝神农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自随州归来多日，在随州、在琵琶湖的见闻感受一直在眼前突出的呈现，包毅国那有点沙哑但却厚重清晰的深情陈述声也一直在耳边回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曾侯乙编钟曾经和鸣奏响的地方，包毅国的这种文化陈述声音似乎也显得十分的深远、厚重和响亮！时间在继续，包毅国的“随州之梦”还在继续！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主编。该文载《中国报告文学》2010年12期）

目 录

总序

代序

神韵随州

- 永远的神韵 1
重塑城市精神灵魂 28

古城的记忆

- 拜谒历史深处的季梁 61
一个伟大王朝的随州味道 69
寻找那缕照耀千古的月光 86
岂能忘情于随 100
温暖历史的生命火焰 114

远古的家乡

- 神奇的仰望 124
生生不息为大德 129
濡养一个民族的源泉 139
叶家山文化解读 149
（附）历史的马蹄声 165
（附）止戈的贵族 169
长寿贵族的礼乐精神 176
永远的安居 188

构筑心灵的文化高峰

- 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 198
炎帝神农的核心就是“救世” 205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文化英雄	213
“随”是中国南北融合的特殊标志	222
构筑心灵的文化高峰	232
节日如此美妙	244

台湾印象

一、温暖民族记忆的那些人	255
二、文化交融激荡的地方	265
三、台北的幸福感觉	278
四、感受钓鱼岛	289

阳光灿烂的地方

后来人的拜谒	306
--------------	-----

从随文化发生发展探其地域文化特质

一、大自然赋予随州兼得南北特点的宜居条件	337
二、随文化亦南亦北的混合性	339
三、农业文明与天人合一	341
四、从青铜器铭文看随文化的包容性	346
五、重人事的民本思想	350
六、结语	353

《永远的神韵》后记

《永远的神韵》后记	354
-----------------	-----

永远的神韵

一个地方能“聚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得历史之积累、获他地之营养”，才具有“神韵”的底蕴。“神”是精神灵魂，“神”的载体是文化，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产生文化的。文化有三个核心内涵，生活、价值、共同体。一个地方不适合人类生活，人类的精神价值就无法在具体生活中表现，一走几十里看不见一户人家，就没有办法成为共同体，这样的地方就难以具备深厚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地方，无论多么壮美，如果没有精神灵魂，总显得苍白和浅薄。

“韵”是中国审美学最重要最高的范畴，它为中国文化所独有，是中国艺术的核心。西方艺术最高境界是“美”，中国艺术比“美”更高的境界则是有“韵”。美只是外在形象在空间及色彩上的平衡、和谐、协调、匀称，而“韵”则是有良好的外在美之外，还具有端庄的举止、优雅的气质，无时无刻透出一种深刻。这就是说，“美”的追求是外在的形式，是一种静止的、表层的；韵的追求是把审美对象看成具有活力的生命，从外到内的韵味和律动中寻找统一和完美的生机与活力、气质与精神。

随州制定出“神韵随州”战略，认为“文化”是“神”，“山水”是“韵”。市委和政府对于“神韵”的解读是“神在铸文

化之魂，韵在绘山水之美”。显然，随州决策层已对随州的地域特点有深刻的认识，一个地方有“神”，才能找到“韵”。让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一座城市发展的灵魂，从而寻找到最能顺应天地自然的发展道路。随州的山水自然生态环境有了“神”，就一定具备美的外在形象和端庄、气质的优雅。这就不仅仅是造福当代随州人民，更是惠及随州子孙后代的伟大功业。

文化的出现，需要天地的造化，这是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天意是不可能违逆的。文化来源于生命。生命从低级进化到高级，需要太多的机缘巧合。天地间有一点点的瑕疵就不能说是完美空间，漫长的历史进程，如果有一次的天灾人祸，就可能被打断。天地就把这神圣的使命交给了随州，人类农耕文明在随州得以发生、发展。今天的科学让我们知道，宇宙深处的能量神秘莫测，这种能量成就宇宙、成就太阳系、成就地球，也成就人类。人的生命活力就来源于这种神秘莫测的能量，然而，人有再大的活力也不能直接吃太阳。太阳对万物的仁慈和恩泽，就是让自己的能量通过辐射照耀地球，植物组织用神奇、微妙的光合作用来接收太阳的能量。植物组织在接受太阳能量的时候，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既需要充足的水分，也必须具备丰富的营养，不是天下所有地方的土壤都具备丰富的营养。

上苍眷顾随州，把中国文化发生、发展所有必须具备的条件全部赐予给这片神奇的土地。随州跨东经 $112^{\circ} 43'$ — $113^{\circ} 46'$ ，北纬 $31^{\circ} 19'$ — $32^{\circ} 26'$ 。地球板块断裂处，地球内部调整最充分的地方。北纬 30° 是一个神奇的纬度，中央台有个栏目叫《北纬 30° 探索》，专门探讨地球的神奇现象。北纬 30° 是一个整数，其实地球的许多神奇现象出现在北纬 28° — 34° 之间。北纬 28° — 34° 数值的中间值是北纬 31° ，随

州就处在这个纬度。

地理学家认为地球的七大板块当中，其中六大板块的交接地带，在北纬 28° — 34° 之间。地质学家进一步解说地球在旋转的过程中，速率变化就会让地球整体上发生变形，加快的時候两极就会压扁，赤道的地方会发生膨胀，反过来，两极的方向略微伸展，赤道的方向是压扁，膨胀和压扁交替出现，就造成地球北纬 28° — 34° 之间的一些地质作用。地球的板块运动，其实就是地球内部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地球内部铁、锌、铜、锰、碘、钴、锶、铬、硒等等微量元素往往是通过地球的运动被挤压到地球表面，形成富含微量元素的土壤。也有地球物理学者认为北纬 30° 被人称之为地球的脐带，地球的自转，引起内部不同的纬度有不同的力作用。其微量元素矿、磁场、电场、重力场对人与环境都有影响。

生命对这些微量元素需求量很低，但作用巨大。生命结构中，这些微量元素总重量在万分之一以下，然而生命拥有了这些微量元素，具有特别的意义。如：“锰”能刺激免疫器官的细胞增值，大大提高具有吞噬、杀菌、抑癌、溶瘤作用的巨噬细胞的生存率。“锌”是直接参与免疫功能的重要生命相关元素，因为锌有免疫功能，故白血球中的锌含量比红血球高25倍。“锶”、“铬”可预防高血压，防治糖尿病、高血脂胆石，“碘”能治甲状腺肿、动脉硬化，提高智力和性功能。“硒”是免疫系统里抗癌的主要元素，可以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最重要的是天地把最丰富的营养，赐予了随州这片土地，让这里成为生命承接宇宙深处能量的最佳所在。随州的许多农产品被注上“富锌”或“富硒”的字样，其实这是天地厚爱这片土地的具体体现。

地球板块的剧烈运动也许让地球内部结构调整更为均衡，但

对于人类生存却并不是特别有利。地球板块在地质历史时期漂移的过程当中剧烈运动，板块的碰撞必然发生塌陷和隆起。喜马拉雅山就是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让欧亚板块发生抬升，形成世界最高的世界屋脊。显然这种剧烈运动的碰撞，并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中国地震局灾难专家告诉我们，北纬30°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带。史料记载，西藏大于8级的地震4次，7级以上的地震11次，6—6.9级地震86次。1950年，8月15日，藏东墨脱大地震达到8.6级。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也与北纬30°有关，青海玉树7.1级地震，大约在北纬33度。文明能够发生不算神奇，能够积累，同时还能够吸收他种文化的营养，累积到一定的厚度，才能产生质的变化。这就叫“量的变化堆积历史，质的变化分割历史”。这种多灾多难的版块边缘地带，到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显然，难以积累能发生质的变化的厚度的文化。这就是说，农耕文化能发生在随州，随州没有板块剧烈撞击大地震发生，却有不间断的运动调整，这就是天地鬼斧神工造化。

随州虽然处于北纬30°地带，但不是地球大板块的交界处，而是处于“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两个小版块之间。大板块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也为小板块的运动提供了推和揉的力量。这种推与揉的力量不是特别大，“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的运动并不剧烈，地壳发生的是些微的变化。板块交接的地方就出现了塌陷和隆起。大地的裂隙产生盆地，大地的相撞挤压隆起高山。秦岭之南塌陷了两个大盆地，分别是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因为小板块的运动不剧烈，地壳的塌陷并不深，两大盆地的边缘隆起了一块无宗无脉的褶皱断块山地也不险峻，这就中国中部的大洪山，它的海拔高度1055米。和大洪山山脉相峙的就是秦岭的余脉，大别山支脉桐柏山，它的海拔高

度1140米。

两大山脉相对的谷地就是中国中部有名的随枣走廊。地球的构造作用造就了随州奇特的地势和复杂的地形，地貌形态有山地、丘陵、冲积平原。南北是山，北有桐柏山绵亘鄂豫两省，南有大洪山雄镇荆襄。东西系陂陀岗地，中部为岗地和大小平原。随枣走廊是连接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一条重要通道。其间岗岭纡盘、河谷蜿蜒，有“荆豫要冲”、“汉襄咽喉”的称谓。丘陵的形态和结构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没有明显的地形构造。山脉是通过地壳运动造成的褶皱和断层，细细分辨，就可以看到脉络和走向，丘陵看不出非常明显的脉络，柔和浑圆的线条可以看到这是丘陵形成原因是山地久经侵蚀的产物，是岁月造就出的地貌。丘陵更给人们贡献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博大精深、回肠荡气的景色。

随州的地形基本符合现代地理学丘陵定义，随南大洪山和随北桐柏山，具有明显的地质构造形态，两山以下大部分地区只是这种地质构造的延伸，山峰的相对高度不超过200米，起伏不大，坡度较缓，是低矮山丘组成的地形。没有明显的脉络，顶部浑圆，是山地久经侵蚀的产物。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一般高度海拔200—800米。这是永远也看不尽的风景，登上这个山顶远眺，魅力又在远处的那个浑圆的高峰，微微隆起的温柔线条就好像又在召唤。丘陵是丰富的调色板，天地在运行中，用每年的春夏秋冬把丰富的色彩，尽情涂抹在这丘壑之中。丘陵地貌在中华文明发生时，生产力最为丰厚，具有巨大推动力。既能种植五谷粮食，也能生长经济植物，还能放牧牲口。

圆润的丘陵，看似一样却不一样，天底下绝对没有两座山丘一模一样的风景。没有锋芒毕露的险峻，也没有一览无遗的坦

荡，有着千岩万壑丰富，更有百溪争流的曲折。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丘陵的复杂多变、神秘莫测，让人类感觉到格外亲切、容易接近。人的活动、人的历史就开始有了丘陵的味道。最适合一个民族的初始生存形态，不能是巍峨的高山，也不能是奔涌的大河，只能是眼前能够亲昵、能够接近的丘陵。可以遮蔽狂风暴雨的是丘陵、可以抵挡烈日骄阳的也是丘陵，可以逃避野兽侵扰的还是丘陵、可以解决果腹之忧的仍是丘陵。丘陵就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必须路径，丘陵就这样把人推到了文明的起跑线上。中华民族的先民，就是从丘陵的美景之中，吸纳了浩然的丰赡之气，从千岩万壑获得了千姿百态的思绪，丘壑就成为一个民族心智的核心，成就丘陵的地理、气候条件也滋润濡养着中华民族的心智。

中国文化就是浩然丰赡的丘陵思绪，人类文化的发生、成长需要天地自然，地域的千差万别，文化发生的机理也不相同。文化首先是生活，中国人的农耕生活，不能在险峻的高山和壮阔的大河边展开，中华民族早期最为活跃的地域主要是中低山丘陵。只有丰赡的丘陵才能让中华民族的祖先酣畅淋漓地进入农耕生活。光有生活不够，生活中必须蕴含着精神价值，农耕生活不仅仅是吃喝穿用住，还有对天地自然的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对自然的顺应。到了该睡的时候睡，到了该起来的时候起来，这是一天的顺应；到了该播种的时候播种，到了该收割的时候收割，这是一年的顺应；山场树林的呵护，丘陵生机的旺盛，最少需要十年的顺应。中国文化的成熟定型，是千万年的顺应。

这种顺应是一种精神价值，人类的力量十分渺小，没有力量改变太阳的东起西落，就只能顺应；没有办法阻止天地的运行，让一年只有春季，就只能顺应；没有办法让树木在一年里长成参

天大树，只能顺应。这种长期的顺应成为一种惯性，就变成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这就是与天和谐、与地和谐、与人和谐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价值。这种生活中蕴含的价值就像一个谜，正因为像谜，文化才变得可爱。当人具有智慧的时候，就能够寻找到其中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用利益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世界上更多的事情是无法用利益来解释的。早晨起来跑步，跑一身的汗水，能获得多大的价值，但觉得格外舒服，因为遵循了生命运动规律。乡镇党委引导农民种植小麦，从利益规律上说，不服土地抛荒者，但引导农民遵守天地的运行法则，寻找与天地的和谐，进而带来社会的和谐，其价值就难以用利益计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应该颠倒这个次序。那就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也不及天时”。

天时地利造就了随州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为优异的条件，为文化的发生做好了最为充分的准备，中国文化就从这里喷薄而出。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有三个核心词：生活、价值、共同体。余秋雨先生到随州考察中国文化的发生，和我认真探讨过随州的天时地利环境以后，认同了我的分析，他在数千人的会场上说：什么地方留下了中华文化第一行最伟大的脚印——随州。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耕文化，最适合农耕的地方才能够发生农耕文化。顺应天时才能够种田，到了种麦子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栽秧，这种顺应就是与天地的和谐。随州人的顺应天时的农耕生活中，其实就蕴含着天底下最高端的思维“天人合一”。

随州有句俗语叫“人多好种田”。就是说一家人和和睦睦，齐心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有好收成。让家庭和和睦睦当然成为随州农耕生活最为突出的课题。以随州人的智慧，寻找到一家人和睦相处的办法，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家是一

个整体，整体的和谐稳定需要的是规则是方法。把人的纵的横的各方面的关系用感性的思维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最好的规则和方法就是用礼仪。老的要受到尊重，小的要得到爱护，这种尊重和爱护是需要载体和形式的。早晨小的要到老人家的跟前去请安，吃饭的时候，老人家不拿筷子，一家人是不能端碗的，晚上，当儿子的要给老人家暖被窝。女孩子站有站相、坐有坐姿，吃饭拿筷子的姿势有模有样。小孩子看到有学问的老人，恭恭敬敬地鞠躬让路，这就是有家教的大户人家子女所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社会结构，所以，这个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这样举世无双的价值体系。

在农耕中，人们需要聚集，共同劳动，就需要互相协助，彼此合作，在这种协助和合作中，就必然产生一种各种关系间都觉得很愉快的规范和准则。大家都能接受的规范和准则，家庭成员认同并遵守，成为习惯，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固定下来。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礼仪之道，也是规范个人从属整体的形式，说这其中有多少玄奥的理论或深刻的道理，它可能没有。但这富有人情味的礼仪却是深入人心的。因而人们在这种礼仪中遵守了一种服从整体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让文明得以茁壮成长。

和谐，就是人间的适度和平衡。人际间的关系适度，就是合理，而超出适度的范围就不合理。平衡则是从适度中引申而来的。说的是均匀、平和、相等、守恒。偏向某一方就失去了均衡，这就是一种合理和完善的状态，这就是中庸。“庸”常也。就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就是“和”，首先起源于家，在人间关系中，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中，有天底下最合天理、最自然的人际关系。生命生存发展流

溢着一种自然的爱，才能确保生命的延续。爱子女属于这种向下的爱，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把这种向下的爱扭转方向使之向上。动物世界，哺育子女，也是所有动物的天性，而改变爱的方向，尊老养老则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反生物学意义。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横与纵两种关系。横是现实中的一切联系，纵则是前人与后人的联系。人的出生其实是延续前人的生命和生存意志。这就构成一条生生不息的永恒链条。后人继承先人物质和精神的遗产，就保持了对自然界的绝对优势。因此，这种纵的联系就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继承之链。

中国的农耕文化需要家的和睦，就必须强调这种继承。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中国人群的基础就是家、再是族。家族的最重要标识就是姓氏。中国人在学会了喊爸爸妈妈，就明白自己姓什么。这种姓氏的强化，是时时提醒你的存在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是父母所生，你和父母兄弟构成一个家，众多的家是一个族，众多的族是一个部落。你是为这个群体而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中国的姓氏理念是区别于世界任何族群的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让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历史的感觉中。这种历史感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横的纵的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宗族力量。这种力量与自然经济的结合，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可以说，姓氏在中华民族有着牵心系情的巨大力量。姓氏观念是中国的人本哲学，这里的“人”是群体的存在。“人”是现实联系的人，家庭是人的第一个社会环境，父母的存在是“我”存在的前提，回报父母就是做人的首要责任。可以说，中国文化区别于异质文化的

根本就在与个体与群体。

中国的群体价值首先诞生于家庭，实现家庭和睦相对容易，因为家族成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是自己人。当家扩大到家族时，父母、最年长者、德高望重者，这些人在家庭、或家族成员间如何进行财产分割、权力分割、矛盾调解方面，在多数情况下，相对于外人来说可能具有更大值的公正性。很多时候，长者的分配明显的不公正，但其中有对弱者的偏爱。只有对自己的亲人有着十分清晰的熟悉和认知，知道你具备一种能力，对你的分配少实际上就是对你内涵的能力的肯定。这种肯定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鼓励和高看，这种鼓励和高看是精神层面的，绝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家族扩大规模，公正性就一定会逐步降低。然而，只要家族成员还认同家族的存在，就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家族得更大利益。人生能维护整体，就是生命的价值。你维护的整体有多大，你生命的价值就有多大。这就是家国民族天下的价值观。你选择维护一个家庭，你就修炼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儿子（女儿）、好父亲（母亲）、好丈夫（妻子）、好兄长（姐姐）。你选择维护一个更大的整体，你就要修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去实践自己的生命价值。中华民族就从家到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炎黄的融合。

“随”是炎帝神农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与轩辕炎帝为代表的黄河文化融合的一个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标识。“随”是一个会意字。“随”的左边是“阜”，《说文解字》解：大陆山无石者象形，高坡的意思。“有”，篆文上面是手，中间有“工”，规矩的意思（《说文解字》），下面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即肥肉的意思，这是规规矩矩侍候土地。中间画的是人的足。这个字讲述

的就是两块土地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从小处看：“阜”就是一个小山丘，中间有“工”的“有”只是一块肥沃的稻田；如果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阜”就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那是整个黄河流域，中间有“工”的“有”就应该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

黄河流域的粟稷旱作农耕是一种相对粗放的农耕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广种薄收，广种需要广阔的地域，黄帝部落跨过秦岭扩展自己的力量是生存的选择。稻作农耕是一种精细农耕。一块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发生冲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场冲突是浩大的、激烈的。想一想，如果失去几代人的努力而成为良田的家园，将是怎样的下场，一方面为了生存拓展空间，另一方是为了生存捍卫家园。为了生存就决定了这场冲突激烈和残酷。那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没有办法跨时空地传递当年的信息，但我们可以想象这场厮杀的血腥场面，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叫人难以忘怀。人们代代口耳相传，传到了有文字的时代。人们把这场冲突称之“炎黄之战”。历史文献讲的“血流漂杵”，就是说这场战争的残酷，四个字把那惊天动地、撕肝裂胆、血肉横飞、尸陈沃野的残酷和激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这四个字仍叫人胆战心惊。最激烈的对抗和缓过后，炎黄二帝面对部族的牺牲开始冷静地思考。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对方，这就是共生共荣。

对抗是不可能让任何一方获得利益的。唯有和解可以让双方共赢。传说，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认为如果能减少部族的牺牲，保住完整的家园，就是承认一个中央天帝。他就答应了

黄帝，他对黄帝说：“我把我的诞生之地更名为随，中间加一个‘走之’，以示我炎帝神农永远拥护跟从中央天帝黄帝。”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在中国的语言工具书中，“随”有许多解释，核心含义是跟随的意思。从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因炎黄的融合成为人类世界文明发育成长最完美的空间。粟稷旱作农耕与稻作精细农耕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文化生态融合。这是秦岭以北的粗犷豪放与淮河以南的精细柔美同时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性格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随”虽是以炎帝神农跟从黄帝而出现，但长江黄河结成一体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永恒的主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江和黄河曾有过分裂的历史，但无论分裂多久，分裂的双方都为统一作着准备。这其实就是特殊状态的统一。那么，“随”就不仅仅是一个地名的标识，它是炎帝神农的一种胸怀，一种智慧，其中隐匿着一个民族最稀缺的统一元素。历史文献记载，炎帝神农在哪个省、哪个县，哪本注释又是怎么解释的，并不重要。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字的成熟定型在殷商时期，成熟的甲骨文字实际上并不是记载历史的文字，如果绕开文化发生的大背景，去解读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的小传统必然遮蔽历史文化的真实，不如直接解读文化发生发展的山川江河。中国能成就为一个整体，离开了长江与黄河的融合，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长江与黄河的融合就必须有“随”，炎帝神农精神之所以极其珍贵且至高无上，就是炎帝神农有牺牲自我，聚集成就整体的过程。实际上，“随”就是“伟大”和“崇高”的过程。随州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为“神韵”，最为坚实的支撑就是随州有炎帝神农文化，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就是追求和谐、成就整体、奉献整体。有了这种追求，生命才有了品质和质量。人们

把这个追求用两个字来表述，这就是“修身”！有这种修身，才能产生和谐、和顺、和睦、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合、祥和、调和、温和等等效果。

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文化追求家的和睦，必然进一步追求社会的和谐，因此带来国际间的和平。这种家国一体的文化，是引领世界走向大同的文化。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他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还进一步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中国炎帝神农文化衍生的家国民族天下家族社会结构，是一种符合天道的文化价值，具有人类文明正确走向的先进性，这种价值代表着未来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实际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是一种走向天下大同的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研究事物的运行规律，符合天地运行规律的文化当然是科学。家庭里家长当家，家族里族长主事，就好比太阳温暖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这是天道！如果在家庭里强调个体利益，最好的选择就是分家。

人类本来就是一家人，联合国成员国从成立时的51个到今天192个，不是这个世界扩大了，而是更多的国家分裂了。显然这种分裂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人类集体自杀之路”。这个西方的历史学者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中国家民族天下文化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这也指出来随州炎帝神农文化的真正普世价值，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能支撑世界一统的文化。如果人类走向群体成为一家人，唯有使用产生于炎帝神农创造的、和睦和谐和平的、农

耕文化价值观，是最好的选择。人类最高的追求，会对随州的炎帝神农文化、因此衍生的中国的社会制度产生坚强的自信。

随州把自己的发展战略定位在“神韵”，首先是随州这片土地有“神”。文化的发生需要天地灵气、日月精华，文化的发展需要历史积累、地域交融，历史只有进行深厚的积累才有养分、地域文化只有进行激烈的碰撞才能显现异质文化的优势，随州就可以从这种积累和优势中获得茁壮成长的营养，这种具有原生性、融合性特征的文化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出现的，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够作为一个地方的灵魂。《中国救荒史》有一段资料，记载隋唐326年中国县以上建制赈灾用粮进出国库的记录。326年随州仅有12次灾荒，两次水灾、十次旱灾，而随州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在百次以上。这个数据说明随州是中国最好的农耕之地。先祖们选择这片土地生活，不仅创造物质，而且创造了意义。

创造的物质是先祖自己享用，他们创造的意义却成为永恒，是后人享用不尽的财富。这些意义就是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和平。要达到这“三和”，我们就要学会做人。会做人的人做官可以做大官、会做人的人做生意做大生意，会做人的人做学问做大学问。这就是中国人的君子之道，获得君子的路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顺应天地运行规律看做“道”，把适宜社会发展潮流认作“德”，具备这种“道”与“德”作为自己人性修养的基础。让道德观念参透一切，强调个人的品格修养，把人性修养放在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有良好的人性修养，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家长。这个好家长就一定能走进官场，中国最早的举荐制度“举孝廉”，就是让好家长走进官场。

今天的国家干部晋升制度，实际上也是有“举孝廉”的意

味，没有乡镇一级首长任职经历，就不能成为县市首长。乡镇一级首长不能把乡镇的父老乡亲当做自己的亲人，就不可能成为优秀首长，也就没有升迁的机会。这种梯级升迁，越到高层投机的可能就越少。中国的学问就是从家庭开始的，善于投机又可能进入乡镇首长或县市首长，然而没有过硬的人品，很难成为省以上首长。《孟子》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如果你的行为不端正，连你的妻子都觉得不能相信和诚服，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和诚服呢？家庭是社会的最初形态，最基层的单位。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内部的关系都处理不好，他还能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吗？一个没有孝悌之心的人，怎么可能想象他把孝悌之心扩充推广到社会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有孝悌之心的人，是仁的起点，这是“亲亲”，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治理好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俄国现实主义顶峰作家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会做人的人能把不幸的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条，变成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人看上去很有魅力，能说会道，很幸福的家庭能让他治理成不幸的家庭。西方今天的选举制度，就很轻松地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实践证明一个人的政治治理能力，只能靠他的竞选演说，把一个国家的命运交给一个能够口头许诺、能不能兑现则要等到当选之后，不能兑现也只有投票人的懊悔，选出一个没有实践经历证明有操作能力的人，确实有些难以理解这种制度的先进性。中国的家国民族天下体系，通过几千年的运行，把能治理好家的人，拔擢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当家长，然后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把更多的人当做自己的亲人。

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体现在家，紧接着就延伸到民族，国家的

荣衰兴衰之中。只有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孝廉”走进公务员队伍，像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一样敬爱他人的父母兄长。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就出现了相亲相爱的和谐气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就在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生活。随州因为上苍的眷顾，赐予生命成长的优越环境，炎帝神农的出现，农耕生活的累积，必然成为东方文化的源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交汇之地，不同的地域文化持续地为这里输送营养，随州文化始终呈一种成长的态势。走进随州，解读这片土地的生态，就能够读出中华民族的心智系统和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那陂陀岗地、冲积平原、千山万壑、千溪百流滋润濡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

“神”是“韵”的灵魂，“韵”是“神”的生命。一个地方有“神”和“韵”，就不仅仅是外在的空间上的匀称、平衡、和谐、色彩上的鲜艳、瑰丽、娇媚，而是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展现出生命的活力与文化的样式。自然的山水，虽然美丽，但没有文化之魂，就显得苍白和轻浮。好比坐台小姐，怎么看只能看出艳丽，却难以看出高雅和端庄。只有行为举止中透出的韵味，才能够征服心灵。所以，“韵”是中国美学最高的审美范畴。西方美学最高审美范畴是“美”，中国对美的追求除了美之外，还追求更内在的“韵味”。《淮南子》载：“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这里的“美”和“悦”就可以让我们充分理解“韵”。美是空间的布局协调、匀称，色彩的和谐、艳丽。这只是美的形式。然而，“悦”则是美的感受，内心深处的愉悦状态。显然，“韵”是超过“美”的。这就是说：“神韵”是比“美丽”更具内涵的神形兼备的端庄、优雅。

2010年，随州市作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决定，市委书记刘

晓鸣在动员会上，深情地对全市人民说：“天地宇宙为给我们创造了这片神奇的山水，老祖先顺应自然为我们留下了‘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今天我们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就是对随州山水、炎帝神农文化最好的保护、继承、发展。”很多人觉得“神韵随州”，有些玄妙，其实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原随州最美的生态、放大随州深邃的文化，解读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细节。在随州感受天地宇宙、历代先祖用全部的生命滋润和孕育的中国文化。从自然的景物中体味山的重叠、水的缭绕、云雾的锁断、空间的弯曲游动；不要以为山水仅仅是线条和色彩，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而是有内在的天地运动节奏和宇宙能量辐射韵律。读懂这种节奏和韵律，就一定能够大彻大悟，随州就是文化中国的样本，原来是这样富有生气与活力，气质是这么高雅、精神是这样磅礴。

天地是生命的母亲，森林就是人类的妈妈。太阳的能量辐射到地球，绿色植物来进行神奇而微妙光合作用，实际上就是转化宇宙深处的能量。这种转化写作： $\text{CO}_2 + \text{H}_2\text{O} + \text{光} + \text{绿色植物}$ 。地球上生命的转化过程全靠这种方式完成。绿色植物在转化过程中需要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制造的有机物中的过程。果子、种子、坚果、根茎、块茎、菌类等各种食物就是宇宙深处能量转化而来。森林中的动物就是依靠这些食物，最终给人们提供肉食和动物蛋白。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不能直接把太阳能量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必须通过植物和动物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人是食杂动物，正因为食杂才保持了自己进化为高级动物。人有28颗—32颗牙齿，其中用来吃各种蔬菜、瓜果食物的牙齿叫切牙

和磨牙，用来吃肉的牙齿叫犬牙。因为有能撕咬的犬牙，人就能从肉食中获得足够的营养，促进脑细胞的发育得以进化。人的犬牙只有四颗，说明人的食物总量有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肉食就足够人的进化，不必对肉类食物产生过分的依赖。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蔬菜瓜果，维持自己生命必须的养分，人在这种生存的需求中走上了劳动之路，劳动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长。

劳动让人伟大起来，伟大起来的人类忘乎所以，不知道天地间有一种神圣、庄严、崇高的秩序，人再伟大也不能超越这个秩序。天地不是一个干瘪、空泛、粗糙的概念，而是由新鲜的空气、蓝湛湛的天空、飘飞的白云、洁净的流水，还有那每一棵树成长增加的那一圈一圈的年轮。时间和空间构成了人必须尊重的威严秩序。人不是霸主，人必须敬畏日月星辰、山林川泽、平原丘陵、草木鸟兽。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开垦耕地，多产粮食，滥伐森林，毁林造地，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农作物反而减产，挨饿的人越来越多。森林的消失，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被破坏，全球的生态失去平衡。人类自大格局就小起来，滥伐森林就毁坏了自己的生存根基。

人敬畏尊重天地自然，因为人只是天地万物之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人类知道了自己的渺小，格局就大起来。人需要氧气，绿色植物的光和作用就是吸收二氧化碳，制造人体所需的氧气。一棵树实际上就是一台氧气发生器和一台二氧化碳吸收器。一棵椴树一天能吸收16公斤二氧化碳，一公顷阔叶树林每天约吸收一吨二氧化碳，释放700公斤氧气。城市的居民如果每个人有10平方米树木，所产生的氧气就保证一个人有足够的新鲜氧气，也足以化解人呼出的二氧化碳。绿色植物还是“天然除尘器”，树叶叶面有许多细小的茸毛和黏液，主要功能就是吸附空中微粒，碳、

硫化物等有害微粒，病菌、病毒等有害物质主要隐藏在空气的尘埃之中，城市绿色植物能使尘埃大量减少和降低，一公顷草坪每年可吸收烟尘30吨以上。有些树木如松、樟、榆等能分泌出特别的杀菌素，能大量灭杀结核杆菌、白喉杆菌等危害人类健康的病菌。城市森林的出现还给城市安装来天然的消音器，绿色植物吸收声波，能减低城市的喧嚣和浮躁，让人心进入一种宁静平和的状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环境”或“生态”的地方大幅达到45处，成为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词。随州党委政府从报告中“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认识到市民生活的基本环境质量，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响亮提出了“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奋斗目标，并全力创建随州“国家森林城市”活动。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其实就是炎帝神农文化“天人合一”思维观念的延续。随州市委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定位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主题为“神农故里、森林随州”。这就是说随州的国家森林城市整个创建活动要围绕“文化”与“生态”展开工作，把炎帝神农文化转化为随州内在的气质之美，凝聚和升华外在之美的保障和灵魂。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文化与生态的动情叙述，体现出一个政党的成熟，明白“道”就是对待天地自然规律的顺应，“德”就是对社会发展潮流的适应。市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处于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之地，“神农故里、森林随州”奋斗目标的提出，就是实现从改造自然、战胜自然，转变到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以一种更急切的心态，渴望修复受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

建设国家森林城市，不是装腔作势，而是站在“给未来留下什么”的高度，慎重对创建工作谋篇布局。“神农故里、森林随

州”的森林城市定位，绝不是空洞无物、华而不实口号，也不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针对随州的历史文化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的高端精准谋划。谋划与规划不同，规划是技术层面的行为，是按照成型的思路进行布局设计。而谋划则是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审势评估既有资源，使之得以重新组合，在这种组合的过程之中创造出机遇，而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遇，就等于把握了我们的未来。认真思考“机遇”这两个字的构成，实际上就可以理解它的深刻内涵，它是无数机缘的巧妙重叠相遇。“神农故里、森林随州”就是谋划文化与生态重新组合，让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真正成为文化中国的样本城市。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任何一个人只要走进随州，就能从随州的文化与生态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未来的方向。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的神奇，就在于天地自然间，无限的时空构成的大舞台，物质这个演员在演绎生生灭灭的大戏，人类这个物种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这个小角色将来是什么样的命运？谁也不能保证人类这个物种不会灭绝。古人说：“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人的个体生命无法与天地一样久长，然而人的思想和目光能和天地时空一样大的时候，我们的胸怀才能博大渺远，人类才真正感知到自己的渺小。这时我们才感觉到先祖炎帝神农创立的“天人合一”理念，是对天地秩序的敬畏和尊重，只有这种敬畏和尊重才能让人类的生命和天地一样久长。

文化发源于生态，良好的生态才能确保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好随州的生态就是保护随州的文化。华夏悠悠文明史，烈山脚下是源头。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才能诞生华夏文明的始祖炎帝神农，随州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随州自然生态环境所孕育的地域文化细节就越清晰，农耕文化特色也越

来越深入具体，中华民族文化就越是丰富多彩，人们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就越是对随州与中华文化的渊源越是有透彻了解。中华民族对文明始祖炎帝神农那种慎终追远的情怀，就越是能凝聚全球炎黄子孙的力量，民族的复兴就越是具有旺盛的精神动力。

文化中国的样本首先就是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随州成为中国年轻的地级市，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必然，因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也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随州的城市发展路径以顺应天地为根本，这种顺应自然规律、就是“大道”；能把“人”的根本需求放在重要地位，满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以人为核心，这种顺应人心所向、就是“大德”。

随州市委政府在城市的核心区位规划了一个687公顷的随城山森林公园。随州城市市区位于大洪山山系中低山区，随城山公园自然地貌保持完整，丘陵地形呈缓坡起伏，植被覆盖率高，也有小型水体斑块镶嵌其间，景观视觉良好。森林是随州城市的绿肺，不可或缺，维系着城市的整个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独特的地形地貌、动植物的丰富多彩，山地森林可以创造出比平地更丰富、更立体的景观。走进随城山公园，满目青山，就必然产生“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怀，每个进入随城山公园的人顿时得以提升，成为智者、仁者。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有山有水的随城山公园其实就是赋予了这片山水道德哲学内涵。

森林涵养水源，1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这就让林区上空格外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能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有森林的地方降雨就格外丰沛，大雨降落到森林里，渗入土

壤深层和岩石缝隙，以地下水的形式缓缓流出，冲不走土壤。据武汉市环境监测站测定的结果，随城山森林公园平均空气负离子每立方厘米含量高达6.1万个，负离子含量在旅游旺季每立方厘米也可达到6.32万个。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能促成人体合成和储存维生素，强化和激活人的生理活动，对人体7个系统，30多种疾病具有抑制、缓解和辅助治疗作用，尤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更为明显，对人体生命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在城市里，每立方厘米含有的负离子很低，室外仅有几百个。

空气的清新，主要依赖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人们知道正负中和的原理，负离子带负电荷，有强烈的吸附特性，空气中的微颗粒物带正电荷，正负相遇就产生相吸。因此负离子看似不起眼的粒子，对人体健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吸附，除尘、灭菌，空气中的负离子像食物中的维生素一样重要，有“空气维生素”、“空气清道夫”诸多美称。传统农业能较好地接受和运用宇宙深处的能量，保证可持续发展，随州是农耕生活开发最早的地区，到今天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近代工业不满足眼前的接受和运用，竭力开发地球历史上接受积淀下来的能量，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种开发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能源，就给大气增添带正电荷的细颗粒物，这些细颗粒物给人类生命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

我踏勘随城山公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载，随州邻近的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所谓空气重度污染，就是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太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粒子太多，这些粒子可能是尘埃、或是病菌、也许是病毒，它们就漂浮在空气中，被称为PM2.5，也就是细颗粒物。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含量越高，代表着空气污染越严重。这个城市空气中的细颗粒

物严重超标，导致城市三次启动雾霾应急预案。污染源企业停工减产，增加道路清扫、洒水压尘的频次，建筑工地停工、渣土停运，排查工地裸土和搅拌站扬尘，货车限行、禁止尾气排放超标的机动车上路运营，还有学校暂停体育课、课间操等。看到这些文字，当随州人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不知道呼吸大量尘埃、病菌、病毒的空气是多么的痛苦，不要以为有钱就是幸福和甜蜜。

地球上没有“全能文化”，文化是特定生态的产物，工业化带给我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伴随大规模工业化，也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处在农耕文明的时候，期盼工业文明的迅速实现，当我们的经济迅猛发展，生态环境受到威胁时，我们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好生态是那么怀念。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看起来是一种冲突，其实真正的智者，能够从中进行很好的交融。工业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转化，是获得财富的过程，获得财富的终极目的是让人生活的更加幸福。随州就是通过良好生态的保护，文化的提升，让随州一个古老年轻的城市获得一种优雅的能力。

优雅是一种能力，看起来不要成本，却能让人感到震撼。有优才有雅，路易十六玛丽王后美艳动人、惹人怜爱，天生丽质，公认的优秀。传说她走上断头台的时候，无意踩到刽子手的脚，欠欠身也不失贵夫人优雅气度，说：“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法国人至今对此念念不忘，觉得她生来就是王后。这是一种高贵的本能，只有本能才能自觉、才能表现出这种高贵的优雅。人的高贵就在于懂得尊重，尊重父母、尊重有恩自己的人，这很好理解；尊重天地、尊重自然环境，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感恩；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同样是一种感恩，因为我们的成长是历史文化的营养滋润濡养。走进随州，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尊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独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故事。随城山公园、随州文化公园、街头的众多的文化广场、绿树覆盖的历史街区，都能讲述出一个优美动听的历史文化故事，“小城故事真是多。”这些故事中蕴含着随州人对天地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森林走进城市，城市拥抱森林。”生态的随州濡养出文化的城市，“神农故里、森林随州”绝不是当代随州人能够创建出来的，而是天地自然、悠久历史浸润滋养出来的，是文化中国的一个典型样本。

随州的城市乡村，形成完整的城市森林建设格局，有森林走进城市工程、城市生态保护圈建设工程、绿色家园建设工程、绿色通道建设工程、水系绿化工程、平原防护林工程等等大项目，构成完备的城市森林生态体系、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随州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在生态的修复过程中，东方文化的和谐元素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随州安居镇处于大洪山与桐柏山相对的玄牝之型谷地中心，自然条件是极为优越，宜于耕作和居住。这个镇有个村子叫和睦畈，集体所有制的时候，生态基本可以。分田到户之后，人的欲望的以扩张，无限制的索取，陂陀岗地的极度开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过苹果、九十年代栽种过银杏，均以毁林复耕而告终。看起来人类是想在贫瘠陂陀岗地上索取，然而这种索取没有顺应天地的规律，让天地间的能量达到最佳的聚积。宇宙深处的能量进行转化需要条件，阳光土地水分等等。本来有深厚生产力的丘陵岗地经过折腾，生产力迅猛下降。每年的雨季，山上的耕地没有森林的涵养，泥沙俱下，堰塘淤塞、耕田被毁，水土的流失极为严重。

镇党委政府和农民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再走集体道路。但这时的集体道路与过去的严重制约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

性的大集体，又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集中规划、集中造林、集中管理，分户承包、分户受益。几百个劳动力分成造林专班，真正的人多好种田，只不过和睦畈村把陂陀岗地当良田来种。两个多月，栽种湿地松75万株，点种橡子4万多斤。当年造林成活率达到98%以上。十余年过去，走进和睦畈村，满目青山，带给人的是格外的轻松和惬意。这片青山森林直接收入达到千余万元，户平万余元。2011年3期《百科知识》资料介绍，我国云南省林业调查队，对森林效益进行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森林的生态效益的总价值占森林总效益价值的94%，直接效益仅占6%。评价森林的作用，不能单纯看它能生产多少木材和其他林产品，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对生态环境、促进农牧业生产等方面的间接效益。

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的教授认真测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棵树生长50年，木材价格如果值300多美元，这棵树的综合价值，就远远木材价值多少倍。粗略计算，这棵生长50年的树每年可以生产出价值31250美元的氧气，价值2500美元的蛋白质。可以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通过换算可以值62500美元、涵养水源、促进水份再循环进行美元换算价值37500美元，防止土壤侵蚀，增加土壤肥力用美元计算价值31250美元，还可以为鸟类及其它动物提供栖息环境也能美元计算价值31250美元，将这些综合价值计算在一起，那么，这棵树的值就是20万美元。这就是说，砍一棵树，虽然能够获得300多美元价值，却要损失20万美元的生态效益。

虽然和睦畈村没有被评定为中国美丽乡村，但只要走进这里，圆润的丘陵有隐隐约约的仙气。细细体味太阳照射下来，被浓浓的树叶细细筛过，有一丝半缕落在地面，地上的水气攀缘着

阳光冉冉升腾，象一抹轻纱把山峦的蜿蜒曲折遮盖起来，丘陵顿时有了绰约动人的姿态。这时就自然能吟诵辛弃疾的《贺新郎》：“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与青山互观互赏，当人的心境与天地的美景融为一体，人世间的知音原在这山水之间，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美好精致，还没有被选定为“中国美丽乡村”，随州被确定为“中国美丽乡村”试点，就有好几处。

随州敢把生态建设奋斗目标定位在“神韵”层级，还源于随州是兰花的故乡。兰花有丰富的种属体系，足以承载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随州被称为中国的“蕙兰之乡”，随州兰花枝叶的姿态、花的精妙、香的韵味都浸染着文化的味道，随州的“国家森林城市”就进入了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韵”的实质即美的本质。兰韵创造过程，包含着人生，积淀着哲理，给人以心理的愉悦，而兰的鉴赏过程，则是兰草香花叶株的引起的心理愉悦的直感仔细品味把玩，体悟人生、宇宙、自然。兰草细节都融解和积淀着生命的脉跳，容纳并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内涵。这种植物可以容纳人类感情色彩，于是赋予它崇高的象征意义，能唤起人类生理和心理快感。植物的文化性得以升华，兰花以生命的活体状态展现出来的，兰花文化就闪烁出无尽的魅力。

兰是一种骄傲，不是任何一块土地敢妄称自己为兰乡。它需要有千百万年的岁月对这片土地的挚爱，用一种深情来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对它进行精雕细刻，这里才生长出了这种株、叶、花俱灵巧、雅致的草本植物。同时，这片土地必须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氛围笼罩，这种植物，让它具有广泛普遍，普世价值的文化意义。炎帝神农故里，东方文化的源头之地，东方文化的核心元素，“和谐”来培育，濡养这高贵的植物，随州才被称

之为兰乡。随州兰花成为产业，当年漫山遍野挖兰花追求利益的农民，今天耗巨资重新购回天下珍奇兰花品种，在随城山公园建成兰苑，让随州的普通民众能认知兰花的丰富内涵，认知兰花所容纳的文化意义。兰的生命、人的感情，在这里被融化成一个整体，独特的植物生命体系震撼另一个生命体系，这种震撼本身就是一种奇观。

解读这种奇观，考验着真正文化人的才气。这种考验具有巨大吸引力，只有走进随州，读出无限的神韵，在解读中就能够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文化品位的提升就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生命品质和质量。

重塑城市精神灵魂

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城市昂扬的精神、高贵的灵魂，城市的精神灵魂才是一座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根本。2008年随州市组建新的领导集体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随州建成一座有精神和灵魂的城市。新市长在大会上讲：“走进一座城市，眼睛一亮，这座城市绝对有品质和质量。城市杂乱无序、乱糟糟的，就像一个人蓬头垢面的，说这样的城市有多大的竞争力，那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其实，衡量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有三个基本判断，人口达到多大规模、是否有专用精神活动场所、文字出现与否。

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就是精神和灵魂。精神是内心的光明，人内心光明，他的面前就没有黑暗；灵魂是人的元气支撑，高贵的信仰就是生命的追求，人的信仰是志向、是意志、是胸襟、是永不衰歇的生命动力。随州虽然是后发地区，要想赶上先进地区，必须有精神的凝聚和思想的升华。懂得城市，就要为随州人谋求最大、最长远利益，那就是养育随州市民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才是城市的竞争力。随州最不缺是文化资源，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化为随州人内心的光明，可以就形成随州建设发展的巨大精神能量。市委、政府决心在随州未来的市中心，建设一座文化公园，把随州文化碎片，连缀成完整的

风景。

这是一个近千亩的公园，除去道路净面积有920多亩。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需要一些胆量和气魄。人有守护家园的天性和基因，后发的城市最需要守望的自己的精神家园，心中有一种敢于超越的精神，才能实现弯道超越。《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实就是说精神的养育，要天天清晨饮用木兰上的露滴，夜夜用菊花残瓣充饥。也就是说天地间的精华要朝夕与之相伴，润物细无声地化进自己的心灵。随州文化公园的建设，就是用随州历史上的优质文化元素，滋润濡养随州人的心灵，培育一种奋发的精神。

修建随州文化公园的决策，是那充满睿智的慧眼，敏锐地发现了随州这座城市的资源和财富。让随州高品质的历史文化朝夕与随州人民相伴，养护随州人的心灵，珍贵的历史文化进入随州人的内心，渐渐充实随州人的精神内核。一代精神强健的随州人，就是让蓬头垢面的城市骄傲自豪地站立起来的根本，站立起来的城市不仅仅是物质的充分涌流，更是精神强健，充盈生气与活力的城市。如果内心力量的缺乏，物质充分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一个地域拥有充分的精神财富，这座城才能够光辉灿烂、魅力四溢。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很多时候，在精神和物质都需要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来选择，更多的人会选择物质。我们不能说这种选择不对。因为人和所有的生命一样，首先是物质的存在，才有生命的存在。然而，人不同于一般的生命，能从普通动物生命中脱颖而出成为高级生命，就在于人在接受物质营养的时候，同时能够吸纳精神营养。只接受物质营养的生命，只能够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在接受物质营养的同时，也能吸纳精神营养的生

命，就可以一代一代地发展自己。人能够从动物中进化成高级生命，就是靠漫长的时间发展自己。也正是因为这种进化时间很缓慢，吸收精神营养发展自己，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到效果的。所以，只要一说到精神营养的事情，就会有人反对，觉得应该把这精神营养的成本，折算成现金，变成物质的东西一人分发一份。

政府对随州的文化积淀进行概括提升，让历史文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化进人们的心里，陶冶人们的灵魂，往往要花很多的精力来进行解说，甚至顶着很大的压力来投入这种长远的建设。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材料是经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审阅的。随州最后能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占到30%的分量，编钟出土地占到30%，随州历史文化名人遗迹占到20%，现实中的随州青城与土城遗迹占到20%。政府希望建设一个公共园林，随州历史中的辉煌记忆，在这座园林转变成光彩的符号，和随州人民朝夕相处，用祖先的精神，陪护当代随州人的心灵，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滋润和濡养随州人的内心和精神。随州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跨越式发展，改变自己困弱地位。真正的智者看得很清楚，随州困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精神；弱的也不仅仅是体量，更是内心。这个专用的精神活动场所，用随州先祖的光辉照耀和温暖当代随州人的内心，是最有说服力的能量和养分，是最佳的“木兰之坠露”、“秋菊之落英”。

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被遗忘，导致随州大众对自己的过去缺乏认知。人在成长中朝夕接受的文化、习惯、信仰等信息，就认知凝聚成为人的品质。人的品质在形成过程中，正能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国28年，随州安居的肖店朱四用拾枪打死日本少佐，日本人突然围住安居的肖店。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大湾子，

老老少少都在场子里站着，没有一个人指认是朱四用抬枪打死的日本少佐。60多年过去，当年的小娃子已经是老汉了。这些健在的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知道绝对不能说。他们从大人的目光中看到，说了就是背叛，一生一世就不能在这湾子里做人。当时的娃娃们都晓得是朱四开的枪，也晓得朱四就是他们常常喊“朱四哈巴”的那个人。他们可以喊“朱四哈巴”，但他们绝不会出卖这个人。他们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但他们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凭着庄稼汉的直觉，如果说出了“朱四哈巴”，就是汉奸，就是进不了族谱、进不了祖庙的千古罪人。这就是一种正能量形成的强大气场，在这种气场中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精神的力量。虽然至今没有一个文人来写这件事，但并没有因为这件事的默默无闻，就可以淹没安居肖店那许多高贵的灵魂。随州普普通通的环境里，安居肖店人也许不知道这就是内心的高贵，正是不知道，才有了真正的灵魂高贵。

随州最高品质的文化就是炎帝神农文化，一说到炎帝神农文化，就有人以为自己读过几本书，觉得这是一件胡扯的事。你跟他问有多少历史文献记载，他说文字出现才只有3000多年，炎帝神农是5000年以前的事，3000多年的文字怎么记载5000多年以前的事？你跟他问，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是口耳相传，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就记载这口耳相传的历史。不管你怎么说，他就是不信。其实，这种不信，是因为缺乏可信的说服力。如果用更高更宽的视野看炎帝神农，它包含着三个层面。

一是普通民众的信仰，对自己生活现实有一种感恩，吃的、穿的、用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是从何而来，就会对创造发明者及自己的身世产生想象，这种想象要寻找一个具体的人，谁是感恩的最佳对象？当然是自己的祖先。南方人有祖先、北方人也

有祖先，南北各地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文明的创始人。这就出现了四省多地炎帝神农故里。人们在感恩中会把中国文明的所有农耕创造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很多时候是夸张和神话的，历史一出现神话与夸张，就会失真，变得不可信。

对待这个层面的炎帝神农认知，不要用理性观念来审视民众的信仰和崇拜，要以宽厚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对于四省多地炎帝神农故里，应该清楚这是民间信仰，予以尊重和理解，要多加强联系和交流。许多姓氏奉炎帝神农为始祖，“烈山五姓宗亲会”就有天下179个姓氏出自于炎帝神农的考证。不能认为这种考证没有多少科学价值，这种恋宗的亲情，不仅仅是世界五姓宗亲回归恋土的文化心态，还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受到的姓氏教育和宗缘熏陶，而产生不可叛宗忘祖的具体体现。我们都是炎帝神农的子孙，先祖是每个中华民族儿女最深的根系所在。

其次，炎帝神农就是创造农耕文化的英雄，农耕文化的发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绝非一个人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完成。炎帝神农就应该是无数先民智慧的集合，众多先祖英灵的聚集。农耕文化的核心是爱和善良，炎帝神农是一个文化英雄，其实就是无数爱和善良的人聚在一起的图像。从这个层面说，这个文化英雄的许多内涵与第一层重叠，不能重叠的部分是地域。史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生活在中国的无数个地域，其中最为发达的是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长江地区的代表是炎帝神农，黄河地区的代表是轩辕黄帝，中国文化决不能排除长江流域，更不能排除黄河流域。

这个层面是我们随州地域文化研究可以着力的地方，唯有地域特点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复制、也难以替代的。比方南方的稻作

农耕文化生态，北方地域不可能产生，稻谷是精细农耕中的重要农作物，在实现高产的过程中，稻谷生产中产生的“聚集”、“秩序”、“理性”这三种文化元素，离开这三大元素，无法想象中国文化能够发生，能够走到今天。炎帝神农离开了长江流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就不能成为文化英雄，南方地域文化的这些元素，才能成就炎帝神农为中华文明的血脉之宗、农业之宗、文明之宗。

北方的农业因为地理气候等原因，只能进行旱作物种植，这种粗放种植，间或有养殖与放牧，虽然有丰富的蛋白质营养，它们为北方人体格的强健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必然诞生粗旷豪放、勇猛彪悍、雄壮豪迈的轩辕黄帝，黄帝的王者之气就是帝王气度君临天下，征服人心。正好印证中国文明炎黄融合的多元共生历史实质。炎帝神农是一种宽厚平和、温暖慈祥的老农形象，他的伟大在于许多发明创造，也都是我们老百姓吃喝穿用等基本生活需求，他站立在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的心间，不是那种勇猛彪悍、雄壮豪迈的帝王气度。

北方谈炎帝神农，怎么谈也会让北方的炎帝神农与轩辕黄帝的文化内涵重叠。轩辕黄帝与炎帝神农融合在中国北方很小的一个区域发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多元融合，没有多大的意义。

谈到炎黄的融合，就离不开“随”这个字，这是炎黄成为一个印记，更是中国南北融合的一个特别的标识。这个印记和标识隐匿着一个民族最珍稀的融合元素。文化的成长主要依靠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融合，在反复交融激荡中积累和吸收营养。随州地处中国中部中心的地理位置，就是不同地域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的一个中心所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的四面八方往这里输送营养。“随”是一种融入，不仅仅是让随州文化得以

成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随州地域文化的分析，看到中国整体文化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否认中国的文化是由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共同构成，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就是否认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本质特征。

随州举办世界华人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主要展示随州地域文化中，文化发生、发展、定型时期的文化元素，以证实随州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定型的重要地区，随州地域的先民为中华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其实就是召唤全球的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来到随州。随州的文化具有原生、融合两大特点，其中蕴含着一个民族最深刻、最持久、最核心的文化特性，认知和接受随州的地域文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华文化，这是真正的归宗认祖。

其三，炎帝神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表述，既是农耕文化发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符号，也是中国文化发生以后、成熟、定形的一个专用词语。炎帝神农时间和空间上的边界，从时间上来看，“炎帝时代”是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和龙山文化的早期，即距今5500年—4500年。这是发生时间，真正发展定型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炎帝神农作为文化概念的时间边界是距今5500—2200年。空间问题是炎黄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问题，炎帝神农的歧义均是因为空间边界的模糊引发的。史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生活在中国的无数个地域。其中最为发达的是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长江地区的代表是炎帝神农，黄河地区的代表是轩辕黄帝，中国文化决不能排除长江流域，更不能排除黄河流域。只要炎黄文化的时空边界清晰了，随州的地域文化特点就十分重要和突出了。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而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蕴

涵着无数中华贤哲几千年来的辛劳与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还在一种成长之中，不然它就会消亡。到今天我国的钓鱼岛山峰命名，作为国家行为选择炎帝神农命名，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文化的性质特征。

炎帝神农文化应该是随州城市的核心文化元素，老城区里有一座神农公园，然而，公园中的炎帝神农文化氛围却不是很浓烈。必须在新的公园里展现炎帝神农文化的高品质和高质量，随州文化公园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炎帝湖。千万不要以为炎帝湖就是挖了两口大堰塘。两口半月形的人工湖，其实承载着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文化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诞生在随州，也是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的铁证。

温家宝总理2007年5月14日对大学生们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炎黄传说时代，随州始终有人在仰望天空，随州一代接一代人的仰望。首先有长远的目光，继而产生哲学的思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生发展之地。稻谷属于精细农耕的种植，必须掌握季节的变化。播种的时间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对收获产生影响。随州的先民为了更好的生存，产生了仰望，原始天文学就在随州这片土地上诞生。炎帝神农除了种植庄稼，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还想到吃饭以外的事情，在观察天地运行变化之中，得到一种启示，就是把天地的灵气引至人间。炎帝神农的神圣远远超过专业的天文技术，而是从天地运行的知识中寻找生活的智慧。

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黑色陶豆，豆柄上有北斗七星图象，以七个透雕的小圆孔组成斗勺状，酷似北斗七星。随州先民把最重要的信息雕刻在日用的器物

上，这道雕刻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天文学资料。它是一道照耀千古的亮光，子孙们有了这道光辉的照耀，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农业考古》1986年1期，历史学家刘玉堂、黄敬刚撰文，断定这件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内涵距今6000年。

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天空著名的大熊星座，这个星群中七颗最明亮的星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属于大熊星座巨大星群的一部分。今天的科学知识让我们知道了，任何星座的恒星距离，都是以光年计算，物理上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北斗七星在天空运行时，巨大的星群朝着相同的方向运行。这种星象的运行让我们知道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吕氏春秋》认为天圆地方不是形状概念，而是天地运行之道。

天的道是周行循环，地的道是规规矩矩，万事万物各守其位不越规矩。它不是自然是人文，是人类对地理规则秩序的认同，对广阔空间秩序的遵从。这不是天地的形状描述，而是天地的时空框架和阴阳五行运行的结合。太阳的东起西落，极星的四季变化，人们有了明显的时空感觉。这是天地的秩序，人类必须依照这种秩序生存。太阳的东起西落，就是告诉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该睡的时候睡，到了该起的时候起。有人不信这个，到了该睡的时候偏不睡，到了该起的时候偏不起，偏要逆天而行，那么，就要受到天道的惩罚，老天就折你的阳寿。

北斗七星在天上作 360° 旋转，在天空周而复始地运行着，每完成一次圆圈运动的时间是一年，一年365天每天运转不到一度。玉衡、开阳、摇光组成的斗柄指向正东就是春分，斗柄指向正南为夏至，正西为秋分，正北为冬至。我们的先祖把这种运行规律编成民谣传唱：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

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只要仰望星空，就会发现天地在运行过程中是遵循对立统一、圆融和谐规律。很多矛盾是对立又是统一的，比方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夜晚最短，但这种长与短的对立是相互转化的，这一天也可以说是白天最长的结束，最短的开始。从这一天起白天就每天短一点短到冬至那天，再发生变化。这种天地运行揭示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有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元素，这就是哲学中的矛盾对立，在运动中就会发生转变，宇宙万物时时刻刻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

仰望星空的随州先民是不是叫炎帝神农，已经不重要。文化的神奇就在发现，随州人在6000年前，专注地仰望星空，从天地运行规律中获得世界最深邃的思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成长最优质和稀缺的精神营养。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这件黑色陶豆，以雄辩的事实告诉世界，随州人在6000年前，完成了这种神奇的发现，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随州人能仰望星空，四省多地的“炎帝神农故里”，就不能仰望星空吗？当然能仰望，但他们仰望的，天地运行规律可能就是另一种天象。因为北斗七星的最佳观测地域在北纬 28° — 34° 之间，北纬 28° 以下地区，因为地表大气层抖动而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中高赤纬带的北斗七星，只能在很短的时间段内观察到，多数时间这些恒星都没入地平线下。纬度在北纬 34° 以上的人们，虽可在较长的时间内观察中高纬度带的恒星，但如果北斗七星的赤纬低于其地理纬度，则其先民们便不会称呼其为“北斗星”。这是因为太阳系在运行过程中，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高纬度地区的观测角度不断发生变化，而大熊星座始终不变。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湖南炎陵这些自称为“炎帝神农故

里”的地方，均在北纬 28° — 34° 边远或以外地域。看不清楚北斗七星的地方，仰望星空的时候，就会出现茫然。没有仰望，就难以发现天地运行规律，难以获得精神营养。北纬 28° — 34° 最佳的中间值是北纬 31° ，随州地处北纬 $31^{\circ}19'$ ，是观测地球围绕北斗七星运行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中央电视台有个《北纬 30° 探索》栏目，人类文明为什么多出现在这个纬度。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人，能够吸收到人间最丰富、最稀缺的精神营养。

中国境内北纬 31° 左右的地域，东部是江河淮汉地区，常年有旱涝之苦；西部是高山大川，多有地质灾害发生，至今难以进行文明积累。中国境内的北纬 31° 地区，东部和西部的人们都无法静下心来仰望天空，没有仰望就无法完成发现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任务。发现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责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随州人的肩上，随州山不高、水不大，是最适合早期人类农耕生活，随州的先民在生活的需求中，自然而然地抬头仰望天空，探寻着天地运行规律，顺应着天地运行规律调整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炎帝湖的形状就是当代随州人把天地运行规律，以一种物化的形式，安放在随州城市的中央。两个半月形的堰塘连成一线，就是北斗七星。随州文化公园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它没有院墙，如果砌一个院墙，就会发现这个公园是水和陆构成的太极图案，是一个抽象凝练的宇宙万物生成图。浑然一体的圆象征着混沌和谐的宇宙，水和陆像两条黑白鱼组成对立和谐的统一体，水为阴，陆就是阳，喻示天下万事万物由阴阳二元对立构成。阴阳两极间柔曲流畅的分界线，是北斗七星的连线，世界万物都处在变化中，昭示着对立的两极之间无时不有的变化和无处不在的交集汇合。阴阳变化无穷，万事万物，至大无外、至小无内，都是

有阴阳对立统一、圆融和谐的一体。阴阳二元彼此独立但能共存共荣，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对立中最终能够达成和谐与平衡。

如果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出土的这件黑色陶豆斗柄上的北斗七星是一个特例，那么，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随州浙河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有太极图形状的陶纺轮，就不是偶然了。此处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陶纺轮，其中的阴阳鱼互纠式的图案，普遍地出现在普通民居的彩绘陶轮上，充分说明随州先民在炎帝神农时代对阴阳对立统一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二黑二白的阴阳图案，强调了多元共生而成和谐圆融。武汉大学的这次野外发掘历时三个月，经过十年的研究解读，终于在武汉大学百年校庆之前正式出版了《西花园与庙台子》的发掘报告，认定此处文物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

祖先经过对天象长时间的观测，从北斗七星变化中发现，自然界普遍存在着对立或二分的现象。累积的思维和观念，必然对后来的思维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直接规定了后来的思维和观念的走向。比方说，一天是个整体，那么它分为白天和黑夜两个对立的观念，它统一了，才是一天。日出日落、东升西下、日出为昼、日落为夜，日出的方向为东，日落的方向为西；太阳出来温暖，黑夜寒冷。季节之寒暑、天气之冷暖、草木之枯荣。这种对立和二分的现象反映刺激着先祖的大脑，久而久之，这种印象就累积成思维和观念。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构成的，它在对立中逐步统一，最终和谐圆融。阴盛时，阳就衰，阳逐步成长，阴就渐渐萎缩。这种思维其实就是整体性思维。

这种思维很快就要出现在随州大地。随州先祖为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走的是一种理性的方向，这个方向确保了一个民族没

有走向盲从，走向痴迷，而是走向智慧。随州的这个用太极图仿轮的先民是否叫炎帝神农，都值得一个民族敬仰崇拜，因为这个群体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理性而神秘的思考在随州大地孕育并逐步成熟，它将惠及整个人类。这种整体的世界观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坚持整体观地看待世界，这种自觉、综合、整体的观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处理人与天、人与人、现在与未来、身与心这四种关系，确保一个民族永远也不会走向极端。

近代科学中“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暗物质”等等难题，玄之又玄，但用中国哲学思维来解释，就很轻松，也很顺畅。太极的阴阳变化，其实就说事物的两面，阴和阳各有自己的特性，也有自己的妙用，在交汇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依存、不离不弃、和谐相处、浑圆一体。万事万物因为阴阳的和谐协调显现出勃勃生机，阴阳的失调也将会导致整体进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1937年5、6月间，到中国访问和讲学，看到太极图案，顿时目瞪口呆，继而犹如醍醐灌顶。他不敢相信自然科学之外，还有学问能揭示自然规律，原来中国人把宇宙天地间的变化规律，早已经用阴阳对立的学说，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

还有人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提出质疑，就请他去看看曾侯乙古墓中的那个有二十八星宿图的衣箱。二十八星宿和北斗七星，完美地再现在曾侯乙天天见面的衣箱盖上，这是地球人类跟宇宙相通的文化理念再现。如果随州的先民不是一代接一代地仰望星空，不可能对天地运行规律，掌握得如此清楚。擂鼓墩曾侯乙大量的青铜器，造型中无不透出天圆地方、通天通地的原始哲学思想。说造器物的工匠都是哲学家，可能有些夸张，但设计者肯定受到了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迪。那些质疑随州就是炎帝

神农故里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的无知，必然对本土的文化缺乏一种自信。

走进随州文化公园，看到炎帝湖水陆匀称、均衡又交汇融合的设计，就想到大洪山下的三里岗，随州的先人仰望天空，黑色陶豆柄上的镌刻的北斗七星；就想到漂水河岸，那用太极图纺轮搓绳纺线的祖先；还有打开衣箱关上衣箱，就可以看到天象运行图案的曾侯乙，其实这是用另一种方法在仰望天空。璀璨的华夏文明在这里发生、发展、定型。炎帝神农三个层面的内容，都可以从眼前的这个炎帝湖中获得最完美的诠释。

因为在炎黄时代，随州就有人在仰望天空，就必然把天地的运行规律运用到生活之中去，这种顺应天地，就是寻求与天地自然的和谐，这是最高层面的和谐，今天叫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和文化”，“和文化”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也应该是世界文化的主脉。

人们在农耕生活中，我们意识到春夏秋冬的节序，跟我们生命的内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我们就产生了“道法自然”的信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天地运行规律，用这个规律作为哲学思想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存方式就与自己特有的天时、地理、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形成超稳定的“以农为本”的文明形态系统，数千年永续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倚地倚天也倚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同时也衍生出一整套符合农耕社会生活、适应社会秩序规范，具有高度智慧和整合功能的人道、社会道、天道，“道器一体”的中国文化道统。

这套道统从本质上讲是符合天地运行规律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家、国、民族、天下体系。社会的最小细胞是家、向前发展

是族、再就是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内在因素起源于家，家庭对家长的尊重，家庭对族长的敬仰，贵族对朝廷的敬畏，构成社会稳定的根本。它是受到天地运行规律启发形成的，“天无二日”，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只能围着太阳转动，因为太阳的能量温暖了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大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展开，最根本、最核心的那一圈在中心，没有中心核心的那一圈，就没后来的若干圈。

农耕文化是整体观，人和天地为一个整体，农业耕种需要顺应天地的运行规律，对生存环境的顺应，其实就是寻求与天地间的和谐。农业耕作需要整体的力量，家的力量不够，就延伸到族，再到部落，最后到国家。这就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家、国、民族、天下四个词可以互换的依据。家、国、民族、天下不仅仅是可实体化的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心理和价值信念的超越性概念，根本指向是一个民族的心性和共同生活的意义世界。在中国人看来，孩子服从母亲，母亲服从父亲，父亲服从祖宗，祖宗服从于生养自己的那片天地，这是符合天理的大“道”。

这就是炎黄子孙，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和集体记忆，有着统一意志的整体意识，有着无论怎样迁徙、高飞远走都不忘记宗缘所在的特殊群体，这是人类从异质文化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一种特殊情感。实际上就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血缘关系，通过祖宗强化民族认同。这种认同蕴涵着深刻的精神。

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前人生命的延续。生是父母爱的结晶，从生的那一天，就不能忘记父母生养的恩德。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太强化这种本能的尊祖意识，无论走多远，隔了多少代，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宗缘所在。它注入在民族的精血之中。你可以加入新的国家，但决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何为祖

国？老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才是自己的祖国。这种称呼，有一种庄严、一种神圣、一种温情，这种富有人情味和历史感的观念就是东方文化的根基。

中国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是来源于自己的家，家是一个整体，个人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这个整体。“家”是众多家庭成员的聚集，众多的能量聚在一起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温暖，“家”的温情也要温暖家庭的每个成员。今天有人引进了民主、人权的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短暂强势的西方，很多人不敢评判其优劣。然而，我们明显地感到这是一种不符合天道的思维，如果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强调自己的利益，没有家长的权威存在，这个家肯定散。中国文化能延续5000年，与家长维系家庭有序和平衡这个根本制度有重要关系。如果说那种个体大于整体的观念符合天道，它运行5000年以后再和中国的家、国、民族、天下观念比较长短。

炎帝神农开创的农耕文化，最核心的元素是“和”。对外寻求与天地环境的和谐，寻求与人际关系的秩序，对内寻求自己心灵的平静；这种“和”首先体现家庭的和睦，家庭、家族兴旺发达的根本就在于和睦，家族中成员都有血缘联系的亲人，权威是父母或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多半具有公正性。家庭中出现利益冲突，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就牵动人性中最柔软的情感，引发亲密无间、真诚关爱与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相比的。先祖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文化价值观是一种符合天道价值观。用这种家庭伦理关系推导，制定社会群体间的关系，带来群体间的和谐，再用它来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带来国际之间的和平。这种东方特色的“家庭和睦”、“群体和谐”、“国际和平”的“三和”文化，可以引领人类更加文明，走向天

下大同。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虽然诞生于欧洲，却没有能够在自己的故乡进行实践，是因为西方社会整体的和谐元素太稀缺。能在中国得以实践，就是因为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化和谐的本质，浸泡中国社会5000年，与马克思学说有太多同质的东西。我们说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科学就符合天地运行规律。就像搞自然科学量子力学研究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看到太极图，突然间明白许多道理。这是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学问，本质符合天道，才能成为科学。“万流归宗”就是说不同形态的事物最终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殊途同归，同出一源。随州文化公园的炎帝湖这一泓清澈的湖水，将把我们的心灵洗涤得干干净净，清澈透明。这时我们就会相信符合天道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最高的追求，从而对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产生坚强的自信。

随州文化有三座高峰，是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无法逾越、必须仰望的。第一座高峰是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明，再一座高峰就是季梁首先倡导的“民本”思想，第三座高峰是令人类世界目瞪口呆的曾侯乙编钟。文化的珍贵就在于珍视爱惜、敬仰尊重，这三座令全世界全人类仰望的高峰，随州人应该有很深刻的的解读，其实就是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敬畏，那是一种敬重到生怕弄坏了的程度。

新建文化公园时，建设者把文化放在重要的位置。让人们走进公园，看到一草一木，一形一象，就有一股暖流、一缕阳光、一种震撼、一种洗礼，在这里展现的不仅仅是随州三座文化高峰，每座高峰都有具体的诠释，真正成为我们的精神殿堂。三座文化高峰实际上有很紧密的内在联系，它是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灵魂，贯穿着随州所有的文化。

炎帝湖上筑高台，高台之上建有“神农坛”。《说文解字》说，坛是祭祀的地方，中国古人最重要的祭祀是祭祀天地，在高台之上堆积柴薪，摆放祭品，燃烧起来让烟气上达于天。今天无需再现这种场景，但炎帝湖水和神农坛传递的阴阳和谐的意境。天为阳，是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能动精神；地为阴，则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担当精神。随州有炎帝神农文化的环境背景，圣贤成长是理所当然的事。

“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炎帝神农在蛮荒世界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这需要人生的大仁义、大勇气、大智慧，所以炎帝神农站立的地方，就值得人类世界仰望。人类走进文明时代，我们需要追求社会政治的和谐。在中国文化发展定型的时代，正是社会秩序动荡，思想信仰危机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思想信仰的建设、社会秩序的规范，这时，需要和炎帝神农一样的仰望，只不过这时需要有一种看破人类社会的真相和发展规律的眼光。这是一双平和远眺却雄视万古的目光，再把自己的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炎帝神农和季梁是同样睿智的双眼，一个是在寻找人跟宇宙自然的敬畏和谐，另一个是在追寻人与人的和谐，人心的淡定与平和，建设和谐的社会政治。中国文化始终有一道光亮照耀，这就是“道”与“德”的无限光芒。天地运行规律为“道”，社会发展潮流就是“德”。只要坚持仰望天空、远眺未来，就一定能够进入道德的境界，有道德的人走上文化的最高处，是历史的必然。神农坛下，季梁以自己的德性和见识，站在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

季梁走到中国文化的高峰，思想只有“民为神主”四个字。《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刚刚强壮起来脱离了原始部落氏族社会的楚国，侵犯随国，随国感到有些危机。随侯问季梁，怎样度

过这场危机。季梁是随国的大夫，帮助随侯是自己的职责。随侯说：我用最好的祭品祭祀神灵，神灵肯定会帮助我度过危机。季梁不这样认为：你知道神灵是谁，神灵的主人就是老百姓！你只有先团结老百姓。老百姓认为你不诚心，是因为他们不幸福。老百姓是神的主人，主人不叫神帮你，神怎么可能帮你？你应该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才可以化解危机。这是一种文化自省，怎样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寻找一种王者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道路，追求建立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孔、孟用一生的精力来实践这种和谐社会制度的追求，然而，季梁思想成熟的这一年，早于孔子出生155年，早于孟子出生434年。季梁是在炎帝神农思想的滋润濡养下成长起来，当然，他的思想精神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季梁雕像用青铜铸造而成，凸显出随州的厚重实在。这种厚重实在首先是随州的历史文化悠久深厚，人类世界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量的积累。也就是说随州具备了文化英雄成长的环境，随州的地域方位适合人们仰望星空，就有人去仰望，一代接一代的仰望，出现炎帝神农就是历史的必然。随州这片天地，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也就肯定引导随州的先民，去发现天的循环运行、地的安静稳定。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圆融和谐，必然启迪先民们认同和遵循，实际上这就是涵养地域特性的丰厚土壤，这是滋润濡养文化英雄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的些微变化，有时候是人感觉不到的，当这种生态堆积到一定的厚度时，历史就发生质的变化，往往人们认为是文化英雄改变历史的走向。其实是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炎帝神农和季梁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生态积累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出现，让历史有了明显的阶段区隔。

季梁站立在5米高的凸凹石纹的基座上，实际上就是象征着

这个文化英雄脚踏着随州5000年的沧桑岁月，那些自然形成的各种石纹，就是地球板块碰撞挤压而形成的大洪山脉，与桐柏山脉相峙而立，形成一道狭长的走廊，其间30公里以上长度的溪水河流达109条，这是厚德载物、万物所生的玄牝之地。历史上汉水东岸这个生长万物的地方有三个别名，分别叫汉东、汉阳、汉川。季梁所在的汉东大地，地处神秘的北纬31°，基座的石纹纵横，如同汉东大川遍布小溪流水。季梁脚踏这块历史厚土，峨冠博带、衣袂飘飞，仰望星空、目光远眺，从容凝思、继往开来。他在神农坛下站立，沐浴着炎帝神农文化灿烂光芒，传承炎帝神农精神，寻找治理社会的良方，就必然成为照耀中国文化的一道光亮。

公园是一个公共空间，开始就准备叫季梁公园，市委政府组织多次讨论，广泛收集民意。有人觉得季梁难以代表丰富的随州文化，市民广泛参入命名，最后选择了“随州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广泛地收集民意，社会各界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命名的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公园的命名，说明随州决策层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方式，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季梁的双眼放射出的是和炎帝神农一样的睿智目光，如同一道照彻文化的天光，令我们心灵震撼。随州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季梁是曾侯家族的重要贵族。就在随州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随州发掘了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顿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就是因为曾侯贵族在随州这片土地上，稳定发展了700年。一个政权稳定这么长的时间，这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一个特例。这片土地上一定蕴含着人类文明最稀缺、最珍贵的文化元素，提取这种元素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其实这元素就是农耕文化的和谐思想，那道能照亮人类世界的对立统一圆融和

谐灿烂光芒。

和谐的基本规律就是平衡。强大的楚国三次侵犯随州，最后的结果是结盟。战争是对立的最高形态，也是力量的对比。这种力量包括很广泛，往往有些专业人士，总是拿一个方面的因素进行比较，就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就对淮海战役60万战胜80万，百思不得其解，但斯大林一定不知道正义和民心值多少万。其实叶家山曾侯家族墓中的随葬品已经说明了，随楚之战能结盟的根本原因。叶家山曾侯家族墓中有很多折弯或折断戈的戈尖，证明曾侯贵族明白“武”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武力。折弯或折断就是“止”，“止”与“戈”合在一起就是“武”，真正的“武”不是打仗，而是止战。“尚武”也是“尚和”，赢得和平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战的实力，更多的是非战的力量，种种力量加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平衡。

有季梁在，随楚之战就一定是“和”。因为季梁明白家族兴旺发达，就应该成为一个整体，要敬老百姓为神的主人，有老百姓的帮助，这个国家的力量就难以估量。曾侯是西周政权在南方的代表，楚与随的对抗，楚对抗的是西周王权，这是对正义的挑战，楚国肯定知道不具备正当性的战争，是难以取胜的。季梁思想蕴涵着社会的本质，这就是“道”，和炎帝神农探知的天地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分量。《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很多人不知道“道”的力量，在人类社会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所以，有季梁思想在，随国就能长治久安。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避难奔走随国，吴军围住随城，并威逼利诱随侯不要保护楚昭王，随侯不为利益所动，还以国家安危为代价，对气势汹汹的吴军说，随国虽小，我有姬姓周王高贵的

血统，与楚国世代都有盟约，这个盟约从没有改过。今天楚有危难，我们就抛弃他，我怎么代表周天子教化天下。其实，这就是“道”，是季梁思想的延续，更是曾侯贵族持续稳定700年的根本。

季梁有思想、有见识，对随州有亲、有功。《周易》说：“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季梁是随国历史中的唯一一个在历史文献中留下名字的姬姓贵族，他能走进中国历史文献，成为信史以来的中国第一座高峰，不是他有多大权力、也不是握有多少财富，只是他有思想、有精神。很多觉得自己有才气的人，没有看破生命的意义，以为人生就是名和利，一辈子没能走出名利的人，不可能有“可久的贤人之德，可大的贤人之业”。最终为历史所不齿。

有些人感到曾侯家族有大量文物在随州出土，为随州增添许多亮色，就主张用曾随文化来作为随州文化公园的主题。认真研究曾随文化，它只是随州文化很小的一部分，作为随州人的精神圣地还缺少些分量。“随”最早写作“阜”和“人”，表示一座山从天上掉下来，是坠落的意思，通“陨落”。今天的大洪山是一座无宗无脉的褶皱断块山地，好像就是从天而降的一座大山，它在古代叫“陨山”，从这里发源的水就叫“涇水”，它滋润濡养的土地就是“随”。“曾”只是作为一个贵族来到“随”，生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今天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能够证明，“曾”在“随”的土地上存在了700余年。特别是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的发掘，文峰塔曾侯墓葬中“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铭文的出现，基本上可以证实李学勤老先生“曾随合一”的猜想。

曾侯贵族从墓葬出土文物来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在定型时

期的一个典范。早期的叶家山曾侯有着浓郁的中原文化特点，进入南方后，迅速吸纳随州的地域文化特色，逐渐有别于母体中原文化，也和楚文化有明显的差别，越到后来，随州的地域特色越是显著，也就是说曾随文化是中国文化定型时期有自己完美的成长路径的文化。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编钟，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中有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的编钟。比编钟更早的是，炎帝神农削桐为琴，练丝为弦。音乐是古人极为重要的道德元素，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音和乐，就不能成为高贵的人。在古人眼里，乐和礼是宇宙和规律的体现，只有走进音乐，才能与天地和谐。这就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周的礼乐制度的深远用意，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用乐的感染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

“音”和“乐”是有区别的，“音”是单独的声响，或者说能发出声响的都是“音”，“音”不进行组合就不能成为“乐”。单个的“音”是不能成为“乐”的，用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来处理一个单音，都不可能成为一支动心悦耳的乐曲。就好比个人，无论个人有多么大的才气，不能融入整体就不可能有作为，个人必须知道怎样融入整体。今天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文化，就看会不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为什么把“琴”放在第一位，就是要求文化人必须融入到整体之中。音乐是一颗心在倾听另一颗心的诉说，是心与心的对话交流。李学勤先生觉得要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必须知“音”懂“乐”。周人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虔诚的躬行实践，期望以音乐的和谐求得天地、君臣、上下人心的和谐，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心态的平和，天地人性的完美统一。只有我们明白了音乐在西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还有在中国文化中有那么显赫的

份量，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编钟的文化意义。

“曾”就是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字。《说文解字》解析“曾”：从八从曰，辞之舒也。“辞”是语言，“舒”是延伸延缓或停顿的意思。什么能对言辞来延伸延缓和停顿呢？唯有音乐有对语言具备延伸延缓停顿的功能。早期的“曾”没有下面的“曰”，没有“曰”的“曾”就是透亮的窗子，通明透亮是指一个人德性高贵，“曰”的篆写就是画的鼻子下的人中，再就是嘴的象形，“嘴”是说话的，让每个字都通明透亮，就是用节奏和旋律，使语言产生磁性与张力，深入人的心田，让人的内心获得营养，走向高贵。这就是发挥音乐的功能，通过500年的追求，曾侯乙那一代的曾侯，出现震惊世界的编钟，就是这种音乐追求的必然结果。

叶家山早期编钟一组，能发9个音，能完整地演奏乐曲。西周早期，曾侯贵族到南方来，肯定不是为了征服而来，虽然早期的西周有一定的实力，然而能够用道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南方，是君子怀德，服之以理，是人心的收服，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道：“礼之用，和为贵。”《庄子》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古人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是音乐赖以产生的背景。从神农作琴到曾侯铸钟，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和进步。深入了解这种背景，就可以领略和体悟出编钟音乐的精妙。

中国音乐的“八音”，是指金、石、土、木、丝、竹、革、匏。八音之中，金居首位。钟的神圣不仅仅是它铸造的艰难，而是它那沉着而又清脆、厚实而又绵长的音色，富有穿透力的音响魅力，出音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具有悠闲雍容、矜持华贵的贵族气度。音乐由节奏和旋律两大元素构成，节奏的声响是块状

的，也就是说发出的声音是一坨一坨的。这种声音主要是敲击乐器发出的，“八音”中属于敲击乐的有“金石革木”。其中具有那种块状的、坚实威严特性的声音只有钟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有一种从容的、矜持的、庄重的、威严的、凝重的、肃穆的节奏感和穿透力。这种声音进入人心，就有一种摄人魂魄的效果，编钟自然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主体，商周的音乐精神是先秦音乐的灵魂。音乐追求的人心的和谐，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层次。炎帝神农追求的重点是天人的和谐，大贤季梁追求的重点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曾侯贵族追求的重点是自己内心的和谐，这种层层递进对于我们理解先秦音乐的“礼乐”精神，联系商周的仁德、修身，保民这些深邃的内涵，对我们领悟编钟那深刻的文化意义，有巨大的帮助。

音乐是用耳朵聆听声音，在聆听中体悟人心。用声音的高低快慢起伏变化，来进行组合，来表达叙述世间万事万物。这种语言不分地域、不分人种、不分古今，是人类最通行最充满智慧的语言。曾侯敲击青铜编钟的声音，是炎帝神农丝弦声音的继承和发扬，来叙述天的深邃、地的旷达、云的高远、山的峻峭、水的静谧、历史的雄浑、生命的厚重。就是向天下苍生传递神的旨意，只要有教养的人，就会在这种和谐的音乐中，变得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

中国文化又叫礼乐文化，“礼”的繁写为“禮”，“示”就表示尊严，上面的“曲”既是指音乐、也是指“酒”，下面的“豆”就是“鼓”，也就是指音乐；而“樂”字就是在木上附丝弦。祭祀时需要用“酒”和“鼓”，《左传》里说，中国最大的事就是祭祀和打仗。怎样让一家人和睦，是中国人一个永恒的话题。周的礼乐制度的深远用意，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

为，用乐的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

西周是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周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因袭的是夏与商，同时接受了夏和商灭亡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因此，音乐的智慧濡养了中国文化定型的王朝，中国文化史的每个章节都弥漫着音乐和谐的韵味。西周建立的这套完整的音乐体系，典雅庄严、格式规整、节拍缓慢、八音俱备、歌舞谐和，呈现出肃穆、安定、和谐、严正的气氛。这种理想的音乐是道德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声音的华表。随州文化公园为展现这种音乐文化，专门为编钟建立了音乐广场。

编钟的价值何在？声音的艺术是人类众多艺术中最具神秘感的艺术，这种艺术精妙地表达出人类最丰富最难以表达的情感世界。随州的先贤不仅仅是洞悉了宇宙构成的奥秘，更是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永恒的价值。威严的、凝重的钟声响起来，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从容不迫、雍容华贵的声音震撼的是整个人类世界的人心。有人把它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们惊叹：“世界音乐史应当重写。”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自认为第一，叶家山编钟能够演奏优美乐曲的时候，所谓世界第一奇迹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还是一片蛮荒。根本不用谁来排序，谁也没有资格来给这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排序。编钟一面世，全世界目瞪口呆，它一发声，整个人类世界顿时寂静无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为它的出现而骄傲自豪。

随州能出现完美的曾侯乙编钟，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炎帝神农仰望星空，渴望与天地自然和谐，到季梁审视古今，期望建立和谐社会，再到曾侯家族代代追求和谐音乐，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金声玉振”的人格境界，然后实现社会的和谐。

“八音”之中居首是“金”和“玉”，都是打击乐器，但二

者有些区别。钟的声音因为有腹部的共鸣腔，发出的声响沉着、浑圆、厚实，有一种男子的阳刚壮美，玉是石头，发出的声音清澈、脆亮、细润，具有女性的悠扬、柔弱之美。这两种声音就叫“金声玉振”，虽然没有旋律上灵活和敏捷，却有一种从容威严、凝重肃穆的节奏感和穿透力。这是一种君子之德，懂得礼乐和谐的音乐理论，你就可以达到修身、养性，你就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资格。

这“金声玉振”蕴含的阴阳和谐构成一种博大和深邃，其实就是修炼人品的厚实、丰满和震撼。音乐不是辨别声响的物理奥秘，音乐是生命的信息和脉动，生命运用自身的能量，产生节律性运动，这运动中携带着生命的信息。我们通过自己的听觉器官捕捉这些信息，体味出生命的意蕴和深邃的历史感。让每一个个体生命与社会的整体达到和谐的境界，就是曾随文化的根本，也是炎帝神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和谐就是随州文化的灵魂。

随州文化公园的核心区域有一条主轴线，蕴含着阴阳对立统一的炎帝湖，弥漫着人间深刻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经过层层堆积，累积成人间的高台。不要以为这是挖炎帝湖垒成的土台，其实它意味着历史的堆积过程。有随州先民的仰望，就有深刻思想的出现，长时间的积累，就必然有伟大人物横空出世，炎帝神农就一定要站立在这个公园的最高处。顶点的神农坛建筑，象征着炎帝神农思想文化滋润濡养着历史。依次闪亮出现的是受到炎帝神农文化浸泡的大贤季梁，代表着曾随文化技术高度的曾盘雕塑。文化与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实力。很多人以为，随能在强秦雄楚之间，存活几百年，靠的是投机政治，朝秦暮楚。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政治从来就是实

力的较量，曾随的长期存活就是依赖这种文化与技术的实力。

有了文化与技术的强健，必然就会有“盛世同庆”。雕塑“盛世同庆”就是随州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的展现，正方、正圆、正三角中透出一种有棱有角的厚重，方正蕴含着稳定严谨、粗犷豪放的王者之气，这是北方粟稷农耕的文化特点，稻作农耕的地域特性就是多水，上善若水透出善良，包含着精细和柔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盛世同庆”雕塑就是北方厚实的直线与南方流畅的曲线完美的结合。这件雕塑矗立于随州文化公园的正门，充分展示出随州文化不南不北、又南又北的南北融合特色。什么是“随”，随就是圆融和谐：随和、随便、随缘、随意、随心，随就是一种融入，随也是一种吸收，这种融入和吸收让随州文化得以成长。

随州文化公园说清楚了炎帝神农、曾随编钟，按国务院评价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就可以达到60分及格。然而，建设者觉得必须充分利用湖心小岛展示随州重要的历史人物，于是，随州历史上的几个重量级的人物潇洒地走进公园和谐的空间，和随州市民朝夕相处。

文化主轴线相对的一个小岛，就叫舜帝岛。相传，舜帝是中国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文献记载：“厉山有舜帝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随州古城西南的随城山有舜帝庙，庙下叫舜井冲，即是今天随州国税局所在地。舜井冲有井一口，传为舜帝所掘，井旁有碑，为秦时县令所立。《随州志》记载这碑的正面是篆文雕刻的“舜井”二字，碑后刻舜耕烈山教民掏井的故事。秦碑被毁之后，宋时续立，仍用秦时的格式。1996年发现了这块宋代石碑，碑质为青石，正面镌刻着“舜井”二字，碑后无文字，藏随州博物馆。随州国税局基建时发掘出这

口井，国税局领导申请市文化局，在井之上建一凉亭，用厚玻璃包裹“舜井”石碑。张扬舜的功德，舜的德行功业其实就是炎帝神农精神的延续。有人建议新修建的白云湖应该命名为舜湖。因为舜帝庙是这湖的起点，也是湖的靠山。当时没有人采用这意见，以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华科大历史学家张良皋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认为舜帝南巡九嶷山就是今天的大洪山。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证据强雄，条理清晰。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至今湘南仍未发现夏人的遗迹，或者说，历史的真实是夏的实力不可能达到湖南零陵。那么夏的影响通过南阳盆地沿随枣走廊达到长江之滨则是历史的真实。今天随州文化公园的建设者学会了尊重历史，依据张良皋先生的论证，在舜帝岛上垦舜田，掘舜井，筑舜帝亭，再现随州曾经的历史辉煌。

历史许许多多的光彩符号和那无数的辉煌记忆。展现光彩符号，就是复活辉煌经历的记忆，让光彩符号的辉煌记忆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化成心中的爱，是故土乡亲挚爱，是挥不去斩不断情怀，是永远的精神家园。很多很多的情怀凝聚在一起，就有了巨大的张力，它就能引领我们随州人民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忠于国家、忠于民族，首先要忠于自己的家乡，连小爱都做不到的人，何谈大爱？

“隋”是随州地域的名字走进中国历史，让一个王朝有了随州地域的味道。隋文帝杨坚与随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时候，英勇善战，领兵收复襄阳、随州、安陆等一系列地盘，战功显赫，被封为隋国公。中国历史上这是一段很黑暗的历史时期，汉民族陷入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史称“五胡乱华”。中国因此进入三百多年的分裂状

态，多年的战乱让东方文化中，那些爱与善良品性损坏殆尽，物质文化也严重破坏，农耕文化积累的文明几乎化为灰烬。

所幸，承袭父爵的杨坚，担任随州刺史。培育过炎帝神农的随州文化，再次浸润他的身心，让他顿时有了无限魅力，四溢光芒，一个英雄就这样，要从随州横空出世，拯救中华文明。杨坚终于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收服各族蛮夷，使中国终于回到了和平年代。他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了以自己爵位命名的“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建立了可以惠及千年的政治制度。杨坚登基后下诏道：“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不怕文明和辉煌消失，就怕精神灭亡。杨坚觉得只要有礼乐在，只要有记载礼乐的经典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

有着胡人文化血缘的杨坚，虽然不信神，但从季梁思想中，感受到神的主人就是老百姓，于是他围绕怎样厚待老百姓，制定宽厚仁义政策，就是渴望感动神的主人，从老百姓那里获得神的力量。重新建立起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一系列主张措施，为这些措施得以实施，杨坚拔擢有真才实干的人。他实现了自己的功业，不但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更建立起惠及后世的制度。

有着胡人文化血统的杨坚，因为在农耕文化的发源之地生活过，从骨子里深爱农耕文化。几百年来的混战，战火焚毁、文化经典大多遗失。杨坚下诏，号召全民献书、捐书，献捐一卷者，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的藏书量顿时大增。经典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过经典的人，就会感到怎样去适应社会规范、去进行人际交流。去做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知道怎样做人了，就会做事。会做人的去做官，一定能做大官；会做人的人，去做生意，一定能做

大生意；会做人的人，去做学问，一定能做大学问。缺少才能，不能成就大事业，也不要紧，只要会做人，他的人生一定可以幸福，因为他会做人，谁都会去帮助他。文化经典的价值不可估量，在传承中不仅可以营养自己，还可以福荫子孙万代。每一个中国人，登临这个小岛，就会感觉到，随州文化营养了一个伟大人物，有了随州，才有隋朝，有了隋朝，就永久性地拯救了中国文化。

“随”是隋王朝的滥觞之地。“滥觞”既有起源、发端的意思，也含有波及、影响的因素。随州有炎帝神农文化，是一个大一统思想强烈的地域。随州之“随”，这个字的本义就是两块土地的结合，左边的“阜”，是大山无石之陆，也是指土层很厚的山坡，这是说一块土地，从小处看，是一个土丘，从大处望去，就是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右边的“有”是简化的写法，篆写就是上面画着一只手，下面一块肥肉，中间还有一个“工”，是说要经过辛勤的劳作、按照规则经营，才能得到肥沃的土地，从小处看，是一块稻田，从大处望去，就是整个长江流域。随州就在这两块两大流域的结合处，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坡（阜）与长江流域的肥沃稻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一个共同体就是完整的中国。

“随”这个字就是炎黄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文字符号，相传，炎黄之战，双方争帝，反复厮杀，双方死伤惨重。炎和黄看到自己的部下这么多伤亡，都不希望这仗再打下去了。轩辕黄帝对炎帝神农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中央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觉得，一个天帝的名号能拯救天下的子民，就答应了轩辕黄帝。为表示自己诚心诚意跟随轩辕黄帝，就把自己的故地更名为“随”，并在两片土地中间加了一个“走之”。“走之”的篆文写法是画的一个足，有跟从的意

思。“随”字就真实地记录了炎黄融合的这个过程，今天这个字的核心含义就是跟从的意思。

今天有隋文帝忌讳“随”字中“走之”有跟从的意思，而改“随”为“隋”的说法。实际上，在隋朝还没有建立之前的春秋时代，就有“随”写为“隋”的先例，比方成语“隋珠弹雀”的“隋”就是说用春秋时代的珍宝隋侯之珠，去弹射一只雀鸟，失去的很大，获得的很小。隋文帝杨坚在隋王朝中不用“走之”，恰恰说明他深刻理解了这个字的内涵，中国的南北，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一样的轻重，没有这个“走之”，就不存在谁跟谁走。隋朝国运短促，“随”在“隋”的地位还没来得及显露就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但“隋”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让随州的地名用作了国号，让随州永久性地走进了中国历史。

还有几个湖心岛，也都是用和随州文化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来命名。比方，明月岛，就是说随州的明月与天下所有地方的明月不一样。因为任何地方的明月，照不出人间最凄美的情感，唯有随州的月光照在李白的身上，李白写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惊天动地的文字。李白写过许多明月的诗篇，唯有在随州写下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明月”诗，如同清澈的甘泉，醉倒了天下华人。再比如，有一个叫“六一”的岛，可不是六一儿童节，那是一万藏书、一千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副棋、一壶酒、一老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只在岛上镌刻欧阳修的一句“岂能忘情于随”，就可以彰显一代文豪与随州的深情厚谊。欧阳修从四岁到二十四岁生活在随州，如果没有这二十年，就没有一代文豪欧阳修。没有欧阳修，就不会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没有唐宋八大家的中国的唐宋

文学，就会黯然失色。

走进随州文化公园，这里的建筑可能不一定有多么的宏伟壮丽，然而，深入进去，随州文化中丰赡的内涵，整个身心就会感到震撼，缓缓地走一遍，经过文化浸泡的一草一木，一景一色就辐射出浓烈的光焰，张扬着永恒的浩气，随州人的心灵就会被这光焰和浩气照亮和溶解，为自己的故乡拥有这么重要的文化资源，骄傲自豪中生出生出永远也摧毁不了文化自信。

走进随州的外地人，看到随州写着“炎帝神农故里”、“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心里肯定有许多疑问，只要在随州文化公园走一走，体味一下，就会觉得这三句话，绝不是凭空而来的口号。这座公园浓缩了随州文化的所有精华，就可以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定型的全过程。感受到随州是一片历史文化厚土，这片文化的光芒照耀的土地诞生炎帝神农文化，是天地精华的孕育，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农耕生存方式出现的哲学思维，具备和睦、和谐、和平的秉性，这是全人类都能理解和认同、接受的思维和思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同时也必将唤起每个炎黄子孙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当我们把自己的能量奉献给中华民族的时候，人类世界就会更加温暖。我们建设的随州文化公园，就不仅仅是营养了随州人，当它营养了一个民族的时候，随州这座城市就有了无限的分量。

拜谒历史深处的季梁

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真正让随州走进中国历史的是季梁。

我们说中华文明5000年，其实它是由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历史从朦胧走向清晰的过程。中国历史走向清晰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由于周王朝的第十任天子姬胡实施集权带来了贵族的叛乱，姬胡出逃，姬胡之子姬靖不能立即继位，由召公、周公共同摄政，史学家称“共和元年”。从这一年起，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得以保存，一直到今年，这种记载就再也没有间断，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所以我们说信史就是记载确切的历史。同时我们把这些历史记载的书通称为“春秋”，先秦各国均有史书，唯有鲁国的史书传世。《春秋》就成为专称。《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0年）。这部史书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为后世修史创立了叙事简洁，意蕴深刻的典范。因而被列入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

季梁能把随州带进中国文化史，是因为楚国的崛起。此前，楚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氏族社会的落后地区。楚武王以前的君

主都是亲自参加社会劳动的。楚发达起来了，就想通过随向朝廷讨要政治地位。随是周王分封在汉水之东监控、教化荆楚蛮荒之地的封国。随真去了周替楚说了话，周不允许。两年后，熊通自立为武王。楚对抗周天子，敢于自封为王，必有自己的实力和底气。不要以为这是楚随的对抗和冲突。这实际标志着春秋时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结构重组（《楚国经济史》刘玉堂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楚地的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格局的改变。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失落，必然催生一个新的阶层的出现。这就是中国社会重建的指导者，历史进步的推动者，自我价值的创造者。他们俯察现实，构想未来，纵横捭阖，立德立言，为中华文化开辟极为广阔的空间。这就是志于道，厚于德，多才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随后，他们有个专用称呼叫“士”。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化的长河才有了波澜壮阔的景色。

楚武王渴望政治地位的变化发动了侵随的战争。这既是朝野的对抗，也是利益的博弈。它为中国新兴阶层“士”的出场营造了最为恰当的氛围。

公元前706年，时代特有的这种分化改组，风云变幻政治环境，必然孕育培养出一大批有思想、有精神、有学识、有人格的社会精英知识阶层。这些人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们只对社会重建负责，对文化重建负责，对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尊严负责。他们对社会负有“不治而医”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对社会负有教导的责任。

楚武王完成了氏族制度向国家机关的转化，就气势汹汹地开始向朝廷讨要政治地位。随国是朝廷在南方的代表。面对气势汹汹的楚王，随侯说：“我无罪。”武王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

家》)楚武王的宠臣斗伯比认为,汉东诸多周天子的分封国都是以随国为中心,我们只要狠狠敲打一下随国。所以他说:“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左传·桓公六年》)楚王的另一谋臣熊章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季梁还未出场,《左传》就通过对方敌人的议论来说明季梁是享有国际声望的社会精英。

透过季梁的出场,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这种社会秩序动荡,思想信仰危机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重建新的思想信仰、重建社会秩序、探索生存之道。这是知识分子最神圣、最紧迫的历史使命。照耀千古的季梁就在中华文明最关键的时刻出场了。

春秋时期,随只是周天子分封在汉水之东的诸侯国,如果不是重大事项,《春秋》是不会记载随国的,因为有季梁劝修政和论兵的事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立言”、“立功”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照耀千古的亮相。一个志于道、厚于德、多才识、勇担当的知识分子在重兵压境的危难时刻,镇静、从容地论述政治、军事、文化,其中的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那么丰赡厚实,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春秋》中平静简洁地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季梁那赤诚的爱国情怀,重塑社会灵魂的精深思想,还有他那双平和远眺却雄视万古的目光。让中国文化始终有一道光亮照耀,原来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季梁那睿智的双眼。

这道照彻文化的天光之所以令中国人心灵震撼,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它放射出的是一个特殊阶层的理想和人格。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它必须有三个阶层起作用,一是政治阶层掌握权力让制度发挥作用,二是知识精英阶层,它不掌控国家权力,但

对社会负有教导责任，三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层，在经济上支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季梁就是中国信史阶段冷静观察社会现实，深入探讨社会发展，创立最适合文明发展的原创性思想家。可以说季梁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士人阶层的第一人。我们可以遗忘许多历史故事，但只要你想做中国的文化人，就不要忘了这位对社会进行教导的开山祖师。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被称为士。《说文解字》是这么解释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就是说，士是忠于社会的，要让少数和多数合为一体。士这个阶层就应该有俯仰天地、洞察人生，具有大视野、大胸怀，熟知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对自己、对国家充满信心，始终把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季梁，就会发现他是“士”的第一人。在西周，士本为低级的贵族，与平民比较接近，但他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一定的修养和才能。随楚这场对抗前后十余年，因为季梁的存在，终于让险恶的抗争顺利化解。我们可以从《春秋》中读出季梁的这些思想和认识。什么是道？道就是忠信。利民就是忠，敬神就是信。神是谁？神是老百姓（夫民，神之主也）。老百姓幸福就能丰收，丰收了就能富裕，小国就能成为大国。先和楚国议和，他不同意，就可以唤醒老百姓的保家卫国激情，和敌人打仗时要避实就虚。这些话题，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哲学诸多领域，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在他的立言的基础上进行详尽的发挥和发展。或者说，诸子百家都是吸收了季梁的学术营养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个先贤哲人。

“道”是中国文化永恒的主题。实际上，“道”意味着正当性和正义性。季梁阐述社会的正义，就是忠和信两个字。季梁和

随侯论述怎样让随国这样一个小国化解大国的威胁，就应该建立一个有道的随国。怎么才能有道呢？就要总要想到对老百姓有利，这就是忠。什么是信，就是真实不欺地祭祀神，就是信。现在老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现在司仪是在欺哄神，随楚对抗中，随肯定会灭亡。随侯听了季梁的话，说：“我祭神的时候，规规矩矩，真心诚意，为什么神灵不帮我？”季梁说：“你以为神灵是谁，神灵就是老百姓！你只有先团结老百姓。老百姓认为你不诚心，是因为他们不幸福。老百姓是神的主人，主人不叫神帮你，神怎么可能帮你？你应该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就可以化解随楚这场冲突。”季梁关于“道”的理解是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学者对《左氏春秋传》（又称《左传》）的“道”作了计算，全书共出现123次。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道”的出现虽然很早，但那是做道路意义的使用，后来虽然引申为方法、样式，作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法则来使用，这是第一次。

中国能成功地将世界上最众多的人组织在一个政治体制内，就是因为有“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故事的发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比方淮海战役，共产党60万打赢了国民党8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斯大林认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实共产党还握有一件法宝就是“道”。

今天的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俄罗斯、西欧与日本人口的总和，这样多的人能够包含在一个政治体内，令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的“道”。这种奇迹的发生，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唯有这个“道”，让所有的中国人觉得大家必须生活在一个政治体内。这就是文化的原因，从季梁提出了“道”的概念之后，能很好理

解诠释“道”的人都成了中国文化天空中灿烂的星斗，当我们仰望满天星斗时，就不会忘记，是季梁给予了它们灿烂的光芒！正是《左传》123次使用了“道”，所以它被列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你要想成为文化人，受过“三、百、千”的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四书五经。《左传》就是五经之一。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是中国文史哲的总汇，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有了季梁的“道”，大一统就成为常态，尽管中国曾有过分裂，但这种分裂就是一种变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会把这种变态恢复到常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有中国文化在，就绕不开公元前706年的季梁。

季梁的“道”让随州走进了中国文化的经典。随州人觉得季梁是大贤。其实，是天地宇宙大自然造就了随州，随州适宜耕种的土地必然孕育农耕文化的圣贤。中国历史的信史之前的夏商周被称为半信史阶段，之前还有传说时代。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就出生在随州。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初期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追记中必然带有神话和传说，但传说不会凭空而起。中国古史专家对历史的编订是严谨的，应该说传说中隐藏着历史的真实。

我觉得从信史中的季梁出现在随州，恰恰可以用信史证明，随州具备文化英雄成长的环境。炎帝神农这个文化英雄的内涵，乐意为民众的生存牺牲和奉献的南方天帝。随州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稻谷的种植，必须用众人的力量，平整稻田，兴修水利，这就涉及到文化最核心的概念。聚集？众人凭什么听你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惧怕，二是道德。体魄的力量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从猴群挑战猴王就会感到惧怕的聚集不会长久。唯有道德的力量可以让聚集紧密长久。炎帝神农就是这种具有高尚

道德的典范。炎帝神农许多行为有着极大的风险，比方他尝百草，尝错了就会死人。但他为什么还会去冒这个风险，是因为这种牺牲可以使他的部落聚集成一个整体。稻谷的种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长时期的安定，因为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稻作最根本的规则就是不能欺哄土地。真心诚意对待土地，就会有丰厚回报。这就是诚之源泉。诚存于心为忠，达于言谓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诚就是“道”。它其实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炎帝神农开创的稻作精细农耕让“道”普遍存在于随州这片土地上。历史从漫漶走向清晰，季梁在东方文化的发源的这片富矿开采出高品位的思想珍宝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把创立这种文化生态的炎帝神农称为圣人，把从这种文化生态中寻找到的规律总结为“道”的季梁称为“大贤”，而且两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天地自然的形貌性质必然产生不同的人群和不完全相同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总和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它是涵养一个区域文化特性的丰厚土壤。这种环境和土壤必然孕育一定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必然催生一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所谓天圆地方，其实是说天地的规则。天的法则是周圆运转循环，地的道理就是稳定，天地就形成对立的动和静。人类对随州天地动静的认同和遵从，就必然产生炎帝神农、季梁这样的文化英雄。随州这座城市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会找到自己的优势。上苍赐予随州众多的智者，终于发现了这座城市丰沛厚实的高品质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在新老城市建设了炎帝神农和季梁两个公园。走进随州，漫步这两个公园就是穿行于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从漫漶走向清晰。特别是信史中的季梁在中国文化经典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季梁是中国信史中的第一位政治家、哲学

家、军事家。他的精神品格孕育了后世的诸子百家，他们构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文化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才有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在炎帝神农故里，季梁是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贤。

只要读过中国文化经典的文化人，就知道大贤是什么样的份量。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克将军到随州，第一件事就问，季梁祠在哪里，我要去拜一拜。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说，发蒙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只要读了中国文化的经典，就会读到季梁。是这些经典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处世。拜谒季梁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自觉。

今日学子不知“经典”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而我们通过季梁公园的建设，重现中国文化的经典。经典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我们读过，就会感受到它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营养自己，还可以福荫子孙万代。历史会永远记住这届随州党委政府和这代随州人。因为我们这代随州人建设了季梁公园，就是让天下人真实地认识了中国文化。

一个伟大王朝的随州味道

中国历史上隋王朝是用随州的地名来命名，让这个王朝有了随州味道。建立这个王朝的隋文帝杨坚，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这在中国历史学界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西方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是因为这个人物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到器物层面都为中国的统一有所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根据国际知名学者与专家撰稿、审校的《世界百科全书》所收录的历史人物，按每个人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诸因素，从数万人物中选择了100位进行了排列。这些人物的选录与排列顺序，虽属于个人见解，但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冷静的观察、平静的叙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与理由。中国的无数帝王中，麦克·哈特只选择了秦始皇嬴政、隋文帝杨坚。

麦克·哈特给出秦始皇上榜的理由是伟大的中国皇帝，开创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格式，给出隋文帝上榜的理由是在秦始皇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度，并营建大运河。哈特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描述这些人物的事业和贡献，哈特认为杨坚能在几百年的动乱之后，重新统一中国，并用文化和交通的模式，让中国的统一成为常态。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通过人物的业绩来阐释人物的地位。从他对中国的帝王排序可以看出，这个西方人认为人类的文明进步，重要的是整体的融合。这就是说，因为

隋文帝杨坚身上有浓厚的随州味道，他才能进入世界前100名的排序。

“随”这个字来源于天地自然环境，它的演变进化其实就是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文字最大的功能就是跨时空地传递历史信息。“随”的最初篆文写法是象形的“卩”和“人”。

“队”是一个会意字。“卩”的篆文写法画的是一座山的形象，《说文解字》解：“大山无石之陆。”它旁边是一个人。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一座山的独体字和一个人的独体字合在一起用，这是说一座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而落。

随州境内确实有一座山，无宗无脉，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今天地理学解释，为褶皱断块山地，是地球的板块运动碰撞形成的。古人没有今天人的地理知识，认为这座山是从天而落，在文字上表述画一个从天上坠落的人和山，它通“陨落”。这座山的古名就叫“陨山”，这座山中流出的水今天依然叫“涇水”。这个被写作“队”的“随”字，其实就是反映了人们最初对这片土地的认识。

人类文明能得以成长，就在于人类的目光能得以延伸。“随”从“队”变成“隋”或者“随”之前的“随”字，是一个“卩”和上下两个“左”。右边的两个“左”字，“左”字上面画着一只手，下面是一个工。手有辛勤劳作的意，工是规则的意思，这是说按规则经营土地，指稻作农耕过程。按规则经营的土地，就能变成肥沃的土地，下面的一个“左”就变成了“月”。这不是月亮的“月”，而是一块肥肉。这种变化就是人们对随州这片土地的认识发生变化的过程。随着人们的眼光伸展，人们认识到随州这片土地处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之间。

“卩”从小处看去，只是一座没有石头的山，如果用更深远的目光来审视，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按照规则经营成为肥沃的土地，“有”从小处看，就是一块稻田，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就是整个长江流域。

“隋”中间多了一个“走之”，来源于炎黄融合。黄河流域的轩辕黄帝跨过秦岭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长江文化的炎帝神农拼死守卫几代人努力才能形成的稻田，与之发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开拓生存空间是文明的本性，冲突其实就是另一种方式的融合。冲突和对抗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冲突和对抗的时候，一定是两种力量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就必然有一方用智慧来增加自己的力量改变这种均衡，这样就必然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力量冲突对抗改变过程。历史文献中有戎狄、蛮夷等许多名号，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众多的族群由于力量的微弱，就逐渐消化在先进的力量之中。

粟稷旱作农耕是一种相对粗放的农耕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广种薄收，广种需要广阔的地域，黄帝部落跨过秦岭扩展自己的力量是生存的选择。稻作农耕是一种精细农耕。一块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发生冲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场冲突是浩大的、激烈的。想一想，如果失去几代人的努力而成为良田的家园，将是怎样的下场，一方面为了生存拓展空间，另一方是为了生存捍卫家园。为了生存就决定了这场冲突激烈和残酷。那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没有办法跨时空地传递当年的信息，但我们可以想象这场厮杀的血腥场面，那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场景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叫人难以忘怀。

人们代代口耳相传，传到了有文字的时代。人们把这场冲突称之为“炎黄之战”。历史文献讲的“血流漂杵”，就是说这场战

争的残酷，四个字把那惊天动地、撕肝裂胆、血肉横飞、尸陈沃野的残酷和激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这四个字仍叫人胆战心惊。最激烈的对抗和缓过后，炎黄二帝面对部族的牺牲开始冷静地思考。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对方。这就是共生共荣。对抗是不可能让任何一方获得利益的。唯有和解可以让双方共赢。

传说，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认为如果能减少部族的牺牲，保住完整的家园，就是承认一个中央天帝。他就答应了黄帝，他对黄帝说：“我把我的诞生之地‘隋’中间加上一只脚，以示我炎帝神农永远拥护跟着中央天帝黄帝走。”两块土地的“隋”之间有了一只脚之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因炎黄的融合成为人类世界文明发育成长最完美的空间。粟稷旱作农耕与稻作精细农耕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文化生态融合。这是秦岭以北的粗犷豪放与淮河以南的精细柔美同时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性格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民间传说是历史传承的一种活体遗存，它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这材料其实映证着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炎黄的融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民族的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中国历史上，长江与黄河曾有过分裂的历史，但无论分多久，分裂的双方都时刻为统一作着准备，期待结束这种分裂，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统一。“随”这个字其实就真实演绎着中国长江与黄河融合的过程。

“随”字从造字到《说文解字》到今天的《辞源》、《辞海》解释，这个字的核心意义都是“顺应”。跟从、沿着、顺应、顺从的意思。“随”作为一个词素和另一个词素搭配时，都

带有和谐圆融的意思。随心、随意、随便、随和、随缘等等词语，只要沾上“随”，就有一种圆融和谐、宽厚融入的味道。

“隋”这个会意文字无论有“走之”、还是没有“走之”，其核心内涵就是两块土地的结合。当两块土地完美地融合成一个整体时，就是一种匀称、平衡、圆融、和谐，其中的内涵无比丰富，十分深刻。仓颉造字时，心与天地鬼神相通，必然明白“随”就是炎帝神农带着自己的故土融入一个更大的整体，因其意而造两片土地融合之“随”字。随州人也领悟了其中深刻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为国、为郡、为州、为府、为县，建制无论怎样发生变化，“随”始终在国、郡、州、府、县之中没有发生变化。

“隋”能够走进一个王朝，为这个王朝打上随州地域的印痕，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动荡和分裂的时代。历史学家们把这个时代命名为魏晋南北朝。实际上，魏是三国之一，它只是三国中比较重要的，并不能代表三国。魏必须加上蜀和吴，才能成为三国。所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时代起始点，就应该从东汉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时间算起。这是三国的序幕，是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的起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下限，应该在陈灭亡之后，陈灭亡了，南北朝才真正算是结束了。陈灭亡在公元589年。中国历史上这个动荡和分裂的时代，总共394年。

“随”与隋文帝杨坚发生关联是公元550年。梁武帝萧衍晚年，由于错误的政策导致了侯景之乱。梁武帝萧衍自己饿死在台城内的文德殿，梁朝王室子弟间的帝位争夺就开始发生。西魏宇文泰乘着梁朝的内乱，派大将杨忠从南阳进军襄阳，攻下随州。随州是随枣走廊的咽喉。古籍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只要拿

下了随州，就能够横扫汉东州县。占领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就能直接威胁梁朝丰腴的江汉盆地。《资治通鉴》卷163记载：“汉东之地尽入于魏。”同年二月，杨忠乘胜到达石城。准备进攻江陵。《旧唐书》说：“石城在竞陵。”今天的钟祥中古时期属于竞陵石城。

湘东王萧绎想借用西魏的力量灭掉与自己争夺帝位的兄长萧纶，签订了“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并称臣于西魏的盟约。西魏这次南征真是大胜，杨忠可是为西魏立下了头功的人，连续进爵陈留郡公。这一年，杨坚9岁。《随州志·古迹》中记载，“文帝微时居州西南龙居山。”我认为这个记载只是一个传说，有些生硬和牵强。最多只是杨忠占据随州之后，带领只有9岁的普六茹坚、小名那罗延的孩子，住过很短的时间。然而这个小住给少年的杨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父亲立下大功获得爵位之后，可能带自己的心肝宝贝来随州小住。一个人心境愉快，满目春光，杨坚见这个地方这么让父亲高兴，必然引发杨坚的深思，随州是一个与自己的命运有着紧密联系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必须深入了解、十分熟知的地方。我觉得从这时起，隋文帝杨坚开始关注随州是说得过去的。

杨忠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关陇贵族集团是以武川军人为班底的文武合一、胡汉杂糅的贵族集团。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四个王朝的皇帝都出自于这个集团，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要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说起。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很有雄心的英雄，他占据中原之后，想治理好中原。他知道治理天下不能靠游牧文化产生出来的那套军事政治方式，必须用农耕文化抚育出来的成熟的封建管理模式。农耕生活需要的是秩序，儒家的礼义文化就是根据

社会稳定的需要而制定的。拓跋宏对汉文化的仰望，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这本是历史的一次重大进步，但进步其实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调整中就肯定有利益的受损者，稍微处置不当就会诱发重大社会动荡。

拓跋宏的迁都洛阳，武川的地位就开始下降。武川在内蒙的大青山，是扼守草原进入内地的门户。北魏的首都原在平城，就是紧挨着草原的山西大同。内蒙古南部有六个军镇，是北魏首都的屏障。孝文帝的迁都让武川六镇的地位发生变化，从保卫首都的桥头堡，一下子变成了北部边陲。六镇变得不重要，六镇将士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也随之下降。六镇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事要地，鲜卑人、汉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界线不是那么清楚和鲜明。战争是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生活，这种生活需要一种过命的互助，相互间的友谊渐渐成了割头换颈的兄弟，这种袍泽气氛最容易形成对社会的破坏势力。果然，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镇民要求开仓取粮，被拒，于是爆发起义。冲击了北魏政权，《资治通鉴》记载：朝廷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着，皆免为民”。

这次起义改变了杨忠的命运，只是一个下级军官的杨忠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武川，流落到山东泰山脚下，娶妻安家。然而，在社会动荡的年月，想过平静的生活，是一种奢望。南梁出兵北魏，攻占了杨忠安家的地方，杨忠被掳掠到了江南。杨忠生得膀大腰圆，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材料，自然就成了梁朝的军士。5年之后，杨忠又成了北魏军队的俘虏，杨忠再次因为身材的强健成为军人。杨忠如水中的浮萍辗转在各种军事力量之间，终于，他落到了独孤信的麾下。同是武川老乡，六镇的袍泽之情顿时被唤醒，他成了独孤信的心腹大将。由于武川起义的冲击，北

魏朝廷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变成东西两个魏，两魏虽然都是拥立北魏的皇族当皇帝，但真正掌权的是六镇出身的人。独孤信与西魏宇文泰同属武川，武川的那种袍泽情谊，让独孤信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靠近西魏，这一年大统三年，杨忠31岁。杨忠既然是独孤信的心腹，宇文泰赐姓普六茹。改换鲜卑姓氏，就是被西魏政权认定是自己人。

在杨忠获得鲜卑族姓氏5年后，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杨坚出生在冯翔般若寺。大名普六茹坚，小名那罗延。有一神尼叫智仙，沉静寡言，精修道业，视那罗延为己出。那罗延七岁时，神尼智仙对那罗延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那罗延是梵文的音译，金刚力士的意思，是护法神。这个名字就说明，杨忠不是把杨坚当作一个佛门弟子来养育，而是要接父亲的班当将军。看一看护法神握杵持剑的形象，就是希望他来主持人间正义。神尼智仙的话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对杨坚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

应该说，神尼智仙虽然是世外高人，但绝对是一个智者。不然，已经成为贵族的杨忠绝对不会把自己老来得到的珍贵长子交给她抚养。智者就一定知道，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成长，成长就需要吸收营养。人成长最重要的营养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中国最重要的精神营养就是汉文化，汉文化实际上就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根就在随州。从后来杨坚的许多言行来看，神尼智仙影响了他的一生。用今天的话说，爸爸是大将军，又是老来得子，典型的官二代，肯定娇生惯养，成为纨绔子弟，不会有什么出息。然而，在佛教浓郁的环境里成长，沉静矜持、淡泊朴素，没有喧嚣与繁荣，恭维和紧张，只有庄严和肃穆，静谧和恬淡。这种环境最适合的觉悟。觉悟就是觉察思索领会，明白开

窍。显然这是不符合孩子天性的地方，一个人没有美好的少年肯定是人生的缺憾。这种缺憾也就影响了杨坚人性的完美，从而让杨坚的整个人生和他创建的那个王朝，失去了应该的温暖和必须的柔情。

然而，他却少年老成，一派英雄气度。西魏的第一权贵宇文泰见了杨坚惊讶不已：“此儿风骨，非世间人！”杨坚多年在清静的宗教氛围中生活，善于与自己的内心交流，不会轻易表露，总是先反复思考，这就显得格外老成持重，这是与他的那个年龄不相适应的。他这个模样让许多有政治谋略的人见了，就感到害怕。害怕是因为一个人内心丰富，却一点也不外露，这是一种深不可测。齐王宇文宪就对周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内史王轨也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其实这都与杨坚少年的教育有关，神尼智仙的成功调教，让一个官二代成为了一个灵魂优秀却不外露的少年英才。

杨坚身上的随州味道渐渐浓厚起来，应该是在他18岁以后。杨忠进爵随公、柱国大将军，邑万户，别食竟陵县一千户，收其租赋。《随州志·卷十四》记载，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武川这个籍贯让独孤信对杨忠有一种兄弟般的情谊，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先，祖先的生命来源于这片天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同乡就是兄弟，就能够托付性命。杨忠成为大将军之后，加官升爵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况且，此时的杨忠已经是独孤信的儿女亲家。独孤信已经把自己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杨坚有父亲和岳父的庇护，应该是很得意，然而，这时走进官场的杨坚却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幸亏是父亲的爵位中的那个“随”字，保佑他躲过了人生的

第一场危机。

杨坚进入官场的官职是右小宫伯，职责是保卫皇帝。但皇帝是权臣宇文护拥立的，他这个官职也是宇文护为拉拢杨忠任命的。宇文护也是逼死岳父独孤信的元凶，投靠宇文护，就是忠奸不分，是悖逆，将来会留下千古骂名。父亲一句随州俗话提醒了他，“两个婆婆难做媳妇。你哪边也不要靠呀（《资治通鉴》卷170）。”这就是“随”的核心，随便、随缘，对皇帝、对权臣都是不冷不热、不离不弃。其实这就是一种平衡，得不到升迁，但可以获得稳定。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八年的时间，他都处于一种稳定之中。不要以为这种稳定是很容易得到的，在那个政治混乱的时代，一句话、一个行为的不当，就要丢性命。不是少年时代尼姑庵里的修炼，和父亲怎样做随州媳妇的教导，让他度过了许多难以忍受的时日。说这八年时间，杨坚是度日如年一点也不为过。杨坚的职责是保护皇帝，行政关系归天官大冢宰的下属，担任天官大冢宰是杀父仇人宇文护，天天与自己的杀父仇人在一起，能做到一点情绪也不外露，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有一点外露就是丢性命的事。

公元565年，随国公杨忠的实力终于让宇文护晋升为大将军，晋升就必须有一个实职，宇文护给了杨坚一个随州刺史的职务。这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但离开那个沉闷的尴尬环境，能来到给父亲带来幸运的地方，肯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随州的这两年，可以说他是真正体味到了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地方。

“随”是一种容纳、一种接受，也是一种随缘、一种顺应，实际上力量的聚集，没有定式和常形，要按照具体的情势，做理性的选择。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是春秋著名的古随国，产生过一代政治家季梁。炎帝神农能成为人文始祖，就是聚集了很大很大的

能量，靠什么聚集能量？靠给予。给予别人就能够收获人心。尝百草，尝错了就可能死人，但炎帝神农尝了，就收获了人心。

炎帝神农是农耕的始祖，农耕生活靠什么，靠一家人的齐心协力。中国文化起源于家，从家到族，再到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就是国家民族。家和睦就兴旺发达，社会和谐国家就顺畅。季梁更是了不得，说老百姓是神的主人，国家治理好就首先敬老百姓，老百姓就保国家昌盛。这些历史其实都是在讲怎样做人做事，会做的人做官，就会很随和，会有很多朋友。朋友就是没有血缘的兄弟，兄弟在关键的时刻，就一定会为兄弟创造机遇。来到随州，他就一定明白了“随”的内涵就是两块土地的结合，用什么方法去领会这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进入两块土地的结合部，就可以深刻体悟出“随”的核心内涵是圆融和谐，在随州境内南北分界线上的淮河源头，我们看不到对抗对立，却能深刻体味出中国文化的魅力。

随州这两年的时间，应该说他明白了做大事就要收服人心的道理。杨坚离开随州的时候一件小事，就能够看出，他在随州收获巨大。《北史·列传·第六十三》中有一段关于杨坚结交朋友的记载：“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结纳。及帝去官归京师，晃迎见于襄邑。帝甚欢，与晃同饭，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图彙，九五之日，幸愿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顷之，有一雄雉鸣于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则有赏。然富贵之日，持以为验。’”

襄阳府的总管宇文直有个手下叫庞晃，庞晃看到杨坚相貌不凡，知道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杨坚离开随州前往京城。庞晃赶来送行，两人饮酒饮了一个通宵，到酒酣之时，庞晃就预言杨坚将来要当皇帝。杨坚的心被人看穿，顿时有些慌乱，但他们之间

关系颇为亲密，就笑着说：“莫乱说。”这时正好天亮雄鸡报晓，杨坚就对庞晃说：“你把这只报晓的鸡射中了，我不光相信你说的，还要赏你。等我真的富贵了，你拿这只箭来找我。”晃既射而中，高祖抚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赐之，情契甚密。这个故事说明二十多岁的杨坚来到随州，已经明白政治就是人心。收服人心，还做得没有痕迹。政治的本质就是让自己的力量很大，一个人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这就需要融合别人的力量。把自己贴身的小妾送给庞晃，庞晃就永远成为自己的贴心人。

公元568年，杨坚承袭父爵为隋公，他身上的随州味道就浓厚起来，并逐步侵染一个崭新的王朝。人一生有所成就，需要才能、勤奋、机遇。机遇的内容极为复杂，但很多时候，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杨坚当过随州刺史之后，学会了聚集各种力量。让很多人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在关键时候，都起到过很大作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个著名的术士叫来和。结交术士，说明杨坚忧心自己的人生前途，需要一种虚幻的东西来麻痹自己。来和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说明来和已经看出杨坚的帝王之相。一个人有帝王之相，这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绝不是一件什么好事，随时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周武帝听很多人说杨坚有帝王之相，就找来和问。一个皇帝问臣子的相貌，就一定关乎这个人的命运前途。来和此时已经是国家级的相面专家，皇帝才会找他来问，他照直说，杨坚就必定命归黄泉。来和此时已经是杨坚的朋友，杨坚这位没有血缘的异姓兄弟对周武帝说：“随公只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这其实就是叫周武帝放心，杨坚只是将军的命，不

会夺取宇文家的江山。这样一场涉及生命的重大危机，因为会做人做事，杨坚早在与来和交上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化解。所以，危机到来之后，杨坚完全不知不觉中躲闪而过。

周武帝听了来和的话，虽然继续让杨坚在定州当总管，但总有些不放心。毕竟这杨坚位高权重，为北周立下过赫赫战功，又是太子的岳父，还必须提防着点好。所以就把眼见换到南兖州去当总管。杨坚是个心有大志的人，心里肯定难受之极。庞晃这时劝道：“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意思是现在手握重兵，动手就能够得天下。在随州呆过，就知道容忍，这种容忍就是随缘，等待最佳的机遇。杨坚说：“时未可也。”这是一种理性判断，不能容忍就不会等待，没有等待就不会让自己的能量特别大。这句话说明，杨坚的雄心，他肯定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但要等待时机。

到过随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山有水，但山不高、水不大的地方。只有柔和浑圆的丘陵，曲折蜿蜒的小河，看不到明显的雄奇和精美，却有着无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博大精深、回肠荡气。黄河流域的粗旷豪放在这里被溶蚀，长江流域的精细柔美也能被化解。容纳其实就是用岁月来消解溶蚀自己的不利，蓄积自己的巨大能量。他向周武帝低头，用随的那种容忍等待，容忍不是一种消极，而是积蓄能量。终于，上苍用一种无形的手为杨坚的新王朝创造着机遇。有为之君周武帝在北伐的胜利之中突然染上重病，呜呼哀哉。新上任的皇帝就是周宣帝宇文赧，正是杨坚的女婿。周宣帝的登基，杨坚从南兖州进入朝廷，成为上柱国、隋国公、首席宰相。

宇文赧是一个荒唐的皇帝，刚当政一年，就禅让于周静帝，做起了太上皇。周宣帝凶狠残暴，无端端要赐死正宫皇后杨丽

华，亏得独孤夫人叩头叩得鲜血淋漓，才消了周宣帝宇文赧的气，保住了皇后的性命。杨坚平时聚集的能量这是就发挥作用了，杨坚读太学的时的同学郑译帮老同学讨了个扬州总管的官职，以避开喜怒无常的周宣帝。正在这时，周宣帝暴病而亡。御正大夫刘昉和内史上大夫郑译伪造皇帝的诏书，着杨坚辅政。内史上士李德林更是力主杨坚设立大丞相，武将卢贲更是说：“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隋书·天文志》记载：“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太后杨立华希望能找到最信赖的人，只有娘家的父亲。杨坚曾多次说：“公主有大功于我。”为什么朝中大臣选择杨坚，说明杨坚平时待人厚道，这份权力送给杨坚，可以与之分享。

杨坚顺利入主正阳宫，有很多偶然因素，细细思量，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假如没有周宣帝的凶残暴戾，诛杀宇文宗亲，就不会有杨坚的入主朝廷的机遇，还有没有杨坚平时结交朋友凝聚能量，大量的文臣武将也不会杨坚入主正阳宫的过程中，衷心拥戴。杨坚成为权臣，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隋书·帝纪》说：“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中国的政治是家国一体的，要换皇帝，就必须清洗整个皇族。而这些皇族都握有强兵据守着关键节点的重镇，还有三个总管的发难。杨坚以自己的雄才伟略用几个月的时间、平息各种动乱，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灭了陈，实现了四海一统。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到陈后主从井中被俘，中国经历了几乎四个世纪的动荡不安。

杨坚建立的隋朝，以自己的爵位“隋”来命名。杨坚虽不是完全弄明白了“随”的内涵，但起码他是喜爱这个圆融和谐的

“隋”字，天下各族从此融为一体、中国南北因而永不分离，中国大一统的历史终于再次成一种常态。我的好朋友蒋天径，专门对“随”与“隋”进行了详细的考据。以强雄的论据证明“随”、“隋”从春秋起就通用，同时找到南唐徐锴“随文帝悉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是一种主观想象，毫无依据的哗众取宠。引用清朝学者王昶、鲁迅、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质疑，还有大量“随”、“隋”通用的具体例证，纠正《资治通鉴》后的史书谬误。

我认同蒋天径的看法，觉得“隋”造字的时候就是古人的对地域的一种认识，开始的“随”字就是“队”，表示这片土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随着日光的伸展，知道了这片土地处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炎黄的融合让长江与黄河永久成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南北融合的标识，其中蕴含和隐匿着民族最珍稀的融合元素。我觉得隋文帝杨坚真正深刻体味出“随”字的真正意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隋文帝杨坚用“隋”字命名自己开创的王朝，让民族的大一统成为永恒。虽然隋文帝杨坚没有胡人的血缘，但他成长于少数民族主政的环境，有着比血缘更深的胡人印记，更能认识和领会出胡人和汉人是兄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实现多民族的统一。吸纳与融合就是最鲜明地随州味道，到过随州的人，只要吃过一顿随州饭，就知道随州味道就是不咸不淡，不甜不酸，却有微咸微淡，微甜微酸。那是一种酸溜溜（儿）的、甜净净（儿）的、苦盈盈（儿）的、辣乎乎（儿）的，那是一种给人很舒服惬意的感觉，地地道道的随州味道，其实就是中国东南西北在这里中和的味道。

在杨坚看来，思想文化的吐纳、吸收、创新，相互间容纳和融合，才是一个民族成为统一体的根本。因此他开创了科举，建

立了文官制度，用制度保障社会精英进入社会上层。这是用制度来保障思想的吸纳与融合。这种文化制度的建立，是从后天资格寻找社会的有效治理人才。显然，人的才气是不能先天遗传的，血缘关系的世袭产生的权力垄断，对社会发展进步具有巨大阻力。科举制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辽阔的地域、复杂的区域、不同的民族、无数的人群。想成为社会精英的人，就会勤奋努力，用自己的才能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稳定不仅仅是给自己的出路，更是让社会呈进步趋势。

不要以为科举制是选择学者和诗人，实际上是在为国家的治理拔擢管理人才。中国的官场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中国的家国一体就是齐家治国。这实际上就是让无数的家融成一个国，国是家的扩展和延伸。治好一个家、治好一个地方，再去治一个更大的地方。治好一个家，不一定是金钱和物质，许多家没有多少的金钱和物质，但一家人过得舒舒服服。有许多钱财的家庭，却搞的一塌糊涂。杨坚下诏：“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献书一卷，赀缣一匹。”献给国家一卷书，可以得到一匹细绢。缣就是质地细薄的丝织品。这卷书国家组织人来誊抄，抄完之后再还给你。经典就是教育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读经典就能够成为精英，就能够去让国家选拔。就是国家在吸纳和融合天下的精英，诱惑着每个正常人的心灵，这种诱惑与其说是在升华人的品性，不如说升华社会的文明。

杨坚修建运河，就是用水的便利把分隔的地域连成一体。人们多以为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实际上隋文帝杨坚开始这项伟大工程。公元584年开漕渠，引渭水，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名广通渠，这是大运河的开始。隋文帝杨坚有随州烙印，就知道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融合靠交通的便利，随枣

走廊的重要，就在于“荆豫要冲”、“汉襄咽喉”的位置，总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随州就能够北望中原、南锁荆襄。交通的通达就能够让中国的南北成为一体。如果南唐徐锴觉得隋文帝杨坚恶“走之”就不会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成一体。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是有运河这个大大的“走之”就永久融为一体。

隋文帝杨坚建立的王朝伟大之处，不仅仅是用了一个“隋”字，而在于随国公杨坚明白了“随”的真正含义，中国的分裂是一种痛苦，是民族的灾难。中国的统一需要融合，这种融合首先是思想文化、再就是地域的连接通畅便利，文化的融合需要一种制度，以文化人，人得以教化，就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就能够顺其自然，只有不讲征服，就能够和谐。广阔地域空间的融合需要通道，通达需要具体的载体，在那个时代，最好的载体就是河流。麦克·哈特以一个西方人给出的理由，其实说明人间的文明不是分离，而是合为整体。

可惜，“随”的深刻还没浸润到隋文帝杨坚的骨髓，这意味着他对“隋”的理解不是很深刻，有利就用，无利则抛，这种急功近利让他少了融合人心的温度和柔情。《隋书》载：“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老百姓吃豆屑杂糠，就不晓得开仓放粮。隋朝富甲天下，仓库的粮食够吃几十年。唐太宗说：“隋文不怜老百姓而惜库房。”顺应天地自然为道、顺应社会人心为德。对人心的感知缺失，也许与他少年时代清心寡欲的生活有关，让他开创的王朝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缺少温度和柔情的王朝无论多么伟大，都会被人抛弃。

寻找那缕照耀千古的月光

随州人时时刻刻怀念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李白用随州的那轮明月，清澈了自己的内心，再用它照耀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天下任何地方的明月都难以照进人的内心，唯有随州的那缕月光能穿透人心，浸染人的质朴思绪。广水市文化界的朋友邀我游览“淮南小寿山”，介绍说，李白就是在这里写下的《静夜思》。

仰望苍穹就会发现，喧哗的白天历历在目。前行、跌倒，爬起、再前行、奋斗失败，人生总是不甘心平平谈谈，拼尽全力来证明，自己才是现实唯一的醒者，因为积极进取，李白的人生具备厚重而且深远的价值；世界总是用无情折磨进取的人，月光下的世界多么宁静，随州头顶上的那轮明月，用清澈的光亮洗涤着李白的内心，李白这时终于有了真正的觉醒。这是一种内心的觉醒，这种觉醒是对生命的超越，对精神价值的领悟。人是高贵还是卑贱的唯一界限，就是精神的优秀与平庸。精神异常优异的李白，从喧嚣中觉醒，从觉醒中寻到了灵魂皈依之地，他在清凉的月光下写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惊天动地的文字。

在李白的人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十年，是被时代抛弃了的十年，是人生磋跎的十年；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十

年，是人生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实现、寻不到精神寄托的十年。这就是李白的安州十年，安州近邻随州。在安州陷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苦闷的时候，他就会来到随州的寿山，让疲惫的身心稍事休息。只有奋斗，没有闲暇，天才也会失去灵性，优异的诗人在奋斗受挫之后，回到寿山，让心灵从功利的奔波中解脱出来。心灵优异的人，能够去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也能够独处和自己的心灵进行会晤。一个人能赢得世界，如果失去自我，算不得优秀。只有能在这清明宁静的月夜找到自己心灵皈依的家园，无论多大的艰难坎坷，都能获得坚毅和顽强的信心，勇敢地跨越。

李白的《静夜思》写于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这十年，这是李白研究学术界的共识。李白在这十年里写下的诗文，主要是两类，一是奋斗进取，不甘心人生的平平谈谈，希望“匡社稷”、“安黎元”、“济苍生”，实现生命的精彩辉煌；二是丰富心灵的营养，辛勤开垦自己的心灵土壤，从道家、佛家之中寻找心灵的安慰。一个人的心灵优异与否，不是天生的，多半取决于自己，一个善于开垦自己心灵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片美丽的果园。学术界一直认为《静夜思》写于这个时期，这个判断十分准确。因为《静夜思》中有奋斗进取的大欢乐，也有寻找心灵慰藉的大宁静。奋斗和进取就是走进喧嚣和浮躁，寻求别人理解和认知自己的优异。一个伟大的心灵，没有被人理解和认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李白“匡社稷”、“安黎元”、“济苍生”的雄心壮志没有多少人能认识，一颗优秀的心灵没有被世间接纳，只有三个去处，无聊、寂寞、孤独。无聊只会在消遣中淡化自己的欲望。寂寞只会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则是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建立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李白的优秀就在于他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希望用自己的才气成就一番事业，从布衣走向卿相，甚至能直接辅佐天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家国一体的模式，只要认同这个家和国，就是这个国家的亲人，只要你真正的优秀，就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从被治理者成为治理者。唐代的社会风尚更是自由，政权向中小地主开放，就是通过科举的方式，遴选社会的精英，也向大地主集团开放，接纳已经握有大权的统治者推荐。这就为李白的进仕实现人生跨越之路，提供了选择。李白天生豪放不拘的性格决定，他不会通过考试入仕，自己具备超人才能，岂能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按部就班地去参加科举考试登上仕途？

这种自信就必然有伟大人物横空出世，一个人不甘心普通，选择漂流与探险，追求生命的品质和质量提升，走一条艰难坎坷的推荐之路，这条路很多时候是自己把握不住的。漂流就会有时而湍急、时而平缓的水流，探险就必然有险峻高峰、平坦宽阔的路径，人在这种漂流和探险中，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境况出现。李白的人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胸襟真正坦荡、开阔起来，生命进入自由洒脱、闲适空灵的生命境界。李白的伟大就在于能及时地把这种胸襟和境界，书写和记录下来，让人类世界来分享他的感觉。

李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首先就是入仕，他觉得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条道路缓慢而且平庸。他感到自己是天下奇才，同一般的读书人不可同日而语，就不愿意和普通读书人一样通过考试而登仕途。他从四川出来，在江陵就遇到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一个道教人物，就是道教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自幼笃学好道，无心仕宦之途。遍游天下名山，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司马承祯的文学修养也很深厚，

初盛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并非一个紧凑的集体，后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归纳而成的历时性的群落。历史上被称为“仙宗十友”，首先是司马承祯，还有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

从李白后来的诗文中可以得知，司马先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道士。“情商”是一门现代学问，又叫“情绪智慧”。我请儿子专门邮购了美国人写的上下两本一套《情商》，读完厚厚的两本书，我才发现，这两本书就说了一句话：说话做事能让别人愉快的人就是情商高。具有情绪智慧的高人说话，别人听了心里很舒服。司马承祯和李白相遇，就说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这一句话几乎影响了李白的整个人生，李白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他始终觉得相信自己就是走下仙界的神仙，至少与神仙有缘。他的字太白，“字”是名的解释和补充，与“名”互为表里，又称“表字”。李白在许多诗文中写自己与太白金星的缘分，最有名的《登太白峰》中“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诗人描绘夕阳西下，晚霞满天，诗人步入峰顶，在那里，与太白金星倾耳交谈，乘着和和习风，飘然飞升，穿过层云，太白金星为诗人大开天门，携手进入仙境。太白金星与李白亲密无间的情态在诗中表露得淋漓尽致，让李白的诗充溢着仙的气息。司马承祯告诉李白，自己的嫡传弟子李含光，门下有一个悟性极高的弟子叫胡紫阳，与你有些缘分，或许能为你步入仙界给予帮助。

道教在唐朝得以空前兴盛，与道教的宗师李耳的姓氏有关。隋末动乱，就开始流传“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等政治谶言，这些政治谶言加速了社会动荡，李密、李轨以此谶言来号令天下。《资治通鉴》载：方士建议隋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隋朝李姓大将军及重臣或被忌

杀、或被猜疑。李渊集团利用老子李耳制造君权神授的理论，在军事和政治上获取了巨大利益。武德八年，高祖规定国家的重大典礼，道教在先、儒教其次、释教最后。唐朝崇尚道教，有政治上的利用，也有帝王个人的信仰，唐玄宗一生崇奉道教，前期为政治上的需要，后期则祈求个人的长生不老，这样就把道教推到了很高的地位。

理解李白来到随州，就必须知道司马承祯在唐王朝政治上的地位，司马承祯被称为道士皇帝，是因为在武则天时代就十分有名气，武则天虽然自称是弥勒佛化生，执行先佛后道政策，但自己早年尊崇道教的许多活动，让她不能对道教有太多的压抑。她闻司马承祯之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操。李旦继位，道教的地位就有所恢复，唐睿宗景云二年召司马承祯入宫，询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他回答阴阳术数为“异端”，理国应当以老子的“无为”思想理念为本。甚合李旦的心意，赐以宝琴及霞纹帔。唐玄宗即位，一改中宗派睿宗佛道并崇的政策，肯定老子在孔子、释迦牟尼之上，神话李姓唐朝，也为了消除武则天的政治影响。玄宗三次为老子加号，先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再封“圣祖大道玄元皇帝”、三追“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西京、亳州设太清宫。

玄宗亲自注释《道德真经》，引领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司马承祯的《坐忘论》是研究老庄思想很深刻的著述，在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也留下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所以，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遣使者迎司马承祯入宫，亲受法篆，前后赏赐甚厚，司马承祯成为道士皇帝。翌年，承祯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开元十五年，再召司马承祯入宫。被称为“仙宗十友”的卢藏用觉得司马承祯不该远离，手指近京的

终南山对司马承祜说：“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司马承祜沉吟片刻慢慢回答说：“以仆观之，乃仕宦之捷径耳。”这“终南捷径”不仅仅是司马承祜人格的超然，也影响了唐代众多文化人的命运。“玄宗令承祜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旧唐书·隐逸传》）。”按照他的意愿，敕在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他号“金剪刀书”，就是篆、隶两种书体写得极佳，又自成一體。玄宗命他以篆、隶两种书体和自成的一體，三种字体书写《老子道德经》，刊正文匍，刻为石经。羽化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称“贞一先生”。只有清楚明白这些历史背景，才能深刻体味出，司马承祜一句“仙风道骨”赞美之词，对李白一生的重大影响，也能够理解李白为什么会有安州十年。

当时的行政区划，安州属淮南道，淮河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再向东直到大海，都归属淮南道，治所在今天的扬州。有人说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诗写于扬州，这话没有错误。寿山又被称为“淮南小寿山”，淮南道的首府就是扬州，首府可以作为淮南的代称，李白在淮南道写下的所有作品都可以注明写于扬州，不算错误。安州寿山，高不过百尺，却峰峦秀出，岩烟岚环结盖。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李白来到寿山，是来寻找道家名士胡紫阳。胡紫阳，俗姓胡，道名紫阳，师傅李含光师事司马承祜于王屋山得授大法灵文金记，成为道教清派茅山宗十三代宗师。胡紫阳跟随李含光潜心学习修炼，终成一代大师。这么说来胡紫阳就称得上是司马承祜的嫡传弟子，以李白的智慧，从道教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是一条最便捷的路。胡紫阳就在谿水河对岸的现光山修行。胡紫阳不在寿山，但寿山之阳的长寿观，掌门道士是胡紫阳的弟子。

李白希望能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家国天下梦想，不愿走一般

儒生科举入仕的道路，这条路太缓慢了。在蜀中时，广汉太守曾举他道科，但他嫌官位小，拒绝了。唐朝上下为朝廷效力的官员在万员以上，其中进士出身的不过上千人。这说明唐代各类政治集团的势力极为强大，占据着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说明各种政治集团也尽可能用各种手段囊括着天下精英，能和李姓皇家分享政治权力。他希望能经人引荐，直接为朝廷所重用。不用世则已，要用就要干大事业。在李白眼里，通过道家名士的引荐，当然能一步登天。司马承祯那种超然的人格，断然不会为朝廷推荐一个与道教没有多少联系的儒生。聪明的李白来到淮南小寿山，显然想从司马承祯的嫡传弟子这里找到一条捷径。

显然，李白成功了。他在淮南小寿山的长寿道人引荐下，来到了仙城山，拜访了一代名士胡紫阳。胡紫阳有个弟子叫元丹丘，是李白的好友，《李太白全集》中写给元丹丘的诗多达11首。其中《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详细回忆了这次拜会。“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当筵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分飞楚关山水遥。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

诗人追忆自己偕元丹丘同游汉东郡即随州，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风光，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这里生动可爱，没有半点官架子。紫阳真人弟子三千，后来能进为西京太微宫使。太微宫是唐代重要的道

教建筑，在洛阳上清宫坐北面南，正名曰玄元皇帝庙，简称玄元庙。玄宗封其名曰“太上玄元皇帝宫”，天宝二年改名太微宫。玄宗为使道教信仰制度化，为培养高级道教人材，把道教典籍列入大唐高等教育的教材。老子的清净无为、休养生息思想使唐王朝繁荣的执政理论基础，太微宫就是提供思想营养的重要场所，这个思想高地为唐王朝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材。太微宫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执政人才的培养场所，相关资料证明太微宫使是当朝宰相为之，统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事，胡紫阳的太微宫使相当于常务。胡紫阳多次推辞，后迫于皇帝诏书，只得入宫。

胡紫阳是皇上的座上宾，汉东太守能和胡紫阳做朋友，当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李白在元丹丘、长寿道人的引荐下，拜会胡紫阳，真是一件人生幸事。这几位忘形之交在仙城山的“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地醉倒，把汉东太守的屁股当成枕头。太守不觉得这是有失礼仪，脱下锦袍给李白盖上。汉东太守脱下象征着权力的官服“锦袍覆我身”，李白一身醉态横卧在汉东太守身上的场面，今天读来仍叫人心动。“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这些道家建筑，不仅给人以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更成为今天随州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李白眼里，随州自神农、季梁之后，随州“无一物可记”，只有紫阳先生，才是值得一记之人。

李白的这些话蕴藏着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的政治抱负，他的终极目标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其实这是一种家国民族天下情怀，隐居在寿山，通过隐居获得名声，四方奔走干谒各类政治集团，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思想的成熟完

美也得益于随州，他虽然说随州“无一物可记”，却一口气数出了神农、季梁、胡紫阳三个人。实际上，这就是他心灵深处的一种本能的外化，他敬仰和崇拜的是历史上的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的根与本就是家国民族天下，这种理念肇始于炎帝神农。自从炎帝神农开创了农耕，就依赖于家的兴旺发达。人多好种田，家庭和睦就能够人多，人多就农业兴旺；农业兴旺就会养活更多的人，带来族的昌盛；族的昌盛就能够形成部落、部落联盟，进而组成国。国是更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炎帝神农有许多的创造，更多的是思想能量。炎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说明炎帝神农不是神仙，尝错了也会死。他为什么要冒死的风险，就是为了家国民族天下，自己死了，能够让部族不死。《左传·桓公六年》关于季梁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季梁为随国的兴衰发展却是竭尽所能，被李白尊奉为大贤。充分说明了李白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应该和季梁一样做人做事。历史文献记载提供的胡紫阳资料不是很详尽，但从李白撰写的《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为唐王朝提供了思想能量的道学家。胡紫阳的弟子“南抵朱陵，北越白水”，多达3000。皇帝诏书聘任他为西京太微宫使，在京都术士推行敛形匿影、吞刀吐火、服丹成仙的时候，不为所动，只和弟子们讲述《道德经》，剖析它的要旨。为唐玄宗以道治天下进行着坚实的思想支持。对道家的深入研究，就会发现，盛唐的出现与道教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关系。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经济上可以缓解人民的压力，对早期中国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就好像，一个小家庭的兴旺，如果家族大家庭的过多干预，可能适得其反，倘若顺其自然，小家庭也能够顺畅繁衍，成为一个新的大家族。

随州文化的灵魂就是家国民族天下，炎帝神农文化看起来是说农耕，没有和睦的家庭，怎么实现男耕女织？家庭的和睦，主要就是处理好家庭的夫妻、父子、兄弟三伦关系。一个家庭里，只要这三伦关系处理得好，不用讲，这个家庭就一定兴旺发达。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说炎帝神农农耕生活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的和睦就是好种田的根和本，它向前发展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优势，经过的漫长岁月，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形式逐渐地浸润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中。

如果把这三伦关系带到社会中去，就发展成五伦关系。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伸。中国历史文字记载的文献中，第一个用这五伦关系来治国的，就是随国的大夫季梁。通观季梁的政治思想，其实就是很好地运用五伦关系来治国。严格意义说，季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炎帝神农的家庭伦理文化很好地运用在国家的政治中，所以，他就站立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第一座文化高峰上。季梁思想成熟成为体系之后，又过了100多年，老子李耳才出生，孔子才面世，老子与孔子成为大家无疑受到过季梁思想的浸润濡养。实事求是说，诸子百家只要梳理清楚了炎帝神农农耕生活的家庭关系，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大家。胡紫阳的道家理论也是讲家庭关系要顺应自然，一万个家庭可能有一万个不同，如果用一个家庭的经验去指导另一个家庭的治理，可能有用，但多数时候没有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殊环境和背景，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很好地让自己的家庭得以发展的家长，就距离治国近了一步。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种传统家庭文化的血脉之中，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精神世界，仍然存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基因。所以，中国最早的公务员，就是从最好的家庭挑选，就是历史上

的“举孝廉”。应该说李白的思想受到随州文化的熏陶，已经开始深入内心，为他进一步的人生路径做好了充分的铺垫。或者说，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思想感染，就难以诞生《静夜思》那样令中国人心动的诗句。

人类社会的关系，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是最合天理、最自然的关系。家庭中虽然也存在着利益，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真诚关爱与无私奉献精神，是超出世界上任何人际关系的。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血缘联系，是亲人、是自己人。亲人间的利益取舍虽然也有公正原则，父母、年长者或德高望重者，在家庭进行财产分割、权力分割、矛盾调解方面，多数时候会很公平公正。有时候看似不公平，但其中一定是对弱小者的倾斜，这种倾斜也是另一个层面的公平。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具有更大值的公正性。汉代出现的“举孝廉”，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是官吏进身的正途，朝庭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中国家国天下政治影响很大。

没有家庭实践的思想是很苍白的。李白的家庭实践是道家名士胡紫阳营造的。李白很想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他向已故宰相许圜师的孙女求婚，李白向胡紫阳袒露了自己的心思。胡紫阳感到成就一个家庭，就是创造一个“无有”。道家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李白没有婚姻，就是处于混沌的“无”，有了婚姻就会阴阳和谐生万物。所以他很乐意撮合这段姻缘，就与“郡督马公”马正公一道前往湖北安陆许家为李白求亲。李白生平中第一次有了婚姻家庭的幸福，严格说，参杂着功利的婚姻不会很完美。前宰相的政治背景没给李白入仕提供多少便利。富裕的许家，可能提供充足的跑官资金，

许家是过气的官僚家庭，过去的关系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许家不仅没在仕途上给李太白提供帮助，还给了李白的伤害，唐人往往把上门女婿称之为赘。赘者，多余之物也，自然会遭人轻视。《中国婚姻史稿》这样说：“（唐时）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未达者，亦多乐于就赘，藉为趋附之梯。”

名门闺秀，娴静而有才情的许小姐，虽不能和李白才貌相当，但也与李白差不了多少。徐家为官已有数代，婚姻选择余地很大，遗传基因不会太差。文献上没记载许小姐有残疾，倒是有许多生活乐趣。李白作《长相思》：“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许夫人觉得后两句有剽窃之嫌，念出武则天皇后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脸上有些发热，这个细节说明许小姐是一个聪明贤淑的女性。严格说，李白的家庭婚姻不幸福，责任不在许小姐，而在于李白太在意做官，几乎没把心思用来呵护家庭。如此才貌出众的女性，李白都不知道疼爱，他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他自己在《赠内》中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李白在安州十年进行了大量的干谒活动，李白干谒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朝廷达官，下至州郡官吏，都是李白上书求荐的对象。幸亏他的干谒没有成功，倘若成功，李白肯定是一个失败的官员。一个连自己的小家都治理不好的人做官，岂能奢望一个不能善待贤淑的妻子、不能给子女幸福的人，能善待自己属下的老百姓。李白干谒活动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人们评论李白性格，“豪迈”、“傲岸”几乎是所有评论家的共识。李白自己也

说“一生傲岸苦不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悲剧的原因在此，其伟大之处也正在此。家庭的失败、官场的失败，丝毫不影响一个诗人的伟大。没有李白的家庭至多是一些平庸的生活，没有李白的官场至多是一些浑浊的争吵，一点也不会影响家庭和官场。中国的诗歌如果没有李白，那一定会黯然失色。

恰恰是家庭的失败、官场的失败，让李白的心灵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希望寻找到皈依之处。仰俯之间，那皈依之处何在？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觉得李白是在寻找自己的故乡，这是历史的一种误读！李白心中的“故乡”是“达济天下，穷善其身”的政治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人生产理想，是施展家国民族天下情怀。李白的不朽就在于他能在伟大和崇高、平常和普通，两种有巨大差异群体，寻找到一种共同的情怀，唤起深深的共鸣。少不更事的少年，历经沧桑的老人，客居他乡的游子，相守相伴的伴侣，只要是中国人，只要静下来，就能想到李白的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寂静无声的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床前的空地上，洒下了淡淡的青辉。如霜的月光就好比看不见的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诗人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抬头仰望，窗外的亮正静静地挂在夜空。有悟性的人恍然大悟，明白触动自己心弦的不是月光，是那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思乡之情。炎帝神农的农耕生活最需要的是家，农耕文化的逐步成熟，家庭文化伦理关系越是清晰，越是能够引领人类走向文明，家就是中国文化核心和根本。家是中国人感到安全，感到放心，感到舒心。文雅的说法，家是精神的港湾，在家里得到一种精神的安歇，是中国文化的特有标识。有

慧根的人，在这仰俯之间，寻找的就是更高层次的情感，这境界可大可小，小者，就是自己的那个小家，大一点，就是生养自己的那方水土，再大一点，就是家国民族天下。

白天有事的时候，这种种的情怀就静静地蛰伏在心灵的角落，只要告别喧嚣和复杂的时候，月亮在天上，月光在地下，人孤独地处天地之间，就和自己的心灵交流，能够与自己的心灵进行这种交流的人就一定深刻。灵魂的丰盈，在于心中的所想境界的大小。我感到李白的伟大，就在于这时他心中的境界一定很大，是家国民族天下境界。这种境界的成熟，就在他吸纳了随州文化英雄炎帝神农、大贤季梁、大道胡紫阳的文化营养，得以成熟。这种思想境界的成熟定型是李白能够写出这首《静夜思》的关键。至于这首清新质朴、婉转如歌的小诗，那些平淡的字句，什么地方成熟，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当代的文化大家、秋雨先生来到随州之后，说：“随州的那轮明月照亮了中国最伟大诗人的内心。”

“淮南小寿山”三观十八寺已经被悠久的岁月淡化成遗迹，如果对这片土地具有深深的爱，就能够从残存的砖瓦遗迹中看成一个地域光彩的文化符号，然后解读出辉煌的历史记忆。我游览过“淮南小寿山”，收获颇丰，就是我在这里寻找到的那缕月光，照耀古人，也照耀今人，更照耀世界。

岂能忘情于随

没有这座城市，唐宋文学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

随州是欧阳修成长的地方。从四岁到二十四岁，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年。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二十年，就没有这个人的一生。没有欧阳修，就不会有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宋代第一人，宋代苏轼、苏澈、曾巩是欧阳修主持科考的进士。在中国文化环境里，这些人就是他的门生。王安石虽不是其门生，但曾得到欧阳修的提携和奖掖。苏洵与欧阳修不熟，欧阳修看过苏洵的文章后，反复褒奖推荐，文人士大夫才普遍认同并接受。没有宋代的这六个人，何来唐宋八大家？文化的真正落点是文化人的创造，唐宋八大家人均创作诗文2600余篇，没有唐宋八大家这两万多篇诗文，就没有唐宋文学的灿烂辉煌。

欧阳修说：“随虽陋，非予乡，然予所长也，岂能忘情于随。”欧阳修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即使是二十字的便条也不会轻易动笔，他都要先打个草稿，他对文字的苛求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欧阳修这样来写随州，就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与这个地方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遭遇，这是一种因缘。因缘是万事万物之间感性而又微妙的一种联系，虽然看不见，但是很神秘，也耐人寻味。真正的智者都会善待珍惜来之不易的缘分，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当然是真正的智者，只有智者时时刻刻都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智者就会活得幸福。

欧阳修对随州的感恩是一种仁爱。大学问家首先应该有仁爱情怀，仁爱者做人的态度是恭、宽、信、敏、惠，“恭”是一种内在的庄重肃穆，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人格。在欧阳修眼里，随州不是自己的故乡，却是自己成长的地方，是终身不能忘怀的地方。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物质和精神两种营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精神营养。一个人思想和精神的强大，才决定这个人的性格，而这个人的性格就必然决定其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这个人成长经历与环境有重大关系，也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地域文化的营养，是一种自然而然地被吸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就融入人的血液，影响着人的一生。这个地方就成为自己从来也不需要记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地方。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患重病突然逝世于泰州任上。欧阳观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从49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先后担任推官、判官。判官、推官的俸禄本来不多，欧阳观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一间房屋和一块土地。无可奈何的郑氏夫人，只得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亡夫，携带幼儿稚女投奔在随州任推官的三叔欧阳晔。这一年，欧阳修四岁。

影响欧阳修思想性格成长的，有他两个很重要的亲人，一是自己的父亲欧阳观，二是三叔欧阳晔。父亲在欧阳修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但母亲郑氏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丈夫去世之后，就把关注点从丈夫转到儿子身上，她用自己的口复活了一个正直清廉的欧阳观，让欧阳观成为欧阳修的人生楷模。这个母亲从欧阳观的为人断定，欧阳观的后人必定有出息。欧阳观的人格也影响着郑氏坚守养孤。因为这个母亲了解丈夫，丈夫对自己的子女有很高的期待。欧阳修通过母亲，对父亲

的认识逐渐清晰深刻起来，父亲俸禄不高常因为廉而好施，喜好交友而不够家用。

欧阳修从母亲的口中还得知父亲是一个具备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的官员。母亲郑氏常常讲述的那个晚上，就成为欧阳修永远的记忆。欧阳观在烛光下办案，面对案卷，拿起来看看放下，再拿起来看看又放下，不住地唉声叹气。

夫人郑氏见他这样，就问丈夫怎么了？

欧阳观说：“这是一个应该判死刑的案子，我想替死刑犯寻找一条活路，可怎么也找不到啊。”

郑夫人很是奇怪：怎么要替死刑犯找活路？

欧阳观觉得生命是第一宝贵的，人失去生命就永不会再来，所以必须谨慎刑狱：“我替犯罪嫌疑人寻找活命的条件而找不到，那么死刑犯和我都将没有遗憾了。”

欧阳观绵州任职三年，同僚们争相采购蜀地特产，欧阳观却什么也没有购置，全部俸禄用于养家待客。任满离开四川时，他只购买了一匹蜀绢，请人画成六幅“七贤图”。这是三年蜀地为官的唯一纪念物品。

郑氏用欧阳观做官的言行影响着欧阳修思想性格的形成。应该说欧阳观虽然早亡，但母亲郑氏日复一日的强化，对欧阳修的影响甚至大于欧阳观的在世。没有父爱的环境让欧阳修思想早熟，对事态炎凉、人情的冷暖更敏感，因而会更加怀念父亲，而且完完全全是最理想的完美父亲。如果欧阳观在世，真实的生活中，任何人都会有瑕疵，唯有没有丝毫瑕疵像神一样高大完美的欧阳观，对欧阳修才有这种完美无瑕的培养。

时任随州推官的欧阳晔是欧阳修的三叔，欧阳晔容貌、性格都像兄长欧阳观。欧阳修想知道死去的父亲，郑氏就说：“尔欲

识尔父否？视尔叔父其状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欧阳修的青年，认叔父如生父。欧阳晔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有一个斗殴杀人案久久不破，欧阳晔调出案卷仔细查阅，然后到监狱，让囚犯坐在庭院中，除去手铐与脚镣，给他们吃喝。吃完后，善加慰问后再送回监狱，只留一个人在大厅上，这人惶恐不安地左右看。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这个人不知原因，欧阳晔说：

“所有的人都用右手拿筷子，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边肋骨。这种伤害痕迹的指向，就是有左手习惯的人。”

郑氏乃江南名门望族，平时不愿去叨扰三叔。就用簸箕装上细沙为纸，再折回河中的荻草作笔，在沙盘上教欧阳修写字。

“荻画学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代宗师一生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创作诗歌八百余首、词两百余首、散文辞赋五百余篇，其中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沙盘中学会写出的。

荻画学书的故事展示的是生命的意义，往往是在最平凡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也许看到别人的宣纸香墨，会让年幼的欧阳修联想，读书写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种心灵的敏感是单亲家庭特有的。郑氏的不凡就在于引导这颗敏感脆弱的心拒绝了贫乏和浅薄，逐步引向了丰富和深刻。生命的意义不是田畴房产和田畴房产折换成的金钱，更不是物质，而是人与这些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希望和信心。从沙盘中领会意义靠心灵的优劣，单亲家庭成员的那种敏感脆弱在一种耐心和艰难中，被慢慢滋润濡养出希望和信心。女性的伟大就是用自己的不凡培育着那将照耀千古的灵魂。

欧阳修年纪稍长，有了自己的朋友，最重要的几个朋友有城南李家李尧辅，黄茂宗、黄梦升兄弟。他们常常结伴而行，游历随州的山山水水。随州没有雄伟嵯峨的峦嶂，也没有莽苍壮阔的

江河，但这里的山水，为生命的成长提供了最优厚的环境，影响着人的品质和思想，这种品质和思想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这片山水孕育了炎帝神农，炎帝神农创造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东方文化的核心就是把万事万物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无限大或无限小。无论大小，它都由阴阳两者构成。就像夏至这一天，白天很长，其实也是白天短的开始，随州的任何一个老农民都知道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掌握了规律的人必然镇静，从容、大气、平和。随州就是阴阳融合统一生成的和气，使万物得以安宁和生生不息的地方。随作为一个词素组词时，和许多词素搭配就可以构成和谐圆融。如随和、随心、随缘、随意等。

“随”是多元融合不可替代的符号。它的本意就是两块土地的结合。中华文明是一个地域文明，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更是一个人文空间。它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结合。中国南北的分界在淮河，淮河就发源于随州。走进随州，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南北融合后的平衡、圆融、和谐，丰富、精致、博大、深刻。淮水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条特殊的河流，它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延伸和趋缓。它恰到好处地兼顾了南北文化的优长，它是那么彼此相生和谐相处。

这种融合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一种文化的中心区域，有着很强烈的排他性。比方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域，他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无比优越，骨子深处是瞧不起与自己有差异的文化。瞧不起，就绝对不会去吸纳其中的营养。只有在多种文化交融激荡的区域，才能真正感受到他种文化的优势和长处，然后接受吸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只有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反复交融激荡，就会产生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

他们游历随州山水，就是用心去寻找心灵深处最隐秘、最微妙的地方，让你忘乎所以地全身心地融入天地山水大自然之中，体验天地之广博，山水之秀美，实际就是认知自己心胸之博大，人性之伟岸，这时一股正气就会在心胸中升腾，这就是游历的绝妙。欧阳修始终对这里有一种神圣的敬畏，内在的感恩是恭，在外的表现是敬，人有这种恭敬，就可以升华，就得以觉悟和觉醒，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人的高贵与卑贱的唯一界线，其实就是精神上的优秀与平庸。这种游历对欧阳修的人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欧阳修的人生命运似乎都与随州的地域文化有关。

有一次，他们游历山水归来，聚在李氏东园，欧阳修在书房里的竹篓里边看到了《韩昌黎六卷》，随手就拿起来翻了翻，一翻就痴在那里了。李尧辅说：“看你痴迷的样子，这书好，你就拿回去吧。”这是影响了欧阳修一生的书，读书其实就是把文明成果据为自己所有的过程，人的灵性高低、品性优劣就在是否具备一种特别的嗅觉，这就是一种判断力和鉴赏力。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位，他是一代文宗，更是唐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忠于朝廷、有独立个性的文臣，也是有胆有识的能臣。

韩愈的经历和甚至比欧阳修更为糟糕，父母早亡，是靠比自己长三十几岁的兄长韩会和一个也是姓郑的女性抚养。韩愈十二岁的时候，兄长被贬而亡，少时的那种艰辛和心灵的孤独难以言说，而欧阳修的体悟显然比所有的人更为深刻。真正的阅读是灵魂的参与，当一个优秀的灵魂和历史最伟大的灵魂进行交流对话时，就是一个灵魂被另一个灵魂浸染和熏陶的过程。这种侵染和熏陶永远不会是所有人，只属于那个有判断力和鉴赏力的人。韩愈是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学者，“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

言。”韩愈很小就晓得读书记笔记，每天少则几百字多则上千言，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读书习惯，最有灵性的记忆也不如很差很慢的笔记，笔记是最为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欧阳修博闻强记肯定就是从韩愈的学习方法习惯中获得启示。

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滔滔雄辩而又沉着痛快。韩愈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文以载道”。“道”究竟是什么？今人泛指思想体系、规律目的等。古代的“道”多是指儒家之道，指经国之方略大道。中国东方农耕文化发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寻找与天地的和谐、与人间的和谐，这是一种整体观的文化。它起源于家，家族、社会，认为家是一个整体、社会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文化像一颗傲视风云的参天巨树，苍郁、葳蕤、雄健、恢弘，吞噬着日月，笼罩着大地，辐射着生命的光焰，张扬着永恒的浩气。欧阳修的灵魂被那宏伟豪放、磅礴的生命之光照亮、溶解、征服。

治国就是治家，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家、国、民族、天下”这几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好家庭、治好大国如同做一盘好菜，色香味形俱和谐。欧阳修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不在表面的利益得失，财富、荣誉、地位、权势无论多么喧闹都触及不到生命的核心。真正中国文人的理想，就是理解、顺应、实现“道”。这个“道”是天地运行规律，是社会发展潮流。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地位特殊，独立品格较强，志于道、厚于德、多才识、敢作为、能担当、人格自觉、勇于追求的一个群体。父亲欧阳观、三叔欧阳晔用自己的一生为欧阳修作着示范，母亲精心培育，就是要欧阳修真正走进这个群体。欧阳修交友结友，也是为了俯察现实、构想未来、纵横捭阖、立德立言、充分实现中国文人的自我价值。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一路坎坷，毫不退缩，所以欧阳修才逐步登上了中国文化的高峰。

欧阳晔对郑氏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说明三叔对欧阳修很是关心，而且观察细致。

欧阳修受韩愈的影响太大，他以为天下的文章，只有韩愈的文章最好。所以他说：“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但当时科考时兴的浮糜艳丽的西昆体。仁宗天圣元年（1023），欧阳修17岁，首次参加随州州试，因赋逸官韵而见黜。自己如果继续沿着韩愈的文风走下去，将永无出头之日。倘若为了考个一官半职，必须改学“西昆体”，这却是欧阳修极不情愿的事。欧阳修试图想找一条路，既能兼顾韩愈的文风，也能考上个一官半职。三年后，州试得以通过，由随州荐名，参加天圣五年（1027）春天的礼部贡举，再次落榜。原来“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韩愈文章虽然浓厚馥郁，然而，当时敲开仕途大门的却是称为“时文”的文章。

就在欧阳修烦恼之时，朋友黄氏兄弟给他带来了一个喜讯。当朝的翰林大学士胥偃看中了黄茂宗的《木铎赋》。原来黄氏兄弟和欧阳修一起，谈论韩愈，受韩愈文章的影响也很大，这次科考也落了榜，却让一个叫王交的人考了个第一，黄茂宗会过王交之后，觉得王交的学识文章远在自己之下，就把自己的文章交给了翰林大学士胥偃。胥偃接过《木铎赋》，认真看了，就对主考官说：“写这篇文章的人能不能中进士？”翰林大学士是能够和皇帝说得上话的人，主考官是不敢马虎的，看过之后说：“今年的头名状元也未必能写得出来。”胥偃这才说了黄茂宗落榜的事，吓坏了主考官员。胥偃把《木铎赋》带给了仁宗皇帝，宋仁宗很是生气，令礼部再举行一次特别考试。黄茂宗赴京发挥很好得中

进士。

黄梦升告诉欧阳修说：“胥偃翰林近期要到汉阳，希望你拿自己的文章，去请教胥偃翰林。”

随州在历史上有三个称谓，汉东、汉阳、汉川。随州地处汉水之东，汉水之东乃水之阳，故又称汉阳，随枣走廊是联系中州平原和荆楚大地的一条狭长孔道，所以又被称为汉川。成为名师的门生是一种社会身份，是走仕途的桥梁和阶梯。欧阳修知道胥偃来到，果然拿了自己的文章拜请胥偃翰林。几年的苦读深研，欧阳修的文章早已从简单的模仿转为消化吸收，他把韩愈的波涛汹涌化为潏潏池水，又把滔滔雄辩变为娓娓而谈，他的诗文被韩愈的思想精神侵染熏陶，但韩愈的思想精神已化作营养被另一个灵魂吸收。作为当朝翰林学士，胥偃几乎不敢相信当朝还有人能写出如此锦绣的文章。当时他就留下了欧阳修，要他在自己身边准备应考。欧阳修当即拜胥偃为师，住进了高墙深院。

深院有深闺，胥偃的女儿身影时常晃动。欧阳修读书的时候，总是感受到一个美丽的身影在自己身边环绕。他门第低微，在女性面前常常不知所措。胥偃看他用功，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他，女儿将来出嫁，不求门当户对，但求夫婿有出息。胥偃就对胥夫人说：“这少年的文章不凡，我这个翰林学士都佩服得很，将来这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把女儿许配于他如何？”

夫人说：“老爷是翰林学士，看中的文章，不会有错。女儿的婚姻，全凭老爷主意。”

欧阳修加倍用功读书应考，没想到胥偃会把女儿许配于自己。当他听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时，顿时喜出望外，但想了想说：“婚姻大事不敢做主，当禀过母亲，再作答复。”

胥偃升官调京师，欧阳修随行。胥偃的女儿，觉得这位二十

四岁的哥哥性格、学问都招人喜欢。一年后她嫁给欧阳修，成为欧阳修的胥氏夫人。

这年，天圣八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高中进士，名列十四。欧阳修终于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上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距离他来到随州连头带尾二十年。

随州生活的二十年，在欧阳修的人生道路上，细细品味，有几个最关键性的脚步，烙印着鲜明的随州印记。欧阳修做官的时候，北宋立朝已经七十多年。北宋王朝最大特点就是皇帝牢牢握有天下的兵权、财权、政权，这也成为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本国策，中央集权的稳定统一，必然带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但也有弊端，那就是“三冗两积”，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

怎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三冗两积”进行革新，革新的方式豪放直爽，勇敢果断。这应该是北方人的性格，秦岭以北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下，这种气候适宜种植大豆高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这些作物就有丰富的蛋白质。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诸因素为北方族群的生命提供了这种品性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使得这个区域的人充溢着浓烈黄土高原泥腥味的文化，正方、正圆、正三角，循规蹈矩的厚重，积极进取的担当，那种坚毅、顽强、粗犷、豪放叫人喜爱。随州北部的人就有着很鲜明地北方人特性，和随北的人交朋友，就会感到那种敢作敢为、不计后果，不拐弯抹角、直来直去。看一看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对高若纳的质疑与抨击，那种爽直和豪气就有着鲜明的北方人的性格特征。

好朋友尹洙问：这么激烈、过分、伤人，不后悔吗？

“做过的事，毫不后悔。”对高若纳这样的“君子之贼”一

点也不后悔，就是被贬也觉得应该这样。

淮河是中国南北的界河，发源于随北的桐柏山中，也是欧阳修和他的朋友们常去的地方。从淮河开始，就有了一些水气淋漓的味道，降雨量从这里缓缓上升，大地就有了湿润的水性。水给人们带来了灵性，是柔弱与细腻，是智慧和精细，是思辨跟幽默，是婉转同妩媚。随州南部大洪山地区人们的生活，就开始有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

在偌大的中国，唯有随州能把中国南北的文化特性融合成一个整体。“随”是一个会意字。“随”的左边是“阜”，高坡的意思，这是指广袤的黄河流域。“有”，篆文上面是手，劳作的意，中间有“工”，规矩的意思，下面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即肥沃的土地，就是按规规矩矩侍候土地。应该说这是精细稻作农耕的地方。中间画的是人的足，讲述的就是两个地方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传说炎黄之战，双方对峙，僵持不下。黄帝就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说：“我把我的出生之地更名为随，以示我炎帝神农永远拥护跟从中央天帝黄帝。”从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因炎黄的融合，成为人类世界文明发育成长最完美的空间。欧阳修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自然被这地域文化熏染的通透。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写下千古不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

为何被贬？就因为写了那首《望江南》，被政敌攻击乱伦。钱明逸从欧阳修的词中寻到了欧阳修与外甥女苟且的证据。“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初春的江南，柳叶稚嫩，莫说人不会去折，

就是黄莺也不忍心在柔弱的枝头吟唱。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的时节，十四五的可爱活泼的少女，时而抱着琵琶调丝索调，要弹奏情长意浓的乐曲，可一会儿她又去和同伴们在一起玩耍游戏去了。这么清纯可爱的少女啊，永在我心里，今天更是妩媚动人了。

像这样的词，欧阳修写的很多。作为北宋政治家，耿介刚直，敢作敢为，又能写出许许多多浓艳的诗文，除了他才气横溢，当然也得益于随州的地域文化的熏染，才巧妙地把粗狂豪放和精致细腻的创作风格集于一身。在欧阳修的人生中，他的性格和他的诗文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如行云流水，流到哪里流不动了，就自然停下来，这种自然而然，其实就是一种最美的形态。

汉水东岸的大洪山对峙的桐柏山是一道真正能容纳的大川，不仅能联系中原和荆楚两块土地，也吸纳融会两地之长。一个人善于吸收和容纳，就必然强大。欧阳修的虚怀若谷就如同这道大川，当年担任主考官，看到苏轼生造“三杀之三宥”的历史典故，以为自己读书面窄了，没有读过。事后问这典出何处？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回去认真读过《三国志·孔融传》没有找到。再问苏轼。苏轼说：袁绍被曹操所灭，绍子袁熙有美妾，曹操送与子丕。孔融知之，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伐纣克商后，将妲己赐给与周公。”曹操非常惊讶，问孔融：这事出自哪本经书？孔融说：按今日发生的事情，我想周武王和周公应该是这样做的。苏轼接着对欧阳修说，尧帝与皋陶“三杀之三宥之”的故事，“某亦意其如此。”意思就是说“我想当然如此”。欧阳修不仅不怪苏轼生造历史典故，还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对好友梅尧臣

说：“读苏轼的文章，头上冒汗，不是病了而是感到虎虎有生气，我要给他让出一条路来，让他出人头地。”

能够如此宽容自己的弟子，这很好理解。然而能善待自己的政敌，却需要很大的雅量。吕夷简是当时保守党的最大人物，是革新派的的死敌。但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他尊重历史，为自己的好友范仲淹写神道碑文，事实求是地写下了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一次和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觉得自己的父亲和死敌和解辱没了父亲，就删去这一段，欧阳修收到拓本说：“非吾文也。”我写的文章收在自己的文集中。他能尊重自己的死敌，就是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芒，自然也会学习他的长处与优点。

欧阳修觉得这一切，得益于自己自然吸收营养的成长。一个人长大成人，说是那一碗饭的营养成就了这个人，肯定觉得好笑。但从四岁到二十四岁，随州二十年的营养让他攀登中国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国文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是自己成长的地方。

附记：

2013年，欧阳修来随州刚过千年的时候，恰逢国家相关部门对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予以通报，相关部门不知怎样展现历史记忆。历史是一个地域辉煌的记忆，或者说这是这个地方历史的光彩符号。所谓传承，就是复活自己辉煌经历的记忆，让无数个光彩符号的辉煌记忆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转化成对这个地方的诚挚之爱，其实家、国、民族、天下情怀就是从爱故乡开始的。其实复活历史记忆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在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时候，让历史文化名城活过来，就要恢复城池，今天的随州城是有城无池，没有池就没有水，一座城少了水，就失去了灵气。在

恢复池的过程中，在李氏东园的旧址上，为市民留下一个公共空间，一块碑就可以恢复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是故，写下此文。

温暖历史的生命火焰

我们歌吟山水，是因为这片山水的景色触动了我们的感情，让生命产生温度，温暖人间。我们结队参访这个山村，是因为这个山村诞生过一个温暖了历史的生命。这个生命能诱发我们许多感慨，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命意义，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更多的光和热，去温暖这个世界。

这里是随县柳林镇明玉珍故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村，它座落在中国最著名的古银杏群落野生植物自然保护区。远远望去，森森的古银杏屹立在村口，苍郁而葳蕤，巍峨而恢宏的树干撑起蓝天白云，簇拥着整个村庄，还没进入村庄，这几株古朴厚重，扎实内凝的银杏，就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气势。这雄健挺拔的植物，辐射着生命的光焰，张扬着永恒的浩气，展示出这山村的莽苍、雄烈。院落前有一颗硕大的桂花树，相传是明玉珍的祖母亲手所植。那虬虬蜿蜒。绿得发蓝的苍翠就是生命的博大深沉，我们还不用知道明玉珍为何等英雄，就被眼前强大的生命体系震撼，这是一类生命对另一类生命的感动、征服。

中国的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者之后建立的一个新的王朝。明玉珍没能看到这个王朝的建立，但他参加了推翻元朝的革命。明朝有很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没有的，因而，这个王朝对许多历史学者产生了吸引力。明史研究者对这个革命者抱有很大兴

趣，所以，关于明玉珍的史料十分详尽。1982年，重庆江北区又发掘了明玉珍墓，出土了一块“玄宫之碑”。这是明玉珍的墓志铭，作者是明玉珍生前极为敬重的右丞相刘桢，参与立碑的人基本上都是长期追随明玉珍的文臣武将。应该说，这碑文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完全可以弥补官、私文献关于明玉珍记载的缺略并订正其讹误。其历史价值极为重大。

明玉珍的生命十分短暂，他生于己巳九月九日，即公元1329年10月2日，崩于丙午二月六日，即公元1366年3月17日。他在人间走过了36年零5个月。古人以虚岁计龄，说他享年38岁。其实生命的亮度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这个生命是否有温度，温暖了别人。只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生命有极大的光和热，而且他竭尽全力释放出来去温暖了这个世界，你就会感到这是一个不能忘怀的历史人物。明玉珍，就是这么一个温暖了历史的生命！

明玉珍这么短暂的生命能温暖历史，是因为他不幸地生在了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对于平凡的生命来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可悲的。这样的时代一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血腥和苦难。只有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才需要勇敢和献身的英雄拯救。

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是在明玉珍去世两年以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准确地断定明玉珍是元代人，不能说他是元末明初人。元朝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前后一共163年。如果从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的公元1271年算到元顺帝公元1368年逃往上都，不足百年。

成吉思汗家族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因为对英雄的崇拜和迷恋，始终没有理性地面对先祖创立的这种掠夺与征服文化中的缺失，这样就不可能诚恳地去吸纳它种文化之长，弥补自己文化的

缺陷和劣优。所以，元朝政治制度中保留了不少蒙古氏族部落制度。虽然有贤明的君主认识到了农耕文化的优势和长处，推行了“汉法”，但始终拗不过一个民族对英雄先祖的敬仰，总会有强大集团势力阻扼这种改革。蒙古民族的宗王权益是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来，这些制度伴随着王权的交替传递。因而百年元朝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激烈冲突的百年，它又与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权反复交织在一起，这就带来了社会的失序。失序的社会是很难让人坐下来对文化进行澄澈的思考。

明玉珍也不可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有理性地思考。但文化的根本在老百姓，它是族群的思维方式、民族的黏合剂，是普通大众的意识，它沉淀在老百姓的骨髓里，流淌在老百姓的血液里。农耕文化的根本就是家，进而到国，再到天下。在中国古代，家、国、民族、天下是可以互换的。你把自己贡献给家，这个家就拥戴你，贡献给族，这个族就拥戴你。你贡献的范围多大，你生命的价值就和社会历史的价值成正比。明玉珍长大成人，有拿不准的事，喜欢求教“耆老”。何为“耆老”？六十为耆，七十为老。古代称年高有德的老人为“耆老”。农耕文化发展到南宋已达到中国文化不可企及的高峰。宋代的程朱理学就是社会大众意识经过思想家，文化专门家提炼而成的。“耆老”的思想是老百姓骨子里的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耆老就是牵引明玉珍走向文化峰巅的导师。

明玉珍成为文化英雄，很多人觉得定位不准。其实一个普通平凡的生命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作为一种选择，并为这种选择去奋斗，这个普通的生命就有了文化的光芒！

明玉珍是求生的本能，让自己短暂的生命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生命之光并不奥妙，它来源于人的神性。这种神性也很简

单，就是依照天地赐予你的条件去活着。天地赐予了明玉珍什么条件？眼前的明玉珍故里古称随州梅丘。是“随枣走廊”的核心地带。这是中国最为特殊的地形，它处长江之北，汉水之东，淮水之西。是中国最适合农耕的一块土地。它是大洪山脉与桐柏山脉遥遥相对而形成的狭长谷地，这谷地是大量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构成，其间沟河交错，形成完整水系，是动植物的生命乐园。《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象形女性生殖器官的谷地，是生养万物的所在。在中国文化，生养万物的“玄牝”是崇高而神圣的，生生不息为大德。所以这片土地诞生炎帝神农是历史的必然。有什么样的山水环境，就孕育生长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生在了这片土地就必然向往农耕生活。这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明玉珍生在了这个时空，只期望在乱世中能营造一个安心耕种的小天地。在“耆老”的指引下，在乡亲们的推举下，他成为了屯长，结栅自固，屯于青山。一个普通平凡的生命从这时起，就有了不平凡的文化意义，因为他把自己生命的光和热温暖了他的父老乡亲。

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个人从属于整体。你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多大的整体，你生命的价值就有多大，你生命的光亮就有多大。如果你只选择一个家庭，你的生命之光就照彻这个家庭。一个人有爱，就会让你获得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古人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这是因为当姑娘有父母爱，当了母亲就会爱自己的子女，她的力量就源源不断。时代把明玉珍推到了屯长的位置，他的生命之光就温暖了随州古梅丘里。

把明玉珍引导走进一个更大的天地的人叫徐寿辉，徐寿辉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一个“无他长”、“无他能”的人。虽然

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但他缺少像刘福通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也没有像朱元璋纵横捭阖的谋略，但这是一个“资性宽纵”，仁和厚道的能团结各方力量的老实人。从明玉珍墓中的《玄宫之碑》中可以看出，明王朝的朱元璋为了证明自己是韩林儿宋政权的继承者，是反抗元朝异族统治的正统代表，掩盖和歪曲了徐寿辉的历史功绩。说什么徐寿辉建立的“天完”政权，其实，他就是韩林儿宋政权的继承者。

徐寿辉“起兵举义，驱逐元虏，以靖中原”，其实就是一个农民渴望能过安定的农耕生活，这与明玉珍的理想和追求是不谋而合。共同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必然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玉珍从此走上了自己生命更高的境界，因为他生命的光和热可以温暖更多的人。

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是很单纯的。农耕种植就是在土地里刨日月，所必然产生质朴厚重的心态。就会执著于社会目的和人生目标，就会做出一种很务实的文化选择，这就是对经验的尊重。有丰富经验的人就受到敬重，“孝”字来源于子扶老，其根本含义是“敬”和“顺”。是尊重前人，认同前人。读音从观念上说“肖”，相似的意思，“效”效仿的意义。这体现出历史连贯的思维原则。我们从前人那里来，是先人生命生存意志的延续。这就是永恒的生存之链，这种有人情味和历史感的文化就规定了我们怎样做人，忠臣孝子。

“孝”植根于农耕文化的人情人性之中，它向前发展，完善，升华就为“忠”。徐寿辉把明玉珍引导走向生命的高峰，就是大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明玉珍就不会忘了这份恩情。他对自己的人生导师及其宋政权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凡是徐寿辉给他的任务，他都会恪尽职守，尽力完成。当徐

寿辉受到陈友谅的掣肘时，他挺身而出，与陈友谅做毫不妥协的斗争。徐寿辉被陈友谅所害，仍被明玉珍捧为宋主。徐寿辉“天启”年号只有两年，但《玄宫之碑》明确记载明玉珍入川时间是“天启三年二月”。这几个字充分表现出明玉珍对自己人生导师的赤胆忠心。说明明玉珍对陈友谅谋位改元的篡逆行为的愤慨，他奉徐的“天启”为正朔，这就是明玉珍忠贞人品的体现。在中国文化里，人品是第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文化就是写写画画，说说唱唱的事，以为会说，会写，会弹，会画就是有价值。其实不然，秦桧，蔡京的书法是具有非凡的功力的，但我们从没见过谁去收藏他们的作品？

所以古人说，一等人忠臣孝子。明玉珍走向自己生命的峰巅，生命的光芒能照耀后世，人品是其根本。徐寿辉去世的消息传到重庆，明玉珍禁不住“拊膺哀悼”，痛不欲生。三军缟素，为主发丧。明玉珍即陇蜀王位，宣布不易国号，不改元。为徐寿辉上谥号“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忠于故主，始终如一。相比时下的“人一走，茶就凉”的淡薄势利人情，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钦敬的德行。

真正让明玉珍走向自己生命高峰的是他自己灵魂深处的爱。人类至所以伟大，源自于博大无际的爱。人类文明其实来源人类的爱。爱是灵魂的核心，孟子认为仁就是恻隐之心。用我们随州话就是看到别人遭孽，心里不得过。元末农民起义，中国豪杰并起，刘福通领导下的东系红巾军的有一员部将叫李喜喜，已先于明玉珍入蜀。然李喜喜攻城掠夺，却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天启《成都府志》载：至正丁酉青军入蜀，肆行剽掠。费氏，灌县人。费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报，今不幸而罹此贼害，不如死，遂缢焉。这段记载是说灌县姓费的女子被李喜喜的

青巾军强暴，自缢身亡。该书还记载有许多女性不甘受辱而自刎的事迹。这说明李喜喜的青巾军给失去军队保护的平民带来了十分悲惨的遭遇。

爱可以照亮一个人的价值，可以鼓动一个人的能力。把爱给予别人，就会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人们得到爱以后的那种惬意和满足，那个给予爱的人一定会觉得幸福。就像母亲面对洋溢着笑脸的孩子。对于一个失序的社会，明玉珍感到自己入川，就应该为更多的人尽一份责任。当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珍惜体悟，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产生一种怜惜时，这一定是人性的光芒。明玉珍出身于农家，长期的戎马生涯，不可能有很高的文化。但他有爱。这就是对生命的同情，这是自身丰沛情感的流溢。这是人性的善良，是文化的根本。

元末明初的这场大动荡，说到底就是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搏斗。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应该说，农耕地区必然孕育农耕文化。如果在农耕文化中强加游牧文化则必然按自身的规律进行融合。文化发展到南宋，充满了脂粉和姨娘气息，虽然柔弱美貌，却是无骨的病态。这时确实需要粗犷和野性的英雄气概。草原的游牧文化的这种粗犷和野性全面地取代农耕文化，就必然由融合演变成生死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明玉珍则是以自己的生命的本性去顺应了这种文化发展的规律。一个人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一定走到历史的高处。

明玉珍虽是行伍之人，却羡慕知识，尊重文化。他驻兵泸州，部将说：“这里有一个叫刘桢，字维国，能写一手好文章，当过元朝的官，因为李中军、李喜等人入川大肆杀戮，才隐居山中。”明玉珍听说这个人召不来的时候，就像刘备“三顾茅庐”一样，登门求见。和刘桢谈了一席话，明玉珍喜不自胜，说

自己像当年的蜀王刘备得到了诸葛亮一样。从此，早晚请刘桢给自己讲授书史，这种讲授，其实就是刘桢用文化点播明玉珍生命的性灵。

在文化的浸润下，明玉珍的道德人格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了善恶之心。对生命的同情就是善良，对子女的哺育就是生命的延伸，报这种哺育就是“孝”，爱自己的亲人就是“孝悌”。把天下的人都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爱，就决定了生命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于是一大批文化人聚在了他的身边。这时，他感到人生在世，做上等人就是做忠臣孝子，做两件事就是读书耕田。

明玉珍是农民出身，他知道种田的艰辛，他采取“赋税取其—，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川蜀本是天府之国。明玉珍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川蜀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在社会动荡的元末年代，出现了这样一块农耕天堂，对天下农耕之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历史上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就是从这里开始。本来明玉珍的部属都是湖北的农民，他十分重视军队的屯田。这些人把自己的亲属从少田缺地的湖北接到川蜀。史籍载：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如蜀。明玉珍能在天下大乱，战火连天的条件下，让自己的辖区保持一份难得的安宁和稳定，为天下恢复农耕社会秩序，无疑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后世的学者都认为明玉珍“风情慷慨，仁心义质……宏图雅节，有足称焉。获据险远，屏绝昏虐，减赋礼贤，文教彬郁，负川锦以为固，控全蜀而称制，要亦偏安之令规，霸者之高烈矣”（傅维麟·明书：卷90·夏明玉真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明玉珍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做忠臣孝子，就是读书耕田。他觉得人要生存，就要有饭吃，有衣穿，这就离不开种田。人区别于禽兽，就是人知道用

生命的火焰去温暖别人，要想这生命的火焰有足够的亮度和温度，就要读书。不要以为这是农民的思维，这是人类文明中最有智慧的东方思考。不要以为明玉珍只是占据西南一隅的大夏帝王，更不要觉得明玉珍的大夏是一个只有5年的短命的王朝。其实，明玉珍的生命意义就在于他为中国文化回归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作过不懈的奋斗。明初学者方孝孺评论说：“夏主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间尽其贤也（《明氏实录》杨学可、学海类编本）。”

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农民起义的历史领袖粗算也有数百人之多，但农耕文化的发源地，炎帝神农故里走出来的能攀登到历史峰巅之上的英雄只有明玉珍。上苍赐予了随州一块最适合精细耕种的宝地，必然激发人们想占有它的欲望，必然会让人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炎黄之战，刑天舞戚，蚩尤冶金作兵，虽然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它们却蕴含着历史的真实。明玉珍应该就另外一个时代的与黄帝抗争的炎帝、舞戚的刑天、冶金作兵的蚩尤。

明玉珍从农民到帝王，尽管只有30多个春秋。但他奋斗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读书耕田的世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忠孝之人。当我们走出这个普通的山村，中国文化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是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为它的传承发展作出牺牲和奉献。其实，文化的根系就在民间，就在老百姓的心里。明玉珍能成为中国农耕文化捍卫者，引导明玉珍结栅、屯兵青山的就是“耆老”，推举他为屯长的就是随州乡亲，跟随着他南征北战的

将士，还有围绕在它身边的文人儒士，他们共同努力去捍卫自己心爱的农耕文化。这众多的生命汇聚成一团烈火，温暖了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

走出这个普通的山村，想到明玉珍这个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农耕文化的生命，虽然这个生命很短暂，但他用自己的那么短暂的生命融进中国文化，我们就会有一种感动。正是有了无数像他这样的英雄，中国文化才这样红红火火。作为中国文化的受惠者，难道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文化正在走向边缘化。有一种浑身充满霸道的文化正在挤压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时，心中的那种感动就会呼唤我们，应该像眼前的这位英雄一样为自己文化的重建尽一份力……

神奇的仰望

随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随州的神奇来源于仰望。因为仰望，人们的目光就会从自己生活的那个狭长的随枣走廊向远方延伸，就可以越过遮挡目光的那一座座山峰，也能够拨开眼前的春花秋月，看清楚三年、五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得失，随着视野的延伸和展开，农耕文化就在这里发生、发展。能够仰望，随州成为炎帝神农故里、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证明随州人距今约6000年前就翘首仰望是随州三里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色陶豆，陶豆的豆柄上有北斗七星的雕刻（《农业考古》1986年1期）。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随州6000年前翘首仰望天空与稻谷种植密切相关。稻谷是一种精细种植的农作物，稻谷的生长对气温、水分的要求很高，这就要求种植者必须掌握最佳的季节，随州的先民不得不登高翘首仰望星空。

万籁俱静，繁星满天，目光在迷乱的星空追寻，这是一种比看山水风景更迷人的追求。他们在斗转星移的过程中，发现北斗七星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运行，而且与季节变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

成，一年之中，它由正北向东，向南渐升、至正南后又向北渐降。斗柄指向正东时，这一刻就是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的时候，祖先们把它定为春分。斗柄指向正南时，为夏至，正西为秋分，正北为冬至。如果把它作 360° 旋转时，正好对应一年的365天。

于是就把看到的重要星象，雕刻在常用的生活器物上。这道雕刻不仅仅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天文学资料。它是一道照耀千古的亮光，子孙们有了这道光辉的照耀，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镌刻在日常生活器皿的天象图案，就为了时时刻刻都能看到这种星象，其实这是另一种方法在仰望天空。随州人对天地运行规律的顺应，按照季节种植稻谷，就能够获得最好的收成。

随州恰恰是种植稻谷的最佳地域，说这话许多人也许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袁隆平是当今世界的杂交稻之父，他对世界的粮食贡献令全世界仰望，说他是当代的炎帝神农一点也不为过。他和他的团队在中国所有适合种植稻谷的地域都有试验田，其中随州均川镇就有他的杂交稻试验田100亩。他的团队常年有人在指导随州农民按照袁隆平的稻谷种植方法，实际上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随州人的内心深处。随州人按照袁隆平的种植方法种植，在全国适应杂交稻的试验地域里，两个高产量区域中就有随州。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天帝，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域指向，这个指向牵引着我们的思维走向中国文化形成的多元。南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稻谷的种植，稻作农耕是一种精细农耕，这种种植方式衍生出的三个因素，对于中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聚、二是序、三是理。稻谷种植必须聚集更多的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稻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要良好的社会秩序；稻谷的种植要按照稻谷的生长规律，就有极大的增产潜力，就促进

科学理性的发展。

历史绝对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传承。祖先们因为种植稻谷而仰望星空，从北斗七星变化中发现天地的运行规律，这不仅仅是人们对春夏秋冬四季认识的起始，更重要的它启示着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二分观象认识。比方说，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从这天起，白天就开始渐渐缩短，而且一天短一天。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渐长。或者说，长与短的对立也是相互转化的。长时间的仰望，就会从天地运行规律中感受到，一年之中有夏就有冬；白天长，黑夜就会短，黑夜短，白天就会长；有阴就有阳，有男就有女。万事万物的存在一个对立统一、此消彼长过程，最后达到圆融和谐的境界。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有因必有果，发生是因，发展是变，“变化”必然遵循一定之规。这种一定之规，处于知识的上游，是基本的原理，属于规律层面的，它将产生科学、诞生思想。这些科学和思想对人类发生的作用，将是惊天动地的。

如果在北斗七星之外画一个，它就是太极图案。现代考古已经证明，北斗七星是图演太极的原型天象，中华民族的先祖根据北斗七星的运行创立了“中华第一图”。太极图哲理中，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阴阳平衡的和谐理念。随州先民的仰望星空，即将发生的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和灵魂。随州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两黑两白四条阴阳鱼相交的太极图纺轮，这件文物距今约4800年（《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件纺轮上的图形虽然不能称作标准太极图形，但说成太极图的雏形或祖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是和谐圆融，这个图形用宏深的哲理，简洁的图形，揭示了永恒的真理，这个图形就是和谐圆融的

太极，太极的构成就是阴和阳，阴和阳的分界就是“s”形的北斗七星连线。

炎帝神农被后人祭祀，重要的是要传承他的这些伟大思想。随州人一而再、再而三、代代相传，能轻松地领会他的和谐思想精神的精髓，与随州的地利有关。现代科学证明，观测北斗七星的最佳纬度在北纬 28° — 34° 之间。北纬 28° 以下的低纬度带的人，仰望星空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这是因为地表大气层抖动；中高赤纬带的恒星，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段内观察到，而其余时间段其恒星则皆已没入地平线下。北纬 34° 以上高纬度带的人，虽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观察中高纬度带的恒星，但如果北斗七星的赤纬低于其地理纬度，“北斗七星”的连线就会发生变形，不成为阴阳圆融的分界线的形状。北纬 28° — 34° 的中间值是 31° ，随州地处北纬 $31^{\circ}19'$ 。

宇宙把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发现的责任赋予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北纬 31° 左右的人们，这是因为中国北纬 31° ，东部地区深受江淮旱涝之苦，无法静下心来完成发现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任务，西部地区是高山大川，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的板块交界之处，碰撞引发的地壳运动，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依然难以积累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就难以产生质的变化。

唯有随州是最适合早期人类农耕生活，农耕生活的发展，需求随州的先民进行天地规律的探寻。随州三里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和随州淅河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随州的先民已经历史性地完成了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发现。随州先民的这种重大发现，巧妙地运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顺应天地的运行规律平静、从容地生活，这种

顺应就是一种天理。这种天理积淀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蕴含着最根本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这顺应就是“道”，当这种“道”深入人心就成为人们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形成社会发展潮流，这就是“德”。这种“道”与“德”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形式，逐渐地浸润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无论你是否明白其中的道理，只要背离这种道德，就是丧失天理良心。

随州先民的这种发现，其中的重大价值，具备丰富足够的营养，可以让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得以强健。发现者是不是叫炎帝神农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功德足以让自己永远站在中国历史的最高处。一个民族虔诚地祭祀，恭敬而有诚意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用庄严而神圣的礼仪，承接祖先深刻精致的思想精神。圆融和谐不仅仅是一个图案，更是一种能力。像大自然的冷与热一样，一点点地积蓄力量，走过冬至，温暖的春天就不会遥远。形成对称、平衡，就一定能出现圆融和谐。圆融和谐是阴阳相生相克得以发展的双赢，以一种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强弱的变化。

仰望关乎着方向，能够为遥远的未来牺牲眼前的利益，需要的就是方向，这种远见只产生于仰望，只有仰望者才能觉悟。觉悟就是觉察思索、明白开窍。追求远程目标，就会警觉眼前的浅薄，天长地久就会珍惜上苍赐予的短暂的人生，就会生出爱与善良的智慧。民族的仁慈善良性格，也必然写出充满圆融和谐的几千年历史。炎帝神农故里就是一个叫人仰望的地方，走进随州，不仅是仰望星空，也能仰望历史，还能俯瞰现实，更能远望未来。

生生不息为大德

称随州为炎帝神农故里，是因为有140多种历史文献典籍记载。我们很少从文化的起源、成长这个层面去认真解读。其实炎帝神农就是一种文化，如果能从文化的发生发展层面去剖析，对于随州的文化建设，将大有裨益。

万物发生的源头就是生，这是人类最为困惑的哲学难题。不要以为哲学深奥得难以理解，其实小区的那几个保安对来宾的询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这几句话就是哲学的追问。哲学就是这种追问向更深层次的进入，人类自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破解这些难题就可以解决人的心灵迷茫。哲学不是教你怎么生活，而是让你对生活有一种觉醒。觉是一种感受与察觉，醒是一种领会和明白。疑惑自己从什么地方来，就必须询问“发生”，以一种原初的眼光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产生疑问，自己来源于父母，父母来源于祖先，祖先来源于天地，天地又从何而来？这种不停的追问就有深刻哲学意味。有生命才有人类，人类和天地自然以及自身构成各种关系就是文化。文化也在这“生”中发生、发展。

生命的产生需要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等条件。宇宙天地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就中国特殊地形。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隆起了秦岭山脉，这道巍峨的山脉隔开了中国南北两个气

候带。一是秦岭以南的亚热带气候，二是秦岭以北的暖温带气候。两种气候带气温和降水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秦岭以北耕地以旱地为主，秦岭以南耕地多为水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也为小板块的运动提供了推和揉的力量。“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的运动使秦岭之南的地壳发生变化。板块交结的地方就出现了“开”、“合”现象，这就是塌陷和隆起。大地的裂隙就是“开”，产生盆地；大地的相撞挤压就是“合”，隆起高山。多次的开合，秦岭之南有了两个大盆地。这就是中国中部的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这两大盆地的边缘就有了一块无宗无脉的褶皱断块山地——大洪山。和大洪山山脉相峙的就是秦岭的余脉，大别山支脉桐柏山。两大山脉相对的谷地就是随州。

这个谷地南北长约13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总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区域内主要是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构成。热带海洋气团和分布极地大陆气团交替控制和互相角逐，就带来丰沛的降水。淮阳山地山势低矮而破碎，屏障作用弱，又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这就为万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生命其实来源于宇宙深处的能量。天地对万物的仁慈和恩泽，就是用自己的能量注入生命之中。这是太阳辐射能转化为植物组织能神奇、微妙的光合作用过程。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让人们知道了植物可以把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化学能。

这种转化可以简单地写作：

二氧化碳（ CO_2 ）+水（ H_2O ）+光+绿色植物

这种反应方式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命根子。这是绿色植物利

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释放氧气，同时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制造的有机物中的过程。

随州的地形就是最适合这种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地方。绿色植物扎根于破碎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转化宇宙深处的能量。这种转化就为这一地区创造充足的葡萄糖，绿色植物在转化的化学能就是葡萄糖。葡萄糖在生物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是活细胞的能量来源和新陈代谢中间产物，是生物的主要供能物质。绿色植物在生产葡萄糖的同时，还有副产品就是制造氧气、过滤和涵养水分。

大洪山与桐柏山两山之间的谷地里，超过30公里以上长度的河流达到109条，构成完整的沮水水系。随州就成为动植物最好的家园。这就是生长万物的所在。随州地形呈现“玄牝”之型，也就是雌性生殖器形状。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大德之地。

《道德经》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不存，用之不勤。”就是说空荡荡的山谷才是万物生长的地方，这是玄妙的生养之门，就是被称为天地生成的地方；它绵绵不绝地存在着，它的使用价值无穷无尽。随州就是中国的“玄牝”，这里是万物生长的地方，是大德之地。

“生生为大德”来源于《易经》，是对生殖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女性的崇拜，是中国古代尚未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之前的一种价值取向。女性，更确切地说，是母性，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毕竟，每个新生命都是经由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个世界的。

“生”就是宇宙价值。“生生不息”就是天地之大德。

随州历史上自然条件优越，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中国救荒史》根据隋唐326年全国县一级区域动用国家赈灾粮的出库情况。它从隋开皇元年到唐哀宗天佑四年，随州共有12次动用

国家粮库赈灾粮。326年发生12次灾荒，水灾2次，旱灾10次。相当于163年发生一次水灾，32.6年发生一次旱灾。这一时期，全国各州县平均2.7年发生一次水灾，2.4年一次旱灾。就是说，生在随州，人一生60岁可能遇到一至两次灾荒。随州以外的地区是23次以上。这就是说：天地宇宙给予了随州优越的自然环境，我们就应该感恩和敬畏。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说万物怀抱着天，背负着地，阴和阳的和谐就化生万物。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化的重点就是“生”。“生”就意味着事情的出现，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是宇宙的根本状态。随州就是阴阳融合统一生成的和气，使万物得以安宁和生生不息的地方。随作为一个词素组词时，和许多词素搭配就可以构成和谐圆融。如随和、随心、随缘、随意等。

随州就是生长万物的所在，这个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从“生”的剖析中，可以获得一种本源性的因素。所谓本性就是事物“生”的那一刻就见到端倪的，越是起源阶段，就越具有本质性，它越是能够终极地解释后来事物特征。就像精卵结合受孕着床为女性，出生为女婴，继而姑娘、媳妇、老太婆，其女性特征不会因为发展而出现变化。那么我们对“生”的研究这是一个关乎事物起源、发展、未来的问题。从这里进入，就会对事物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够弄明白万事万物的来龙去脉。

生命的“生”，缓缓进化终于产生了人类，世界顿时有了生气与活力；人在生存发展中必然“生”出爱和善良，形成整体力量，这个世界就有了价值和意义。前者为有形，后者为无形。前者是文明的载体，后者就是文明的本质。我们以为对有形的研究深入了，就是科学。其实，科学也包括无形，而且是更高层次的

学问。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说，形体之上的无形是本质和规律，形体之中的有形只是工具和物质。这种“器”只是提供我们观察的“对象”。人类知识的起源和形成，就是由对“器”的观察和思索奠定的。或者说我们的哲思是在对现象的关注中萌发的。

中国文化起源于农耕，随州是最适合农耕的地方，当然就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尊称中国文化的创始人是炎帝神农，他必须选择最适合农耕的地方创立农耕文化。最早的农耕不可能发生在大江大河、崇山峻岭，只能选择随州这种好亲近，能亲昵的低山丘陵、冲积平原。因为这里生命力旺盛，有充足的动植物资源，中华民族的先人就会来栖居。随州的风水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怎样怎样玄妙的不的了，其实这是故弄玄虚。风水的本质就是生命力旺盛强健，只要那里草木茂密，就一定是风水好的地方。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子孙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先祖。因为角度的不同，就必然有认知的差异，这就有了不相同的历史记载。所以有了山西的高平、陕西的宝鸡、湖南的株洲等等，而且都可以拿出可以支撑的历史记载。

这些记载几千年来，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普通民众会从有形这个层面去认识炎帝神农，他老人家就是慈祥仁厚的老农民，和蔼的目光、无限的仁爱，飞扬的思绪、深邃的睿智，宽厚的胸脯、坚毅的勇气。老祖先那天生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走过那些地方，弄得十分清楚。这没有错，因为普通民众觉得自己的先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象站立在庙堂之上，自己的敬仰之情化成庄重的礼仪，才能完成不忘根本的

信仰追求。

然而，理性告诉我们，炎帝神农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起始，是一个文化英雄的符号。文化的创造不是在一个人手里完成，必须是漫长的积累。文化生态是指无数的文化细胞，缓缓地发育、渐渐地成熟、层层地累积，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量的变化构成历史、重大事件让历史发生质的变化。量变是一种些微的变化，是文化生态的累积，质变就是说一个英雄人物、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历史此时有了明确的划分。炎帝神农实际上就是野蛮和文明分界的文化英雄。

既然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我们就应该从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中去进行判断。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农耕文化，把农耕再往细处进行划分，有粗放式农耕、精细型农耕。粗放式农耕主要发生在降雨量800毫米以下的秦岭以北地区，我们称为粟作农耕，这个区域有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这些食物丰富的蛋白质就为北方人的体格彪悍提供物质基础，也让北方人的性格粗旷豪放有了保障。

精细农耕主要发生在降雨量800毫米以上的秦岭以南，我们称其为稻作农耕。稻谷的种植特点，要很多人聚在一起平整土地、修筑堰塘。一家一户是无法完成稻谷种植的，必须有家族的聚集。人多好种田，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今天的“两弹一星”、“三峡水利”工程，30年完成西方几百年走过的路，就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延续。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的起源，从“家”到家族、再到部落，就是一个整体。个人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个人就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这个整体。农耕文化特别是稻作农耕需要这种文化生态，这是生存的需要。在历史过程中，这种文化生态反

复强化，就形成完整的东方文化。人一出生就反复强化你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你姓王或张，就表示你是王家或张家的一份子。你的生命价值就是为这个整体，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先。背叛这个整体就是弥天大罪。

稻作农耕部落最追求和平，当他们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他们身上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刑天舞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悲剧故事都发生在炎帝神农这个部落，精细稻作农耕生活追求和平，当他们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他们身上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能追求安稳的、来之不易的农耕生活，稻作农耕人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铭刻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

稻作农耕文化生态中需要秩序的元素，是因为稻田的开垦到最后成为良田需要漫长的时间。维持社会的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礼乐精神，社会的安稳才可以保证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精耕细作。精耕细作就必然对故土有深刻的情怀，热土难离、守候家园，对远方的土地没有多大的兴致。这就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总是对生存空间的拓展有浓厚的兴趣有了本质性的区别。曾经充满征服欲望、相信铁骑就是一切的英雄，那么不可一世，到头来都是灰飞烟灭。依靠武力征服其实是文明的倒退，这是一种生物链高端生存的自然法则，是缺乏道德的，在毁灭文明的同时毁灭自身。文化的根本是爱和善良，说征服中有爱和善良，那一定是征服者骗人的鬼话。如“大东亚共荣”里面只有丑恶和野蛮。

中国文化能安稳地走过5000年，与这种没有扩张欲望的非侵略性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或者是以自己的文化心态来推测中国。其实中国文化对自己疆域风物的满足，对占领远方毫无兴趣。西方学者总是

拿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说事，真正的学者就会明白，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也是被游牧文化征服。

稻作农耕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按照稻谷的生长规律种植，早一天晚一天插秧，对收获都有巨大的影响。稻谷对自然环境要求很高，它能在较小的土地上作最大的产出，必须顺应自然。顺因自然就要认识自然，对天象的观测就是为了稻谷获得最高的产量。随州境内新石器石器的出土的两件文物，一是三里岗冷皮垭出土的黑色陶豆，豆柄上有七个透雕的北斗七星图案。这件新石器石器的文化内涵距今约6000年。二是浙河西花园一件有太极图形状的陶纺轮。此处文物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另外有一件是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的衣箱。这件文物有精准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这三件文物出土在随州，证明随州的先民为了生存，已准确地掌握天地的运行规律。或者说只有掌握了事物运行规律的人才镇静、从容、平和、大气。

稻作农耕文化生态中的聚集、秩序、理性三大元素，只能发生在中国的秦岭以南地区，最后它被中国的北方地区认同和吸收，这是文化的“长”，而不是“生”。“生生不息为大德”就是说能“生”能“长”，前一个“生”是发生，后一个“生”则是成长。“长”的条件就是能广泛地吸收和融合各种营养。

文化成长的营养，主要是各种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中的精华，自然而然地被吸纳。这种吸纳和融合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一种文化的中心区域，有着很强烈的排他性。比方今天的西方文化的核心区域，他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无比优越，骨子深处是瞧不起与自己有差异的文化。瞧不起，就绝对不会去吸纳其中的营养。只有在多种文化交融激荡的区域，才能真正感受到他种文化的优势和长处，然后接受吸收。中国文化的定型时期，中国文

化最发达的地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只有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反复交融激荡，就会产生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认为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是地域文化的融合。张光直针对中国史前文化这种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向国人介绍了“交互作用圈”。这就是两个文化板块的相交的地方。随州地处长江之北、汉水之东、淮水之西，就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界处，就是承接各种文化的优长的最佳区域。

讲一个随州人看戏的故事，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随州文化的广泛吸纳融合的特征。我们知道南方人喜欢看汉剧、楚剧、花鼓戏，这些剧中在随州有很深厚的基础。旧时，看戏不光是要给钱，还要管演戏人的饭。这些剧种唱到随州就是最边缘了，往北的信阳、南阳、枣阳就不看这南方剧种了。但北方的豫剧、曲剧唱到随州就是尽头，随州以南的安陆、京山、钟祥是不看这北方剧种的，随州在解放初，不仅有自己的豫剧团、还有曲剧团、更有花鼓剧团。许多老艺人能唱南北多个剧种的戏。

随州的地域特点就是中国中部的中心位置，东南西北往这中心地域输送营养，造成了随州不南不北、又南又北的特点。这就是一种反复的交融激荡，让一种文化始终呈现一种成长的态势。这就是说炎帝神农作为中国的文化英雄，他不可能在中国的一隅，必须在中国能“生”能“长”的地方。“生”就是文化的一种本源性特点，“长”就是文化的一种融合性特点。如果说炎帝神农在黄河流域，那么，炎黄的融合发生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中国最重要的融合，是中国南北的融合，只有这样的融合才让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随州成为“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就因为随州是中国古代文

化发达的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交汇地区，文化生态的反复交融激荡让随州成为唯一能生能长的地区。只有在这里来拜谒人文始祖，才可以深刻地领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出“生生不息为大德”又是怎样的美妙。这种领会和体悟就是聚集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能量，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寻找理论根据、价值依托、意义支撑，是建设这个民族全体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

我们对“生生”有清楚的认知，就会对先祖产生敬畏和感恩，就懂得继承和发展。继承和发展就是一种新的“生”，是生的延续。中国文化有了这种“生”，就呈永远健康的态势，就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为大德，第一个“生”就是说随州这个地域是文化的发源地，第二个“生”就是文化的成长地。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其地域文化具备本源性、融合性特征。这种特征是炎帝神农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他地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随州举办“世界华人寻根节”，其实就是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有这种生生不息，中国文化的大家园就一定充盈着生机与活力。即使有一个两个小家园的垮塌，也不可怕，只要大家园生气勃勃、欣欣向荣，小家园的重建就很容易。国家如果是我们生存的最高组织，这个组织的灵魂就是中国文化，创立这个文化的英雄就是炎帝神农。当我们怀着敬畏感恩的心到文化的发生、发展之地拜谒先祖，就是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输送营养。

濡养一个民族的源泉

悠悠华夏文明史，烈山脚下是源头。说的就是炎帝神农创立的文化生态，濡养了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能平安地走过5000年，与先祖炎帝神农创立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体观。这种整体的价值观起源于家。“家”是一个整体，从家到家族，再到部落和国家，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份子，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这个整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化的反复强化。就形成完整的东方文化。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文化英雄，南方以稻作精细农耕为主，稻谷的种植需要很多人的力量合在一起，去平整土地、修筑堰塘，才能在较少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这种整体观，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整体的完整性。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几乎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创造的历史文化的总和。这些功绩围绕整体展开，涉及到民生的方方面面，虽是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但这些功德是普通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创造性的贡献中，更多的是先祖的一种牺牲和奉献。随州的一句土话“揽憨”，就是说自己多吃点亏，让别人沾点光，就是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简洁表述。具备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肯定能够得到普通民众的信赖，自然就成为这个整体的核心。这才是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真实过程。

南方的稻谷种植，没有一个聚集得十分紧密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开垦稻田、兴修水利的。余秋雨先生曾用很简单的话定义文化，他觉得文化就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随州地区已经发现的56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地下文物证明，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先民，稻谷的种植水平远远超过周边地区，他们通过种植稻谷深刻地认识到，人多好种田，只有家族、部落的力量仅仅集中在一起，才能在较小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

稻谷种植就像一个高妙的老师引导着随州先民过一种集体的生活，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成为随州人的共识，经过时间的积累，就渐渐积淀成一种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家、家族、部落的价值远远大于个人，为了这个整体的成功，个人的一切利益都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你的生命价值只是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得起这个整体。这种整体观念通过漫长的时间，化进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一种集体人格，也就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整体观起源于生存、繁衍、发展之道。先祖创立的整体观包含着大爱和善良的元素。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可见“群”是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并发展的基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懂得了合作，才有了人猿相揖别。炎帝神农和他的氏族部落创立了稻作农耕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是聚集，聚集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根本。

聚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力量的对比，力气小的不听力气大的，就动拳头。这种方法就是生物链高端猴王式聚集，这是动物的弱肉强食本能，这种聚集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聚集方式。

今天，很多人以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实这是人类文化良知良觉的丧失。尽管人类社会还有太多太多的丛林原则，但由于人性中始终保持着高贵的爱和善良的因素，人类才没有退回到丛林成为动物。

炎帝神农的伟大，就在于他是用道德的方式让众多的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随州的气候、地形、食物诸环境让先祖很自然地选择了稻谷种植，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等于选择必须聚集。稻谷的精耕细作可以让先祖在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让自己的部族生活得更好，选择增产潜力最大的农作物必须要聚集众人的力量。这种聚集就有了爱和善良。家、家族、部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的关键，就是整体的核心以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炎帝神农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揽憨”。“揽憨”是随州地区的一句土话，意思是说：自己多吃点亏，尽可能让大家多沾光。自己吃的亏越大，感召力越强，凝聚能力就越强大。这种“揽憨”就是炎帝神农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只要为这个整体“揽了憨”，作出了牺牲和奉献，就永远站在这个整体的高处。

整体观的出现需要条件，广种薄收的粗放式农耕投入较小，财富出现缓慢，舍弃之后没有多少压力，种不下去就舍弃，换个地方再种，这种迁徙在粗放农耕看来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广种薄收的农耕，不依赖家族的力量，可以是闲适懒散，无聊无序，纷争抵牾，所以可以不需要聚集。而在精细耕作的部落，则是不可思议的。家族的强化，亲缘的聚集就在这种生存的需求中，自然地出现在精细的稻作农耕文化生态。家族内部协调需要族长的权威，集权思维就这样应运而生。水稻的种植需要家族的每个成员尽心尽力，族长尽可能照顾家族全体成员的利益。大家觉得族长

公平合理才会服从族长的安排，这就是以众为大。众人的利益始终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聚集才紧密。

这种从家到族、再到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到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观念，虽然能寻出很多很多的缺失，但它却像一泓清冽的甘泉，永久地滋润和濡养了中华民族。它让中华民族从这种观念诞生的那一刻就处于一种整体的状态。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虽然是有差别的农耕文化生态，炎黄之战后炎黄的融合，长江流域精耕细作的文化观念迅速被黄河流域的粟作农耕接受，旱作物的精细种植也能让土地获得更大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整体文化观念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品质和质量得到提升。炎帝神农接受了轩辕黄帝的分封，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故里更名为“随”，就再也没有背叛过轩辕黄帝。中国南北一体从此就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南北的分裂，但分裂的双方时刻都在思考如何结束这种分裂，这是在争夺整体主导权，只能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整体观。无论分裂多久，在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心中，分裂的另一边就是自己的至亲骨肉，骨肉分离的苦痛，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时时刻刻折磨着人。

近代以来，特别是人类世界纷纷攘攘地进步，大一统的中国落后，更多的人把眼睛盯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连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只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吃人”。中国的历史文化被定位于封建文化，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困局。我们用什么文化支持民族复兴？许多思想的探索者提出了新鲜的思想，但实质却是与先祖创立相同或相通，只不过换了个说法。

比方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尊严，忍饥受饿，也要制造出“两弹一星”。在世界握有文化话语权的西方人

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民族为一个虚无的尊严牺牲，先是觉得不可能，而后又感到了害怕。因为这些相信适者生存进化论的人，信仰的是力量的对比。要想自己成为处于生物链高端的猴王，就应该让中国这个整体分裂成七八个小的个体，他们就永远是一个强者，就可以很轻松地操控这些个体，永远主导这个世界。

炎帝神农创立的文化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左冲右撞中，其整体价值观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迅速拉近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看一看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中的词句：要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民族、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这些词语中蕴含着一个核心，就是颠覆中国文化的整体观。

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对待中国文化的最佳智慧就是分三步走：一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二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三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三步走战略目前正在具体的实践中。

这些遏制和围堵让中华民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地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世界强国，成为强国需

要物质力量，还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这时，我们再看炎帝神农文化的整体价值观，就会感觉到发源于烈山脚下那文化之源是那么清醇甘冽。

整体的和谐稳定需要秩序。文明的成长最怕的就是社会的失序。稻田的开垦需要聚集巨大的人力，而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勤扒苦做，贫瘠的土地可以变得肥沃。珍爱土地的人在外面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堆牛粪，他情愿脱下衣服把这堆牛粪包到自己那硗薄的稻田。多少年下来，这片土地就变得松软柔和，捏一捏都可以流油。从开垦的那一天起，稻田的主人就想到要把自己的稻田盘成肥沃得流油的良田，就必须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的子女还珍贵。一个人能想到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以后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他必然目光远大。那么他就会拼尽全力维系社会长久的稳定和有序的规则。

社会的安定和有序，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只有思想的大一统，才有政治的大一统。近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安定有序的，就是自认为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人太多，以一种新的思想破坏中国文化的整体观。这些异见者与国内的利益集团结合、与国外的势力呼应，以革命的主张，肃清封建专制的口号，损毁着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困局。幸亏，中国历史文化整体精神的价值不可超越，其核心内容被更多的人认同，重新成为国家明确认可的思想共源，虽然表述方式是现代的，其实质却与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不同的政党所倡导的思想、道德、精神虽有许多不同，然而在文化的核心部分却有惊人的一致，这就是民族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诉求。

先祖创立的精细稻作农耕，就是那种深厚的恋土情结。只要

拥有脚下的土地，就会付出全部的身心去热爱、呵护，人类世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葱茏的稻田，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大树在那里深深扎下根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精细稻作农耕的文化生态，把已经拥有的土地服侍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成为良田还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气力来捍卫，这种固土自守很少对远方产生仰望，更不会对远方的占领有丝毫的兴致。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则完全不同，疆域的广阔，就会让自身生命具有强健的活力，所以这两种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就对生存空间的拓展，有一种激情和渴望。正是这种激情和渴望，必然让自己永远地被历史所唾弃，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很多人觉得今天的西方商业文化似乎充盈着勃勃生机，就以为这才是人类文化的一条坦途。这必须用历史来证明，中华文明能平安地走过5000年，已经证明先祖创立的文化能让世界最多的人，用这种方式生活可以获得幸福。

精细稻作农耕文化中也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就是南方炎帝神农部落的精神特质。刑天舞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悲剧故事都发生在这个部落。为了能追求安稳的农耕生活，蚩尤九死不悔、英勇牺牲的精神铭刻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从抗金反元，到反清复明，从辛亥首义，到红色革命，忠臣良将世代相传。“无湘不成军”，“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还有中国现代军队均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这是因为稻作农耕部落最追求和平，当他们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他们身上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牺牲和奉献如果是为一个地区付出的，英雄就活在这个地区民众的心里，如果是为一个民族，英雄就永远站在这个民族的高峰。

然而，英雄的牺牲和奉献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和平，“止戈

为武”就是说真正拥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才能够获得和平。第二代居里夫妇向中国学者建议，要反对核武器首先就要先拥有核武器。就是说：要想制止武力就必须拥有能力。1964年，中国核爆炸成功，中国立即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防御性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拥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就必须拥有核武器，为了拥有这种能力，一个民族可以勒紧自己的裤带，这就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而牺牲和奉献。没有核能力的时候，中国曾经多次受到核威慑。一个民族的生存权没有了，谈什么个人的人权？这时，整体的权益绝对高于个人的权益。今天，中国最大的国家能力就是具有了制止战争的能力，这种“止戈为武”就是中国掌握拥有了核能力，即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和稳定，也确保了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今天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鼓噪者，说轻一点，就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他们不知道农耕文化最根本的意识就是欲望的自律，虽有强健的军队，那是守护农业的疆域、保持耕作的安宁。即使有远行万里的使者，但绝不是开疆拓土，那一定是去宣讲农耕的荣耀，是为了“协和万邦”。中国文化能延续5000年的根本，就是这种整体的和谐约束了自己向外扩张。说得更贴切一点，就是这些人以自己思维推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游牧文化产生于人食牛羊、牛羊食青草、青草需要广博的地域；商业文化需要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力，市场的大小又和利益紧密联系。所以，这样的文化只要具备能力，就必然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如果不是这二者，那用心就一定很险恶，这些人明知中国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和谐理念，具有非扩张特点，还要诬陷为“威胁”，无非就是要造一种混乱之势，以便乱

中取利。

文化必须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是一个巨大群体5000年积淀的精神惯性，不是某个精英或某个政党就可动摇能够改变的。中华民族最期盼的是和平安定，最优秀的人是忠臣孝子，最伟大的是读书种田它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心中。中国文化的这种做人做事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时，它才被称为是一种“文化”。随便到中国的工厂农村问一问，看有几个人会对远方的占领有正常的兴趣。这种共同意识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惯势，就是民族文化。

东方文化从炎帝神农创立以来，就主张和而不同，认为文化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产生，自然就有不同的特性。想着法子与别人相协调，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协调而不重复别人能达成和谐就是真正的高明。这种和谐是一种君子雅量，否则为了迎合他人而趋同别人是不齿的小人，觉得这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只有这样，才是大美。因此，中国从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在别人头上，内心深处以为美就是爱与善良，爱与善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君子内心的爱与善良相同，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所以中国文化的那种多元共荣、互利双赢，觉得自己获得利益，同时可以让合作的一方也获得利益，并不认为自己幸福，别人必然痛苦，其实这种共荣共生的观念是整体观的进一步升华。

怎样维护这个整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维护方法，不同的维护方法，就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学问。中国的医家认为个人是一个整体，由阴阳两部分构成，而且与世界的阴阳相联系，阴阳的失调，身体就必然出现问题，首先是调整个体的阴阳，进而达到与世界的阴阳协调；孔子主张：做人要对这个整体有所作为，要立

德立功立言，要有责任和担当去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成为中国的儒家；老子主张：做人要顺应这个整体，顺应天地为道，顺应社会为德，无为而智，要超越自我，去感悟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就变成了中国的道家；释迦牟尼的弟子走进中国，以佛的名义传的是中国文化，以出世的心（道家）做入世的事（儒家），也就是身在红尘、心在净土，这是中国的释家。中国文化的核心整体观从炎帝神农创立以来，中国的儒、道、释用不同的方法加以阐述，才成为人类蔚为壮观的浩浩江流，濡养一个民族的心灵。

叶家山文化解读

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考古发掘，毫不起眼的丘壑深厚的历史文化一下就吸引全球华人的目光。山水的景色无论多么惊艳，如果缺少历史文化的熏染，总显得苍白和单薄。这座普通的丘壑，隐含着那么厚重的历史信息，吸引我们急切地探寻。丘壑和人彼此亲昵、接近，就不再是千岩万壑的美景，而是中国人心灵的驿站，为中国思想提供丰赡浩然之气。中国的丘壑孳生万物，影响中国文化，映照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丘壑之中是无数相同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山丘和沟壑，就好比国家就是家的递归，无数家庭集合就是国家，丘壑就是中国的天下。

叶家山栖息过曾侯家族的灵魂，二号墓的一个鼎的铭文，有墓主参与周王盟会的历史信息。专家认定这次盟会发生的时间在周成王三年，即公元前1040年2月。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这次盟会活动的规模很大，参加盟会的都是诸侯一级。由此推断墓主当为诸侯，应该是“曾侯谏”的儿子或再晚一代。曾侯贵族与周王如果没有很密切的关系，不可能参加这样的盟会。叶家山的曾侯家族墓葬的这个细节和后来的义地岗曾侯家族墓群以及曾侯乙墓葬的众多文物告诉我们，这个家族与西周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

西周文化是中国文化处在发展定型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王

朝，这个王朝是怎样影响中国的黄河长江，曾侯贵族家族墓葬会给我们作出许多合乎历史情理的回答。一座小土丘能作出的这种回答，必然增添历史的厚度，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叶家山也因此轻轻松松地走进中国文化史

3000年前的曾侯十分普通平凡，普通平凡得在历史文献中连个名字也没留下，但他们却把自己的生活真实埋进了这座微不足道的丘壑之中。丘壑顿时有了神妙的文化氤氲，因为曾侯生活的时代处在中国大分化、大变革、大组合的风云变幻重要时代，埋藏在丘壑深处的每个细节都与今天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因缘瓜葛联系，解读这些细节其实就是解读中国文化。

丘壑就是天下，叶家山这座普通的丘壑，那深厚历史是被淅河镇蒋家寨村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把铁锹突然剜出来的。这个农民在平整农田时，一锹下去铲出一件3000年前的青铜器。文物工作者通过农民挖出的15件青铜器，发现了叶家山西周墓葬。一期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众多。出土的青铜器有“曾侯”和“曾侯谏”铭文，对西周曾国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随州叶家山古墓群被票选为“中国考古新发现”，受到海内外华人关注。

叶家山走进中国文化史，是因为这里的文化将证明：文化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叶家山邻近的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保存的文化堆积厚度惊人、内涵丰富。附近的农田随处可以采集到石刀、石斧及其众多的陶器残片。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出版的《西花园与庙台子》在序言里说：一个农民家中土院墙多处暴露出陶器和石器 etc 古文化遗物，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堵干打垒的土墙是用5000年的历史厚度进行的堆积（《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当时的发掘报告明确说，随州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农耕生活极为发达，

远远领先于周边地区。

文化的根本在于发现，当我们被历史堆积淹没的时候，就不知道历史是什么。地域才是一种文化赖以诞生、发育的基础。我们常说，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是全球华人的谒祖圣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人较真地问：依据何在？随州境内的众多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就能够系统的回答这个问题。

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是随州境内65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的其中一处。考古队在进入叶家山之后，就对曾侯家族的生地进行了踏勘，发现庙台子城池遗址就是曾侯家族的生地。在中国古代，贵族居于城中，成为国人，国人之外就是野人，城外的村落和邻近的西花园就应该是野人生活的遗址。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进行野外考古认定这里有屈家岭（距今5000年左右）、石家河（距今4500年左右）、夏、商、周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这就是说：叶家山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定型时期一个典型。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发生于新石器时期炎黄传说时代，发展于夏商时期，成熟定型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界定的炎黄传说时代上限应不早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时代后期（距今5500年），下限不晚于龙山时代（距今4500年），这就是中国文化5000年的来历（《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

其实文化的发生很远很远，北京猿人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就有文明因素，但我们不能说那时是文明时代。文明通过量的些微变化来堆积历史，量变是微不足道的，难以察觉的，但这是文明的成长过程。当量变达到一定的厚度时，就必然产生质变，距今5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这种堆积已经达到一定的厚度，社会性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认为这时才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时期。

这就是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叶家山紧邻的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就是展示这种量变堆积过程，随州众多的新石器时期发掘报告都指出，随州在这一时期农耕文化极为成熟。

随州的历史文化堆积优于其他地区是随州地区的地域环境所决定的。因为随州具备两个难以替代、不可复制的条件，一是随州地区有最为优质的物质营养，二是随州还具备优质的精神营养，物质和精神两种营养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根本条件。

首先随州地处地球的板块交接处。中央电视台有个《北纬30°探索》，人类文明多出现于这个纬度线，因为北纬28°—34°属于地球板块的交接处。地球板块的碰撞，地壳发生的塌陷、褶皱、隆起，出现的是盆地、是丘陵、是高山。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也是地球内部结构的惊天动地的大调整。地球内部的铁、锌、铜、锰、碘、钴、锶、铬、硒等微量元素，在这种调整中被挤压到地球表面，地球板块交界处表层所蕴含的稀缺的微量元素，远远高于地球板块的中心地区。优质的物质营养是产生生命的必备条件。随州处在北纬31°19—32°26，为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交接处，板块碰撞时地壳发生塌陷和隆起，塌陷了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盆地的边缘隆起了褶皱断块山地大洪山，与之相对的是巍峨的桐柏山，对峙的两大山脉中间是经过挤压产生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形成一个面积约为10000平方公里的谷地。

《道德经》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不绝，用之不勤。”谷地是生长万物的地方。随州这个谷地表层富含生命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植物是绿色生命，绿色植物转化宇宙深处的能量，输送微量元素于植物之中。绿色植物在制造氧气、过滤和涵养水分，就有着比别处绿色植物更多

一些微量元素。随州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农耕文明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其次，随州有地球最为丰富的精神营养，漫长的史前时代，随州的先民始终在探寻着天地运行规律，他们一代接一代的仰望星空和浩瀚的宇宙。人类文明的出现除了物质条件，还需要丰富的精神营养。所有的生命都需要物质营养，获得了物质营养的生命，只能一代一代复制自己，人能成为生命中的高级生命，就在于人能够获得精神营养，就可以一代一代地发展自己。随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不仅为生命贡献了优越的物质，也因为一代接一代人的仰望星空，从天地运行规律中获得世界最深邃的思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成长最优质和稀缺的精神营养。

天地运行规律蕴藏在天地之间，凭什么说随州人完成了这种发现？观测北斗七星，纬度低的地方因地表大气层抖动而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中高赤纬带的人们看到北斗七星，四季运行规律的时间很短，高纬度带的人们看高纬度带的恒星，就失去指示方向的作用。北纬 28° — 34° 是观测北斗七星看得清楚的地方，最佳的是中间值北纬 31° 。宇宙把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发现的责任赋予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北纬 31° 左右的人们，西部是高山大川，东部是虽是平原，但深受江淮旱涝之苦，无法静下心来完成发现天地运行规律的重大任务。唯有随州是最适合早期人类农耕生活，农耕生活的发展需求逼迫随州的先民必须进行天地规律的探寻。

日理万机、十分务实的前总理曾有这样的哲学思考，人跟宇宙和谐、与天地和谐，就一定有美好的未来，那么，就一定会仰望天空。随州有人在仰望天空，随州肯定是有希望的。如果随州人都忙忙碌碌，为了鼻子底下的那点小事，肯定是没有未来的。

随州的先民把这种仰望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随州就必然成为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的重要地区。

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黑色陶豆，豆柄上有七个透雕的北斗七星图案，这件新石器时期的文物文化内涵距今约6000年（《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原随州市文物局长黄克勇告诉我，这件文物存于博物馆库房。北斗七星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它在天上作 360° 旋转，每天运转不到一度。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东就是春分，斗柄指向正南为夏至，正西为秋分，正北为冬至。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也是白天最短的开始，长与短的对立也是相互转化的。这种对立统一就是天地运行的规律。

在北斗七星之外画一个圆，它就是太极图案，太极图是一个抽象凝练的宇宙万物生成图。叶家山附近的随州浙河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文物，是有太极图形状的陶纺轮，此处文物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s”曲线将太极圆一分为二，揭秘了万事万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阴阳两个元素组成，这两个元素便是哲学中最基本的元素。万物都处在变化中，太极图变化无穷，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变化规律其实就是由小到大的此消彼长。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呈“s”形，这个“s”就是圆融和谐的中心线。

上世纪二十年代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见解被重新认识。许多现象通过量子力学被精确地计算出来，而且获得精确的实验证明。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1937年5、6月间，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和中国学者作学术交流时，中国学者讲到太极图，他有些不相信。当他看到太极图案，顿时目瞪口呆，

继而犹如醍醐灌顶。中国的先民早已经把宇宙间的阴阳变化规律阐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近代科学中“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暗物质”等等难题，都可以从太极的阴阳变化中找到解决的方法。

中国文化儒、道、佛三家都受到这太极图的影响，儒家讲“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论，中不偏，庸不易；中正、平和；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道家认为世界始于混沌，阳气上升，阴气下降成阴阳二气的世界，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第三种物质，即世上的万物。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佛家讲“有”和“空”，“有”“空”的平衡就是“中道”，“中道”是般若思想弥合自身矛盾的思辨模式，是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更让我们惊奇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的衣箱，这件文物有精准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北斗七星环绕二十八星宿是地球人类跟宇宙相通的文化理念再现，擂鼓墩曾侯乙大量的青铜器，造型中无不透出天圆地方、通天通地的原始哲学思想。

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张士元先生，通过多年对编钟的研究，认为编钟的体型纹饰蕴含着宇宙星云的图案，与现代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几千亿星系运行形成的图案，有着惊人的一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给我看时，我陡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一个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民主党派，竟然有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人，不由让我对这个党派肃然起敬。我觉得经济界的人士是一些很实在的人，他们能够仰望星空，就一定在想民族的明天，人类的未来，就一定有长远的目光。一群有经济实力的人，在想这些文化上的事，中国就一定大有希望。

这一系列文物出土在随州，决不是偶然，它们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随州的先民为了生存，已准确地掌握天地的运行规律。这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最为丰富的营养。

文明发生之后，最重要的需要成长，成长主要依靠不断的交汇融合，在交融激荡中积累和吸收营养。历史发展是一种量的些微变化，人类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昨天的野蛮变成今天的文明，文明的成长需要吸收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营养，随州不仅有自己最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还有地处中国中部中心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四面八方往这里输送营养。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农耕文化，炎黄传说时代是这种文化的发生阶段，夏商是发展时期，两周战国就基本定型。中国文化的发生时期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炎黄的融合。现代国家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成功地由不同的地理、文化、血缘等形成一个共同认同的民族。

其实“和”就是矛盾和斗争，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很自然的，炎黄之战，反复厮杀，双方都很痛苦。在痛苦中寻找最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协商就是退让和妥协，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是需要反复的协商，才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点。“随”这个字传说就是炎帝神农诚心跟随轩辕黄帝，把自己的故地更名为“随”。在两片土地中间加了一个“走之”。“走之”的篆文写法是画的一个足，表示跟从的意思。它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但这个字为我们提供历史真实的许多信息，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是承认差异、差别、乃至矛盾和斗争，“和”就是融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这个道理。

“随”作为一个词素和许多词素构成的词，都有圆融和谐的意思：随和、随便、随缘、随意、随心等等。“随”的这种融

人，让随州文化得以成长。考古发掘工作一开始，人们就感到墓主是北方的贵族，采用的西周的葬制。北方的贵族居住在南方，南北文化有许多差异，差异恰恰是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北方粟稷农耕孕育的粗犷豪放透出一种王者之气；南方的稻作农耕蕴含着精细和柔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两者完美结合就是一个民族的丰富多彩，就有了厚重，也有了流畅。正方、正圆、正三角的厚重，但不可能取代曲线的圆润和流畅。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中的许多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随州文化既不是北方文化，也有别于南方文化，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他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的路径。

文化是人的内在的一种力量，是人的一种特殊力量。南北的文化的差异越大，越要尊重，越是尊重，就越是显得博大。这种文化的成长只能发生在中国南北交汇的中心，不可能发生中国的一隅。“炎黄融合”不仅仅是中国南北的统一，它留给世界的除了统一模式，还有“天下一家”的文化概念。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从家到家族，再到部落、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一旦认同了，就给地提供保护，你就是我的一分子。“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家、国、民族、天下这四个词是可以互换的，但也有细微的区别。可以亡国，但不能亡天下，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改朝换代只是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苍生，苍生的利益，就是天下每个匹夫的责任。

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就在这里，只要你认同了中华文化，你就是我的一分子，没有种族的概念。你的女子可以成为皇后，她的

孩子一样享有王位继承权。这种文化起源于家、家族，发展于部落，成熟于炎黄融合。心里有些不服气，可以再打，再失败，孟获七次之后，终于心服口服了，两者就融为一体了。这就是中国文化，这样的“天下一家”观念，才可以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出路。

叶家山曾侯和战国早期的曾侯乙，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早期有叶家山古墓，战国时期有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还有随州义地岗今年发现的东周曾国，虽没有发现西周中期和晚期的曾国墓葬，目前暂时连不起来，但可以确定叶家山这个曾国是周王朝承认并分封的。如果联系历史文献记载，就可以肯定西周王朝威权的存在，就能对社会实行有效地管理，基层的组织百家为族（《礼记·祭法》），五族为党（《周礼·地官》），贵族的经济就建立在公社组织之上。

叶家山曾侯虽然只是一个贵族，甚至在历史文献上连个名字也没留下，从墓葬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们政治文化观，只要遵守中国农耕社会生活的规则，就有长久的富贵。人类的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西周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王朝，从葬制的许多细节可以看出，亡者头的朝向、棺木的深埋、随葬品有序的排列在中间平台，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曾侯贵族对周天子的敬仰和崇拜。家庭是最合天理、最自然的人际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早期的曾侯为姬姓，代表周天子开发南土才最为合理，西周中晚期虽没有出土文物证明曾侯与西周的关系，但后来的曾侯墓葬却一再证实这个贵族与西周姬姓亲密关系。

社会稳定的内在因素起源于家、发展于族、成熟于国。家庭对家长的尊重，家庭对族长的敬仰，贵族对朝廷的敬畏，构成社会稳定的根本。叶家山曾侯墓葬中所有文物的铭文把王的赏赐作

为家族最高的荣耀，强势家长制是中央集权根基。这也是世间万物运行之规律，太阳能温暖这个星系，所以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就围着太阳转动，大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展开，也因为最核心的那一圈是根本，没有中心核心的那一圈，就没后来的若干圈。如果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强调自己的利益，没有家长的权威存在，这个家肯定散。中国文化能延续5000年，与家长维系家庭有序和平衡这个根本制度有重要关系。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叶家山曾侯，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与后来的曾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同时，这种适应社会聚集、规范社会秩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传统文化所衍生出的家国体系，还有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符合天地运行规律、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

从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到擂鼓墩曾侯乙墓，可以看到一个贵族500多年的辉煌历史。应该说曾侯乙时代的曾侯家族还处于鼎盛时期，随州的曾侯家族从历史文献上完全消失，大约在公元前290年前后。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是什么原因支撑曾侯贵族在随州这片土地上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这几乎就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随州这片土地上一定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最为稀缺的文化元素，寻找到这种稀缺元素，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的人类社会，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文化最珍贵的文化元素就是“三和”，首先是家庭的和睦、其次是群体之间的和谐，由此带来国际之间的和平。

普通民众把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看得很重。这是因为每个家庭都会把家庭的和睦看作最高的追求，这种和谐追求是家、家族兴旺发达的根本，应该是最合理的文化，虽然不等于说是最优秀的文化，但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血缘的联系，是亲人、是自

己人，家、家族中的权威是父母或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多数情况下显然有更大的公正性。在家庭中虽然会存在利益摩擦，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无间、真诚关爱与无私奉献精神，毫无疑问是人间的一切人际关系都不能相比的。家庭中产生的价值观是最自然、最合天人伦理道德、也是最理想的价值观。在家族结构中必然产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这样举世无双的价值体系。这种强调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农耕文化价值，必然会由家庭发展发展为家族，再由家族发展为国家，家国形式成为水到渠成的政体形式。

因为血缘关系产生的和谐、和顺、和睦效果一定会超过所有的利益集团制定的所谓公正，利益集团的冲突弥合纷争的办法，谁的势力大，谁才能够制定公正的规则。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产生的价值体系是人类最理想的价值体系，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和归宿。而握有话语权的人往往会用各种理由诋毁和指责这种符合天道的价值体系，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天下一家”，或“亲密得像一家人”看似通俗，其实蕴含着“天下大同”这样符合天道运行规律、人类最为珍稀的价值观。随着家、家族的发展，社会开始复杂化起来，当国家成为更大规模的家族社会结构，进行利益分配时，公正性逐步降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果支撑这个社会存在的文化认知没有发生改变，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就一定会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化共同体，那么，过去在家庭关系中产生的自然的合理的的价值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商业贸易巨大风险中也蕴含着巨大利益，勇敢冒险的英雄在流动冒险中可能获得利益，形成利益帮派，再发展为更大的利益集团，必然摧毁原始家族部落，被利益帮派，若干利益集团就可

以成为邦国。邦国形式的政体就当然崇尚“三争”，这就是个人之间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三争”文化崇拜冒险的个人英雄，在重商抑农中强调进取、尚武、掠夺、好战。

家、国、民族、天下一家的文化优势在于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特质，深层背景是顺应天地运行规律，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我们从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可以看到这种天性和基因，编号111墓中，南边的二层台上，戈、矛、戟、弓箭、盾牌等有序地摆放着，尖朝东边，多数戈的戈尖进行了折弯或折断。曾侯贵族到南方来的主要目的不是征服，而是教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当然也是国家的性格。这是一种骄傲，骄傲到不肯打仗的地步。这也是在解说中国的“武”字，折弯或折断就是“止”的意思，“止”“戈”合在一起就是“武”，真正的“武”不是打仗，而是止战。“武”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武力，用宽容厚道、友好以礼，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志于和平的精神，才是农耕文化的本质，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别人，是君子怀德，服之以理，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只有动物才动不动就展示自己的肌肉，要人畏威，以力治之。

在中国文化中，“尚武”就是“尚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是为了赢得和平，制止倚强凌弱。之所以说西周王朝是中国文化定型的重要时期，就是因为这个王朝，在兴起的过程中，就有一种大而不横、强而不霸的品性。这个王朝以爱己之心爱人，塑造了民族爱好和平而不穷兵黩武仁慈善良性格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这其实就是中国人亘古的情感基础，仰望中寻找出天地运行规律，对天道的敬畏，必然对天地间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有了亲近悲悯情怀。

西汉文学家、政论家贾捐之是贾谊曾孙，针对珠崖郡反叛朝廷，写下《弃珠崖议》，陈述关东人民生活很苦，国库空虚，不宜出兵远征，与南方蛮夷争夺地盘，和平思想很充分的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中国强大了几千年，周边的弱小的安南、缅甸、高丽、泰国、琉球等仍能独立存在。当一群动不动就展示肌肉，以威示之，以力治之的生物性高端生存文化的人走进来时，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这些国家就先后灭亡了。这就更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可亲可敬，从而证明“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汤因比语）”。

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的编钟。保持着早期编钟的原始形态，这组编钟能发9个音，能完整地演奏乐曲。李学勤先生认为要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就必须认识中国古代音乐。音为单调孤立的声响，众音和谐才能为乐。在古人眼里，乐和礼是宇宙和规律的体现，只要我们走进音乐，就与天地和谐。这就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周的礼乐制度的深远用意，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用乐的安装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

早期的“曾”没有下面的“曰”，后来的“曾”有“曰”，从有“曰”到无“曰”，其实就是音乐在曾侯家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礼乐政治的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支撑周王朝。义地岗春秋墓出土了两件铜戈铭文：“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臧之武之用戈。”李学勤先生指出：周王孙，是周初的分封国，并和周王室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左传》记载：“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同姓的诸侯，多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后

裔，是在周公摄政时分封的。

我曾经有过一个猜想，我认为首封诸侯的人选应是周王朝慎思而择的人。这个人叫“姬曾”，无“曰”的“曾”指窗子，含明亮的的意思，指有德行。他与周公的血缘关系很近，其次有很高的德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知乐，开疆拓土的周王朝，乐舞是教化南民的唯一手段。这种分封不是移民，而是教化分封地的国民认同西周王朝。曰的篆写是象形人中和嘴的形状，说明这个字与口有关。“曾”有“曰”就是强调音乐，《说文解字》解析“曾”：从八从曰，辞之舒也。舒是延伸延缓或停顿的意思。什么能对言辞来延伸延缓和停顿呢？唯有音乐有对语言具备延伸延缓停顿的功能。

“曾”还有自谦的含义。晋平王曾对周天子说：“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彪是晋平公的名字。晋平公在这里自称“曾臣”是“小臣”“微臣”的意思，是对天子的敬重而言的自谦之词。姬曾任首任南方诸侯自称曾侯，是对周天子的尊重，亦有自谦的意味。随侯的二世，按敬祖的体例，是可以先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或作为自己的封号。诸侯立太子须由天子批准，随侯的继承者上呈“曾侯”之名，一是对先祖的敬仰，二是对周王朝的尊崇，三是对平民炫耀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拙作《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曾侯世世代代皆为“曾侯”，既是身份职位，也是世代传递的信物，“再封”礼仪体现王权的权威，也是社会有效管理的证明。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守。

叶家山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丘，被一个普通的农民一锹剝出3000年的厚重历史时，随州市委书记刘晓明就有一种惴惴不安

的感觉，他对全国政协视察大遗址片区保护的领导说，祖先的灵魂在这片土地安静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惊扰了祖先的安宁，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建设好这片历史文化厚土，就愧对古人和来者。这是烙印在我们心灵深处的祖先崇拜意识，我们希望社会安定，这种安定就带来文明的发展，曾侯家族的长期传承已经强雄地证明，随州人与天地自然构成的关系，就是难以复制、不可替代的民俗民风，这就是随州文化。是人的内在的一种力量，更是一种特殊力量。人有守护家园的天性和基因，我们生活的地理家园很重要，然而我们守望的精神家园更神圣。叶家山曾侯家族墓群留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定型的重要时期典范，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和“天下一家”的思想内涵，将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出路。

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体现为文化的复兴。人类是一家人，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让我们相信，人类本来就是一家人。如果本来就是一家人，那么，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价值体系质疑的今天，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突然面世，其中蕴含着重大玄机。何尚不是一种天道？

文化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灵魂的集合，灵魂永远也不会死去，横空出世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就是呼唤我们，对家族社会结构和家族价值观的回溯，刷新了我们人类社会的理解。原始家族主义价值观是符合天道的，引领我们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绝对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必然符合天地运行规律。这是一种符合天道的同质，两者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就好比创立“粒子正负自旋产生自然力”学说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看到太极图，又比如现代计算机二进制技术与阴阳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的学问终极走向，必然符合天道。

今天，我们可以从叶家山，解读出中国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站在3000年前的高处，看人类世界，文明的兴兴衰衰。这叶家山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仍然有着勃勃生气活力，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附）：历史的马蹄声

中央台直播随州叶家山考古发掘现场，首次在南方地区发现西周马坑，其中一座马坑的随葬马匹多达10匹。人们看到那些完整的马骨架，这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仿佛看到了强健的骏马，也听到了贵族骑着骏马踏踩农耕厚土铿锵的蹄音，那是一种历史前进的足音。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是农耕文化中心腹地，这里出现西北地区才有的骏马，对我们解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前行的力量由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构成。历史出现停顿的时候，人往往借助物质的力量，推动历史的前行。眼前的骏马，实际上是人依靠动物的力量促进历史的进步。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会形成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可以形成人类社会文明不同的走向。采集和狩猎相伴，狩猎者获得猎物，进行家养。动物经过驯养逐步改变了性情，在野为兽，在家为畜。专家们考据，牛的驯化在中亚完成。野牛成为家畜之后，极大地推动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粮食的剩余。财富不仅仅是农耕产品的剩余，也包括能实现剩余的生产资料。中亚游牧民族对牛的驯化，进入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国的历史就发生质的变化。

人类对马的驯化是一种最高贵的征服，马有宁静、高贵、潇洒、勇敢的品性，驯化了马，就获得了马身上的这些完美的品

性。马的驯化和征服也是在中亚进行的，当人们骑马南下，跨过黄河，进入长江，历史就发生新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重大矛盾时，人的力量无法解决，就只好再次借助动物的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其实是力量的对比。马的力量大、速度快，矛盾对立的一方只要握有了马的力量，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人们总是感到是长江与黄河的江河之水滋润濡养了中国文化，很少有人提及北方的大漠和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中国的历史走到关键时刻，北方总会有一股力量推动历史前行。这大概是与北方驯化牛马，适应良马生长有密切关系。其实中国历史少了北方的大漠和草原，就少了真正的王者之气。

马行走快捷、力大温良，很早被用来驾车。黄帝造车，车前的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所以号称轩辕黄帝。牛马在中亚经过驯化，首先传入黄河流域，众多的历史文献有详细的描述，黄帝“服牛乘马”应该是历史的真实。马步是一种最稳定、最好发力的步法，习武之人首先就是从站立马步开始。马步就是骑马的姿勢，站好了马步，就是获得稳定和发力的一种最好姿态。中国历史上十二个王朝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北方完成传递，应该与这种姿态息息相关。轩辕黄帝能建立中华政治文明，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轩辕黄帝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这种站立的姿态。

农耕文化有一种偏见，就是对不同于自己文化体系有一种深深的歧视。从游牧部落那里学会了骑马，掌握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力量，却并未改变那种狭隘的历史成见。总是认为中原以外发展晚些的狩猎游牧部落，是蛮、夷、戎、狄。他们从事了农耕，就进入了文明。古人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种狭隘的文化偏见。马的

速度和力量优势，还有游牧民族充满野性的精神和有效的组织配合，往往能迅速改变农耕社会的基本矛盾力量对比，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叶家山曾侯家族来源于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西周。《诗经·大雅·绵》中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亶父率领善于骑马的周人，迁到岐山。这个属于“西戎”的落后部族，加上马的速度和力量，就有了巨大优势，周人战胜商人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有周公亲自制礼作乐的故事，认同和接受了农耕礼乐文明，就有了取代殷商腐朽没落的正当性，人们忘记了这是一个骑着马从贫瘠和瘠薄的草原走来的部落。

马坑墓旁曾侯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有铭文记载叶家山曾侯参加过周王会盟的信息。专家考证这次盟会发生的时间在周成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40年2月。叶家山的曾侯贵族到擂鼓墩的曾侯贵族曾侯乙，有十分清晰的传承关系。曾侯乙墓葬准确时间是公元前433年，此时的曾侯贵族依然处于鼎盛时期，曾侯贵族所在的随国从历史文献上消失，约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这就是说曾侯贵族在随州这片土地上，稳定发展了700年。一个贵族靠什么繁荣昌盛700年？马坑中随葬的马，告诉我们，善于学习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民族，就能够创造奇迹。一个贵族能在随州这片土地上稳定发展700年，这在人类文化历史上不仅是一个特例，更是一个奇迹。

叶家山马坑墓旁边曾侯墓葬中，有一组编钟，能发9个音。乐和礼是宇宙和规律的体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用乐的感染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从炎帝神农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到震惊世界的编钟。曾侯用站马步的姿态对音乐有深刻理解，并虔诚

地进行着实践，以音乐的和谐求得天地、君臣、上下人心的和谐，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心态的平和，天地人性的完美统一。

有胡人文化血统的杨坚，骑马来到随州，承袭父爵担任随州刺史。走进随州的杨坚，体味出农耕生活期盼安宁，就迅即扬鞭催马，走进朝廷，废周立隋，建立了一个以炎帝神农故里名字命名的王朝。结束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挽救了几乎化为灰烬中华农耕文明。因为在炎帝神农故里农耕文化的发源之地生活过，从骨子里深爱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礼乐文化。几百年来的混战，战火焚毁、文化经典大多遗失。杨坚登基后下诏道：“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杨坚诏令号召全民献书、捐书，献捐一卷者，赏绢一匹，隋的藏书量顿时大增。经典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读经典就是学做人。学会了做人，一定会做事。做官能有大作为，做生意能做大生意，做学问能做大学问。可惜，隋朝国运短促，随州在“隋”的地位还没来得及显露就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和杨坚一样有着胡人血统的李世民，以骑乘骏马的姿势，接过杨坚未竟的大业，创造出照耀世界的盛唐辉煌。

中华民族的农耕生活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谐的人间关系，维护这种稳定和谐，需要精神和物质两种力量。农耕生活形态的渴望始终有内生的精神力量的动力，总会有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来打破农耕的平静，一种慌乱之后，就会从容地接纳、掌握这种力量。

中国古代，马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拥有马就是拥有速度和力量，拥有速度和力量，就可以去建功立业；今天，西方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物质力量，再次干扰中华文明常态发展的时候，我

们也有些慌乱。当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从叶家山曾侯贵族马坑那马蹄声中，我们将再次从容地面对新的物质力量，迅速接纳、掌握这种新的物质力量。具备吸收营养的能力，当然得到迅猛成长。古老的中国文化，具备符合天地运行规律的精神，如果再获得新的物质力量，就能引领历史的进步。

（附）：止戈的贵族

随州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被票选为中国2011年十大考古发现，普通的土丘始终吸引着人们的关注。随着发掘的深入，一个真正的贵族越来越清晰地走近我们。

说叶家山曾侯是真正的贵族，是因为这个贵族深得农耕文化精髓，也领悟出礼乐文化的精妙，一个贵族群体把生命的深刻埋进不起眼的土丘。揭开这个土丘，我们发现今天原来是历史的延续，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早在3000年前定型。历史是一种记忆，一个伟大的民族，突然从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中找到了自己荒芜已久的记忆。

叶家山与随州城区的直线距离也就几公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考古发掘，顿时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其中诸多墓葬中均有兵器陪葬，显示出曾侯贵族对军事思想的深刻理解。墓中既能用于进攻、也可用来防御的兵器就是戈。这多数戈的戈尖都进行了折弯或折断，这一折，折出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爱与善良，也折出了对和睦、和谐、和平的深刻理解和虔诚的躬行实践。

过去我们从文献上知道，古人对“武”的解释，是“止戈为武”。叶家山曾侯贵族却用自己的行为来我们解说着“武”字的真正含义。“武”是典型的会意字。会意字是由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新的字形内容和含义与独体字有内在联系。“止戈为

“武”包含着两个独立的字，“止”与“戈”。“止”的篆写是脚趾的象形，从而引申出停止的意思。“戈”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兵器，青铜制作，尖锐锋利，安装在长柄之上，可以横击和钩援，能够用于进攻和防御，是战争的重要标志。“止”和“戈”和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这就是“武”。

在叶家山读这个“武”字，折断与折弯就是真正的“止”，停止使用“戈”就是尚武，尚武实际上也就是尚和，“武”的真正内涵，是一种争取和平的能力。这就是说：“武”的核心就是“止戈”，“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具备“止戈”的能力。曾侯家族大量折断折弯“戈”，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解说真正的“武”，是不能够轻易使用兵器“戈”。后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兵本与不杀，武在于止戈。”都是在用各自的智慧阐述自己对“武”字的理解。历史上，能把“武”字阐述得很精妙的人，就能站立在历史的高处。

曾侯贵族折断折弯戈尖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引领我们走进武的最高境界。进入武的最高境界，需要两种力量。首先需要具备追求和睦和谐和平的思想精神能量，再就是必须握有停止战争的巨大能量。叶家山曾侯是西周早期的重要贵族，贵族最重要的体现不是权力和财富，真正的贵族是精神的富有、智慧的充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王请他参加过西周早期最重要的一次盟会。考古专家根据墓中的文物铭文认定盟会时间在公元前1040年2月。显然，能参与如此重要的盟会，绝不仅仅酒瓢饭袋的庸庸之辈。周王召集天下诸侯盟会岐山，周王必然要赋予其统一天下的重任。

接受周王重任的曾侯当然知道，统一天下不仅仅是武力的开疆拓土，武装占领可以一时，不能一世，重要的是人心的认同和接受，唯有人心的认同和接受，才可以让姬周的天下千秋万代。这就是：“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按《诗经》中所说，西周来岐山之前，就是“西戎”游牧民族，身上不乏充满野性的杀伐之气。走进中原，才感觉到农耕生活是一种符合天道的生活。天地生养了人类，也生养了天下万物。要想永续发展，就要爱惜天下万物。

这种爱与善良的情怀引申出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身与心的和谐。唯有这种思想的滋润濡养，才能够培育英雄身上巨大的能量，一个王朝才具备至高无上的品质。周公姬旦完成了东征和分封，还亲自制礼作乐，成为圣人孔子最为尊崇的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一代伟人。在曾侯参加的这次盟会上，周公姬旦把自己“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对曾侯作了特别交代，曾侯深刻领会了周公的思想精髓。止武事，兴文教。让人感受文化的爱与善良，唯有爱与善良乃天地宇宙之道，能引导人类走向高贵。唯有高贵，才能完成心灵的征服。攻城略地不能叫征服，只有让人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真正的仰望，才称得上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征服。

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农耕文化发展积淀深厚。为曾侯实践周公的德治提供了最好的人文环境，让一代代的曾侯具备巨大的思想能量成为可能。很多人以为农耕文化玄而又玄，说不清道不明。文化就是道，天地运行的大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越说越复杂。随州的一句俗话“人多好种田”就说出了农耕文化的精妙。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有个规矩，规定怎样做老人怎样做子女，一家人都按这个规矩做人，一家人就和和睦睦。对老人的

尊重需要有形式和载体。早晨起来，做子女的要跟老人去问安；吃饭的时候，老人没上桌子，子女们不要先顾自己埋头吃自己的；冷天的晚上要跟老人们去用烘炉暖暖被窝。这就是“礼”，它可以保持一个家庭的稳定秩序，可以保证一个家庭兴旺发达。有很多人觉得个人权利是神圣的，不能用整体的利益侵犯个人权利。看上去似乎有点道理，然而仔细想想，一家人各强调各的权利，这个家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散。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家庭兴旺的搞法。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用乐的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群”是人类得以发展壮大根本。人懂得“群”，就告别动物，走进人猿相揖别的文明。中国农耕社会的聚集性，就是从炎帝神农开始的。炎帝神农在两汉之前是分述的，炎帝是个人，神农是部落。司马迁觉得两者的内涵基本重叠，就合称为炎帝神农。从字面上可以看出，炎帝神农就是从个体走向群体的过程。炎帝为帝就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人，大到能温暖一个群体。男耕女织的农耕最少也要两个人，有炎帝温暖的群体应该就是很会种田的群体，所以叫做炎帝神农。炎帝神农不仅仅是血缘的联系，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化就是聚集成“群”，成“群”的过程，首先是从家开始的，到家族、再到部落、部落联盟、最后是国家。

中国文化起源于家，家的和睦，才有家族的和睦，就能够带来兴旺发达，家族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权威是父母或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具有相对的公正性。血缘联系能牵动人性中最柔软的情感，引发出亲密无间、真诚关爱与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相比的，能化解家庭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家

是“群”的初始，国是“群”的终点。家、国、民族、天下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一个意义，可以经常用来互换。

“群”需要能量，好比太阳，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围绕太阳，就是能够享受到太阳的巨大能量；又好比树木，能从根部吸收到营养，所有的年轮都围绕着中间的核心展开。“群”的过程，就是人心凝聚的过程。首先是道德能量，就是愿意用自己的能量温暖别人。一个人家财万贯，能量够大，但没有道德能量，万贯的家财只晓得自己独享，不会与人分享，就不可能让人感觉到温暖。愿意让人享受自己的温暖，必须具备一种道德境界，具备这境界的人能温暖别人就会觉得很幸福。其次，就是有温暖别人的能量，还有让人感受温暖的最为适当的方法，方法不当别人就会觉得假，有不安好意的感觉，就产生本能地拒绝。

农耕文化叫礼乐文化，就是用礼乐精神让一家人在一起和睦相处。“礼”的繁写为“禮”，“示”表示尊重，上面的“曲”指音乐，下面的“豆”就是一面“鼓”，也就是指音乐；“樂”字写法就是在木上附丝弦。古人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古人认为音乐是宇宙万物中最为和谐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单纯的娱乐，有着比娱乐更为重要的融洽和谐意义。“音”和“乐”有区别，“音”是声响，能发出声响的都是“音”，“音”不进行组合不能成为“乐”。单个的“音”不能成为“乐”，用节奏和旋律处理好众多的单音，就能成为好听的乐曲。好比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才气，不会融入整体就是不会做人，知道怎样融入整体，在整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才算会做人。对于那些难以融入整体的有一些技巧的人，最多会被称作有才无德。

叶家山曾侯贵族具备巨大的物质能量，其中一座马坑的随葬马匹多达10匹，可见其保持着“西戎”游牧民族对马的钟爱，这种钟爱其实是内心深处对豪爽、彪悍的眷念，也说明具备强悍的实际能力。然而，曾侯贵族把这种能力妥善安放在自己的陵寝之外，认为这些东西皆是身外之物。放在自己的陵寝之内的，是折断和折弯的铜戈，还有那铜戈融化之后铸成的青铜编钟。墓中编钟一组，能发9个音，能完整地演奏乐曲。曾侯贵族到南方来，不是为征服而来，希望能用道德的力量来教化南蛮之地，是君子怀德，是心灵的交融感染，是真正的人类文明。钟铸造艰难，声音沉着清脆、厚实绵长的音色，富有穿透人心的音响效果，出音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具有悠闲雍容、矜持华贵的贵族气度，具备一种摄人魂魄的节奏感和穿透力。是一种男子的阳刚壮美，是一种君子之德。

中国音乐有金、石、土、木、丝、竹、革、匏，谓之八音。八音之中，金居首位。钟是重器，不仅居于演奏中心，还象征着王权，对荆楚之地影响极为深刻。因为钟的高贵，南方有人以钟为姓，更有以音乐为职的钟仪、钟建和钟子期。著名音乐家、楚人伯牙，弹奏乐曲，志在高山流水，意境深幽，唯钟子期知音懂意。钟子期死，伯牙绝弦破琴，不再操琴，成千古美谈。铜戈无论多么尖锐锋利，只能夺人性命，心随性命而去，但没有被征服。唯有沉着、悠扬的钟声，才让人倾耳聆听，继而，产生了仰望，用这种高贵作为家族的姓氏，要进行世世代代的传递。

“止戈”是真正的高贵，曾侯贵族从参加周王的盟会公元前1040年算起，折断折弯铜戈，为曾侯贵族带来了700多年的稳定发展。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准确年代是公元前433年，这时的曾侯应该还是很兴旺的，曾侯所在的随国从历史文献上消失大约在公

元前290年前后。一个贵族稳定发展700年，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贵族，就贵在精神的强大无比。精神的强大，才具备折断折弯手中铜戈的勇气和信心；唯有精神的强健，就不会失去制止战争的能力和智慧，确保生活中的那种和平。中国文化传统并不认同“止戈”是一种高贵，喜欢以成败论英雄，在角斗中寻找英雄，只要斗过，哪怕失败也是英雄。这种“止戈”行为，找不到英雄的本色，自然被人们遗忘。

一个创造了700年和平的贵族，没能走进历史。贵族和历史，该谁遗憾？

长寿贵族的礼乐精神

叶家山曾侯墓群的发现，我们知道了曾侯谏应该是曾侯乙的先祖。虽然文物中没有发现带姬姓的文字，但中国的先秦史学者认定安州六器的曾侯为姬曾，这与昭王南征青铜器诸多铭文形成对应关系，也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战国早期的曾侯遗物构成完整的器物链条。

从曾侯谏到曾侯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叶家山曾侯谏为西周成康年间，是公元前1042年—1021年，擂鼓墩的曾侯乙，准确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从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墓葬规模可以知道，这时的曾侯贵族还是处于兴旺发达时期。学界主流认为“曾随合一”，文献中随文献中消失应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这就是说，曾侯贵族在随州这片土地上存在了700年。我们知道，西周初期到战国晚期的700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就发生在这个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格局变化、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是什么因素让一个贵族在这个时代能有这么长的生命活力？文献中关于这个贵族的记载很少，虽有一些地下文物面世，但可供剖析的信息也极其有限，然而，寻找这个贵族长寿的文化基因，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不是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就是贵族，只有灵魂的高贵才能称之

为贵族。人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需要有物质的保障，但比物质生活更高的是精神生活。人的贵贱不在物质的丰富，而在精神的伟大和渺小，优秀与平庸。周人知道精神的高贵是不能够通过血缘传递的，必须花大力气来培育。西周立国后就以礼乐治国。周人认为，国家的兴衰枯荣是与礼乐的好坏相对应的。对于社会的成员来讲，从小就应受到礼乐的教育，参加社会事务后，执礼必须举乐，事事都要在礼乐的规范下进行。因为音乐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所以西周朝廷有庞大的音乐教育机构，教育对象分别是具备高贵血统的世子、冑子、学士、君子、贤人。未来政务承担者必须在这里接受教育，掌握道义理想、治国之术、礼乐诗书。正是由于音乐在周人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理解音乐在中国文化中有那么显赫的份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李学勤先生觉得不认识古代的音乐思想，就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

礼乐政治的重要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来支撑西周王朝。叶家山的曾侯墓群具有显著的周文化特征。墓群的葬制，口小底大、墓坑陡直，随葬以礼器居多，说明墓主骨子里是信仰西周文化的。这充分说明，一个刚刚诞生的西周姬姓王朝，已经成功地掌控了中国南方地区，并用自己的礼乐思想影响了中国文明。

叶家山墓葬中许多青铜器细节上又与中原青铜器明显不同，这表明墓主受到随州本地文化的影响很深。一号墓主的青铜器铭文有“癸”字，周人少有用日名的习惯，先秦历史学研究者们都公认：周文化是在商文化（尤其是其青铜器文化）等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墓主可能在西周立国之前就来到随州，

所以受商文化的影响较大。这就为《诗经·小雅·北山》中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出了实际证明。表明周王室对中国南方真实有效地控制已到达随州，并通过随国之曾侯对长江、汉水流域的荆楚地区进行教化，为进一步的掌控奠定基础。墓中的器物有太多的细节说明，这些器物就是在本地生产。那么，我们可以以此判断，这时的曾国具有巨大的经济生产能力，而且，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随州地域文化。

其实随州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随州的地域文化就有一种本源特征。所谓本源就是一种本质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变异的。礼乐文化的核心就是敬。随州这片土地蕴藏着深厚稳定文化基因，这就是对权威的认同和敬重。对权威的承认并遵从的文化基因萌发于稻作农耕。因为稻田的开垦、堰塘的修建，需要众多的人群聚集。族群的聚集必须有一个权威中心存在。家庭里是家长，家族里就是族长，部落里就是酋长。聚集是文明发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元素。聚集需要权威，权威的产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多吃点亏，让别人多沾点光。你吃的亏越大，感召力就越强，聚集能力就越大。随州的土话有两个字“揽憨”，就是这种做法的准确表达，就是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

当然，这个世界还有人会以为力量就是一切。这是生物链高端的猴王聚集理论，但这种方法聚集的能量十分有限。就像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多少力气，就会信服力气，成长之后，积累了人生的经验、智慧、道德，就会对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的看法，就知道真正的强大是有实力支撑的道德。

稻作农耕生产必须就是让很多的人聚在一起，而且是长时间的紧密聚集，因为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有时需要几代人。这种聚集是从家、家族、再到民族，服从整体、奉献整体。这种对

权威的尊重起源于家，家长在家里受到尊重。这种尊重是需要载体和形式的。比方，早晨起床，需要去给父母请安，家长不动筷子，一家人是不能端碗的，晚上是需要儿子去给父母暖被窝的。人在各自的特定的环境里形成各自的习惯，这种生活习惯转化为礼需要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就是以文化人。西周时期完成了这种从俗到礼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这才是中华文明的底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站到更高处来看中国之心，中国文化的心就是礼乐精神。

曾侯来到随州显然不仅仅是攫取财富，更重要的是实现西周王权对整个南方的影响，进而进行实质性的掌控。天地间最合理的秩序就是礼，天地间的最美好的声音就是乐。用礼乐来传播西周的文化是最智慧的选择。今天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曾侯用怎样隆重的礼仪来展现自己的高贵，但我们通过叶家山的葬制礼器的组合方式，可以看出曾侯遵从的是西周的礼器制度。从这些青铜礼器中，我们可以读出曾侯的礼乐精神。古人说：“藏礼于器”就是这个道理。礼器就是行礼所用的器具，没有器物礼无法表达。礼器怎样组合，何种礼器在什么样的场合行什么样的礼，体现着尊卑的不同。比如，觚为君之尊，而鬯就是臣所用，不能混同。贵族传统的礼仪是一丝不苟的。许多人觉得礼仪多繁琐，叫人不自在啊。你真的这样想，你就把自己的格降底了，降为庶人。“礼不下庶人”有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的意思。但这句话更多的意思是平民身份，就可以将自己排除於文明社会之外。礼仪需要成本，所以因为成本的原因，许多礼仪，庶人是没有条件去执行的。

但不是说有了钱财就可以执行礼仪，因为他首先必须懂得礼

仪。就像我们随州有个老板在迪拜8万块钱住一晚，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嘲笑有钱就应该像他一样会生活。内心贫乏的人精神世界不一定很丰富。因为他不知道这里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他更不知道阿拉伯半岛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是世界三大文明的发源地，他不知道就感觉不到就不可能领会文化的美妙、也就享受不了，最多是肉体快活一下。没有文化能力体味文化的精妙，就不会有精神参与，也不可能真正的愉悦欢快。那么他到了这种文化厚重的地方，最多是到红灯区或者疯狂购物。我知道自己物质上不富裕，但并不仇恨富裕，我只想告诉一个人富裕只是物质上到得满足，一个人高贵必须精神上丰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的存在，动物只知道物质上满足就够了，有精神追求才能成为人，富裕以后就应该追求贵，真正的富贵才是一个人。

所谓无知者无畏，就好比说，随州文化的深厚，因为不知道，就敢指手画脚。这实际上这是教育的缺失。随州的学校，什么时候讲授过随州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自己摧毁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礼仪。连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只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吃人”两个字。礼仪确实有缺失，但无论有多少缺失，它都是文明的表现；就如文明无论有多少弊端，也要比野蛮好。

礼乐精神的基础就是感恩和敬畏。父母不动筷子，自己不端碗，就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源于他们。无视他们的存在，与禽兽何异？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最重要标志。有人说：文化的核心是爱。不错，但这种爱用礼来表达时，才是文化，才是高贵。比方，动物也有爱，但动物不会选择唯一的配偶，也不会为爱自己的配偶去举行婚礼，甚至还会父子聚麀。然而唯有人类把自己对配偶的爱转化为敬，不厌其烦地去操办一道又一道礼仪程序，

只有这样才是对配偶的尊和敬。

曾侯在叶家山家族墓葬的所有葬制遵循西周模式，这就是继承祖制，这就是一种感恩和敬畏。把祖先创立的这种人生方式向更广阔的地域、更众多的人群传播，就是更高层次的一种感恩和敬畏。只有这时，曾侯的礼乐才会成为一种自觉，因为这是曾侯来到随州的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周王朝从殷商灭亡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感到了政治首先是一种责任，所以周公亲自制礼作乐，目的在于用礼乐规范人心，实现真正的一统。“统”的文字学意义就是一大把丝线的线头束在一起，成一个总线头。总线头形成后，人们就直接和总线头打交道，否则，就是面对一团乱麻。“统”由此引申出“始”的意思。“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就是说正月是一年的开局，是把握统率一年的关键时间。所以《春秋》有“王正月”之说。就是用王道来统率天下的秩序。什么是王道？就是礼乐征伐。“礼乐是政治”、“征伐是实力”。

用今天的话说：讲政治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应该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实施“德政”的起始，也是古代中国真正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为政得失要看人民的反应，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要进步，就要自觉地抑制自身的动物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应该归结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人从动物中能脱颖而出，能保持对自然界的优势，就在于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生物性，去自觉地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修养。用礼乐来培育人的健康情感，创造出一个有别于殷商的人本主义社会，可以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同时推行各种形式的礼。从此，礼乐文化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根本。这种传播不是武力，而是文化自身的力量。

可以想象，曾侯在随州这片土地上进行日月星辰的祭祀。曾

侯乃诸侯之国，没有资格祭天。祭天是国家最重大的典礼，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诸侯只能祭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附丽于天，日月乃天之明，星辰指“五维”、“十二辰”、“二十八宿”，在古人眼里，这日月星辰是与民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天体。

曾侯沐浴更衣，沐浴是一种隆重的礼仪。沐浴斋戒更衣以祀上天，更衣，换上庄重的深色祭服，体现是“依”，“依”是一人一衣，有所依托的意思。更衣就是寻找依托，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曾侯是诸侯，身着诸侯黼，这是黑白斧型的祭服。随行人穿大夫黻，这是黑青相次亚型祭服。还有更多的人着玄衣纁裳，这是士祭祀时穿的服装。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样的服装有明确的规矩。诸侯祭祀时舞者为六佾，也就是四十八个人，不得超过；钟磬为三肆，摆放在东、西、北三方。隆重的仪式之后，钟磬和奏、载歌载舞，点燃堆积的薪柴，经过肢解的全牲在烈火中发出“啪啪”的声响，扑鼻的香气随着冉冉升起的浓烟上闻于天。这种日月星辰的“实柴”之祀，场面宏大、惊心动魄，令人震撼。亲历过这样一场祭祀，不用说什么，就知道了什么是高贵。

曾侯的举手投足都有着规范的程序，这每个规定动作都有深刻的内涵。比方天子巡视诸侯境内时，诸侯侍奉天子就如天子侍奉天，天子就是诸侯的天。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守。聘：从耳，从粤。粤从由从亏。“由”意为“滑行”、“过渡”，“亏”意为“磨难”、“折磨”，“由”和“亏”成上下结构就表示磨难折磨过程，“耳”与“粤”联合起来表示“我说这个磨难过程你听”。用今天的话说：诸侯每年要到天子那里去汇报，三年要进行一次考核检验，每五年天子要对诸侯的领地进行视察。天子在诸侯的领地巡守，

一食告饱，诸侯再食、大夫三食。一食就是只吃一口。尊者是以德为饱，不以食味为重，诸侯大夫的德行递降，食数就递增。礼仪有时以繁复为庄重，表示礼数的高低；有时以简洁明了为虔诚，以素为贵。这就是“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比方天子祭天用的木车几乎不加装饰。礼仪的制定，是以人文精神为根据，以思想内涵为依托，传递出尊与敬的情怀。

我从叶家山曾侯的众多礼器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因此想到我们今天对礼仪的淡忘，觉得海外华人和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对礼的保存比我们自觉。1993年，中国首届炎帝神农节时，我作为专业文化工作者向来宾介绍炎帝神农文化。那天，我精心挑了一件“梦特娇”的体恤衫，那是我价格最贵的一件衣服。走进会场，我看到所有来宾都穿着正装，我就有些坐不住了。当时天很热，来宾大汗淋漓，湿透衣背，但没有一个人解领带。这时，我才知道礼和敬必须有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我当时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这件事不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礼和敬，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家的礼延伸到族时，族就存在了，再扩大延伸，就有了国家。周礼就因为曾侯言行举止被随州的民众认同并接受，因为任何普通平凡的人，都崇拜文雅高贵，有向往就会学习，深入人心就会践行。今天讲文化建设，其实就是讲人心建设，要让民众看到、相信、接受，并逐步参入产生记忆，有了记忆就会有情怀。他就跟随、拥护这个高贵的集团走向一种伟大崇高的境界。随州是中国南北的一条通道，姬姓曾侯能让西周文化在这里深入人心，就必然影响广大的荆楚蛮荒之地。《礼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就是说天笼罩大地，哺育万物，这是人类生命之源。人类要和天地共存，就要顺应天道。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

明，真正灭绝于种族屠杀的民族并不多，而因为文化消亡带来的民族消失却不胜枚举。

因为工作原因，能多次接触叶家山曾侯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亲手摩挲，虽在地下几千年，但仍然有一种热热的温度，感到了它曾经温暖过人类世界，今天它出土依然可以让世界文明有滚烫的温度。想到全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女士的话：“3000多年前，随州有这么精美的青铜礼器，就一定有很高的品质和质量的礼乐文化精神。什么也不要说了，这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人类世界到处都是一片蛮荒，只有很少的几处有那么些微微的亮光。看一看随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充满了骄傲和自信。”

历史文献中，虽没有曾侯的记载，但有几处随侯的记载。印证了礼乐文化在这片土地已经深深扎根，而且枝繁叶茂。《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乃盟而还。”这段历史出了中国信史中的第一位叫季梁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精神品格孕育了后世的诸子百家，他们构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文化因为有这样一个士族群体才有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

《史记·楚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它说“楚伐随。”我觉得这样的史观是不符合礼乐精神的。历史是由历史真相和历史观构成的，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正确的史观。细节的真实可靠，不加任何描述的历史真相。齐太史“崔杼弑庄公”五个字就叙述了历史真相，也蕴含着正确的历史观，这个“弑”字就是以下犯上，是臣杀君、子杀父母。《史记》的这个“伐”字就说明了楚挑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我觉得这种历史观是值得商榷的。楚武王刚刚完成了氏族制度向国家机关的转化，就渴望政治地位的变

化发动了侵随的战争。就好像今天的一些人口袋里装了几个钱，就觉得天下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全没想想这钱是怎么来的，是否应该感恩和敬畏。《史记》虽然有这个字的瑕疵，也难掩作为经典的不朽。但台湾的教科书编撰者把日本殖民台湾的时代称为“日治”时代，这个“治”就具有合法性，就是对治理者的认同和尊重，这种史观就是对民族身份的背叛。这个字的运用就是有点别有用心了。

另一处就是《左传·定公四年》，随侯用一城的安危，来践行先祖对楚王的盟约。这是昭王奔随的故事，伍子胥为报家仇率吴军攻陷了郢都，掘墓鞭尸，又追赶楚昭王，而围住了随城喊话：“周王姬姓封在汉水之东的诸侯，楚国全都灭了他们。现在上天垂示天意，惩罚楚国，楚的国君却被随侯藏匿起来。随侯是周的子孙，你要报答周王的恩惠，替那些被灭亡的姬姓诸侯小国复仇，这是天的旨意。如果您交出了楚昭王，汉水以东的土地，您就可以享用。”

以相当优厚的条件来引诱，随侯不仅不为利益所动，而且还以一城的安危为代价，站在城头，对气势汹汹的吴军说，随国虽小，但我有姬姓周王高贵的血统。我与楚国世代都有盟约。这个盟约我们从没有改过。今天楚有危难，我们就抛弃他，我怎么代表周天子教化天下。

季梁“民为神主”的思想，是西周“敬天保民”思想的延续。敬天就是敬民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政治要“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这就是说国家要生存，必须致力农时、修明教化，亲近自己的族人，利用血缘关系，巩固国家的政治。这样，国家就和睦，民众就安居乐业，民富国就强。他的这些治国思想不仅为随国的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为后世

的儒家治国输送了滋润和濡养。“亲兄弟之国”是随国能在强秦雄楚的夹缝中生存的重要策略。汉水之东有大量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这些小国为了生存朝秦暮楚，但随国对他们一概采用友好的策略。关于这个问题，历史文献少有记载，但考古发现却证明“亲兄弟之国”乃随国的基本国策，随国周边小国出土的随国聘媵的青铜重器。显然，这不是随灭他国的证据，而是随“亲兄弟之国”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材料。“昭王奔随”随侯面对强敌，不受小利迷惑引诱，信守200年定下的盟约，这种重诺守信的行为是曾侯贵族人格品质的具体体现，这才是这个贵族能长寿的重要的文化基因。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让人类世界震惊、惊讶，很多人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对古代中国音乐的认识。它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因为轻轻地撞击它，它的声音就是天籁，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国势衰微，列强入侵，智者思考，把这种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对其进行了百年的讨伐，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思索，却不尽然。好比文弱书生被人打了，就不该去读书。觉得应该去练武艺，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强人。显然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只有身和心的强健，才是真正的高贵。

擂鼓墩二号墓中的“九鼎八簋”的出土，显然是一种僭越。这种僭越说明曾侯贵族的礼乐精神已经丧失。僭越是失礼，是下级使用了上级才能使用的礼，乱了尊卑长幼秩序。礼坏乐崩，周公创立的规矩被破坏了，失礼的行为越来越多，直接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季氏享用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其实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认为自己有力量，就应该和长房的子孙平

起平坐。西周分封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嫡长子是第二代的天子，是为大宗。其母弟及庶兄弟只能为诸侯，是为小宗，亦称别宗。很多人以为辈分长就是族中的权威，其实这是没弄懂宗法制度。这是一种嫡长子继承法。祭祀只能是长子长孙担任主祭，因为只有他才是告慰先祖最合适的人选，他往那里一站，辈分越晚，说明世代代数越多，就表示祖先创立的基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种嫡长制避免了王室贵族的争论，抑止了兄弟的争执，为贵族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乐精神的丧失，其实就离亡国不远了。因为这个人的高贵灵魂已经死去，他虽然活着，最多也只是行尸走肉。公元前290年前后，高贵的姬姓随侯就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这个世界没有万世一贯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营养、历久弥新，持续地影响民族的精神面貌。令人惭愧的是民族文化的礼乐精神在悄然流逝。交往中语言优雅、举止高贵的人日渐稀少。人生中最重要婚礼，也开始失去民族特性。圣诞节、情人节被青年人所喜爱，因为他们不知道本民族还有比这些更高贵的礼乐文化。青年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他们有什么样的灵魂，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品质和质量。随着曾侯贵族的青铜礼器越来越多地在随州出土，这个贵族兴衰的规律中，我们会体味出，这个贵族长寿的文化基因就是他的礼乐精神。

永远的安居

地域文化的载体、特定文化的象征就是地名。最牵动我的故乡情怀的就是随州的地名。人有了生命就开始有自己的名字，一个地方和人一样，有了生命的活力，就会有自己的名字，这就是生命的起始。这个名字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有它自己地域特征，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更具有相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深厚的文化。随州有万福、万和、安居这些充满文化气息的地名，就让随州这片土地有了凝聚力、亲和力，叫人难以忘怀的情韵。

中国叫安居的地名可能有很多，但将来能走进中国文化史的，就只能是随州安居镇。2007年11月，安居镇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对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动。武汉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少华教授说用一个不太夸张的名词来讲：这个发现是震惊历史学界、震惊世界。这话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太夸张了，但历史学家觉得，历史就是自己的生命，历史的一次发现，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的品质和质量。羊子山4号墓出土27件噩国青铜器，这批弥足珍贵的青铜器，14件上面带有铭文。实际上，早在1958年，羊子山出土了噩侯的一簋一尊，现藏上海博物馆。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了一件铭为“噩侯弟厂季觶”的青铜器。1976年，羊子山出土一件噩侯的青铜单鬲尊。羊子山

屡现噩侯重器，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噩侯，其封地就在安居。

“噩”如何演变成为“鄂”？武汉大学的罗运环教授从清华简的解读中得知有“填湖后成为陆地”的意思，安居就是一个以冲积平原为主体的地方。鄂今天是湖北省的简称，就是从这个冲积平原开始的。青铜器的特征、器型、花纹、铭文等信息告诉我们，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的康昭年间（周康王公元前1021年—公元前996年、周昭王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墓主人应是西周早期偏晚的噩国国君。

噩侯，姁姓贵族。是黄帝的嫡传子孙。《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西、祁、己、滕、葳、任、荀、僖、姁、儁、依’是也。”文献资料记载：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有功德的14个就得到黄帝亲赐的姓氏，姁姓就是黄帝亲赐的12姓中的一姓。既是黄帝的血脉，当然来自黄河流域。这羊子山4号墓的文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融合。中国如果没有黄河流域是不能成为中国的，而没有长江流域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中国南北最早的融合应该是在炎黄时代，黄河流域的轩辕黄帝粟作种植属旱作粗放农耕，需要广博的地域，他必然跨越秦岭寻找更大的空间。长江流域的炎帝神农拼死守卫几代人努力才能形成的良田，就必然有巨大的冲突。历史文献记载这场炎黄之战“血流漂杵”。这四个字把惊天动地、撕肝裂胆、血肉横飞、尸陈沃野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炎黄看到这种惨烈就开始思考，希望能找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对方的共生共荣的双赢局面的方法。

民间传说是远古历史传承的一种活体遗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炎帝神农故里有关于炎黄融合的民间传说。传说的大意是，炎黄之战，相持不下，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为自己的部族不再牺牲，接受了黄帝的封号，为南方的天帝，真心实意拥护黄帝为中央天帝，为显示自己诚意，就把自己的故土更名为“随”。

这个传说应该蕴含着历史的真实，中国最大的融合应该就是黄河与长江两大区域融合。炎帝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当两个人都代表着正义和高贵的时候，只有走到一起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炎黄融合之后的中国从此成为一个整体，虽然炎帝的部族蚩尤和刑天都反过黄帝，但炎帝神农却从那融合之后就再没有和黄帝部落发生过冲突。“随”这个地名其实就是中国南北融合的符号，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典范。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还有分裂意识和倾向的今天，“随”作为中国成为一个整体的文字符号具有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意义。

安徽有一个村庄叫作“鞭打芦花车牛返”，这么长的村名为中国所独有。说的是一个姓闵的人带着两个儿子赶着牛车走到这里，车歪了一下，大儿下车扶车，恰巧父亲的鞭子抽到他身上，芦花飞出，原是后母偏心竟以芦花为棉做袄。闵者立刻返车回家休妻。这故事是民间传说，而且不只一次地听过。后来在戏剧工作室任职时，看过京剧《芦花记》才知道这个传说被改成春秋贤士闵损，其继母偏爱亲生而疏闵损。闵损随父赴宴，在席前露寒粟状。及归，父责其故意造作出丑人前，以鞭笞之。不意衣破芦花飞，其父乃悟，怒遣继母，并欲休妻。闵损哀告，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语劝阻。继母愧悔，遂改过善视闵损。安徽

的这个村名就是这个民间传说的发源地。一看这个地名，就想到了那个民间传说，也想到了京剧《芦花记》，更感觉到了中国家庭的爱和善良。

一听到随州安居这个地名，就想到中国南北融合的那个谷型玄牝之地的正中心，有一个十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安居地处大洪山与桐柏山相峙而形成的谷地的中心，是涑水与澁水交汇的地方。涑水是府河的上游，是湖北省境内唯一的一条境内河，它汇于汉江后再注入长江。地形是破碎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因为它处于玄牝之型的“随枣走廊”的正中心，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羊子山四号墓的文物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是黄帝的嫡传子孙“媯”姓贵族噩侯西周康昭年间生活在随州安居。这就必然引发人们的极大兴趣，寻找噩侯在随州的前因后果，尽可能拼出完整的历史。《战国策》、《史记》中都记载“西伯昌、九侯、噩侯为三公”。

《殷本纪》中有一段记载更为详实：“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噩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

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她不喜淫荡，纣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噩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西伯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这一段话说明媯姓噩侯在商王朝的具有很显赫的地位，也是具有声望和势力的贵族。

真正的贵族不仅仅是有奢华的生活，更有高贵的灵魂，噩侯

面对商纣王的荒淫，敢于争辩，明知会有很大的凶险，还去与商纣王理论，除了自己高贵的血统、正直的品性，还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和支撑自己说话的经济实力。脯刑是古代的非常残酷的刑罚，就是把犯罪者杀死后晒成肉干。忠心耿耿的噩侯认为纣王不应该醢九侯。醢刑也称菹醢，也是古代的一种酷刑，指将尸体剁成肉酱。一代忠良就这样惨死在商王朝的殿堂之上。《左传》宣公三年曰：“姬、媯耦，其子孙必蕃。”说明姬、媯两姓早已联姻。西伯昌，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闻见此事，只是暗暗叹息了一下。就被崇侯虎告发，西伯就被纣王囚禁在羑里。西伯的僚臣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王，商纣才释放了西伯昌。

商王朝的灭亡，应该与这一段黑暗的历史密切相关。后世的出土文物证明三公间有良好的关系，噩侯与姬姓曾侯相邻而居，曾侯墓中有九侯的女子为夫人。

噩侯被纣王脯之后，高贵的噩侯族人往何处去，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作为忠良之后的噩侯族人肯定受到了朝中正直之士的关爱和照顾。西伯昌就应该是充满爱和善良的正直之人，不然，他不会叹息。虽然他被囚禁羑里，他会指示自己的部族，好好照顾九侯、噩侯的族人。他们从京都（安阳）出发，进入南（阳）襄（阳）盆地，穿过随枣走廊，护送噩侯族人南迁随州安居的队伍里，就应该有姬姓的曾侯。叶家山一号墓中出土文物中有日干命名的器物，说明曾侯在西周还没有获得政权之前就在随州的涇水和漂水地区存在，曾侯墓中曾侯谏夫人为隗姓。九侯的姓氏就是隗姓，姬姓与九侯贵族的联姻，说明姬姓是真正的具有博大胸怀的贵族，姬姓曾侯与噩侯相邻而居，姬姓与九侯贵族后裔的联姻，不仅为姬姓贵族赢得了关照忠良之后的好名声，还团结和聚

集了反商纣的力量。

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铭文中：“在曾、噩师。”昭王南征时，把王师驻扎在噩国，说明西周与噩的关系很亲密。北宋时期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也记录了“在曾噩师”。这一系列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曾、噩两个诸侯国是西周早期分封的很重要的，而且是王朝可以信赖的。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段历史真实作出这样的判断：商代末年，九侯、噩侯被商纣王残暴地杀害，西伯昌被囚禁。噩侯的族人在姬姓贵族的护送下，南下来到随枣走廊的中心地带。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宜于耕作和居住，也远离凶残的王权，就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护送噩侯的姬姓族人也是为了姬姓贵族在南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基础，在沮水的另一条支流的交汇处定居下来。应该说随州这片充满爱和善良的土地，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忠良之人。

人类文明起源于爱和善良，当姬姓贵族给了别人爱和善良，就必然收获敬畏和感恩。如果爱和善良与敬畏和感恩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就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纣王鹿台自焚之后，西周从商灭亡的教训中得到启示，王权的长治久安，在人不在天。商纣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他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的德行太差，因而制造了很多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殷商王朝的覆灭。所以周公亲自制定周礼，希望把爱和善良作为立国之本。后世的孔夫子认为：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就是克制自己身上的动物性特征恢复维系社会稳定的西周的礼仪文明。

噩侯因为受到了姬姓贵族的恩惠，在周武王反商纣的战争中，应该提供过强有力的支持，这其实是良心使然。商周是青铜

时代，铜矿资源就成了国家的第一战略物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铜矿的主要分布地。噩侯通过随枣走廊为西周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因此获得了分封。西周在分封异姓王的同时，又对血缘关系较远的噩侯不是那么很放心，随枣走廊这条连接荆楚的通道有着太重要的地位，分封自己的近亲曾侯在这里，对南方的诸侯进行掌控，进而对整个南方蛮夷苗地区实施礼乐教化。

中国文化理性化的特征从这时起开始显现，文明的进步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爱和善良。真正的安居乐业不完全是适宜人居住的自然条件，还必须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敬畏和感恩，自己的幸福从哪里来，怎样去报答这种爱和善良。这实际上是生存、发展的道理。真正的文明是一种大爱和善良，这种大爱和善良体现在感恩。

有两种人很容易忘记感恩，就是权力和财富的获得者。这些人把获得权力和财富作为人生目标，一旦获得其心态就会变异。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人，不知道人作为最有灵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命存在就是要追求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这就是过高尚的精神生活。人的真正幸福不在你有多大权力、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懂得感恩。要养成一种习惯，自觉地把爱和善良回报给这个社会。

有位哲人说：“我应该，所以我能够。”这是具有强烈道德力量的话。但这句话好说却难以做到。前几天开会的时候，有个领导同志坐在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他旁边坐的是人大副主任，再就是我。因为排与排距离很窄，这个同志站起来时就把自己坐的凳子推动桌子下面，以让里面的同志出来方便一些。这不是作秀，就是给他人的一种方便，这是一种下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中体现的就是一种爱和善良。两人谈话的时候突然来了电话，接电

话前，轻轻地说一句：“对不起，我接个电话。”这就是体现自己对别人的尊重，这就是一种爱和善良。做这些爱和善良的小事，谁都应该，谁都能够。然而，我们往往难以真正做到。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巨大成功，如果爱和善良的因素缺失了，多大的成功也是一种私欲的暂时满足。

真正的安居乐业应该就是这种爱和善良，不一定是肥沃的土地和碗里的大块肥肉。就是有了这些，也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爱和善良不能通过血缘传递，需要一种很好的环境培养。俗话说：一代贵族需要三代人培养。其实就是说明真正的精神贵族是需要用几代人的心血培养的。生命的形成是物质的奇妙组合，高级生命之所以高级，是因为他能够获得物质能量，还知道去获得精神能量。只晓得获得物质能量的生命，就永远是动物，物质能量只能延续和复制生命，唯有精神能量能让生命延续中得以发展。占据安居的噩侯，就忽视了这种精神的传递，虽然有随枣走廊中心位置的好地方，但贪欲的膨胀会让人失去理性。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也很重视噩国，亲赐噩侯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青铜宝器来作纪念。

噩侯得到周王的恩宠，如果知道感恩，就会兢兢业业地支持西周王朝。但噩侯觉得周王室日渐衰弱，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就联合南淮夷、东夷叛周。随州有一句土话叫“不服周”，就是反叛西周的一种历史记忆。从宋代和1942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噩国青铜器《禹鼎》铭文的记载证实，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活动，声势是很大的。他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

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的语调，发出“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推测，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一师约为2500人。

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好获胜，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周王发出这样的指令，说明西周王朝对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的危害程度的认识很深刻，平定叛乱的决心和意志十分坚定。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噩国的老老小小也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被斩尽杀绝，噩国从此灭亡。

安居这样一片肥沃的土地，不可能搬到京城，周王很自然并入了与自己血缘关系很近的曾侯。在汉水之东的姬姓诸侯国中，曾侯的地位越来越显要。这就是历史文献上说的：“汉东之国随为大。”

深知礼乐精神的曾侯，是否明白人间的安居乐业，不在土地的饶薄与肥沃，而在人心的仁爱 and 善良？从公元前706年，随国诞生了一代圣贤季梁来看，这片土地在缓缓地累积着仁爱 and 善良，当这大德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一定照耀出辉煌的历史。

安居这片土地有太多太多的仁爱 and 善良，这才是这片土地的生命活力之所在。这片土地的主人只要激活了这些元素，这里一定是人间的首善之地，是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安居是一个具备

生命能量的地名，在随枣走廊玄牝之型谷地中心，自然条件是比较优越的。这种优越是上苍赐予人类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天地的厚爱，就会产生敬畏与感恩。一个地方具备很好的自然条件，只是有生命能量的外在条件，一个地方自然条件再好，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强健，不可能成为人生的福地。就像一个人仅仅是有了钱、有了力量，就有了人格的质量和品质，没有钱、没有力量就没有质量和品质？当这个地方的爱和善良经过聚集能重新迸发出来时，这里一定具有了生命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一种高品质高质量。这里就真正成为了“永远的安居”。

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

2012年5月29日，喜雨天降，久旱的随州普降甘霖。省委省政府也为随州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小气候，省委书记李鸿忠笑着说：“下了一场毛毛雨。”

这场“毛毛雨”叫我难以忘怀。按说早已过了宠辱不惊的年纪，这“毛毛雨”与一个文化人何干？李鸿忠同志说：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比黄帝还要早的先人。我们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炎放在黄之前，说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秋万代的福荫。现在就要看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能不能把对祖先的祭祀做好做诚，把炎帝神农文化做深做细做精。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是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谒祖圣地”是文化的旗帜，要固化、亮化、强化，增强其彰显力、凝聚力、吸引力。这是湖北省的省级战略，由随州来具体实施，是省级支持，随州主导。这是随州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是历史性的责任。

作为一个很普通的领导干部，我不知道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要了什么，但新闻报道称，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送来“大礼包”。李鸿忠是东北人，他说随州是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东北话说是“老疙瘩”，就是最小的么儿子，怎么偏爱都不过分。他表示随州提出的要求，省委省政府“照单全收”。他亲切地说：同志们要把省委省政府的这种倾力、全力的支持，化为

抓好各项工作的动力。

说实话，我觉得这是随州文化的一场甘霖。它滋润和濡养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道德和核心价值体系。民族是无数个体生命集合的共同体。人区别于动物，不仅仅是人聪明，而在于人能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这就是说人不光要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精神价值，对精神价值的渴望和追求，就是人的灵魂。这是人与所有生命之间的最本质区别。

中华民族就是生活繁衍在中华大地有精神价值渴望和追求的群体。历经5000年沧桑而延绵不坠，起伏跌宕而薪火相传，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凝聚和固化为稳定的结构，具有一种遗传的历史性，在传递的过程中又不断揉进鲜活的时代因子。这种精神价值的渴望和追求，诞生于最适合它自身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被全民族的成员理解并承认，从而成为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

这种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能够陶铸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使其在言行和思想深处自觉地符合它的规范和要求，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一种最具活力的内容，时时刻刻奔突在这个民族每个成员的血脉里，经过历史的积淀、延续，传承下来，成为这个民族继承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中华民族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理解并共同接受的思想源泉就是炎帝神农文化。

中华民族是人类民族中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也是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更是渴望和追求继续对人类文明创造的民族。这种继续贡献就是为人类寻找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

的，也就是全人类共有的群体价值。实现人类精神上的提升，这就是“救世”、“救人类”。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不容置疑的共识。

我们把这种“救世”表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诞生的那个时刻就有一种强烈的“救世”基因，它始终沉积在这个民族的血脉中，成为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今天的人类社会最渴望和追求的就是“救世”。中华民族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救世”。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不管是哪个阶级，还是哪个利益集团，和代表阶级的政党，无论在过去的生活中有多么激烈的冲突，在对抗中累积了多少恩怨，有多么不同的政治歧见，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协商实现民族的复兴大业。

人类最高的“救世”智慧来源于炎帝神农。尽管人类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中东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下游、中国的长江黄河、南亚的恒河发生。中国文明虽然不算最早，但惟有中国的先祖炎帝神农创造的文明生生不息，以海纳百川、吞吐八荒的气概化解了无数次危机，以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维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发展之道得益于自己先祖的“救世”智慧。世界华人来到先祖炎帝神农故里拜谒自己的先祖，就是从先祖那里获得这种生存发展的智慧。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依据自己的能量所决定的。

生命起源于宇宙能量的聚合与耗散，这种聚合与耗散就是阴阳转换的节奏。动物与植物是生命，人类也是生命，民族当然也

是生命。那么生命的发生发展就必须遵循这种转换节奏的规律进行。在中华民族的语境里，宇宙就是时空的结合。《易经》里说：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间有一种神圣、崇高、庄严的秩序。人只是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遵循这种秩序，要万般依赖于它，才能生存发展，宇宙可以不要人，但人不能须臾离开这种秩序。

天的道理，就是周行循环。太阳东起西落，极星四季变化，地的规则，沉着稳定，人就是按照天地的道理规则生存发展。我们称这三者为天道、地道和人为“三才”。不要以为这“三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逆天而行。到了该睡的时候不睡，到了工作的时候却死睡，到了播种的时候抛荒。明明知道地形气候是一个民族赖以诞生、发育的根本，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却把这种诞生、发育之根本东挪西移。

炎帝神农只能诞生于最适合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这是天地给他的选择。他只能选择一个可以躲避狂风暴雨的地方，一个可以抵挡骄阳烈日的地方，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交汇融合的湖北随州。我们难以想象，没有长江流域的中国可以说成是中国，没有黄河流域的中国可以叫做中国。唯有一个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挽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中国上生存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

随州就是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复杂多变，神秘莫测，观瞻丰富的一个丘陵所在。这里千岩万壑，百溪争流，这种地势是聚合与耗散宇宙深处能量最佳之处。这种地形得益地球板块的碰撞。地球板块的碰撞其实就是宇宙深处能量的聚合与耗散。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就造成了中国秦岭山脉的隆起。大板块

中又有小板块，华北板块与杨子板块的碰撞，就让中国中部的两个最重要的盆块边缘隆起了一座山。这座山无宗无脉矗立在南（阳）襄（阳）盆地与汉江盆地的交接处。好像是从天而落的一座山。

最古老的“随”字就是一座山从天而落。这座山最早的名字叫陨山，它的写法是一个“阜”和一个坠落而下的“人”，就表示从天而落的一座山。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它的主峰海拔高度只有1055米。它是丘陵地貌，丘陵地形才是中华民族初生时最重要的推动力。一座山从天而落的“陨山”转化成“随”字就是中华文明一则宏大的隐喻，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心灵的归宿，更是中国丘陵思维的产床。因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只能从自己生存的丘陵环境中才能吸收到浩然丰赡的灵气，成就千姿百态、斑驳陆离的思维。

丘陵的神妙氤氲，不是人难以到达的高山大川，但人又离不开山川与河流。中国的初民只能选择这些低山小河而居。中国的学问就起源于这些丘陵。因为真正的学问就是人类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沉浸于丘陵。于是就有山南水北、阴阳八卦，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低山丘陵的学问。

这座从天而落的山，开始叫陨山，因为植被丰富在先秦叫绿林山，山中有大湖，唐宋时期又叫大湖山，丰沛的降雨导致洪水发生后来才被称为今天的大洪山。与这座山遥遥相对的是桐柏山，属秦岭的余脉，它的主峰海拔高度为1140米。两道山脉之间就是千岩万壑、万溪争流的美景。两山相望，中间是层峦叠嶂，曲径通幽的可供人类栖居的地貌。这就必然为一个民族的先民提

供筭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创造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中国南北荆楚与中原相通的一条狭长通道，被人们称为随枣走廊。所以古人说随州是“汉襄咽喉”、“豫鄂通道”，就是说这里的重要。

这条狭长的随枣走廊约一万平方公里，其间是大量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有着天下最为丰厚的生产力。这里既可以生长千姿百态的大山灌木乔木，也可以生长可供动物生命食用的五谷杂粮。其间有30公里以上长度的大小河流109条，构成一条完美的水系。这就是千山百水的沮水流域。这里的山水就弥漫着一种神圣、崇高、庄严的秩序。这里可以深刻地把宇宙深处的能量进行转换。沮水流域丰富多变的丘陵是绿色植物的生产者。绿色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水及太阳的光辉。然后把二氧化碳、水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葡萄糖，氧作为一种副产品被释放出来，正是由于随州的山水太适合这种转化，就有了最纯正的绿色，最净洁的流水，最浓郁的氧气。这就是说，偌大的中国，随州才真正有天地的正气！

中国有一部被称为“万经之王”的神圣宝典，它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认为随州的这种地形地貌为“玄牝之地”。这本书叫《道德经》。这本书在第六章里这样写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是最初始、最微妙的生殖器官。这就是说，空荡荡的山谷是生养万物的地方。随枣走廊就是生养中华民族的牝门！

中华文明诞生于千变万化的丘陵，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大丘陵中充满着各种形式的小丘陵，形成一种递归的特征。这种递归结构必然产生中国的个体递归家庭，家庭递归国家。中国的

家、国、民族、天下是可以的。这种互换就是这种丘陵地形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中华民族的发生就隐藏在千变万化的随州丘陵地貌的山水之中。拜谒自己的祖先就是寻找中华文明萌发的根源！

炎帝神农的核心就是“救世”

炎帝神农不是一个生物学过程的生命。只要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先祖生活在一个极为恶劣的环境，他们面对狂风暴雨无以遮蔽，头顶烈日骄阳无以抵挡，缺衣少食的现实无可逃避，生离死别的痛苦天天都在发生，野兽侵扰的威胁日日都会出现。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炎黄传说时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20.3岁—20.8岁（《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卷）。

然而，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祖都在寻找一个高于生命自身的目的，他们渴望和追求活着的意义。这就是高于个体生命的群体价值。这种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活得更好。这就是“救世”。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升华。这种升华就让人从动物界脱离开来。我们说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人有灵魂。人不光要活着，还要追求一种比活着更为高尚的意义。人内在的这种精神渴望和追求就是灵魂。精神价值是一种最纯粹的形而上的存在。它是对肉体存在毫无一点益处的渴望和追求。人如果能站在100年以上的高度看自己，肉体生命回归自然，什么也没有。但人有了一种高于肉体生命的“救世”的渴望和追求，就会有神性，这就是灵魂。这种神性的灵魂处于万物之上的一种高端的地位，他会超脱于肉体永恒。无数生活在远古的先祖高贵的灵魂聚集成一个让我们敬仰

崇拜的名字——炎帝神农。

随枣走廊就是玄牝之门，它是母亲的母亲。中华民族从这个出口而来，拜谒炎帝神圣，就是重新进入这个伟大的入口。面对炎帝神农圣像，我们会感受到先祖“救世”的渴望和追求，先祖的灵魂就会和我们的心灵对话。这种对话就是灵魂与灵魂的交流，我们的精神就会得以提升。这里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如果获得灵魂，等于获得新生。随州无数天地山水是生养先祖的父母，感受随州的山水就是感受圣母玄德。古人说：生生为大德。圣母玄德就是生！

生生大德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人是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是宇宙深处能量的奇妙组合。这种奇妙但包含着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灵魂的起源，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奥秘。对于个体生命来讲，生命是最珍贵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容易，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而且无论是谁，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敬畏自己的生命。所谓敬畏就是尊敬到生怕弄坏了的地步，再将心比心。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将心比心就是“慈”。“兹”是永恒当下之心，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珍惜，对别人的生命关爱。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生命，这太普通和平凡。为了名和利，也就是成功与财富，不惜去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到造成恶果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一个人不知道敬畏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的生命。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太多的偶然因素。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这个偶然的生命又必然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死比生更基本，生是短暂，死才是永恒。一个人只要失去生命，就再没有第二次机会。特别是人死后的虚无，更让人强烈地感到生的价值唯一无二，不可复制。

由此就必然引发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敬畏，必然渴望追寻一个比生更高意义的东西，这个渴望和追求过程就构成人类的精神领域，从而形成我们的精神世界。有精神追求的生活就让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具有神性的生命。这就是“救世”。这种“救世”首先拯救的是自己。

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当作生命存在，就渴望和追寻物欲的生活，再去追寻一种精神的存在，人就伟大和崇高起来。一个人有了对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并努力去实践这种追求，就会实现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于是，人与人之间就有伟大与渺小，优秀与平庸的区别。伟大和崇高，丰富和优秀，不在于物质，而在于内心。这就是“兹心”。慈爱的人就有慈爱的心。就会爱自己，爱一切。这是对生命的善良和同情。再将心比心，就会诱发对别人的善良和同情。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就是从善良和同情发端的。

我们的先哲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翻译成随州话就是看到了别人遭孽，心里不得过。这就是仁爱的发源。

西方的哲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由同情发展出了两类道德。消极的道德——正义，它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人的行为，积极的道德——仁慈，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人可以做，应该做生命。”这话有些啰嗦。用随州话说，你赚钱可以，不能损人。你为了赚钱，用地沟油，就没有基本的正义，也就是消极的道德就没有达到。只有你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才是积极的道德。

在5000年前后，也就是中国的新石器时期，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靠狩猎和采集已不能满足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人们从森林中走出来，从狩猎和采集转化为农耕，又必须大量采集食物。这

就是炎帝神农创五谷、尝百草的历史真实。人们面对饥饿，去采集各种可能充饥的植物，以什么来判断是否有毒，只能口尝。这一时期，炎帝神农尝百草是先祖们适应自然地一种进化选择，这是自然形成的。2011年，复旦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中国人基因组中有一种功能非常强的苦味基因TAS2R16，应当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尽管所有族群中都有这种基因，但检测世界上大多数人种的样本后，只有中国人的基因组中发现了很强功能的苦味基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先祖尝百草实有其事，这是中国人生存发展中的苦难进化在中国人身体中的遗存（相关资料来源于2012年5月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人身上的那种功能很强的TAS2R16苦味基因，其实就是中华文化苦旅的足迹，是苦难中磨炼出的精神在炎黄子孙身上的固化的标识。创五谷，尝百草就是先祖对自己生命的尊重珍惜，对部族生命的负责。这种尝百草有巨大的风险，谁来承担这种风险，一个把危险推给别人的人是不会受人敬重的，只有愿意承担的家长、族长，看到自己的子女和部族受着饥饿的煎熬，心里就难受。这就是生命对生命的同情，这就是恻隐之心。有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就会去救赎，这种救赎就是一种真正的“救世”。这种人类精神的升华，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活得更好。让自己的明天过的更好，让自己的子女过的更好，让自己的部族明天过的更好。这种责任大小决定了精神境界的高低。

一个人对别人的生命有同情心，首先是对自己的生命有很深切的感受，如果没有很深刻的感觉，必然对别人的生命冷漠。因为爱自己的生命从而体会到别人饥饿的痛苦，才能对别人的生命产生同情。平凡与伟大，其实就体现在许多细小的事上。伟大与崇高多半来自日常细行的积累和沉淀，日常言行和修养。

炎帝神农的许多故事都是一脸和善，两手粗糙的老农民对他生命尊重的日常琐事。他“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让更多的衣食得到了保障。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日遇七十毒（《淮南子》）”。炎帝神农艰难创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不可磨灭的足迹，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以往的历史流传下来。这些传说大多数是先祖创造功业的受惠者对自己先祖的回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赞颂，也朦胧地意味到，人类的文明进步需要后人必须继承的精神品质，因而神化了部落的首领为英雄的崇拜。马克思认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的英雄时代大约成形于战国时期。被称为三皇五帝。谁是三皇，多是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史记》作者司马迁认为五帝的事迹较为可信。而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炎帝有一场大融合战争。那么这说明炎黄氏是时代的部落首领。黄帝也是因为融合了炎帝才显赫起来的。古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今天史学界的共识是炎黄传说时代应在距今5000年前后。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下限不晚于龙山时代（即距今5500年—4500年间）（《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近年来，史前到文明形成通过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纠正了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观点。考古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元的，文明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从起源来说，必须看到若干地区的交互作用。这就是说，中国文明是在辽阔幅员之上的多民族

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

从长江地区的考古文化看，这里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而是相当先进的。所以众多的学者提出了中国的“两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之地。因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影响又相互融通。正好印证古史记载的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代表的南方和中原（《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

春秋早期展禽认为炎帝神农生在随州。展禽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展禽就是周公旦的子孙。展禽字获，食邑在柳下，谥号“惠”。因为柳下惠在城门里避风，见一女子寒冷，于是解衣相拥，有了坐怀不乱的故事，被孟子称为和圣。是故展、柳两姓尊其为始祖。孟子觉得展禽可以成为“万世之师”。一个人有高尚的道德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一个人精神上的丰富来源于自己孜孜的学习。一个人读一本书不能说有学问，但读一辈子的书，他身上一定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展禽是春秋早期少见的百岁老人。他的见解被后人推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随州地处长江之北，汉水之东，淮水之西。这三条河流是中国最重要的三条河流。中国的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其流域面积、长度、水量都占亚洲第一位，总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居住最早的地区之一。汉水则是中国最古老的河流，地质资料表明，在300万年至160万年前，青藏高原的三次抬升，长江以青藏高原的雄峰巨峦终年积雪为后盾，水势猛增，才成为一条泱泱巨川。而汉水则形成于七亿年前后的造山运动。汉水头枕秦岭，怀抱巴山，串联中国最重的汉中、南（阳）襄（阳）、江汉三大盆地，是汉民族的母亲河。淮河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

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某种延伸性和趋缓性，在很大程度上，它类似北方，但在许多方面，它又类似南方。或者说这是一条不南不北的河，又是一条又南又北的河，在北方，它叫淮河，在南方，它叫淮水。这三条江河给了炎帝神农巨大恩惠。一个民族呱呱坠地之时，最需要的就是天时地利的初乳丰富营养。所谓初乳就是母亲的初始乳汁。这是有丰富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的乳汁，它对出生的婴儿体质、抵御疾病、排除胎中毒素具有重要的功能。随州境内有两座高峰，就是洪山顶和太白顶。如果把随州比作丰腴的母亲，那么这两座高峰就是她坚挺的乳房。随州境内的地理气候、地貌和植被为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随州的天时地利为创五谷尝百草创造了足够的物质条件，必然孕育一个厚道、诚实、平和、坚毅、善良、丰富、高贵的农民。这就是随州炎帝神农风景区站立的身体壮实、和蔼慈祥、朴素温暖的先祖形象。这是一个历经沧桑、任劳任怨、健康快乐、幸福安详的普通人。因为普通，他的八大功绩都是为普通人而创立。吃饭、穿衣、住房、贸易等等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他的成功的外在条件就是随州的天时地利，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和追求形成的创造，是普通人都能享用到的，和创造同时产生的还有精神的信仰和道德。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上限是信仰，下限是道德。坚定的精神源于信仰，高尚的情操来源于道德。一个人有梦想，时时为实现这个梦奋斗，就是幸福。炎帝神农的梦就是让自己的部落有吃的穿的用的。为实现这个“救世”的梦想，随州的天地山水自然环境是他的必然选择。然而，外在条件再好，创造了再多的物质，不愿与人分享，就好比一个人有一坛子好酒，一个人独享，香吗？香。幸福吗？我看未必。只有很多

人去喝，都说香，而且对愿意让大家分享的人露出感谢的目光。这种波光流进主人的心里，估计，比一个人独自喝酒要幸福得多。这就是说，幸福也需要能力。

你需要有“救世”的渴望和追求，需要为“救世”去艰难地奋斗，你需要把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人分享。先祖炎帝神农做到了这些，他就是一个有幸福能力的人。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文化英雄

站在世界的高处，俯瞰人类的各种文明。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和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罗河文明、南亚恒河文明及南欧希腊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地域的广博。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的两河流域核心区域约10万余平方公里，尼罗河河谷地区，适合人类精耕细作的面积约为4万余平方公里，南亚的恒河宜耕地区也只有6万余平方公里。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充分依赖天地赐予的优厚条件，精心耕作有限的肥沃土地，创造出丰赡巍峨的人类文明，但终因区域的狭小，文明不能惠及更多的人群而消失。文明的光辉如果不能照彻人心，就必须牵引人走向迷惘。这些文明的周边地区是沙丘与荒漠。这些文明越是辉煌，越是让蛮荒黯淡。光辉与黑暗是不能交融的。人类的种族群落在生态方面如果不能进行沟通，就会冲突。就好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冲突就是你死我活的厮杀，多少正义与公平？文明最终变成一堆一堆的碎块，让考古家去猜想。这些文明留下了多少思想的遗物？

唯有中华文明发生在一个足够完美的空间。这就是黄河以北的狩猎采集区，淮河北的旱地农业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隆起的那道秦岭不仅隔开了中国的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广义的秦岭西起甘肃、青海，东到河南中

部，这条巍峨的山脉也成为一道屏障，分开了两种气候，这就是暖温带半湿润气候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两种气候的最大区别是降水量大小和气温的湿度，那么就让秦岭南北的动植物、土壤和农业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地理气候的不同，两块土地上产生的文明及其性格也有巨大差异，那么社会组织也会有差别。

大豆、高粱、小麦、玉米等旱作物虽然有丰富的蛋白质营养，它们为北方人体格的强健提供了物质基础，也让粗犷豪放性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些作物在种植上也可以粗放一些。而水稻的种植则不然，它的种植必须需要种植者高度的社会化。所以水稻被历史学家定位为精细耕作植物。精细耕作就说明这种植物的种植和高产必须注入太多的文化因素。如果不注入这些文化元素，在较少的土地上养活较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就依赖这种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因素的推动。炎帝神农必须依赖这种地理气候便利条件才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血脉之宗、农业之宗、文明之宗。或者说，炎帝神农离开了长江流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就不能成为文化英雄。

炎帝神农是一种宽厚平和、温暖慈祥的老农形象，站立在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的心间，这是文明发生时充满柔性的母亲形象，而不是那种勇猛彪悍、雄壮豪迈的帝王气度君临天下，征服人心。君临天下的王气是父亲形象，是那种威猛英勇、熊熊烈烈、刚毅执著、胸襟阔广，这种王气是文明发展必须具备的气度。

稻谷这种农作物在实现高产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三种元素。

一是人的本质属性，即“聚集”。因为稻谷的种植离不开水，把水蓄住，保持稻谷足够的水份必须对土地进行平整，而且

保持在缺水时，能进行有效的灌溉就要修筑堰塘。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必须让很多的人聚在一起，才能完成这浩大的工程。而旱耕作物可以广种薄收，以弥补产量低下之缺憾。广种薄收也不可能精细耕作。或者说粟作农耕对“聚集”的要求不是一个必备条件。“聚集”就是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应该归结为生物性和社会性。“聚集”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人力气不若牛，行走不如马，但人能够驾驭牛马。为什么？这是因为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有人问：狼也能群，狼也有文明？然而，狼群只是动物群，人是社会群。虽然人也有动物性，比方说，人碰到了好吃的想吃一口，碰到好看的想看几眼，碰到了好玩的想玩一下。这是人的生物性特点，但人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保持对自然界的优势，就在于人能克服自己的这种生物性，努力适应社会性。

人的生物性也可以让大家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以自己体力的强大威逼你服从我的意志。这种以自己实力威逼别人的方式必然蔑视他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一种奴役他人的强者生存，这种生物性聚集虽可以确保强者处于社会生物链高端，是一种“猴王”生物性规则。今天有人把这种生物性规则冠上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维持了强者对世界的统治。这是人的生物性聚集的一种投机性表现。

人的社会性聚集则是在道德旗帜下展开。荀子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恶的。他的论断比马克思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论断要早2000多年。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恶的，人的善是后天扩而充之的，要修养和维护。他觉得水与火有气息，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智慧，禽兽有智慧而不知道道德，唯有人才是生命、智慧、道德齐备的人。所以人是天底下最高贵的。在他看来，道德

是人的灵魂，而稻谷的种植必须依靠道德的高贵才能凝聚人心。

随州人认为要让大家成为一个群体，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揽憨”。这只是随州的一句土得掉渣的话。“憨”是憨厚实在的意思，“揽憨”就是把憨厚实在的事揽在自己怀里。在许多智慧人眼里憨厚实在就是愚蠢、哈巴，是吃亏上当。但众人聚在这个憨厚实在人身边就可以沾到很多光。这个群体就可能凝聚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会具有了很高的品质和质量。这种品质和质量就可以确保精细稻作农耕获得最大的收获。其实随州土话中的“揽憨”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精神。这种牺牲和奉献就是一种道德和责任。有这种道德和责任的人是真正具有了大智慧。这才叫大智若愚。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虽使了一点小技巧，小权谋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其实这个人没有多少智慧，顶多是一点小聪明。懂一点小技巧，会一些权谋的人以为可以玩弄别人、操控别人，最终会被玩弄和操控。今天的许多政治投机就是这种小聪明。靠小聪明“聚集”的整体终不会长久，最多是暂时的利益追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绝不可能有很高的品质和质量。

炎帝神农就是这种高品质质量共同体的核心人物，他是具有道德和责任的牺牲奉献者。他的发明创造多是我们普通百姓衣食住行，最需求、最为有效的东西。其中的功利追求则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是在谋群体利益的大功利。这是站在人生大背景下的一种牺牲和奉献。他揽的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最为憨厚实在的事。炎帝神农的这种“揽憨”其实就是为中华民族牺牲奉献的随州说法。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揽憨”越多，大家从那身上沾的光就越多，那么他的感召力就越强，其凝聚能力就越大。他所凝聚的共同体就越具有品质和质量。这种牺牲奉献让一个民族受惠，炎帝神农就永远站在这个民族的高峰。

这种稻谷种植中的道德责任是长江流域文化元素烙印在这个民族最鲜明的胎记，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和发展潜力。稻谷的生长特性逼迫中国的长江流域生存的人类群体必须作出相应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谋略的选择。尽管它在发生的那一刻毫不起眼，但它对人们的生存太有帮助，它就必然由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

稻作农耕的第二大特性，就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文明的成长最怕的就是社会的失序。我们知道，稻田的开垦需要聚集巨大的人力，而开垦的稻田到成为良田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有几代人的勤扒苦做，贫瘠的土地可以变得肥沃。珍爱土地的人在外面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堆牛粪，他情愿脱下衣服把这堆牛粪包到自己那硠薄的稻田。多少年下来，这片土地就变得松软柔和，捏一捏都可以流油。从开垦的那一天起，稻田的主人就想到了这一天。一个人能想到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以后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他必然目光远大。那么他就会拼尽全力维系社会长久的稳定和有序的规则。

社会的安定和有序，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

社会稳定的内在因素起源于家。因为稻作农耕可以为两性关系变得稳固。丰产的稻田不仅能养活较多的人口，还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财富，谁来继承这种财富，就必然促进血统的纯正。稳定的两性关系也为家庭注入了道德与责任，家庭内的夫妇、父子、兄弟构成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夫妇关系也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父子、兄弟因夫妇的和睦而产生，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就很顺畅地出现了。家是一个整体，个人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这个整体。精

细稻作农耕尤其需要众心合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化生态反复强化，就成为完整的东方文化。人从一出生就反复强调你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你学会说话的那天起，你就知道自己姓什么，这其实就是提醒和强调你的生命从这里而来，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先。背叛这个整体就是弥天大罪。

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和谐需要爱和敬。爱人和敬人最终可以获得被爱和被敬。爱和敬需要载体和平台。爱是向下的，这带有生物性本能。古人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就是说人的这种生物性本能因为对子女的爱会得以发挥，就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敬则是一种社会性规则。因为这是一种向上的爱，扭转人的爱的方向需要精神力量。这种敬不是嘴上说说，需要用很具体的形式和方法表达。早上起来，需要到父母的跟前去跪拜请安，晚上需要用自己的身体的温暖为父母暖被窝。吃饭的时候，父母不动筷子，一家人是不能端碗的。这就是一种礼，这种礼可以很好维系一个家庭秩序。这种秩序的准则是整体的相辅相成关系之两端。比方父子关系其准则是父慈子孝。它是规定双方遵守的准则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后才可以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这种有序和平衡是一个理想家庭的标准。能很好的维系这种有序和平衡的家庭才是真正的大门大户。

在随州，不是什么家庭都能被称为大门大户的人家。只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以家的递归形式得以扩展，纵向的父子关系扩展到祖孙、叔侄、姑侄、舅甥、姨侄、远祖与裔孙，横向的兄弟关系扩展为堂兄妹、表兄妹，依然能很好的维系这种有序和平衡。那么这样的家就是东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东方社会就是这种文化的延伸和扩展。家庭的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关系

延伸扩展，就有了君臣、朋友。君臣关系其实就是父母关系的延伸，而朋友关系则是兄弟关系在没有血缘关系中的扩展。中国的孔子把这五伦关系排序为一夫妇、二父子、三兄弟、四君臣、五朋友。这种排序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其科学的逻辑性。但《中庸》的作者却把这五伦关系定位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后世儒家则沿用荀子的排序，一君臣、二父子、三兄弟、四夫妇、五朋友。这就强化了君权和父权的神圣。其实这种排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这种双向的约束，就成为一种规则和制度，这种完美的规则和制度有一个十分动听的名字，叫做礼乐精神。

近年来，随州这片土地上不断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礼乐重器。距今3000年前后，人类世界到处都是一片蛮荒的时候，这片土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礼乐重器，充分说明随州是真正有序的土地。这地方的礼乐重器一面世，就让人类世界目瞪口呆、寂静无声。那千古绝响的编钟，震惊的是整个人类世界。一个民族为之骄傲自豪，全人类肃然起敬。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只有充满和谐氛围，有普遍秩序的土地，最有资格产生这种礼乐重器，随州这样地方没有这种礼乐重器，才是不正常。如果不服气，你去自己家里翻个底朝天，也难以找到这种代表秩序的青铜重器基因。能确保自己稳定和谐的是支撑着青铜礼乐重器的原生态文化。

外在的社会稳定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中国广袤的地域分布在长江与黄河两大河流，虽有区别，但通过文化生态的交融，或王权的调剂可以得以均衡发展。相对于中东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埃及地理环境，还要南亚的恒河流域，想在较大区域得到均衡发展确实有相当难度。区域间得不到平衡发展，贫困和落后者就

必然觊觎繁荣和富裕。文明越是辉煌就越是刺激贫困和落后占有的雄心。当这种雄心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发生生死的冲突。区域间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失序的根本性原因。或者说，贫困和落后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正面因素，星星点点的繁荣和富裕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文明的辉煌。中国文明能够长寿首先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环境，其次就是文化的这种道德责任。中国的每个区域的智者都会依然自己的发展条件去追求繁荣和富裕。这就使得中国广袤的土地大体得到了一种均衡发展，从而有效的维系了文明的秩序。

第三大元素就是稻作农耕必然孕育人的理性思维。我们知道，稻谷这种植物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奇的植物，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生长规律，是不是我们完全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袁隆平创造的稻谷产量未必就是稻谷这种植物产量的顶点，我以为这种探索依然在进行之中。

我们的先祖在初始与其接触中，就已经发现这种植物的种植早一天晚一天播种、移栽、除草，都关乎着它的最终产量。于是掌握天时，就成为我们的梦想。随州境内的三里岗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一件黑色陶豆柄上有北斗七星的雕刻（《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内涵属屈家岭文化初期，北斗七星在天上旋转，为精细农耕提供了季节变化的准确时间。先民们把北斗七星雕刻在日常所用的器皿上，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万年历。

应该说，人类探寻世界的奥秘，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区别。人为了生存而对世界万物产生兴趣。因而对与稻谷相联系的天文地理都产生强烈地好奇心。用这种好奇心去探索其运行规律，依据自己的经验去作判断和推理，这就是一种很认真的头脑。有很

认真的头脑，就可以显示人的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可以说只有在中国南方的稻作农耕区域，只要进行稻谷的种植，就必须产生在最少的土地上获得最高产量的渴望和追求，那么就会有认真的头脑去寻找稻谷生长的奥秘，人们对稻谷生长规律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就不会浅尝辄止。一代接一代地探索，中国南方这片土地就必然产生一个伟大和优秀的人物。炎帝神农就是中国南方必然产生的伟大和优秀人物。

“随”是中国南北融合的特殊标志

汉字诞生于先民抽象符号线条组合中，每一个汉字都融入了先祖对宇宙万物的认识。相传，仓颉观测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研究龟鸟禽兽的斑纹踪迹，然后对纷繁杂乱的符号进行了归纳整理，然后造出了汉字。说明古人以整个宇宙为观察对象，以取之不尽的宇宙万物为自己的营养，然后胸怀宇宙，使宇宙的浩然正气与自己生命的精神品质接近。那么，我们今天读汉字，就是通过这些符号认识古人的精神品质，还原古人描摹的宇宙万物。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巨大魅力。所以有人说，汉字才是中国的第一大发明。

看“随”字的成形和发展，就可以从这个字的变化中获得一些我们最想知道的信息。或者说，跨时空地传递历史信息是文字的最大功能。“随”在造字之初是一个“阜”和一个“人”，其中隐含着一个人从高处坠落的意思。这是说随州有一座山从天而降。随州的大洪山是无宗无脉，好像突然从天上降落下来的。今天的地质学解读，是由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的碰撞，大地发生塌陷、隆起。塌陷的地方就是盆地，隆起的地方就是高山。在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的交界处，隆起了一座高山，在地质学上叫褶皱断块山地。这就是今天的大洪山脉。因为它处于两个盆地的边缘，所以它显得特别突兀，因此古人认为这座山叫

陨山。就是说这座山是从天上陨落下来的。随因这座山而得名。随州境内是七山一水两分田，两分田也是陂陀岗地和山上冲下来的冲积平原，也应归于这座山。这就是说随这片土地也是随着这座山从天而落的。这是上苍赐予先祖的一片风水宝地。它是从天上坠落的。这就是最早，先民对随州的认识。

应该说，文字的成熟并成为体系是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6世纪的事，随字的“阜”加一个从天而落的“人”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认识。

随字在远古还有一种写法，是一个“阜”加上下结构的两个“左”。这个字记录的是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创农耕的历史功绩。“左”的上面是一横一撇，其篆文写法是画的一只手，是辛勤劳作的意思，下面是一个工，这是规则规矩的意思。按一定的规则规矩劳作，再进行一次重复。其实这是强化开创农耕的艰难辛苦。“随”字的这种写法其实证明了这里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的原点。这是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文字上的反映。

随字的这两种写法基本上是讲“随”的起源和“随”的开发。而今天，我们见到的“随”字则是随州这片土地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随州，或者说这个“随”记录了南北融合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随的左边是一座高山。这座山就不再是从天上陨落的那座高山而是中国北方绵绵不绝的黄土高坡。《说文解字》解为大山无石之陆。随字的右边是一个“左”和一块肥肉。今天简化为“有”。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谁能得到一块肉是标志着十分富有。这表示按规则辛勤劳动就能获得肥沃的土地。那么“左”下面的那边肥沃土地就代表整个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黄土高坡（阜）与长江精细耕作（有）的肥沃土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一个共同体。

1982年，我从事三民集成的工作，收集到关于“随”字的民间传说。相传，炎黄之战，部落冲突，反复厮杀，双方死伤惨重。炎帝和黄帝看到自己的部下这么多伤亡，都不希望这仗再打下去了。轩辕黄帝对炎帝神农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中央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觉得，为争一个天帝的名号死伤这么多人太不值了，就答应了轩辕黄帝。为表示自己诚心诚意跟随轩辕黄帝，就把自己的故地更名为“随”，并在两片土地中间加了一个“走之”。“走之”的篆文写法是画的一个足，表示跟从的意思。今天，“随”的文字内涵就是跟从的意思。民间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历史信息，被称为研究历史的活体遗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它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但这个字为我们提供历史真实的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随州民俗文化研究著名学者蒋天径先生专门就“随”字写过文章，很多人以为“隋”字中间的“走之”是隋文帝杨坚去掉的，他经过详细的考证，“隋”在先秦时期与“随”是通用的。那么，这个“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左边的“卩”是大山没有石头，又写作“阜”，这是指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坡，右边的“有”中间有一个“工”是经过辛勤劳作按着规则经营就是肥沃土地的长江流域，“隋”就是这两块土地的交界处。“随”这个字和任何一个词素构成的词都有圆融和谐的意思，随和、随便、随缘、随意、随心。

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发源的时候，就显示出多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中国的疆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悬殊较大，人们在不相同的地域间和自然构成的不相同的关系，这就形成不同的民俗民风。所谓文化是人的内在的一种文化

力量，是人的一种特殊力量。握有不同文化的人，生活的物质精神幸福程度是不一样的。比方随州境内的随南与随北，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冬天，你会看到随北就有大量的田地抛荒。随南虽然也有抛荒地，但明显少于随北。这就是精细耕作与粗放耕作在人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文化力量的最具体体现。随州南部的乡亲受到的精细稻作农耕文化的影响就多一些，这就是遵从天地大自然为人们制定的规范。这就是到了该睡的时候就睡，到了该起床的时候就起床，到了该播种的时候就播种，这时候，抛荒肥沃的土地，不去播种就是对上天的不敬，就会受到天的谴责。千万不要以为随南的乡亲就比随北的乡亲有文化，这是一种生活习惯。随南人就是看到这么好的田，不种点什么，心里觉得不好过，随北人大大咧咧惯了，种这么一点不多，不种这么一点不少，不在乎这么一点点的事。不计较不算计，本身就是大气和豪爽，这就是北方人的性格特点。

遵守天地规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就像清晨晨练的人觉得出一身的汗就很舒服。至于这片土地上能收获多少麦子，这麦子能值多少钱，那是另一回事。许多乡镇领导就从劳力的投入到支出到收获的价值进行比较，为抛荒寻找借口。我们问一句，引导我们的群众遵从天地的这种规律，应该付出多大的成本？培养出的文化能量在社会发展中又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

其实，文化不是文化精英或文化英雄才有的，文化是从不需要记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它就流淌在我们老百姓的血脉里。就像到了腊月，不用任何人去号召，人们就会去买肉腌制灌香肠。这就是文化融合在我们血液中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会支配我们的行动。随州境内有几十万的农民工在全国的各地，到了过年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赶回家去吃一顿团圆饭。中国

人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精细农耕积淀在中国人身上的一种文化力。我们看重家长，敬重家长，有什么事就会去找政府，其实这是中国精细农耕文化生态在我们生命中的很自然的表现。这不是西方文化的那种争民主、自由、平等。

文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促成的，也不是统治者突发奇想可以摧毁的。在人们的记忆里，春节这个中国人过了一二千年的头号节日，曾被自己的政府叫停过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把春节给废了，叫全体中国人过洋节——元旦节，一直到1934年才解禁。第二次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要大革传统文化命，1967年又把春节给废了，那时是“破四旧”，春节当属“封建文化”之旧。“过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天天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年后，春节才又恢复放假。尽管有这些坎坷，但都没能丝毫消褪人们对春节的热爱和眷恋。

山水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民风人情，辽阔的中国有不尽相同的山水，就必然有不尽相同的民风民俗。这种不同的文化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由于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冲突激荡、融合交汇，才使中国文化有了丰富的意蕴，互相取长补短，才使中华民族有了恒久的生命力。这种民族的生命其实首先来自文化力。

中国最重要的冲突激荡、融合交汇应该是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冲突和融合。或者说粗放性的粟作农耕需要广阔的地域，当一个地域不能承载自己部落发展的时候，就必然寻求新的地域。从地域上，中国南北分界的地方是秦岭之南的淮河。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淮”字就是一条美丽的水鸟站立在弯弯曲曲的河流之上。在甲骨文里，“河”字是一个人站在水边，表示人与水的关系。水哺育人，生命需要水，人要喝水，树木，粮食以及一切生命要吸纳宇宙深处的能量都离不开水。所以河流是文明

的伴生物，没有河流就没有文化。淮河以北就是以粟稷为主的旱作物种植，淮河以南就是以稻谷为主的稻作农耕。淮河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这条河流就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延伸和趋缓。这条河流就发源于秦岭余脉的桐柏山，桐柏山的主峰太白顶就坐落在随州境内。

应该说，中国南北的冲突融合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中国南北虽然都属农耕文化，但其中仍有许多差异，有差异就会有碰撞，这种碰撞就是冲突。可以说，中国南北的碰撞是大碰撞。炎黄之战就是历史的真实。有文字的历史是口耳相传历史的记载。

史载，炎黄之战，“三战不得其志。”双方死伤“血流漂杵”。这些文字今天读起来仍然叫人胆颤心惊。那是鲜活的生命，生命是无价的，没有生命一切都谈不上。而且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就再也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炎帝神农是仁慈的，他是长者，就是生养儿女的父母。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必然视自己部族的每一个成员为自己的子女。在他眼里，有什么比自己子女的生命还宝贵的东西，那一定是人的尊严。如果失去土地，在精细稻作农耕部落来说，那就是失去了生命根本的依托。没有生命根本依托就一定丧失了生命的尊严。稻作农耕部落是喜爱和平的，当他们的和平与安宁受到破坏时，他们身上所爆发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

“无湘不成军”的俗语为什么形成。说明长江流域的人组成的部队具有很高的战斗力。近代革命多在长江流域爆发，应该也是稻作农耕的这种文化基因在其中的作用。辛亥起义队伍总数3000多人，随州籍将领达300余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起义文告的起草者和起义旗帜的制造者就是随州万店人谢石钦和浙河人邢伯谦。中国现代军队是由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转化而来，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均与长江流域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有关。

中国上古最感人的悲剧故事都发生在长江流域，刑天舞戚、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触不周山，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不是炎帝神农部落的英雄。这些英雄把神农部族的一往无前、顽强坚毅、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精神镌刻在民族记忆的深处。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辉煌记忆，历史就是民族英雄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大地上刻划的光彩符号。

这种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握有这种文化力量的炎帝神农在炎黄之战的冲突中，“血流漂杵”四个字把厮杀的残酷，英雄的不屈展示的淋漓尽致。虽然握有扩展生存空间追求实力的轩辕黄帝面对如此强悍的抵御，不得不想，战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死。有什么办法不死而能生呢，那就是和谈。谈判说到底是一种妥协和退让，有时候，这种妥协和退让换来的更为广阔的空间。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场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轩辕黄帝开疆拓土，为华夏奠定坚实基础；炎帝神农护族保家，牺牲奉献，捍卫生命尊严。当争斗的双方都有正义性的时候，就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心灵就会被这场争斗征服溶解，这场争斗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融合。

轩辕黄帝拥有勇猛彪悍的雄师劲旅，退一步得到的是炎帝神农带着他的土地和子女融进了中华民族。其实更重要的是炎帝神农还带着先进的精细稻作农耕文化走进了中华。粟稷旱作物农耕融入精细耕作的因素同样让少量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量。这种粮食产量的提高就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扩展。文化生态的融合是随着血缘关系的扩大进行的。炎帝神农只有一个姜姓，这是因为稻作农耕需要聚集最大的力量，不是说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人口

少。一个姓氏就有更亲密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族内的凝聚基因。炎黄融合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婚姻，当文化生态通过婚姻的形式走进中国北方，它就呈现出巨大的磁性和张力。

炎黄的这次融合，让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成为永恒的主题。因为思想文化的吐纳吸收、自我创新、相互间的容纳和融合，才是一个民族成为统一体的根本。尽管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国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在历史上曾经分裂过。但无论分裂多长时间，分裂双方的那种血肉分离的疼痛都是那么强烈，甚至是分裂的时间越长，这种痛苦越深，统一的愿望越强烈。那么这种分裂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统一。

“随”是炎黄成为一个印记，更是中国南北融合的一个特别的标识。这个印记和标识隐匿着一个民族最珍稀的融合元素。中国文化是有强烈特征的文化类型，溯其渊源，就是追查寻找文化发源的那一刻，因为只有这一刻的文化所显现出的特征具有本源性，它就可以解释后来的文化特征问题。如果我们否认中国的文化是由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共同构成，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就是否认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本质特征。

今天有人依据历史文献的片言只语记录，认为炎帝神农与轩辕黄帝同属黄河流域。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知。文字的出现并成为体系是在距炎黄传说时代千年以后，这时的文字叫甲骨文，主要功能是祭祀和卜卦，虽然有历史的信息，但不是记载历史的文字。真正记载历史的文字是在距炎黄传说时代的两千年以后。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还可以宽容。但这些记载者的功利倾向是为了强调王权的正当性，而否认长江文明的存在。因为王权的传承一直都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王权的神圣和权威是以征服而得到的，不能以妥协和退让的方式获得。这样就必然作

出遮蔽历史真实的记载。二是记载者的历史修养不够，只能站在一个很小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他不知道中国文化发生在一个很辽阔的空间，以为一处小的冲突和融合就是全部历史。正如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一个县市的两个乡镇的合并，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局部真实。这种局部真实的历史虽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意义，但意义的作用有限。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这个巨大的实体最重要的融合只能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间完成，才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祖国还没有完全统一，还有许多分裂倾向意识存在的时候，“随”的这种统一融合的文化内涵彰显出一种特别的力量。这是一个民族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印记和标识。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先祖，他那温暖、慈祥、神圣、庄严的形象是这个民族不同阶级、政党，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接受的。只有面对民族的根源所在，站在血脉之宗、农业之宗、文明之宗的祖宗圣像前，民族复兴就可以成为共识，可以搁置政治歧见，淡化阶级冲突，化解历史恩怨，凝聚的力量是大于 $1+1=2$ 的。分散的音符虽然很美，但不能构成优美的旋律，单调的色彩虽然艳丽，但不能构成斑斓。文化间的差异恰恰是融合的前提。黄河流域的粟稷农耕孕育的粗犷豪放，长江流域培养的是精细和柔美，两者结合就是一个民族的丰富多彩，就有了厚重，也有了流畅。正方、正圆、正三角的厚重不可能取代曲线的圆润和流畅。热烈的灿烂、浪漫的绚丽、含蓄的温婉、圆融的柔美。文化有差异是因为山水不相同，不同的山水就有不同的人，只要是人就应该相互尊重。文化的差异越大，越是应该尊重。只有尊重才可以求和存异，而不是要同。有人企图以自己的普世价值一统天下，其实是痴人说梦。这就是“和则生，同则不济。”实际

上这句话告诉我们，和是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同只承认同一性，而不承认斗争性，和则是承认同一性也有斗争性的。

文化差异不是冲突的原因。同一民族、同一地区、同一主权也有冲突和分裂。冲突和分裂的原因是利益而不是文化。强调“随”的融合文化内涵有利益但更多的是文化。在充满功利的当下，只讲文化不讲功利，就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虚假。但深刻发掘“随”的南北融合的文化内涵是在谋民族发展的大功利。站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从“随”的地域符号发掘的是民族的凝聚力、融合力、文化力，客观上可以为随州这个地区的发展获得一些机遇，但中华民族通过先祖精神文化的营养滋润，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强健的文化肌体，这是一个民族走向幸福的正确路径。

广泛地吸纳和融合会是让自己走向丰富的最佳途径。随州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比方汉剧、楚剧、花鼓戏这些南方地方剧种，在随州是很受欢迎的，但近邻随州的枣阳、南阳、信阳就唱不过去。而中原的曲剧、豫剧、梆子等北方剧种，在随州也很受群众喜爱，解放初期，随州有曲剧团，也有豫剧团。今天，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南北各地方剧种的表演仍会迎来热烈的掌声。一个善于接受各种文化营养的人，肯定会拥有健康的肌体。

构筑心灵的文化高峰

炎帝神农是远古南方的文化英雄，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座文化高峰。他是无数先祖仁爱、和谐、真诚灵魂的聚集，他是我们的信仰和追求。信仰和追求就是我们的仰望。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中华民族信仰的就是自己的祖先。

《诗经》中说：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意思就是说，祖先与我有约，不会抛弃我，会带领我。昊天上帝就是我们心中的那座文化高峰。为了让普通民众更好地信仰他，就把这高高的山峰具体为一个人。既然是人，就有诞生、成长、传承。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灵需要。在中国人心里，天就是人的形象，头部特别大，表示人的巅顶。后来在甲骨文和金文里，这个头变成了一横。《说文解字》说：天，巅也，至高无上，从一天。这就是说，天是人，是人的放大。自己的祖先做了很多好事就会升天为神，好事做少了升不了天就入地为鬼。神鬼在另一世界都会庇护自己的子孙。所以，中国人就有了敬天地祖宗崇拜传统。现实总是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是历史的条件限制，没有办法进行横向比较，于是就进行纵向比较。就是用现实同回忆作比较。而历史都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加工、改造、理想化，就有了选择和夸张。就像我们今天会时时忆起改革之前的人心纯朴，而那种物质匮乏的饥饿的

痛苦却被忘记。美化往昔其实是我们的思维定势。我们的新思想新观念，要被普通民众普遍接受，往往会从古代的圣贤那里寻找依据。请求祖先庇护我们的地方是专门的祭祀场所，它是神圣和崇高的，它被列为国家的第一件大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个场所就叫“庙”。《诗经·大雅》说：“雍雍在宫，肃肃在庙。”《释名》解道：“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地。”对先祖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形象。

站立在炎帝神农风景区的那座圣像，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余小平先生创作。余先生心中的炎帝神农充满了仁爱、和谐、真诚。我们站在这座圣像前，就感到了一种温暖、慈祥、善良。心中就有一种正气冉冉升腾。市区的炎帝神农公园也站立着一尊炎帝神农。有人说，这是雕塑界很有名气的教授创作的。我觉得他还应该加强文化修养，因为他心中的炎帝神农，怪异和神奇多于精神和文化。虽然东汉有个叫皇甫谧的人说过炎帝神农是“牛首人身”，远古也有生殖崇拜的习俗，但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不是先祖的生物性特征、怪异和神奇，而是深刻的文化精神。

先祖炎帝神农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仰望和追求。这种仰望和追求不是创造，而是发现、是理解、是接受。你内心有太多的怪异，你发现，理解接受的就是“牛魔王”。你仰望的是仁爱、和谐、真诚，追求的是善良、平和、宽厚，那么你发现、理解、接受的就是那个身材强健、双手粗糙、慈眉善目、厚道实在的老农民形象。他让我们倍感亲切和温暖。

毛泽东曾经说过：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他认为圣贤就是多做有利于群体的事，是有道德和责任感的人，是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人。有道德就有高尚的情操，有信仰就有坚定的精神，炎帝神农就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圣贤。我们垒砌自己心灵的这

座文化高峰，就是对信仰和道德的珍视。就是从世间万事万物中去发现，去热爱，去继承，去发扬。其实这就是人走向圣贤的过程。一个人圣贤一回是很容易的事。比方碰到了值得同情的人同情一下，值得帮助的人去帮助一下。拜谒炎帝神农就是修炼这种圣贤的过程，让自己圣贤的时间能更长一些。

人生就是人的生命展开的过程，人生渴望和追求就是对自己的一生所具有的鲜明的目的意识。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动物只会一代一代复制自己，而人类却善于一代一代发展自己。发展就是目的，是自己最重要的精神和灵魂。炎帝神农文化是精神灵魂成长最丰富的营养。你深入进去，你就可以和先祖的精神灵魂对话，这是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你不断往里走，它就越来越深刻越丰富，你就会获得越丰满，越强烈的快乐。这种精神享受是无限美好的。

这种认识是由表及里的渐进过程。1990年11月，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当时的烈山宾馆举办了“炎帝文化暨炎帝诞生地论证学术研讨会”。当代炎帝神农文化研究从此在炎帝神农故里拉开了序幕。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中国文化是由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共同支撑的。黄帝代表着黄河流域的粟稷耕作文化，炎黄融合后，它注入了王权的厚重和正统；炎帝神农代表着长江流域稻作农耕，有更多的本源性和融合性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活水，在全人类面临的诸多危机和环境恶化，争名夺利，内心浮躁，灵魂焦虑，先祖对生命的价值关怀，对立统一，多元融合，天人合一观念中那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对国家文化的传承和重建具有重大意义。

很多人觉得，国家文化的传承和重建，与眼前的随州发展有

多大联系，与我们得到多少实惠有多大关系。其实，你这片土地的地位，来源于这片土地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国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元素，你就可以有话语权。你就可以聚集世界华人的能量。一个善于聚集能量的人就可以得到很快的发展。有个朋友告诉我：公司在县里，最多能聚集一个县的能量，搬到市里就可以聚集这个市的能量，总部设在北京，就可以聚集中国的能量。一个人能想到五年以后的事，他一定是一个有仰望和追求的人。一座城市没有仰望和追求就不会有希望。

我们知道，政治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祭祀炎帝神农就是另一个层面的政治活动。其实这是巧妙地把中国的政治资源转移到中国中部。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那里脆弱的生态不容承载过量的经济发展。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需要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试想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有再多的自信，他说出的话能有多重的份量？如果中国中部的鄂豫皖晋湘赣六省经济得到发展，这个地区有中国60%的农民。这一地区每个农民多5000元的消费支出，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怎样的贡献？随州就在这中部六省的中心点。湖北省的战略支点作用就可以通过这种政治资源的转移巧妙实现。这种文化的功利，就是民族复兴的大功业。只有中国的富裕强盛，中国文化就一定具有一种磁性和张力。东方文化的发源之地就会成为全人类注目的地方。原来东方文化是这么仁爱、和谐、真诚。历史那么悠久，那么富有智慧，那么温文尔雅，那么与人为善。炎帝神农救世思想和灵魂是怀有天下观念的博大精神和博爱文化。仰望就可以向往，登高才可以呼远。炎帝神农文化就是一座高峰，它既可以统领有信仰的文化精英，也能够恩惠无所敬畏的芸芸众生。这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更是世界华人的根。精神是文化的高地，是文化的灵魂，以这种精神文化

聚集的民族一定是最强健的民族。

炎帝神农部落的悲剧神话英雄早就有改天换地的壮举和济世为民的情怀。夸父是后土的孙子，后土是炎帝神农的五世孙，他追赶的太阳使我们的文化目标，精卫是炎帝神农的小女儿，她前往东海采药被大海淹溺，她发誓要把大海填成平地，这是我们的文化任务，还有补天的女娲是我们的文化责任。文化如果被发现，就会带来大众的觉醒，就能带来我们的文化自强。炎帝神农的文化的融合特性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文化，而是一种善于吸纳和融汇的文化，是可以从异质文化中吸收营养强健自己的文化。我们从强势文化主导世界的氛围中认识到自身的文化优势，所以可以更平心静气地看待多元融合，和共生共荣的世界，也会努力地寻找在强权中去和善地表述自己的文化，实现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

我们必须明白，任何思想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文化也不会永远强势。唯有善于融会贯通，发现创新的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高峰。炎帝神农文化的融合性特征在今天就是古今中外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可以让一个民族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魅力。

炎帝神农精神的这座文化高峰的高度和质量，在于当代我们的认知深度和广泛接受的程度，它来源于自己的精英研究群体。如果没有一个苦行僧一样的群体始终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思考去追寻，炎帝神农精神不可能出现一个高峰。大多数人没有心中没有一个确定的仰望和追求，是不会相信，这位远古文化英雄与我们的精神文化重建有什么联系。那么炎帝神农风景区的所有建筑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石头。这就是说，真正能让炎帝神农站立在我们心中的是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渴望和追求的高品质精神生活的芸芸众生。炎帝神农文化高峰必须由随州的文化精英和普通

民众共同构建。

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者虽然投入了许多精力去思考，去追寻，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他。我的朋友蒋天径为寻找一个厉山的厉，为什么不是“历”，非得是“厉”？为此，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方言大师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村汉的指导下，终于从杨雄的第一部方言著作中找到了依据，那就是广袤的田野，万物成熟的意思。但随州本土这些研究者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埋头研究，气宇轩昂。随州有这个群体的存在，炎帝神农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一定的高度和质量。

今天，看起来每年都在举行炎帝神农文化的高层论坛。因为接待任务很重，无缘每次出席。终于有一次机会说服我的接待对象和我一起去参加了一次论坛。多是泛泛而谈的文化评说。这些评说可以说没有错，绝对正确，只是在湖北可以说，在北京也可以说。当我听到那个所谓的权威说，“炎帝神农宝鸡说”也有一定的依据时，我感到一种愤然。那种傲慢的指手划脚其实是对地域文化的无知。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炎帝神农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符号，那么陕西的“炎帝神农”内涵就是陕西的地域文化内涵，它必然与轩辕黄帝文化的内涵重叠。那么有什么必要在一个地域里出现两个符号。这个专家学者可能在我不知道的领域有些建树，但起码在地域文化研究上，他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所以我想说，随州地域文化的专家只能出在对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的随州学界。因为他们苦行僧一样的深入研究全面系统，有随州的风土人情依托，有随州的地下文物支撑，也有随州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孕育，当然也有文献记载梳理。他们研究出来的炎帝神农精神，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文献中的片言只语，更不是文明的碎片，不是毫无准备，也不是时髦拼凑，更不是自

卖自夸。如果我们能关心和支撑一下，炎帝神农的文化高峰建设就不会是他们精神挣扎的记录，也不是纸上谈兵。假设，随州的学者提供资料，让专家学者来评说、指导。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主导了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话语权。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随州目前最需要的是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炎帝神农文化的精神价值。或者说，随州已具备这种理解和接受的实力。政府有多大的实力我不知道，但民间的相当多的企业家一出手就是几百万的豪车。省委党校厅干班的同学看了随州豪车的密集，感慨地说，不亲眼所见，真不知道随州富裕。我却听到坐豪车的人抱怨道，人家的布加迪威龙3800万那才叫豪车，我们随州这叫什么豪车。如果随州实现了许多3800万的豪车，他们可能还会抱怨，人家经常坐火箭到太空去，3800万的布加迪威龙算什么豪车。追求和渴望生命之外的东西，肯定是高于肉体生命之外的精神。人们赚钱的目的一定是用来实现比富裕更高的理想，这就是成就感。那么坐上了火箭就有了成就了吗？钱财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并不代表幸福的大小多少。

因为在工商联任过职，有很多民营企业朋友。说实话，他们生在了一个物质缺乏时代，不是他们能选择的时代，能够进行物质创造的追求，而且很成功，已经很难为他们了。他们知道自己文化不充足，就希望用品牌来弥补这种不足，其实文化的不足，物质是不能弥补的。只衷心祝愿他们的下一代没有物质之忧，可以无忧无虑地做精神追求，成为真正的精神贵族。

财富的持有者，权力的握有者，只有拥有了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拥有了炎帝神农文化“救世”的渴望和追求，才够资格谈成就。拥有了炎帝神农文化的仁爱、和谐、真诚，才具备幸福的基础。有人告诉我，随州的老板住迪拜，一晚上8万，眼睛

都不眨一下。迪拜是现代奢华的代名词，我不敢说这位朋友内心贫乏，但他的精神世界不是很丰富，这是可以肯定的。阿拉伯半岛是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命脉，与世界文明有着极大关系，而且这里还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很多学者专家认为闪族的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这个民族与阿拉伯人有太亲密的关系。阿拉伯在历史上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目前全世界每4个人之中就有一个穆斯林。以我对随州文化界的熟悉程度，如果他有这种文化能力，我一定会认识他。他没有这种文化知识，就没有文化能力。这个朋友不可能感受到阿拉伯半岛那深厚的文化积淀，他感觉不到就享受不了，最多是肉体享受一下。很多大款出国就喜欢到红灯区或者疯狂购物，因为他没有文化能力体味异国文化的精妙。没有精神参与的活动不可能有高级的愉悦欢快。

在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斌庆先生家里遇到一个叫涂汉江的朋友，一不抽烟，二不酗酒，三不赌博，四不铺张，五不浪费，六不吹拍，七不争权，八不贪利，九不失信，十不变节。企业做的很大，钱赚的很多，最喜欢做的事是慈善。他前后捐赠的财物给“希望工程”、“阳光工程”、“温暖工程”，贫困学生、孤寡老人、残疾人，下岗工人，贫困农民，已达1.2亿元。每天的生活费用自定为9元钱，每年的穿戴自定为200元。因为是近距离接触，我看到他腰间的皮带是人造皮革。俗话说，男人的腰，女人的包。他腰间的皮带比我的皮带档次低得多，因为那人造皮革涂的漆有明显脱落，我没见他以此羞愧。他告诉我，每次捐赠，他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一个人的幸福其实就是丰沛的流溢，当一个人对别人的爱很多很多，多到向外漫的时候，就是丰沛的流溢。这种流溢的幸福没有丰富仁爱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涂汉江是湖北省慈善家协会的

副会长，当他知道我是随州人时，说一定到随州拜谒慈善家的老祖宗炎帝神农，并和随州的企业家一起交流一下慈善的心得。我顿时哑然。我不知道随州众多的企业家能否有资格与其对话。我们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应该是慈善事业的发源地，竟然没有人能在慈善事业上发言。不是物质的实力不够，而是精神的高度太低！所以，构建心灵的文化高峰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们的干部队伍对炎帝神农文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想让我们普通民众产生信仰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您的内心深处就没有多少仁爱、和谐、真诚？你叫老百姓怎么想。有人会反驳我，凭什么说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仁爱、和谐、真诚？那么我觉得当下基本的民生、仁爱、和谐、真诚有许多缺失。不说盈利的事业都交给民营了，企业化了。既然企业，就以盈利为目的。就说没有退出的文教卫事业。

报纸、电台、文化应该是有更多社会责任的事业单位，不能以其自身的创收能力来办的事业。为生存，这些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首先想的是弄钱养家糊口。于是这些本是公共事业的神圣职业变得比商人还势利，对金钱的渴望是那么强烈，眼里的目光泛着饥饿的绿色。那种凶残和贪婪叫人不寒而栗。一个依靠自己的社会功能来养命的单位，生存状况肯定不是很好。社会功能强一点的单位可能好一点，创收功能差一点的事业单位，其生存状况就很是糟糕。那么只要是有一点办法，做父母的是不会让自己的子女进入文化馆、剧团等文化单位。一个没有大量人才进入的行业，说这个事业兴旺发达，那肯定是说假话。

有人告诉我，城里的学校有大量的代课教师，这些代课教师月收入400元，我不信。因为过去与文教卫有些联系，就问问了，才知道这话不假。有的一个学校有二三十个。我不相信，这

些人都有牺牲奉献精神，因为我知道月收入400元是不能养家糊口的。我们太知道这座城市的生活水平了。那么，我觉得大家反映的事应该有些依据。代课教师的待遇太低，他就想法办班收费。因为这些人不在编，学校管不了。他是社会人。那么他本应在课堂讲的东西，留在办班的时候讲，以办班的收入来养家糊口。教育本是远离功利的，但我们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么功利的环境里，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引导一代人，以功利的心来衡量教育。一个学生能考多少分就判断教育是否成功。最多只可以培养一代人的知识技能，以为有了这点小技巧就可以谋一个好职业，那么他最多可以在与人低水平的竞争中，取得一点先机，精神上不可能崇高。一个没有精神贵族的社会，绝不是我们渴望和追求的社会。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只要还存有一点良知良觉的人就会呼喊：救救孩子！

因为我走过生命的大坎坷。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有亲身的感受。我觉得医院太缺乏“恻隐之心”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可能从事医疗行业的人看到了太多的生命痛苦，神经很坚实强壮，心肠很硬，硬到对痛苦的场面麻木的地步。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死托付到这样人手里，心里确实忐忑。但又不敢有半点的表露，只敢在心里说：洁白的凶残和野蛮。

在大医院，吃了一种新药对自己的病很有效，就想在本地医院开，却没有，找了很多药房也没买到，就根据包装上的地址，找到了生产厂家。厂家说与医院有协议，不能卖。最后通过许多关系，才卖了一点给我。原来12.3元一袋的药，出厂价才2.1元。我知道了以药养医，其实就是用病人的痛苦养活医疗事业。我查资料，才知道，我国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在全世界属于最低，不说比发达国家，就是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也是偏低的。

何为民生？教育和医疗，是我们生存的必需，如果把这种必需的公益推向市场，就是逼着他们赚钱，他们有垄断地位，因为好赚钱，赚了钱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就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领域。

炎帝神农文化中的仁爱、和谐、真诚，会让我们去关注真正的民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解决，你内心就不安，就难受，这就是“恻隐之心”。你关注和呼喊，形成一种力量。老百姓其实是最明白的。只有他们明白你是真诚的，爱着他们的，他就会相信你。

不要以为文化高峰很难构建，只要我们心中有良知良觉，就会去爱，有真诚的爱，大家就可以沾到光。随州话说的“你为老百姓‘揽了憨’。”揽的憨越多，平地就有了高度。

炎帝神农文化必须有普通民众的掌握和参与。在老百姓眼里，炎帝神农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救世神仙。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他发明的。它就是一个和蔼慈祥，温暖的老农民。他生在农历的四月二十六，他尝断肠草死在了南方。他姓姜，传了多少代，是179个姓氏的祖先。就是我们的农业之宗、血脉之宗、文明之宗。这是炎帝神农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认知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普通的民众，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有一颗感恩之心。自己吃的、喝的、用的、住的来源于谁，应该感谢，这个创造发明的人就应该是自己的祖先，所以就会用许多夸张和神话。千万不要以为老百姓心中的炎帝神农没有科学依据，这是民众对自己祖先的一种真诚的敬仰。不要以为这些文化是草根文化，这些认识是民族文化共同认同、归属、自豪的前提，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必须尊重。这种尊重就是理性，更是真正学者的良知良觉。只有认真呵护草根文化，才可能培养精英文化。特别是炎帝神农

文化，必须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同和接受。如果没有随州古代的“至今神农庙，年年赛村鼓（《随州志》）”的民俗，就不会有今天每年的祭祀大典，更不会有世界华人的谒祖圣地。

这座文化的高峰能达到多高的高度，首先是看普通老百姓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我觉得，随县的炎帝神农庙会上的板凳龙、随州慢板、打碓号子、义阳大鼓，就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随州特色，只在炎帝神农庙会上看得到。至于那些西方的舞，不说不好，但起码没有大城市里演得好。外地人来看的东西是随州独有的不可复制，难以替代的。这些地方的表现形式加上老百姓乐意接受的炎帝神农文化思想，就是民族的。

社会的各阶层都认同并接受的就一定是好的文化。今天的社会有三个最重要的阶层。一是财富的创造阶级，它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商人；二是社会的管理者，这是从村一级到县市区各级的干部；三是这个社会的参谋者，或者说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思想者，他们把自己思考的问题说出来。别人听不听，你千万不要生气。你就要检讨自己，自己参谋的可能没说透，可能见识一般，因为你没能影响别人。或者你把很普通的话讲的很神秘。“王大娘上街卖鸡蛋”，你弄成“王氏高龄老妇人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实现鸡卵与货币的等价交换”。老百姓弄糊涂了，就会说，这是山里的骡子学马叫。其实，你做的学问说出来只要受过初等教育就能听懂，才是真正的学问。

炎帝神农文化的这座高峰是靠我们随州人上上下下牵手构建。一点力不费就会有成果的想法就是指望天上一场馅饼。只有我们历经辛苦建筑起来的高峰，我们就真正感到它的辉煌和珍贵。

节日如此美妙

一个地域文化研究者最兴奋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人认同被接受。当研究者把这种研究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一定会觉得这是自己生命最辉煌的时刻。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先生在随州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炎帝神农比轩辕黄帝早，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认同的祖先。连续几年的“世界华人寻根节”举办，夯实了随州炎帝神农故里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作为湖北省的省级战略，就是把随州建设成“世界华人谒祖圣地”。

湖北省的战略就是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总书记两次嘱托湖北要加快战略支点建设。这是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湖北的委托，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的期盼。战略支点建设是湖北省的总目标、总任务，它统领着多个层次。

“世界华人谒祖圣地”是其中一个重要层面，这种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就是省级战略，随州实施，省级支持，随州主导。这些话让人感动，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者，随州的地域文化研究不再是随州自己的事了，而是事关中国中部崛起的事。李鸿忠先生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来湖北，自然明白深圳发展的原因和背景。深圳能聚集全中国的能量，根本原因是政治。政治是一个地区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几个渔民是不可能把这个小渔村建设成现代化都

市的。深圳能获得这种力量，依赖于地缘优势。给了很多政策，让其起到牵引的作用。

今天，随州如何获得这种政治动力，这就是如何巧妙地转移政治资源。祭祀是另一个层面的政治，如果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让中国中部富裕起来。随州作为中部六省最中心的位置，是最能够承接这种政治资源转移的。“世界华人谒祖圣地”要建设什么、达成什么目标。我觉得随州“炎帝神农”这张名片就是唤起世界华人的关注，聚集世界华人的能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富强的关键所在就是中国中部的崛起，“鄂豫皖晋湘赣”有中国60%以上的农民和60%以上的农产品，只有这一区域的富强才有中国的真正富强。所以总书记两次重托，就是要湖北在中部崛起中要起到战略支点作用。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就是建设中国的国家民族宗庙，巧妙地转移中国的政治资源。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共同接受的先祖，太庙是不可能有两个的。必须证明随州的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国的唯一。

我是随州本土人，先祖包祥逊1369年迁随至今已600余年。这片土地就是随州包姓家族另一个层面的父母。包姓子孙还将依赖这片土地生存发展。所以把这里建设成天下最好的地方，这是我生命的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种“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建设就是为随州创造了一座永不枯竭的精神宝藏，这是高品位的富矿。随州虽然有天下最好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的消耗总会被耗尽的，唯有精神的资源却是越发掘就会越深刻，就会越细致，就会越丰富，就会越宝贵。

生在一个很糟糕的年代，没有机会读书，后来工作了，因为工作的原因离不开读书。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文化人，是觉得一

个人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就可以认为自己是文化人，这说明文化太没价值了。自己生在了一个很寒微的下层市民家庭，抱怨和等待没有用，要改变只有创造，唯有读书和写作的成本最低。读书和写作就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文化成为一个人的生存方式时，就会有一种觉悟，觉就是发现，悟就是明白。我发现和明白，爱国主义是很空泛的。爱国就是从生自己养自己的家乡，这种觉和悟让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地域文化研究者。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从事领导工作多年，还不懈地写作。我就觉得自己的写作，不是为了发表，图个名利，就是为了说说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是一个很快活的事。有人问：快活值多少钱？我以为随州的快活就是幸福。幸福无价！

在研究中，我发现随州的地域文化具有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和炎帝神农文化的外延和内涵重叠的。于是我对随州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是可怜的。有未来就是自己能看到以后很远的事。如果能看到5年以后的目标，其实就是有了见识。一个人有了见识，自己的生命就有了一种宽度和深度。一个人在基本生命需求得到解决后，内心的欢乐是来自于心灵的和谐与宁静。人在和自己的心灵交流的时刻，需要在一种很静谧的环境下，可以达到一种最完美的和谐。这种快乐只需要自己孤身独处，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和恒久的幸福。它与金钱和权力毫不相干。这时，我才感到，一个人依赖外物得到的快乐，肯定不会长久。

在这种寻找快乐的过程中，我觉得随州这片土地的富裕要聚集这个世界的能量。我们知道，生命其实就是来源于宇宙深处能量的聚集与耗散。一个人聚集了这种能量，就有生机与活力，一块土地如果拥有这种能量，就会得到迅猛的发展。这个世界最大

的一个群体就是中华民族，把全民族的能量聚集到随州来，就是这里有民族全体成员都能认同并接受的先祖——炎帝神农。

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清楚地知道，炎帝神农是传说时代的文化英雄，他是无数先祖精神灵魂的聚集，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有很强烈的尊祖观念。这种“慎终追远”的观念根植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血缘关系之中。这就必然产生“祭先报本”的哲学意蕴。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这种崇祖祭祖的文化也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古代的先哲。先哲们尊祖敬祖观念提炼升华，强化了这种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定势。

远古的中国人文环境相对比较封闭，横向交流存在许多困难，只好作纵向比较，就是拿现实比较回忆。现实中是有许多不满意，而回忆又有太多美好。于是历史就被理想化。回忆中的美好也确实有先祖留下的物质和精神的遗产，供我们继承，在继承中不断的发展。我们继承和发展传递给子孙，也就成为“祖”的遗产，这就保证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界的相对优势。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之链。5000年不间断的传承发展，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说更早的中国没有文明。严格说，从老祖宗走下树，站立起来的那天，就是人类文明的起始。到我们的先祖制造工具，学会用火等等。但这些都只是文明元素，这些元素需要累积，累积得很厚很厚，才能算进入文明时代。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提出文明有三个很具体的标准，得到全世界文化学者的认同，这三个标准就是城市、文字、精神建筑。按这三个标准，中国的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第一个王朝建立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但国家所需要的所有文化生态成熟时间，当在国家建立前的1000年。这就是中国文明

5000年的来历。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也应在中华民族迈进文明前的那一刻。就是学者们共同能认同并接受的仰韶文化后期与龙山文化早期。即距今5500年—4500年之间。

文明是文化的高级形态，是文化的结晶，文化被提炼和固化就是文明。炎黄时代的文化已经被提炼和固化，它影响着—个民族的继承和发展。文明的发展是一条河，不能没有源，不能断其流。中国文化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展开，就有了复杂的性质和不同的形态。每种文化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条件，这些必然条件就是人类顺应天时地利而生存。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地形和气候的差异必然产生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广袤的中国有不—样的地形和气候，人类最适应其方式方法有多样性就必然催生出有差异的地域文化。人是流动的。人在流动时，有差异的文化就会有冲突。人总是渴望和追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寻找的过程中，就会碰撞，对立冲突的结果，就是圆融和谐。这种融合让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把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带进了新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为共同体提供营养。中国文明就在这种反复的融合中呈—种成长的态势。

如果把地域文化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比对，就会发现真实。真和实是有区别的，符合客观事实的是真，有发生发展过程的是实。这种真实就可以转化为今天社会发展的营养。在对比中我们就会发现随州地域文化有本源性和融合性的特点，它与中国文化有—种自然的、必然的一致的发展方向，这就与中华文化有—种本质的固定的联系，这就是规律。

地域文化的研究，终极目标是更有利于这块土地的发展。随州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我们知道，文字形成并成为完整的体系与人类跨进文明之门有很长距离。口传的多样，就让炎黄有

多个故乡。其实，这正好证明中国文化是在多个的地域发生。炎帝早于黄帝说明炎帝神农文化的本源特征，黄帝通过征战成为正统，说明炎帝神农文化还具有融合性特征。那么我们通过地域文化的特质研究就可以判断传说的真伪。

由于地球板块碰撞，随州有一个“玄牝”的地形。这是一个万余平方公里的狭长走廊，狭长走廊里大量的低山丘陵和呈叶脉状的水系，还有丰沛的降雨，让这狭长的走廊成为生长万物的地方。随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必然为人类开发利用。那么，这里就必然成为文化发生的原点。原点地区的文化必然具备本源性特点。有人会问，湖南道县蛤蟆洞发现的稻谷，距今15000年。不错，稻谷经历了野生稻、籼稻、粳稻的演变过程，随州出土的稻谷品种是粳稻，是经过多次进化的栽培稻。这种稻谷品种恰恰说明5000年前，随州的稻作精细耕作文化十分成熟。中国南北融合有两条通道，一是中国的汉水，二是狭长的“随枣走廊”。长江中游地区与宽阔的中州平原最便捷的通道是“随枣走廊”。随州地域文化中必然有丰富的融合元素。

随州的地形地貌气象物候虽然有5000年的变化，但差异不大。不会由亚热带季风气候变成暖温带半湿润气候。这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随州境内有56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紧邻随州的屈家岭、雕龙碑、石家河三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是得到中国学界承认的稻作农耕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标本，这就是实。这种真与实的结合才是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并不需要证明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先民叫炎帝神农，但这种地域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和中华民族认同并接受先祖文化完全重叠。这就为我们祭祀先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者说，随州的先民无论叫什么名字，以他们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都值得一个民族虔诚地祭祀。这就是慎终追

远。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社会性就是他需要过群体生活。中华民族在祭祀过程中就会聚在一起。很多人虽然人不能到场，但心是会向往这种聚集的。在聚积中人们就会思考，在思考中就会发现，在发现中就会明白。发现和明白地域文化才是中国的唯一。这种随州地域的唯一，以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文化，恰恰和炎帝神农文化完全重叠。发现的地域文化都是中国元素，明白的地域特点又是中国的唯一。发现是察觉，明白是领悟。这种察觉和领悟又叫觉悟，就是让参与者有一种归宿感，有一种欣慰。

随州人的梦想，就是创造这种觉悟的契机，然后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所谓机遇，就是无数个机缘巧妙地叠加在一起。世界华人谒祖就会有无数个机缘巧妙地叠加在一起，这时，随州就会获得这种先机。因为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必须实现中国中部的崛起。中国中部是中华民族强雄的根本区域。今天的沿海经济发展迅猛最多只是中华民族富强敲响了边鼓。如果中国中部60%以上的农民没有实现富强，中国的富强只是一句口号。我们知道，政治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力。如果在中国中部地区建设中国的国家民族宗庙，随州就是中部六省的中心点。通过宗庙祭祀巧妙地转移中国的政治资源，以用于中国中部的经济发展。

我把这种梦想提炼为“随州之梦”。在自己穿越生命的大坎坷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个梦想。我在化疗的时候，对“随州之梦”进行完善补充，出版了。也是先祖感念我的诚恳，庇护我通过人生的一道大坎坷。

国家民族宗庙建设就是夯实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地位。炎帝神农虽然是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接受的前祖。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

特点必然会有多个原点，而国家民族宗庙是不能有两个的，随州要解决唯一性的问题只有从地域特点着手。也就是说随州是中国的唯一。相对于黄河流域，随州强调长江流域稻作精细农耕本源性特点，相对于长江流域，则阐述长江与黄河的融合特点。

我们必须明白，“国家民族宗庙”最坚实的支撑不是宏伟的建筑，而是文化。离开了文化，那么建筑只是没有生命的石头。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知道，本土的地域文化学者只能出现在对这片土地有深厚情感的随州的学界。我们要建设“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必须着力培养自己的专家学者。事实上，随州学界有一个群体生存状态十分卑微，虽然蓬头垢面，但他们依然像苦行僧一样，扎根于随州的地形地貌、气象物候，研究醉心于随州的地下文物解读，深入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整理。他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独立人格追求的志于道、厚于德、多才识、傲岸不屈的群体。今天的所谓“高层次文化论坛”说的虽然是文化真理，但对证明随州地域文化与炎帝神农文化重叠作用不大。“世界华人谒祖圣地”的唯一性只有通过地域文化的唯一性来实现。

“世界华人谒祖圣地”的建设是通过每年的“世界华人寻根节”来实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喜欢过节的民族。有人统计中国56个民族从古到今的各种节日达1700多个。节日是生养人们的文化之根，它有丰富的文化意境与象征，并注入了社会的现实功能。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节”是什么。“节”这个字虽然多次简化，仍表示是植物的坚实结节的部分。“过节”是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通过这个非常的时间，艰难的时间。随州地区传说，农历四月二十六是炎帝神农诞生的日子。这是真正的中国的“圣诞节”。

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这“子孙”二字是泛血缘意义和文

化意义。而且文化意义重于泛血缘意义。因为炎黄是人文初祖，所以中华民族准确地表述应该是炎黄文化子孙。炎帝神农是创造衣食住行的先祖，相对于黄帝征战的丰功伟业，似乎少了些深沉和威严。但这种祭祀是我们普通民众对先祖在艰困环境辛劳创造的一种感恩。“寻根”，何为根，就是植物的那些疙瘩，就是劈都劈不开的地方。根是苦的，根是疙瘩，根是情结。想到祖先的遭受的苦难，心里就不得过，这就是疙瘩和情结。这时，人们就会自发地把最好的食物、歌舞献给先祖。所以才有“至今神农庙、年年赛村鼓（《随州志》）”。这就是村村准备最好的锣鼓，文艺节目到神农庙前进行比赛。这个节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更是我们内在的精神支撑。

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不多，有人统计不到城市人口比例的3%。但商家为了利益反复炒作，大多数人对其中的宗教意义完全漠然。其实，炎帝神农的生日是东方“圣诞日”，其中衣食住行中的商机更多，然而没有文化精英的融入，商家不知怎么开发。比方，我们献给炎帝神农的祭品，那是要带回家与家人分享的。这种“分胙”比佛教中的“开光”可能更有意义。这就必须有文化精英的融入，可是我们真诚地尊重这些文化人了吗？“寻根节”可以开发吃随菜饮随酒体验随州的饮食文化。随州饮食食品的祭品系列的开发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随州还有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随州民间艺术中有完整说唱表演体系，其中美轮美奂的形式，多姿多彩的特点，还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民间风俗、民间艺术走不进寻根节，这个节日不可能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把普通民众拦在神圣的炎帝神农祭祀广场之外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我觉得，一个节庆，不能让普通大众成为活动的局外人和围观者。普通大众不参与，就不会有记忆，没有记忆

怎么可能有情怀，就进不了老百姓的血脉和集体的记忆。炎帝神农首先应该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然后才是建筑。我们在这个日子里缅怀追思民族的过去，展望美好的未来。随州人是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如果嫡传子孙的灵魂在先祖的生日，也没有栖息和回忆，那是多么的遗憾。节日的生命与活力就在记忆的深处，灵魂的深处，必须让随州人有念想，充满期待。只有亲身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和占据，才能产生感受和记忆。

寻根节的颜色、锣鼓、祭品，就让我们兴奋，我们与所有的祭祀者都有亲近感、认同感，回家的感觉，就会对这个民族热爱。这种情感是人类的其他民族不可能有的，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群体价值观，是民族认同的标志。这种内心深处的感受和记忆，就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追求。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人首先要有情怀，有了情怀就会有需求。我们明明知道，牛郎和织女是不可能相会的，但我们有男女相爱的情怀，这种情怀就会编造出天下喜鹊去搭一座桥，让他们相会的传说。就会有民间故事、民间戏剧。当我们感受到男女相爱的真诚，就恨不得变成喜鹊帮他们一把。没有了情怀，也就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会越来越空虚。当一座城市只知道赚钱与花钱时，这座城市肯定就失去了品味。如果我们的节日是为老百姓办的，就必须把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放在首位。老百姓就不会感到幸福，没有普通民众的主动、冲动，这个节就不可能有魅力。

祭祀大典只是这节日中一个规定的程序。祭祀大典之后，必须让节日成为老百姓有凝聚力和亲和力的时空符号，搭建一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平台和载体，传承民间文化的地域性特色。而且这个特色只有炎帝神农故里才有。这就是说炎帝神农文化的

思想和理想活在文化精英的不倦地探索追求之中；那么，炎帝神农文化情感和先祖的凝聚力则必须由普通民众重视这个日子，用特殊的表达方式传导和承载一种家国民族情怀，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追求。如果文艺院校的精英人物能与随州民间艺术结合，随州的民间艺术一定能提升一个很高的档次。文化只有沉静，沉到心灵里去，就一定可以出成果。

节日的真正美妙在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在人们心灵的记忆深处，是始终不需要提醒，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就会买些肉回来腌制成腊肉。到了除夕，就是在天涯海角，也要赶回家去吃一顿团圆饭。中国的春节如果用英文翻译是没有一点味道的。西方人是不可想象的，为吃一顿饭，形成人山人海的潮流和涌动。人山人海的涌动中，都很少有人争吵。有按捺不住心中急躁的人争吵了起来，只要说：“吵个么事，早点回家过节。”多少的烦躁也会平静下来。

我们随州要建设“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就需要随州地域文化研究的同志去发现随州本土文化生态中的深刻内涵，只要地域文化被人识别，被人理解，就能被人接受。随州村村镇镇的老百姓发掘出本土蕴藏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通过艺术院校的艺术精英的融入，在节日期间进行展示汇演，然后逐步走向常态。我们的执政者必须有民族复兴的大胸怀，而不是功利主义的政绩观，让老百姓幸福地和文化精英结合为一体。凸显其地位和作用，“世界华人谒祖圣地”就不是一句口号，“世界华人寻根节”就会成为一个美妙的节日。

台湾印象

能到台湾走一走，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梦，很小的时候，就想去看看，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没能圆这个梦，湖北省政协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终于让我的梦想成真。壬辰年深秋，省政协通过中华文化交流协会的努力，到台湾去参访考察的活动成行，当我登上台湾岛，见到了真真实实的台湾，走过了台湾的许多地方，收获太多太多。台湾很多美丽的风景，蕴含的内容很丰富，当我写下“台湾印象”几个字时，觉得能够写的东西也很多，但是，我却又不知从何处落笔，沉思良久，觉得还是从自己最熟悉的文化开始写起。于是，就有了这四个段落。

一、温暖民族记忆的那些人

走进《湖北文献》社，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这里是台北市龙江路二二三巷十一号，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院。门口有一块“湖北文献社”的铭牌，看到署名“黄冈万耀煌”，就肃然起敬。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些爱好，知道万耀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万耀煌是湖北黄冈周铺镇万家大湾人，光绪十七年出生，先后进入湖北陆军小学、陆军第三中学、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接受的军事教育完全是新式的。加入过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从教会团体到革命组织的日知会，日知会被改造成革命组织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举行演讲会，阐述革命思想。日知会实际上

是同盟会湖北分会，居正是湖北革命组织的代表，也是同盟会会员，在居正的介绍下万耀煌加入同盟会。

居正是湖北广济人，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居正曾被被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连署提名为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得选票2191票，比蒋介石只少269票，就知道这是湖北的骄傲。居正也是淡江英专的创办人，淡江英专后改名为淡江大学。今日淡江大学仍以居正的生日11月8日为校庆。

万耀煌被居正看重是这个人有吃苦耐劳的质量，也特别能带兵打仗，先后被拔擢为师长、军长，1928年6月，升任十五军团军团长，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万耀煌率部转进湖北，兼任武汉卫戍区副司令，与司令陈诚共事。“西安事变”时万耀煌是蒋介石“随难之臣”，然而拥护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景仰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万耀煌作为军人，总是希望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让军人的价值得以体现，就是奋力杀敌救家救国。所以他内心深处是希望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

“卢沟桥事变”是全面侵华的起点，作为军人他看得很清楚，日本人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长期推行的方针，进而统治亚洲，是日本的国策。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就是南方炎帝神农部落的精神特质，刑天舞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悲剧故事都发生在这个部落，为了能追求安稳的农耕生活，湖北人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铭刻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从抗金反元，到反清复明，从辛亥首义，到抗日战争，忠臣良将世代相传。这是因为稻作农耕部落最追求和平，当他们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他们身上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

万耀煌屡屡请缨，并率所部官兵，为佟麟阁、赵登禹等先期损躯之将士设灵祭奠，泣血宣誓：当追佟、赵慷慨赴死；誓扫倭奴，飞雪国耻！屡无复电，万耀煌毫不气馁，派夫人周长林直赴南京，晋谒宋美龄。周夫人慷慨陈词，极言属下官兵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请缨杀敌，誓尽军人天职以报国家，声泪俱下。其情状令宋美龄动容，宋夫人亲向蒋介石建言，万耀煌得以率部赴沪作战。抗战胜利后，万耀煌曾担任两年的湖北省主席。

我们坐定，开始逐步认识台北的这些湖北乡亲。《湖北文献》社社长汪大华先生，1934年生于蕲春张榜。1949年随父去台湾。其父曾任台湾“国防部次长”，中将军衔。本人法学学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月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理事”、“中华民间各同乡会联合会常务理事”、“金瓯女子中学董事”、“湖北同乡会常务监事”，在台湾湖北籍人士中有较强影响力。

陈兴国，湖北黄梅人，“总政战部”中将副主任退役，台北湖北同乡会会长。陈先生知道我是随州人时，握着我的手说：

“已经三次参加世界华人寻根节，每次参加感受都不一样，一届更比一届隆重。想到自己作为湖北人，就是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就应该为民族做点什么。”

严幼铭，黄陂横店黄严湾人，1931年出生于武昌，6岁丧父，14岁丧母，家世寒微，童年在战乱、贫困、孤苦中度过。

《湖北文献》季刊最早的创办人之一，担任社务委员，义务参与社务工作，迄今40余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无怨无悔。黄陂旅台同乡会理事，积极参与会务活动，从未中断。为家乡教育事业及长江水患赈灾解囊捐献。一个瘦瘦弱弱的老人，觉得他很亲切，

就和他攀谈起来。他说：“包先生，在自己的记忆里，18岁以前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曾担任过台湾“中央日报”前总经理助理的车守同先生是现《湖北文献》总编辑，1955年出生于台湾与我同庚。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文化学者，他在介绍台湾情况时，几次讲到台湾1895至1945的历史都用“日据”时代来表述，与导游一口一个“日治”时代有明显区别。历史是由历史真相和历史观构成的，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正确的史观。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占据台湾是历史的真实，“日据”不仅仅是叙述历史真相，也蕴含着正确的历史观。这个“据”字有占据、殖民的意味，有一种非法在其中。而导游所说的“日治”有治理的意思，具备合法性在其中。我觉得认同中华民族的人讲“据”，就是铭记民族的耻辱。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湖北文献》一看，就感到了震撼。桌上的两本《湖北文献》分别是184期和185期。这两本《湖北文献》的后两页有在台湾的湖北乡亲捐赠款额和订阅收入，其中收入仅有新台币300元，也记得清楚，只相当于人民币的几十元。刊物按收款的时间先后次序姓名数额，还有每期的总收入和总支出及总结存，用表格列得清清楚楚。这些数据是什么？是一群文化人的艰难与坎坷。是在台湾的湖北人用对家乡的思念和情怀呵护的一片绿荫。

一个人身在异乡，思念家乡是一种本能。时间一长，异乡成了家乡，家乡成为异乡，灵魂在家乡与异乡中游荡，其中的苦痛，无人知道，唯有这刊物记录和展示着那无数赤诚的心灵。

陈兴国说：“湖北与台湾的距离不是很远，我的归乡之路，从1947年走到2006年将近一个甲子。当我见到我的亲人长辈时，相拥而泣，来到祖坟前，痛哭失声。”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一种

崇高的力量，扭转爱的方向。这就是“孝”！爱的力量向下是一种本能，动物也有。唯有中国人，从学会说话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个姓其实就是在反复强调自己的生命从何而来，一辈子不要忘记。故乡是生养自己的地方，或者是生养父母及先祖的地方，实际上故乡就是另一个层面的父母。我们说爱自己的祖国就是从爱这里开始的。这里就是自己生命的根源所在，无论走多远，绝不会忘了自己的血缘之所在。绵绵乡愁永远与祖宗亲情联结在一起，回家，是中国人终生不渝的信念。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春运感到不可思议，那么多人，非要在这个时刻回家。无论多少艰难，读过书没读过书，这时就知道自己要回家，家乡那才是最叫人牵肠挂肚的地方。一个人几十年找不到回家的路，那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20世纪先后有多种类似的刊物在台湾创办，独独《湖北文献》四十六年生机盎然。我想，湖北在近代中国有太深刻的记忆，从洋务运动的汉阳兵工厂，到辛亥革命的发生，这些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记忆，绝对没有共同的未来。眼前这些人一下子在我眼里高大起来，他们在用生命中的那一点点能量，捂热一个民族的记忆。这两本《湖北文献》顿时在我手里有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汪大华社长详细介绍了《湖北文献》为“征文考献、采风载籍、崇功纪事、弘扬文化”。刊物创办于1966年，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为什么这样？汪大华先生说：我们必须让在台的湖北乡亲的第三、四代对湖北桑梓故里有认同感、对中华民族有归属感和荣誉感。湖北省省长王国生先生到台湾，汪大华先生送给王省长的礼物，就是全套《湖北文献》。我想，王省长抚摸这套《湖北文献》，一定感觉到了在台湖北乡亲那一颗颗滚烫的心。他说：

“文化才是维系湖北乡亲与家乡的最佳平台和载体，这份刊物一定要持续办下去。”

轮到我交流发言，我说自己曾经从事过民间刊物创办，知道办刊的艰辛和困难。所以我对在坐的各位有一种真诚的崇敬和仰望。刚才我问过办刊经费主要来源于旅台湖北乡亲捐助的退休金、工资甚至遗产。看到刊物公布的收支细目，什么也不要说了，这些数据就让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爱与善良，你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爱和善良。

《湖北文献》第184期中有一篇文章叫《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惊艳出土》，在台湾看到这篇文章，作为随州人，我觉得是那么亲切。我向诸位介绍一下，叶家山曾侯家族墓群被评为中国2011年十大考古发现，这种评选公布时是以年代排名，但我告诉诸位，叶家山曾侯家族墓群是满票当选，如果按票数应该是排名第一。这个墓群的发现，意义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已经融为一体，随州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区域，墓中文物就是典型中的典型。我讲了叶家山曾侯墓群对中国先秦文化界的吸引力及影响，中国先秦历史学界召开年会时在随州设立分会场的经过，还有开会时的盛况。在台的湖北乡亲不断地问话，从那些问话中，我觉察到作为湖北乡亲的那种震撼和骄傲。车先生当场向我约稿，请我把随州文化介绍给台湾的湖北乡亲。因为时间关系，汪社长说李庆安副社长、童中仪社务委员两位女士在三军军官俱乐部晚宴所在处等着我们，我们边吃边聊。

在路上，我知道了在台的湖北乡亲，他们不仅仅办了《湖北文献》刊物，还极为重视文化事业，每年通过《湖北文献》社向优秀的旅台鄂籍大专院校学生颁发奖学金。我们的车子走到台北信义路，车守同指着道路边的一所学校说：“这是台北私立金瓯

女子高级中学，李庆安女士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是1946年由鄂籍来台人士为纪念台湾光复而斥资创立。当时名“金瓯小学”，取“金瓯无缺”（出自《南史·朱异传》）、国土无损之意。1992年更名为“台北私立金瓯女子高级中学”，成为台北市第一所改制学校。现在，这所学校设有普通高中、综合高中、商业职业科，成为台湾有名的女子中学。校训为“诚、朴、勤、毅”，“诚”就是“诚以待人”，“朴”就是“朴以治己”，“勤”就是“勤以励学”，“毅”就是“毅以赴事”。首任校长周召南先生提出并释义。学校设有董事会，历任董事长瞿荆州（黄梅）、居正（广济）、张知本（江陵）、何成浚（随州）、贺国光（蒲圻）、刘博文（京山）、陈绍平（黄陂）、李焕（汉口）等均为湖北籍知名人士。现任校长为童中仪女士，黄陂人。

何成浚是随州厉山何家畈人，时任湖北国民政府主席。随州一中的前身烈山中学就是他创办的，他约请张学良、何应钦、阎锡山等社会名流为随州的烈山中学捐资。他还请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叶君健来过教，烈山中学的校训是“诚朴洁勤、发奋为雄”，与“金瓯女中”的校训几乎没有差别。我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随州政协还出版过“何成浚”先生的文史专辑，所以我觉得老校长担任过董事长的学校很亲切。

因为我喜爱看《海峡两岸》，对李庆安一点也不陌生，也知道她祖籍湖北。李庆安家世显赫、才貌双全，是国民党民代中很受大陆观众喜爱的女士。她专业勤奋，是坚定的反对“台独”、“公投制宪”、军购，主张统一的人，是打击“台独”、批判民进党当局搞“去中国化”不遗余力的泛蓝战将。1992年10月任展望基金会执行长。父李焕，前“行政院长”，母潘香凝，前“国

大代表”。

见到她，少了些立委的直率淋漓之气，但充满著青春活力，显得更是亲切平和。接过她递来的名片一看，印着“泛太平洋集团”执行长、“中华孔孟学会”副会长、“湖北文献社”副社长，就感到这次赴台真是幸运，能这样近距离与知名的女士交流是一种缘分。泛太平洋集团是潘思源先生创办，我知道那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中国概念”的大公司。中华孔孟学会，以非营利为目的之社会团体，以阐扬儒家思想，恢弘伦理道德，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历任理事长有陈大奇、增约农、陈立夫、朱汇森、潘振球、李焕等耆宿硕儒知名之士。

生命与生命的相逢是一种缘分。在横无际涯，大无可方的空间，在没有起始，永无尽期的时间，两个生命的相逢是千载一瞬，显得格外珍贵。握手时我对她说：“在电视中早就认识，今天与您相见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就是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乡。”

她说：“家父李焕生于湖北省汉口，祖籍黄陂。”我接到赴台的通知后，查过相关的资料，知道李焕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历任《沈阳日报》社社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秘书、沈阳市政府外事处副处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书记等职。

李庆安说：“1949年到台湾后，因为擅长组织协调又深具学术涵养的李焕得到了蒋经国先生的重用。蒋经国先生开始在台湾推行‘革新保台’运动，家父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关键人物，从而也被外界视为国民党开明派的典型代表。”

我知道李焕担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教育部长”。1987年7月蒋经国先生提议，任命李焕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这项任命是在台湾解除“戒严”前夕宣布的，被认为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李焕具有强烈的“大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脱离中国而独立。因此李登辉上台后，以李焕等外省籍官员为代表的“非主流派”和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围绕着权力分配、“统”与“独”走向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李庆安接着说：“家父自1949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去台湾后就没回过祖国大陆。虽然大陆方面过去曾多次邀请他来访，但均碍于身份敏感，如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并担任过‘行政院长’和国民党秘书长等要职，而没有成行。到2002年，应大陆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家父才以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身份率‘中华民国’孔孟学会成员到大陆访问。”

“家父参观了北京、山东、上海、湖北、广东等地方。时隔50多年，家父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心中特别激动。亲眼目睹大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家乡的巨大变化，了却了一大夙愿。他表示在有生之年，会用自己的生命能量的热度，温暖家乡，为民族多做有益的事。”

这一次是李焕先生半个多世纪来首次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

她担任“展望基金会”执行长期间，积极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在两岸分隔43年之后，我们推动“兵马俑及金缕玉衣”赴台展出。当时绿营的人拼尽全力抵制，又是游行示威，又是静坐。我们顶着种种压力开启了海峡两岸第一次的文化交流合作。有了第一次，才有今天的文化交流盛况，看到两岸的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觉得当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

童中仪是《湖北文献》社社务委员，出身于教育世家。其父童启祥先生是闻名海峡两岸的教育家、台湾国父纪念馆首任馆

长，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金瓯女子中学从创办到现在已经60年，历届董事长、董事和校长都由湖北籍人士担任。童中仪女士是该校第九任校长，她还是台北市湖北同乡会理事，代表父亲充当起与家乡交流的友好使者。她认为两岸的教育交流太重要了，她说：“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这里是祖国，但对于孩子们来讲，这里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要让孩子知道这边的一切，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渊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根在大陆。”

她告诉我：“在北京，有很多历史文物，学生们在课本上都念到过，但是自己没有亲身体会到，所以让他们来体会一下。比方，景山公园，哪一棵树与崇祯皇帝有关。学生们在历史课本中都有了解，我们也要进行考试，但是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要让他们自己来触摸，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真的。我们的祖先来自于这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明白，她是用自己的教育能量，把一个民族的记忆装进一代人的心里，当两岸的一代人有共同的记忆，才可以创造共同的未来。

“台湾的人也觉得湖北人特别厉害。”李庆安女士插了一句。

“湖北与近代历史的关系太密切，像汉阳兵工厂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李庆安女士突然问：“有人问我，‘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赴台参访团的彭明团长要我解释一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说：相当多的解释认为，荆楚是崇拜凤凰的部落，也是从凤凰的概念去寻求答案，故而现在的许多答案差强人意，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尚能令人满意，但不是最好的解释。

我觉得，这句俗语还有更好的解释，它与湖北的地域有关，应该从地域文化特点去寻求更完美的答案。湖北在中国中部的中心位置，被称为九省通衢，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湖北能够广泛地吸收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营养，有人问：湖北的地域特点是什么？其实湖北就是一种不南不北、又南又北的特点。一个地方善于吸纳和融会，那么这个地方就一定呈一种成长的态势，始终能够成长的地域，一定是一个强健的地方。这种地域特征不是哪里都能够有的，唯有湖北的九省通衢的地域位置是他地不可替代、也难以复制的。文化成长的时候只有多元的文化反复的交融激荡，接受的一方觉得对方的文化元素好，才会去吸收。李庆安觉得这个解释很有些道理，专门来到我跟前敬了我一杯酒。

晚宴过后，汪大华社长又安排我们合影留念。从走进《湖北文献》社那个普通的小院，到三军军官俱乐部晚宴，我觉得在台的湖北乡亲为我们营造了“家”的氛围，我们这些参访台湾的人没有丝毫的异地他乡之感。这一群人把异乡当故乡，自己的人生在异乡与故乡间奔走，灵魂也在故乡与异乡中安驻。

离开台湾时，这些湖北乡亲赶到圆山饭店，为我们参访团的每个成员送来了台湾的最好伴手礼“凤梨酥”。我想到小时候，走亲戚时，只有走最亲最亲的亲戚，吃饱了、喝足了，还会给些礼物带回家，让一家人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这一盒“凤梨酥”将甜蜜我的家人，两本《湖北文献》，我将认真研读，读出这群在台的湖北乡亲的情怀，尽力写出亲人们那滚烫的热度，复活我们的共同记忆，走向美好的未来。

二、文化交融激荡的地方

台湾的行程中最叫人难忘的地方，就是花莲县的七星潭，那是一个美丽的海湾。海岸线延绵20多公里，海滩或宽或窄，或陡

峭或平缓，平缓处多为砾石滩，是一个踏浪捡石的好去处。

来到台湾的七星潭，天阴沉沉的，不时的飘下几丝细雨，我看只有一些雨丝，就没有拿伞，穿过赏星广场，面对的就是浩瀚的太平洋。那海浪一阵一阵从远处向眼前涌来，心胸顿时觉得开阔起来。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深的海洋，只有这时候，在世界最大的海洋面前，才感到人的渺小。我们的目光能看到的方，就那么几公里，如果天气好，可能就几十公里。但我所掌握的地理知识告诉自己，目光能见到的太平洋，只能是真正太平洋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太平洋超过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其面积不包括邻近属海，约为1.6980万万平方公里。是第二大洋大西洋面积的2倍、水容量的2倍以上。面积若是以亿为单位的时候，目光所及几十上百平方公里就微不足道了。

那一浪接一浪涌上海滩的海浪，就像多情的人为自己的情侣献着殷勤，那么亲切、那么热忱，一浪还没退去，后面的一浪就跟着过来了。这时我感觉到脚下的这片土地，真正是文化反复交融激荡的地方。我们知道太平洋是当代地球上最大的构造单元，它和所有大洋有着不相同的演化史。环太平洋的地震火山带、还在发育成长的岛弧及海沟，东西两岸的地质构造历史有着明显的差异。地质构造的不同不仅仅是位置和地形的差异，气候物产也必然会有很大不同，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生存的需求，就必须适应天地的自然规律。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手段，这各不相同的手段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求和人类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这就必然产生各不相同的文化。

人们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就会顺应这种自然环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中也必然有精神价值，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就成为一个群体共同遵守的生活习惯，经过凝炼渐渐积淀

成一种集体人格，就是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人的生存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

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化是东西方两种文化。

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希腊，只需要把世界地图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海洋文化。那是一个陆海相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必然会有与陆海相适应的生存状态。地处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是一个半岛，东部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海岸线。依傍着爱琴海的海岸有许多天然港湾和小湾，海水平静、陆海交织，航行在海内的任何部位，远方的陆岸都不会很远，风起浪涌之时，航船随时可以入港泊船。希腊的橄榄油、葡萄酒，可以和便捷地在西亚、北非换取粮食、金属和奴隶。这就必然孕育人类的商业文明。商业需要灵活的头脑、处世的精明、及时的信息、广博的知识，这种文明的模式就是科学加商业，文化精神就必然是理性加利益。这是西方人生活的必然选择。

这种文化的个人意识很强，经商的成效如何，不在别人，而在自己的才干，个人的能动精神突出，获利就多。所以这种文化激励进取、鼓励冒险，个人努力尽可能更多更快积累财富，就必然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文明进步需要权力与财富的集中，然而“丛林原则”有让人类退回到丛林重新成为动物的危险，这时，人们渴望有人来救渡这个世界。于是，耶和华盛顿生了。耶和华盛顿的原意就是拯救。耶稣用基督教义维系着人类心灵深处的爱和善良的因素，让商业文明能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里始终保持着一种爱与善良的理性。商业文明始终没有迷失方向，为人类获得科学知识，推动历史进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东方所面临的太平洋与希腊完全不同，既没有地中海的安详，也没有陆海相间欧亚非大陆，只有苍天和大地。在这块土

地上生存，个人的意志强大也无法阻止干旱、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到来，人们只有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才能生活下去。对天地依赖的农耕生活中，人们生存的需求寻找家庭家族力量的集中，才能在干旱和洪水面前有一点作为。以家族为基本单元的宗法制度就是应对注重自然环境的挑战，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东方人生存、繁衍、发展之道。

这种以农业耕作的生活习惯，从生到死就离不开脚下的土地，为了让这片土地能打出更多的粮食，施展的能动性就是起早贪黑呵护这片土地，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摊牛粪，中国的老农民会脱下自己的衣服，包起牛粪送到脚下的那片土地。中国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可以用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也要把自己脚下的瘠薄土地盘成丰腴的良田。中国人心里想的就是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从不会对远方的土地产生兴趣。这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心中敬畏和崇拜的是天地、是给自己生命的先人。这种自然崇拜和血缘崇拜用一种特别的精神价值支持着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展到今天。

中国人的先祖是炎帝神农和轩辕黄帝，中国文化又被称为炎黄文化，那就是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的两个宽厚平和的老农民。其实中国文化是一种实在厚道的文化，说中国威胁的人要么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我知道自己的目光所及之处，只是太平洋很小很小的一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航海技术的掌握，过去令人畏惧的太平洋在今天看来，也和地中海一样便捷。商业的文明模式和文化精神就希望得以扩展。这种文明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源和市场。这两种因素决定了这个文明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边界。西方文化把眼光盯住了东方世界，台湾就是西方进入东方世

界的一块美妙的跳板。

最早进入台湾的是西方的教会神职人员，1619年，天主教教父随西班牙侵略军进入台湾。162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台湾，荷兰改革宗教会教士来台传教，基督教由此传入台湾。17世纪初叶，荷兰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殖民强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荷兰侵略者据台时，驱逐了天主教教父，留下一群无人领导的信徒。然后大量聘用荷兰改革教派的神职人员来台传教。这些人传教的最重要方法就是创办教会学校，利用荷兰的资本主义成果，灌输西方文化的价值观。1662年荷兰侵略者不敌投降郑成功，郑氏并没有驱逐基督教神职人员，西方宗教就这样占据了台湾人的心灵。我们环岛的时候，公路边有许多土著民的墓地，那墓地的坟头有许多许多十字架，应该就是西方文化传播者的成果。

福建南部的闽南人是台湾人口的主体，据相关资料分析，闽南人占72%，外省人占13%，客家人占11%，原住民和新住民为4%。这就是说：从血缘上来看，中国文化的印痕谁也没法抹去。文化就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生活方式，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中国人有一个最重的印痕，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姓，从学会说话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姓什么。姓氏实际是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最基本的理念。这种姓氏强化就是东方中华民族独有的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

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了多么远，隔了多少代，入了什么籍，都不会忘记自己姓什么，也不会把个人的名字放在前面，姓氏放在后面。其实这就是在反复地提醒“我”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我”是父母所生养，父母是祖先生养，不要忘记生养大恩德。中国人一生就在这人性

朴、动情的“感恩”中受教育，是因为中国人的姓氏时时刻刻都不能与自己的身心分开。姓氏帮助中国人完成了人格修养的教育。中国人不信教，但中国人必须守住的一套人生底线，就是不能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先的事。这种生活习惯沉淀为集体人格，就成为民族的灵魂。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信教，就难以完成自己的人格修养。其实中国的儒、道、佛用不同的方法，把一种爱的精神贯穿于文化哲学的始终。爱是向下的，动物也知道爱自己的子女。人的伟大和崇高就在于能够改变这种方向，让爱能向上流溢。农耕重继承是因为耕耘收获、分配消费都是在家长的权威下进行，形成尊老敬老的习俗很正常。商业活动千变万化，遵循老经验可能会赔本，盲从权威还会破产，所以尊祖敬祖的意识要淡薄得多。东西方人在一起生活，文化习惯就会有大的冲突。过年了，中国的男人女人不顾一切地要与的亲人团聚，家庭的另一半就感到不可思议。什么亲人？从没有来往的人，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帮助的人。清明节，中国人又要去给那些从没见过面的人上香烧纸。东方人丢下工作也要回故乡去祭祀的行为，西方人觉得难以理解。

现代西方人以寻根为新潮，被称为揭开近代西方序幕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在意大利发生，就是寻根。因为意大利保有大量古希腊的文化典籍。基督教教会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精神支柱，个人的价值不能通过正常的道路得以展现，就必然去寻找一条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中国人无需寻根，这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年夜饭的温暖，清明的袅袅烟火就是中国人寻根最感性的东西。尊祖敬宗精神从宏观上铸造了一个民族永不衰竭的向心力、凝聚力。文化不是说读了多少书的人才有，它就是融进了血液中的自觉行动。到了过年的时候，无论多少艰难，也要

回家。人生坎坷的时候，抬头望着天上的那轮明月，想的就是生养自己的故乡，自己不在那里生、那里长，从来也没见过，不重要，只要那里是生养祖先的地方，依然是故乡。祖是一切亲情、根系所在，“血浓于水”是中国人终生不渝的信念。

台湾的人口构成说明，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肯定是东方的。然而，台湾特殊的地域位置和特殊的历史，让这片土地必然比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台湾人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说明台湾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孙先生希望用西方的民主思想完成东方民族复兴的理想。孙中山所处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全面遭遇危机的时代。孙先生的生活经历，让他觉得通过西方的文化可以让中国民族独立、民主、富强。其实孙先生对西方并没有全面的认识，中华民族的独立首先是文化的强大，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不是简单嫁接就可以兼容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的旗帜是那么吸引人心，以为三民主义就可以带给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富强。

孙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叫宋嘉树，同是喝过洋墨水的，又同是基督教徒。宋嘉树娶妻倪桂珍，生下了影响台湾命运的蒋夫人宋美龄。宋嘉树有12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还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倪桂珍母亲姓徐，她可以说是明朝中西文化交流的名士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毕业于上海圣公会主办的女子学堂。他们的女儿宋美龄是影响台湾人的思想的。而宋美龄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宋美龄5岁就进入中西女塾，8岁开始美国生活。十余年的美国生活，除了一副面孔无法改变，她的身心都被西方文化和社会浸染、陶冶。

1943年2月，她站在美国众院讲台上说：“我操诸君之语

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美国人为之倾倒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是痴醉自己的文化。无论何种文明能够存世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维护爱与善良。宋美龄的演讲触动文明最脆弱的神经，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只有互相救助，才能存活。

中国的重大灾难其实就来源于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战争，中国的近邻日本是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发现亚洲的资源和市场已被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觉得依靠自己的实力，应该重新分配，这当然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就发动了战争。亚洲人民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在生死的时候，意识形态就显得不重要了，存活让不同思想的人团结成一个共同体。不同文明必然包含着爱和善良，人类因为有这些爱和善良，才没有退回丛林成为野兽。

人从动物中能脱颖而出，能保持对自然界的优势，就在于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生物性，自觉履行一种道德规范。东西方文化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存活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一种机制抑制人类自身向生物型方向发展。西方商业文化出现了基督教，人获得知识就是偷吃智慧果，就有了羞耻感。人不能沿着生物型方向走，走下去就是造新的罪孽。东方的农耕文化则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就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这实际上是维护文明发展方向的一种机制，一种道德人格的修养，把道德实践的经验内化到文化的结构之中，以凝聚积淀起强有力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日本文化中，始终缺少这样一种抑制自己朝生物性发展的机制。这个民族始终信奉实力，认为战败是实力不济的原因，从没想过正义性。历史与正义本无联系，历史是岁月的积淀，正义是判断的结论，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沿着正义的方向前行。日本

政府从没认为自己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战争中造下过罪孽，因此，从不会像勃兰特那样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一个民族的总理面对600万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深深的罪恶感、负疚感一阵一阵地撞击着心灵，想到自己的民族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良知良觉被唤醒，身为德国总理的勃兰特突然双膝跪倒在冰冷坚硬的大理石上。全世界在这一刻寂静无声，很多硬汉顿时潸然泪下。那一夜，德意志全民族彻夜未眠，反复收看自己选出的总理那下跪的画面，勃兰特的人格终于让一个民族的良知良觉得以苏醒，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负罪感。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错误，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中那种抑制机制发挥了作用。德意志民族从没有指责总理下跪是卖国行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民族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就是因为其文化中缺少这样一种维护爱与善良、抑制生物性发展的机制，所以就很难做到真正的悔罪。其自以为最聪明，最多是一点小聪明，不可能有大智慧。这点小聪明可以让其获得一时的利益，不可能真正强大。

财富获得与聚集的方式的不同，是区别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判别这两种文化品格高下的最佳切入点。

东方的农耕文化认为财富的获取，只能先予后取，只有给予，方能取得。收获粮食，先要付出汗水辛劳。中华民族的勤劳朴实、厚道平和是世界民族中屈指可数的。中华民族不信奉实力和征服，在万物面前，是平等的合作对象，对大地虽有索取，但必须要平等地付出。东方的农耕生活以自给自足为主，也有交换的商业，那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平等交换，它不需要有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这就造就中国文化与天地的和谐，确保了中华民族永续的生存发展，5000年的中国文明，依然和大自然保持了相

对和谐的关系。中华民族很满足已经得到的东西，不会无限的索取，这就决定了中华文明不具有贪婪的侵略性，它与游牧和商业完全不同。

人的生存其实就是能够转移宇宙深处的能量，天地对人类的仁慈和恩泽，就是用自己的能量注入生命之中。但是太阳不能直接把能量注入人体，太阳辐射出的能量必须由植物组织吸收，这就是神奇、微妙的光合作用。能吃青草植物的生物为初级消费，再吃初级消费的生物为二级消费。人作为一种动物，是自然界中很少的多级消费者。游牧生存方式需要两级的能量转换，两级能量转换需要广阔的疆域，以承接太阳能量的转化。这种生存方式天生注定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很多西方学者总是以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世界来论证中华文明，虽然这个游牧民族的部分后裔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但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农耕文化也是被征服者。而且，游牧民族的那种征服的野性戾气也被农耕文化的平和厚道渐渐消失融化。

西方的商业文化也是一种无明确边界的生存方式。资源和市场的最佳配置围绕的是利益，只要有利益，那里就可以作为起点，那里也能够成为终点。为了确保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生存方式总是以实力作为衡量边界的标准。

中国曾经有很强大的实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民族，但这个民族从没有野心侵略与扩张。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生存发展中，有过许多战争，然而全然没有扩疆拓土的侵略，而是守疆护土，维护农耕环境不受干扰的战争，更多的是农耕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耗战争。

我面前的海就是东西方交融激荡的一个所在，虽然是阴天，也有些风，但眼前的景象丝毫不恐怖，有点像一个顽皮的娃娃嬉

闹、喧嚷，深蓝色大海，看似很平静，为显示自己生命的存在，那一排排的白色浪从远处向岸边走来，发出哗哗的声响。我知道这浪也许就是从对岸而来，一次次地拍打着海滩，海滩耐着性子任由那浪的嬉闹和喧嚷。我觉得人类文化的交融如果不参杂利益因素，就应该是这样的模样，这是多么娇美的容光。

然而，人有欲望，欲望既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造成人类灾难的根本原因。一只蝴蝶在亚马孙河谷的鲜花边抖动翅膀，发出的声波共振甚至难以察觉，但是蝶舞可以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气流在两周后形成一场巨大的风暴。气象学家的“蝴蝶效益”理论其实也适应文化价值的冲突。我没有见到太平洋的台风登陆台湾，但我的脑海里储存着许许多多风暴面前，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无奈信息。由这些自然灾害就想到人类自己因为欲望引发的灾难，巨大的伤痛，恐怖的记忆，远比自然灾害可怕。

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不同的民族有着不相同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生态的差异就会发生冲撞，这种冲突有时就源于一个很小很小的起因，一种文化觉得微不足道，另一种文化却感到是尊严的丧失。尊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尊严是可以以命相搏的。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生活需要整体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心中的大中华就是一个家。

这个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和战争。《左传》里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初始是讲祀礼与军礼，后来成为祭祀与战争的最好解释。把祭祀和战争作为国家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具体诠释。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和祖先的神灵，祖先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天地是给予祖先生命的，这种祭祀就是感恩。

祖产有物质和精神两种，维护祖产，就是维护生养祖先的那片天地和祖先创立的文化。炎帝神农的精神特质就是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刑天舞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部落，因为这是南方精细稻作农耕的特质，为了追求安稳和平的农耕生活。当耕种的和平环境受到破坏时，中国人身上爆发的那种能量是不可思议的。近代中国有太多的国仇家恨，那被瓜分抢掠的记忆，那被奸淫烧杀的恐怖，仿佛就在眼前，但这个民族真诚地期盼着和平。这种期盼不是中华民族健忘，而是这个民族心中有太多的宽容和饶恕，这种宽容和饶恕必须是在能维护祖产的前提下实现。

人类文化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只要是文化，就有一种共同的元素，那就是爱与善良。文化的交融激荡过程就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吸纳的过程。以利益为上的商业文化很多时候以实力来判别文化的优劣，当一种文化以经济规模来判断文化价值时，必然误判。这种误判就可能蒙蔽自己的智慧，难以发现异质文化中的高贵，这种高贵与自己文化中的高贵有着相同的基因。这种相同需要的是发现，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发现这许多的相同，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根本保证。很多时候有些人不是发现和维持各种文化中的共同元素，而是想法操弄其中的差异，差异的扩大就可以获得更大利益。判别一种文化的质量优劣，应该从这种文化发生发展定型时期去寻找本源特征，进行分析，才能够获得这种文化的本质认识。

东方农耕文化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就在寻找与天地的和谐、与人间的和谐，这是一种整体观的文化。它起源于家，家族、社会，认为家是一个整体、社会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为了整体的完美，可以牺牲、奉献，大陆曾用一代人的工农产品剪

刀差，完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建设，也勒紧一个民族的裤带制造出“两弹一星”，才让一个民族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这种文化对于整体和谐的追求，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向。它追求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讲究的是共生共荣，而不是我荣你枯的零和。再比方父债子还，在西方和许多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东方农耕文化则是理所当然，因为我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子就是一个整体。儿子做错了什么，对不起的是父母祖先，这种约束不会小于宗教的约束力量。说实话，人类世界没有万世一系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文化要善于吸纳他种文化的营养，让自己呈一种成长的态势。

天地厚待中华民族，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一个地方，能广泛地接纳人类世界的许多文化。这就是天帝赐予的息壤，息壤就是天地间的一块神土，不仅能生能长，还能给人祸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有幸能先感受天下文化之精妙，细心品味，剔除糟粕，吸收营养。

我漫步走向海滩，台湾真是文化交融激荡的地方，我俯下身去，捡起一块卵石，那么温柔敦厚、圆融和谐，把玩良久，我体味出这卵石曾经无限大，岁月的浪涛渐渐地雕刻，才有了这等模样。多长的岁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由此我感觉到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神土叫作息壤，息壤是《山海经》中大禹治水用的一种神土，后来成为能为民众带来福祉的神物。息壤就赋予了台湾同胞的一种责任和使命，这就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真诚的心、爱和善良的准绳悉心体察各民族创立的各种文化，细心梳理、精心呵护、虚心吸收、诚心融合，一个民族因为有您的辛勤而受益。

三、台北的幸福感觉

走进台北，就感到这是一座幸福的城市，这种幸福感主要来源于这座城市浓郁的人情味。一座城市有高楼大厦、洁净的街道、宽阔的广场、悠久的历史，是一座幸福城市的必备条件。然而，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这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的精神才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如果在这座城市里，遇到了一个冷冰冰的市民，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可能就是极不愉快的感觉，也许就是这个人一生的记忆。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城市，给人的感觉是一股暖流缓缓地流进心里，在人的五脏六腑渐渐舒展，浑身就会有一种生机与活力复苏，这才是一种真正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给你的，必须是一座城市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

到台北后，基本上都是团队活动，团队活动中没有安排逛书店，作为读书人，很想去看看台北的书店。总算安排了一次自己单独活动的机会，就到总台问了问，买书到哪里去？就有人说：到诚品去，那是读书永远也不打烊的书店。我第一次感到了台湾人的热情。我感到了台湾人的热情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如果你有一点疑惑，他就会详细的为你解释，直到你明白为止。就是一个问路，马上有几个人围上来帮助你，让你置身于一种充满温情的氛围，这时就有一种惬意簇拥着你，那种惬意渐渐浸润你的五脏六腑，浑身就觉得舒畅，其实这就是幸福的感觉。

中华文化交流会的王冠云小姐接机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说台湾人很“鸡婆”，“鸡婆”就是很喜欢管闲事。并解释说“鸡婆”一词是从闽南语“家婆”变化过来的。闽南话中“鸡”与“家”读一个音，“鸡婆”就是家里的那个婆婆，明白了这个词的来源。“鸡婆”就有了一种很亲切很温暖的

感觉，家里的那个女性肯定就是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妻子，只有这样的人，生怕你不明白，才会千叮咛、万嘱咐，说了很多话，也不会厌烦。如果自己觉得不是一家人，才会感到这是多管闲事。冷漠的人才会觉到这种“鸡婆”行为是一种无聊、一种无趣。置身于这种环境，只要不说谢谢，对方就一直在说，我不说谢谢，不是自己没听明白，而是在享受家庭的那种温暖，这时的倾听不仅仅是一种修养，更是归家后在暖暖亲情中的享受。

台湾这种“鸡婆”的家庭温情，很快让人想起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农耕文化把一个很重要的空间，放进了血缘关系中，农耕需要家、家族、部落、国家的和谐稳定，长期的和谐安定，才能保证耕种有丰厚的收获，于是有了忠臣孝子的做人准则。从家庭老少尊卑关系中推论出国家的君臣关系，就有了家国一体的文化。在外做事要忠于朝廷，回到家里要懂得孝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共的空间，只有“家国一体”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朝廷和家庭，还有一个更为辽阔的空间，在朝廷和家庭之外的那个生活空间，应该有怎样的做人做事规范和准则，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很精致详细的论述，这对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现代社会要求个人必须与整体建立一种联系，个人有责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以维护和实现共同的利益和价值，保障社会的秩序。商业贸易是西方人最重要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需要广阔的公共空间。有需要就会有人去拓展，精神丰富的哲学家康德有了“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的观念后，汉娜·阿伦特就开始认真思考公共空间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共同构成的“雌雄同体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人类自律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

产物，哈贝马斯再进一步研究了公共空间理论，是公共空间理论得以更加完善，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时的公共空间理论就有了一种普遍的人文关爱，表现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关切。文化有一种共同特点，只要顺应天地运行规律，社会发展潮流，就具有道德，就是人类自身强健的文化营养。

台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激荡的地方，西方公共空间理论最丰富的营养在政治领域，台湾对政治营养的吸纳是否很好，我没见过，也无法做详细考察。只觉得街头政治撕裂整体，可能对表达各种声音有些作用，因为无缘亲眼目睹，不能胡言，但想到大陆关于钓鱼岛事件的游行，表达了多少理性？台湾也许全是理性表达，但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始终陪同我们的王冠云小姐说凯达格兰大道有过“倒扁”或“倒马”等许许多多的游行示威。她一句“很好玩”，我就感到理性并没有完全深入台湾普通百姓的心中。公共空间理性表达，如果过多地干扰社会正常秩序，无法让民选政权集中力量办事，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那么，我认为是否很好地吸纳进了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营养，尚需要观察和讨论。

然而，台湾在现代文明的公共空间的秩序与公德方面，却学会了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体谅他人可以让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除了“鸡婆”的那种充满女性柔情的温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志工”身影。一座城市的伟大在于文化，我们很多时候看待文化以为就是历史文化。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出过什么样的人物，文化当然包含着这些，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进入这座城市，遇到了什么样的人。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对文化有一个很简单的提炼：“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就是

说，集体人格才是城市文化。如果一座城市的人充盈着爱和善良，时时刻刻都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座城市的文化不仅仅是深厚，而且还十分精彩。无论这座城市历史多么辉煌，假如辉煌的历史文化没能影响这座城市的共同人格，这座城市成为文化的荒漠是一件迟早的事。

一座城市具有什么样的共同人格，是衡量这座城市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在台北参访时间只有两天，所到达的地方许多地方只能是浮光掠影式经过。2012年12月4日，我们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所属的阳明山国家公园中山楼参访。这是一个美丽的所在，中山楼建筑群坐落在阳明山、七星山为主体的国家公园保护区内，有完整的火山特性自然景观，在阳明山的北侧，台湾著名的建筑师修泽兰设计出典型的东方特色建筑，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宫廷和经典建筑的优势与长处，加之宏大雄壮的山势，还没进去，就有了一种神圣而崇高的气氛，一种庄严肃穆油然而生。

迎上来的讲解员是一个“志工”。同行的鄂州文史委樊主任轻声对我说：“她年纪不小了。还来做志工，真是了不起。”

我说：“她心理年纪没超过三十岁。”我见樊主任有些疑惑，就说：“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叫红三十，绿到老。”

这位女士上身着了一件大红底色起白花大襟，外套着志工专用的大红背心，胸前绣有“中山楼·国父纪念馆·志工”字样，下着一条黑色碎花长裤，显得极为精神。樊主任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一个人心态没过三十岁，就会有三十岁的着装。这位志工解说得极为认真，可能没有注意休息，她的音质有点些微的变化，声带的长时间使用，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和力度，没有那么圆润和清亮。我们一行有一种敬意，没有一个人说话，连脚步也迈得很轻，生怕干扰了她的解说。

我紧紧跟着她，瞅着空闲时，趁机问道：“大姐贵姓？”

“免贵姓林。”

“对不起，我知道问女士的年龄极不礼貌，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您贵庚？”

她笑了笑，答道：“不要紧。”她举起手拳起中间三个手指，露出拇指和小指翻了翻说：“六十六。”

“做志工多少年了？”

“从四十九岁开始做，今年十七年了。”我觉得她很骄傲。

只要有一点空闲，她就跟我谈。我知道了她这种志工叫“导览志工”。通过报名，参加招募，然后进行培训。认识国父建国之艰辛，了解国父纪念馆建馆始末，以现代的角度诠释历史，以历史的精神融入人心、净化灵魂。她知道了我们是湖北人，就说：“那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起点，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国父的建国。我的儿子就在武汉发展，那是一座我经常去的城市。”

通过交流，我知道了这位大姐叫林登银，她说做志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丢两天不做，心里就空落落的，做了，就感到了格外舒坦。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佛经故事，说的是两个投胎的人被召唤到佛祖面前，佛祖说：你们有一个人要投胎去做索取的人，一个只能做给予的人，怎么选择，想好了再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觉得索取可以坐享其成，就抢着说：我做索取的人。另一个人没有选择，只能去做给予的人。佛祖满足了二人的选择，结果，那个索取的人就是乞丐，整天索取，接受别人的施舍，给予的人则是一个大富翁，整天布施行善。给予并不一定就是物质的，给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更可以是文化的。

林登银大姐就是一个给予的人，她觉得自己对台北市熟悉程度很高，把这种熟悉让所有到达台北的人来分享，就好比一瓶美酒，自己在家自斟自饮，可不可以，也许有些味道，但如果有很多人来共同品味，大家都享受一下，可能味道更加令人沉醉。林大姐的这种行为就是另一个层面的给予，是一种情感丰沛的流溢。一个人爱的情感无限丰沛的时候，就会从心灵深处流进社会，流进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是什么力量支持林大姐十七年来，始终保持着一种情感丰富的状态？有个伟人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我觉得连续做十七年的好事，虽然不是一辈子，也是难能可贵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精神层面的给予比物质层面的给予更有价值。

林大姐告诉我，国立国父纪念馆还开展了“导览小志工培训”活动，从百余名小学生中挑选50名小志工候选人，进行半年的培训和实习，有25名小学生成为“导览小志工”。小志工正式上岗之前，必须认识导览与讲演技巧，甚至每个字的正确发音，国立国父纪念馆馆长郑乃文先生为这些小志工颁发制服，你今天没遇到这群生气勃勃的导览小志工，有些遗憾。

林大姐对我说：台湾小孩子做志工，近年正在形成一种风潮，爸爸妈妈最希望自己的孩子到文化单位做志工。很多时候就是爸爸妈妈陪着去做志工。小小年纪培养孩子的浓浓的历史文化兴趣，对于孩子的成长太重要了。一座城市要让人热爱，一是历史文化，二是温暖别人，这两者都需要从孩子做起。林大姐给我说了一个叫林士渊的小朋友，在台北探索馆做小志工。士渊十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加台北探索馆导览志工，因为年纪小，必须由爸爸妈妈陪同才行，士渊妈妈在银行上班，时间不灵活，士渊爸爸生意做得很好，很高兴与儿子一起做志工。天天跟着孩子一起游

台北探索馆，台北市的点点滴滴读被土渊发掘出来了，土渊爸爸原来对历史文化一窍不通，如今已经深深热爱起历史文化了。

有人问土渊爸爸：土渊一辈子从事这个事业，经济上没有保障，可能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土渊爸爸说：我会用全部家产支持孩子做一个精神贵族。

我想：土渊小朋友该不是大姐的亲人吧。一代真正的贵族是需要三代培养的。

我对林大姐说：“我能和您合影吗？”

“可以！可以！”

我和林登银女士站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雕像前，国父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和林大姐，留影。志工在大陆叫志愿者，我觉得自己来源于中国志工第一人炎帝神农故里，炎帝神农创农耕、尝百草，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层面的志愿者，随州人就应该炎帝神农的嫡传子孙，我们是否很好地继承了先祖那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台北的林大姐以及那位没见过面的林士渊小朋友相比，我有些汗颜。有很多城市开展起了志愿者活动，但我见过的，把这种志愿活动开展得很好的，感受最深的城市是台北市。听说，奥运会期间，给人类世界最美好记忆的就是众多的志愿者，可惜我无缘去感受。

离开国父纪念馆所属的中山楼，就陷入深深的思考，感到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大陆，大陆的很多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应该都超过台湾地区。然而，历史文化如果只存活在历史考古家的研究之中，少数文化学者的记忆深处，历史文化的生命力量就一定会很微弱。文化的根本其实就是在人间普及爱与善良，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世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具有爱与善良，就应该是人间的共同营养，聪明的人就会吸纳让自己成长。中国的历史文化

资源丰富，应该能够滋润濡养人们心中的爱与善良，让普通民众心中的爱与善良丰沛得流溢到社会的公共空间。想到自己生长在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市委为什么有让我去炎黄文化研究会工作的想法，无非是希望我能够更好地传承炎帝神农文化。

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农耕文化，起始于家庭、延伸于朝廷，朝廷只是一个更大的家。关于家的研究和训练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是人的生活除了家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公共空间却是荒芜的。许多贤哲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是放在家的背景下，或者从家的伦理进行推论，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对公共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作出精致的规划和建设。怎么吸纳和融会人类文化的精华和营养，我以为台湾这个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交融激荡的地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出了宽阔的路子，到这里来走走看看，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来到免税商店，在免税店门口看到了有义工在场子里指挥交通，就有心想和义工聊聊。于是草草从五楼向下走去，很快就在商店走了一圈，表示已经来过，就和这个身着橘红色上衣、深蓝长裤，手持红色指挥棒的男子攀谈起来。

“兄弟贵庚？”

“五十八。”他一手挥动指挥棒，一手比划着动作，疏导着免税店门前来往如织的车流人流。

我想他大概跟自己同庚，就冒昧地问：“属羊？”

“属羊，属羊。”

“几月的生？”

“五月。”

“长我三月。”

“怎么称呼？”

“姓张。”

“张大哥。”

“不敢，不敢。痴长三月。”我跟在他的身后，他进我进，他退我退，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张大哥是个出租车司机，做义交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告诉我，台北的义交很多人是出租车司机，熟悉交通规则，时间也比较自由，有点空儿就出来做做。特别是大陆游客来台以后，台北对“义交”的需求量很大。

不是说做义交就是做一整天，能做几个小时就是几个小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时间，能长则长，不能长就短。义交工作量很大，很辛苦，还有一定的风险，政府给一点补贴。张大哥告诉我，所有的义交都不是冲着钱来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帮助社会，这也就是帮了自己。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就是积福，为自己积福、为子孙积福。积福的事，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些个平民百姓，没有多少钱，出一点点的力，虽然有一点点累，但心里特别安慰，特别满足。政府给多少补贴，也难也启动人们心中的善念，这是一种道德和精神。心中有善念，行为上方有善举，善举再次提升善念，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人能群，彼不能群。人在群的过程中，需要相互帮衬。看上去，这个帮衬是微不足道，对于得到过帮扶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生难忘的恩惠。这个人回报恩惠的方式，就是在帮衬另外的人，帮衬与被帮衬的人，心里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幸福，做志工就是推动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形成正能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张大哥上过那所大学？”

“见笑，家境不是很好，只读了一个中学。”

张大哥告诉我，读书多的人，可以从事文化类的志工，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到社区里去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离退休的老人，做完了家务，有点空儿就拔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志工。一天书没读过的人，也可以到街上做导护妈妈。

张大哥见我有些疑惑，就解释说，导护妈妈就是孩子放学的时候，站在路口接自家的孩子，同时也指挥一下繁忙的交通，也许就是几十分钟的时间。做这样的志工，与受教育多少无关。我在想，爱与善良是人的本性，就看怎么发掘出来。《国语·周语》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有两性，就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人的生物性是人更本质的属性，培养和发掘人的社会性，就是教导人从善，好比登山一样艰难。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身上的生物属性自然存在着，任着性子就会如雪崩一样奔涌而下。从善与地位高低、财富多少、学识深浅关系并不紧密，关乎着人的良知良觉。我在党校讲课说出“高学历的文盲”的词语，很多人不解。我举例说，一个设计游戏软件的人，没有像样的学历，是不能胜任的，一般来说应该是高学历。如果看看他设计的游戏，就知道他连文盲也不如，人可以是文盲，但不能没有对同类的同情心。这些有着高学历的人设计的软件，每过一个关口，都必须杀人如麻，实际上他是诱导幼小的心灵漠视生命。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同情生命。这个电玩游戏软件设计者漠视生命就是“高学历的文盲”。

我跟在张大哥身后，我生怕影响了他指挥交通，就说：“和您说话不耽误您事吗？”张大哥知道我的谈话是做文化研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入从善积福活动。忙道：“没事。”他说自己做义交，就是回报社会，开了一辈子的出租车，被别人服务，现

在年纪大了，就把自己的一点余热发回给社会，没有别的专业知识，想要服务社会，也不一定能服务好，就做做自己的本行。一个人生出有善念是常事，把善念付之于行动亦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西方的公共空间道德规范理论，应该在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农耕文化疏于公共空间建设的缺失，让如登山一样艰难的从善，变成了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从善如登，起步的时候，仰望陡峭高耸的峰巅，举步很是踌躇，只要登到半山腰，世界顿时开阔起来。眼界开阔的人们，就自然会向往更高的峰巅，群体的向往就自然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张大哥告诉我，台湾做志工的人很多，有的调查说是七十多万人，有的说有三百多万人。我查了资料，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一个专题节目中，台北大学的郑又平教授说，慈济功德会会员有250万人。加入慈济功德会必须有爱心，爱心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就是必须经过十个小时的训练，经过六十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具备了爱的能力，才可以入会。这个节目讲台湾志工占全台总人口的13%强，年龄从10岁到80岁，活跃在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

公共空间的规则和规范是人自己定下的，进步的规则和规范，一定要改变人们落后的生活习惯，这种改变开始肯定不适应，当人们不得不接受时，就会主动去遵守，甚至用超过规则规范的行为去践行，社会公德就建立起来了。公共空间的道德伦理规范规则可以将人们的偶尔的从善固化成生活的习惯。这么算起来，台湾做志工的人肯定超过300万！那么，台湾社会就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具有爱与善良之念，并有爱与善良之举，善念带动善举，善举再次升华善念，一个充盈昂扬向上正能量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叫人感受到幸福的社会。

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定义，生活习惯中有一种很高贵的精神价值，经过引导和积累成为生态共同体，形成共同的人格，就是真正的文化。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不是几个文化精英在那里论证的，而是让没有读过一天书的人也感觉到愉快舒心、温暖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有文化的社会。

我来到台北市的时间很短，所到的地方又都是像蜻蜓点水一样草草走过，不可能对台北社会有细致的观察，产生浮光掠影的感觉是很自然的。但人生中，人的情感很奇怪，相处在朝朝暮暮，却不会有深刻的记忆。很多事情的发生，只有那么一刹那，就叫你终生难以忘怀。和林登银大姐交谈的时候，我还不住地看手表，总怕误了导游规定的归队时间，不可能很深入，和张大哥交谈时间虽然充裕点，但我连他的名字都没问清楚，但在我的生命记忆里，他们俩和许多台湾志工的印象却永远那么鲜活，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我的人生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的旅程。

四、感受钓鱼岛

台湾的环岛行程中总是与海近距离接触，看到海就想起钓鱼岛，所以，有许多关于钓鱼岛的思考。台湾在地质上是欧亚大陆板块的延伸，台湾海峡其实是一个广阔而平缓的大陆架，台湾岛向东伸延才是冲绳海槽，在水深2940米的断层戛然而止。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交接处。宇宙大爆炸的学说告诉地球起源于物质的运动，这个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地壳不是完整的整体，而是由大小板块构成。物质的运动让板块相交的地方发生错动、碰撞。地壳的岩层出现挤压、扭动、延伸，板块的交接处出现断裂、褶皱。地质学称之为板块隐没带。在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洋板块碰撞挤压，隆起了许多高山。地壳的运动虽然让大陆板块的部分地壳沉入海底，但

仍有许多高山露出水面成为岛屿，这些岛屿在地质上与大陆板块是一体，彭佳屿、钓鱼岛、台湾北部近海的观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脉延伸入海的突出部分，都属于是这种性质，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是个4.3838平方公里的小岛，属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这次台湾行乘坐的旅行车驶入苏花公路，在学校学过的地理知识让我感觉到钓鱼岛就在前面。苏花公路是以宜兰苏澳镇至花莲县的一条沿着海岸，穿过悬岩峭壁的公路。车窗外就是太平洋的旖旎风光，人们说这条公路是西太平洋的观景台。坐在车里，山与海的美妙不断地进入视野，一会儿是柔和美丽的海洋风光、一会儿又是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景色。这种交错出现的风景带来的是一种心境的愉悦欢快。人生如果能寻到的无价之宝，就应该是这种感觉。

一个文化人往往会把这种经历和感觉写下来，这种写作没有主旋律，也没有名和利的炫耀和追求，就是记录自己真实的感觉，岁月消失了，这种感觉就成为历史的真实。关于国土的归属，国际间公认和通行的法则就是谁先发现、命名、利用、管辖，就应该属于谁。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彼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一书《福建往琉球》条下最早记载“钓鱼岛”为“钓鱼屿”，是福建往琉球途中的指标地之一。这本书中有“永乐元年”，可见早在公元1403年钓鱼岛已为中国人民发现并命名、利用和管辖。

航海者面对一泓海水，行至“钓鱼屿”，看到这个地标就有了一种镇静与从容，表示走出了古老的海峡，驶出了东海走廊。钓鱼岛是云水约会的去处，是星月盼归的所在，是好风迎来、顺风送往的佳境，是收网避风、降帆躲雨的妙处。一个连姓名也没

留下文人不经意记下的一段文字，穿过苍凉的历史，突然有了鼎一样的意义、山一样的重量。这个文人虽然没有姓名，然而他却有一个籍贯叫中国。

中国是一种农耕文化，做人做事是最重要的，做一等人就是忠臣孝子，做两件事就是读书种田。成为忠臣孝子，必须有良好的品行。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蓄积丰赡学养，提升高迈人格才能真正的一等人。读经诵史，赋诗作文，就成为颐养性情、陶冶操守、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一种手段。所以真正的文化人，都有写作的习惯。明代嘉靖年间一个小官叫陈侃，是一个官阶只有从七品的“吏科左给事中”，相当于今天大陆的副处级干部。嘉靖十三年，喜从天降，这个官阶很低的官员代表明朝皇帝前往琉球册封新王。

琉球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附属国，从隋炀帝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琉球就开始俯首称臣，称中国为父国，定期进贡。这是一种“协和万邦”的体制，宗主国并无领土要求，只要求认同中国的宗主地位，就用很多具体措施保障藩属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说书人所说的“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其实是两年进贡一次。所谓进贡，也就是象征性地呈送一些地方上的土特产品，就像逢年过节，给长辈送点礼品，长辈是要还礼的，还礼的价值远远高于送礼的价值。这种礼仪不是用实物价值来衡量，最重要的是信仰和崇拜，有了信仰和崇拜，附属国的新王上任应由宗主国册封。这是一种朝贡体系，是按照中国儒家的礼制，依据文明的发展程度，来确定与中国关系。朝贡的前提，朝贡国要获得中国的册封，在王权交替之际要去中国朝见。实际上，朝贡国因此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给与的最惠国待遇，从而既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先进的商品和生产技术，同时也可以通

过向中国出口以换取财富。或者说，这种朝贡体系就是中华民族用农耕文明温暖周边国家的一种体制。

然而，这个官阶只有从七品的陈侃学养丰赡，习惯是一个人的重要的文化形象。官员的举动，是内在涵养、人生品位的外化，不是简单的举手投足那么简单。简历写得多么牛，举手投足就露馅了，原因就是每一个人的举动都代表着他的文化内涵。陈侃手握毛笔，凝神静气，如实写下了册封琉球新王的经过。“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台湾北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黄尾鱼），过赤屿（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简约的笔法隐含着心中的快意，无意间却书写出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众多的岛屿都在中国的行政管辖之内，直到见了古米山（今久米岛），才是“乃属琉球者”。这一年是公元1534年。

清嘉庆十三年，清廷特使齐鲲册封琉球新王，幕僚沈复是个文人，他随齐鲲前往琉球，写下了《浮生六记》如下：“十三日辰见钓鱼台（钓鱼岛），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帆。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久米岛），入琉球界矣。”沈复这里的“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十一个字记述了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一个重大活动。使团到了中国与琉球国领海分界处——“黑水沟”，即将离开祖国的地方，举办了出国的拜谒活动。

对祖国的尊重需要有一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礼仪。今天很多自认为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人会觉得这是形式主义，诸不知在东方文化就是一种礼仪文化，“礼仪”才是文明的根本，没有形式就无法表达心中的尊重情意。比方我们尊重父母，早晨要去请

安，晚上要给父母暖被窝，吃饭的时候，父母不动筷子，一家人不能端碗。对祖国的尊重，更甚于父母，离开祖国的国境，中国册封琉球新王使团举行了隆重的叩拜天皇地后的祈祷国家平安活动，这是极为庄重的国家仪式。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把祭祀是国家最大的事。祭祀就是感恩和祈求天地和祖先的庇佑，以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平安幸福。

两个文化人不经意的笔记，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的范围。这隆重的祭拜活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钓鱼岛在明代嘉靖年间、清代嘉庆年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两个文化人不经意的笔记，也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在黑水沟。字里行间也弥漫着中国文化的那种平和厚道的气氛，中国行使监管琉球那么多年，除了册封这样的大事，从来没有想过把琉球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华民族建立的朝贡体系，只想把自己农耕文化中的爱与善良输送给万国，这是《尚书·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它的核心就是对世界各国的尊重，有这种尊重，才有中国和琉球的明确边界，也就有文化人的清晰认知。

中国文化关于领土认识多是以天地来表述，生养自己的是父母，生养父母的是祖先，生养祖先的是头顶的那片天、脚踏的那片地，靠海讨生活的人则是常去捕鱼的那片海。这片天地是神圣的上苍赐予的祖产。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祖宗的民族，祖宗传给我们的财产就叫祖产。它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精神方面就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共同人格，物质方面就是上苍给予的那

片天地。维护祖产是每一个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祖产的受损会叫每一个炎黄子孙生死不得安宁。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期间，面对日本即将要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现实，约见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这一天是2012年9月9日，胡锦涛郑重指出，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方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胡锦涛的谈话传递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包围领土完整的决心。野田佳彦说得很好，但回去以后就召开内阁会议，以自己不出席的方式确定了国有化钓鱼岛。恶意挑起了争端，期望用自己的强硬侵占钓鱼岛。

强硬的日本人，喜欢用武力说话，这个民族最后成为军国主义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从以征战杀伐为业的武士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就灌输忠君、勇拼杀、重诺言、轻生命的武士文化。从日本国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向往阳刚的民族，崇拜太阳的民族很多，但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天照大神创造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种天生血缘优异观就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始终缺少一种抑制自己向生物性发展的机制，人从动物发展成高级动物，就是人能克服自己的生物性，把爱与善良奉献给别人，就是社会性。任由自己的生物性发展，只能和动物一样一代一代复制自己，而能够克制自己的生物性，让自己身上的社会性多起来，就可以一代一代发展自己。西方商业文化中有了基督教，东方农耕文化中有了儒家文化。太阳旗帜为天皇使用，称作“天皇旗”，也是大和民族血缘优异观的体现。这时的武士阶层得以发展，逐步走向政治舞台，成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日之丸”就必然和法西斯专政成为一体。

从镰仓幕府开始，经历了室町、织丰和江户三个时代，日本武士好勇斗狠、野蛮凶残的信仰就成为日本社会伦理的主流意识。畸形的民族文化就为培养孕育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提供了丰富营养的土壤。“大和民族优秀论”、“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武力乃立国之本基础”成为一个民族的观念和信仰。这种人掌握了国家的政治舵轮，就必然会欺软怕硬，敢于挑战国际秩序，给人类带来灾难。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结束多年战乱，丰臣秀吉出身寒微，对物质的渴望欲望强烈，有别日本社会中上层贵族还有一些精神需求，对中华文化还有依念，就萌发了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充当亚洲霸主的思想。首先是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这面太阳旗的意义就是：旭日东升之处，大和民族强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有思想和物质两方面的支持。人成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在吸收物质能量的同时，能够吸纳精神能量，而只能吸收物质能量的动物，就永远只能是动物，不可能成为高级动物。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攫取物质能量的民族，日本的工业化就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基础上完成的，日本工业化缺少资源，中国供应充足，需要市场，中国足够广阔，尽快工业化的最好办法，日本武士文化给出的捷径就是征服。日本这个信奉武力征服的民族只要有一点能量，就想获得更多的物质能量，赶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把整个亚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就必然给整个亚洲带来灾难。从丰臣秀吉的亚洲大帝国，到大东亚共荣圈，再到今天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其中有多少道德的能量可以温暖世界？

路险、崖峻、是苏花公路最大特点，峭壁悬崖，在眼前层层叠叠伸向远方。穿行在悬崖、峻岭中，心随着车的颠簸而起伏，脚下的海水湛蓝令人心醉，因为太平洋从来就没太平。人类能力低下的时候，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洋，无可奈何；人类有能力驾驭大洋的时候，却遇到了任由自己生物性品性发展的同类，徒唤奈何。摊上这么一个近邻，中华民族就必然命运多舛。

日本政府在有关内阁大臣会议上决定“购岛”，将这些岛屿（钓鱼岛诸岛）“收归国有”的当天，中国政府进行反制就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十余天后，国家海洋局对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进行了名称标准化处理。其中钓鱼岛上最高的两座山峰，分别叫高华峰、神农峰。

在苏花公路面对广阔的太平洋，中华农耕文明的灿烂光芒曾经温暖过太平洋的亚洲那么多地域。钓鱼岛上最高山峰命名高华峰，就是中华民族期盼再次以自己的文化“协和万邦”，感染亚洲，和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中华是中国和华夏的合称。前者是指这个国家处于中心的方位；后者表华夏性质，华是说服章之美，夏则是礼节之大。中华这个词就是象征着文明礼仪，区别于野蛮霸道。中华文明说到底就是一种农业耕种的文明，这是一种对生存空间有强烈边界性的文化，这种边界就是难离的热土，固守的疆域，防止邪恶的边界，排除干扰的底线。中国的文化曾经走出去过，但中国文化所到之处，输送的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能量。

中国文化的最早创造者就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宽厚平和的老农民，他敬天爱地，组织自己的家族和部落，发明了五谷，创立了农耕，他的名字叫炎帝神农。我的家乡湖北随州就是他老人家的诞生地。在伟大的天地面前，个人一时的强大，总是那么渺小。

只有牵手协作才能存活，于是，一个民族因此走出蛮荒，进入文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平整土地、开垦稻田，兴修水利，滋润文明，让丰硕的收获一次又一次证明牵手协作，可以共生共荣。这个宽厚平和的老人创立的文明，其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爱与善良元素，这些因素能够融入人类世界，人间就一定会更加美好。钓鱼岛的另一座山峰就叫神农峰，就是希望世界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宽厚平和。我来到台湾的第二天，就接到电话，奉随州市委之命，征求我是否愿意为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献力的意见。我当即回答，感谢市委给了一个为自己积福、为子孙积福的平台。这时，我在想如果有机会主导炎黄文化研究，第一件事就是展开钓鱼岛高华峰、神农峰命名意义的研究。

我觉得人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文化，只能是发明永动机一样的美好期盼，短时间内难以出现。那么，已经出现的文明就是利人利己，牵手协作；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东方的农耕文化就是这样的利人利己的文化，从炎帝神农发生发展到今天，始终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澄澈的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能持久地与天地自然、广大同类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延续5000年仍充盈着生机与活力。这种文化还自动设计出活着不能做亏心之事，不然，死后灵魂就进不了庙堂，永远也不能和列祖列宗相见的孤魂野鬼。这种儒家文化的设计宗法关系维护了一种生活价值、精神信仰，确保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规范。

商业文化的长处和优点就是始终能把握不避讳主观利己，客观利人的生活价值。这种文明的本质就是极大地激发了人自身的潜在能量，极度开发自然为人类服务，为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文化也设计出偷吃智慧果的原罪，人生中

始终用一种赎罪的态度处世，因而确保了自己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抑制自己身上的生物性，发展人类的社会性。

我感到日本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里面始终缺少抑制人的生物性、启动人的社会性的文化元素，更谈不上形成一种文化机制。这个民族的生活价值中始终缺少生命对生命的同情，很多时候会做出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选择。

海军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多次去日本基层考察，走过日本的许多县和小镇，他看到几乎每个小镇中都能看到日清纪念碑，碑的造型就是一颗铜制的子弹，那种全民战争心态非常可怕。镇上的老百姓就关心镇上的子弟兵打到了什么地方。他还看到一个小女孩买了一日元战争债券的记录，一日元的债券很不起眼。但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个盲人，生计很是艰难，她积攒这一日元需要三四个月，她居然去买了永远也不会有回报的战争债券。这个民族的精英设计的天皇制，就是说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嫡传子孙，让天皇握有无限的权力，军部又可绕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军国主义成为民族的灵魂。天皇身上的生物性需求没有任何约束时，近代的日本就成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民族。

我们常常站在文明的角度谴责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的使用，如果仔细考察其背景，就会感到一种尴尬，心里就会格外沉重。深深印在西方人的脑海里是战争期间的太多暴力行为，菲律宾“巴丹血战”美菲战俘达7.8万，丛林中步行65英里路程，抵达卡帕斯战俘营，1.5万人倒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虐待俘虏事件。最可怕的是不顾一切或采取自杀式行动的日本人。日本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考察了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后，知道已经无法挽救其战败的局面，决定利用日本民族的武士精神，设计出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自杀性袭击的特别攻击战术，

这是人间最荒唐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这种“神风攻击队”共出击2550次，其中475次命中目标，击沉美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舰只43艘，击伤各型舰艇约370艘，先后有数千名年轻的美军士兵魂归异国他乡。想到一种文化准备用全体国民的“玉碎”，换取一种虚幻的价值，就会理解和体察当年决策者那种无奈的选择。

历史的发生发展，往往有许多必然和无奈，我们无法去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也不能苛求历史人物必须具有道德高度。但历史中有许多教训，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一个民族获得这种营养，远比获得物质营养更有作用。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双膝跪下，真诚忏悔，其实就是吸取历史的教训，化罪孽为营养，强健德意志民族。然而，切腹自杀的大西泷治郎就是给美军带来巨大伤害的“神风攻击队”的始作俑者，他的亡灵就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不仅没得到清算，还被一个民族奉为神明。这个国家的首相和许多公职人员时不时地就去参拜，期望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沉淀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

天阴沉沉的，我的目光始终没能穿透阴霾，看透那个曾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究竟想在钓鱼岛上干些什么。9月18日是中国人的“国耻之日”，日本却偏偏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日本是精于算计的一个民族，绝不会对历史如此麻木，只能是故意挑起事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日本“购岛”和激进分子浩浩荡荡登上属于中国的钓鱼岛，激起一个大国的民族情绪，希望中华民族情绪失控，做出失去理性有利于日本的行为。

车窗外突然开阔起来，那是三面环山，形势险要的港口。东

向太平洋，导游说这是著名的苏澳港，这个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常是海盗等外力垂涎窥犯的地方。港面宽阔，礁石罗列，形势险要，左右各有弧形半岛，为南北澳，北方澳则被收为军港，南方澳为台湾重要渔港。台湾渔民多是从苏澳港出发，到钓鱼岛传统渔场去讨生活，钓鱼岛那片海域就是台湾渔民的衣食父母，中国军人则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人民的生活就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我这时才真正觉得，钓鱼岛不是用眼睛看的，那是一个民族心中的存在。

进入台北市，市议员王正德先生设宴招待，王先生的名片上印有“马英九的铁卫、市议会的悍将”，他是为马英九竞选立下大功的政治人物。此君军人出身，性格开朗，诙谐幽默，从军时曾驻守过金门，当他得知这次文化交流同行的周君曾驻守过厦门，一攀年龄，周君年尊，王先生当即对中华文化交流协会的接待组长蓝少华先生说：“我们两个国军兄弟，一起请这个共军周大哥。”国共两军都是炎黄的子孙，保卫祖产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台湾当局多次重申，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钓鱼岛列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是“中国”固有领土及水域，主权属于“中国”。上述岛屿及周遭水域、海床及底土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所有权益，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在法律上都属无效。《诗经》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年相向对峙的弟兄说到了钓鱼岛，他们几个二话没说，一仰颈就满饮了大盏金门高粱酒。

作为炎黄的子孙，如果在自己的手里丢失了祖产，那是天大的事，祖产和自己的生命一样。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只有灵魂可以永恒，丢失祖宗的物质和精神财产，灵魂就进不了祖庙，就

享受不了子孙的烟火供奉。所以那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是难以知道祖产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更不会理解一个民族的行为能力。维护祖产，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唯有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里的“利”，可不是利益，而是斩断邪恶的一种锋利，是无往而不胜的力量。

东方对“道德”的理解认为，遵循天地运行规律为“道”，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为“德”。不同的天地环境有各不相同的运行规律，人在不相同的环境里生活，就会有不相同的顺应，必然就产生不相同的生活习惯、也会有不相同的价值观。钓鱼岛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争议，其实它蕴含著文化的认同理解与融合接受。因为钓鱼岛属于中国，本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表面看上去，中日关系的适度紧张，可以让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以更深远的历史目光来审视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其实这是东西两种文化价值观的交融激荡。西方的商业文化觉得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的价值，用枪炮和船舰压缩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这个世界没有万世一系的文化，一种文化如果不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纳异质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就必然萎缩甚至消亡。一种伟大的文化进入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必然寻找新的营养，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力。农耕文化能延续5000年历史而不衰败，就是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而不同”包容精神，和一种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平衡原则。前者能够广泛吸纳世界各种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后者保持自己不走极端，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宽厚与平和的气度，让一个民族走过许多艰难坎坷。当一种文化提出复兴的时候，另一种强势的文化有一种惴惴不安，生怕失去统治地位，用尽心机延缓对方的复兴。复兴者必须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认识到这种复兴是

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从中国文化衰落的历史看，《马可波罗游记》让西方人突然知道了东方世界有一个富饶的中国。于是，商业文明就一拨又一拨来东方寻找宝藏。不胜其扰的明代，这时就开始关闭自己与世界交往的门窗。农耕文化的空间从此时就一步步后退，一个民族也因为屈辱而觉悟。觉就是思考、体会，悟就是领会、明白。其实这是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与“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在起作用，通过比对异质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寻找自己的缺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根本上强大，还需要发扬自己的文化优势，弥补自己的缺失。

农耕文化是一种重视经验忽视理性的文化，理性是用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科学精神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包括理性、实证、批判、创新，以及民主、探索、奉献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根本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涉及到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时候，中国文化的这种缺失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时，总是先讲忠奸，凭感觉，讲蛊惑力，不讲实证。似乎打仗就是忠、不打就是奸。在自然经济背景下成长的文化从整体上说，是崇尚直觉式的思维，重悟性、重直觉，跟着感觉走，很少理性思考，更缺数据推论，儒家经典的注疏、考据、钻研很是详尽，学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没有科学精神存在的环境。朝堂之上，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很少有人详细地论述国库多少银子，军队有什么样的战力，这场仗要打多长时间……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就在这种忠奸之辩中一步步后退，缺少科学精神的文化退到了不能退的地步。

幸亏，中国文化的内在的修复系统吸纳着异质文化的营养，

把科学精神融入血液，让自己的文化逐步成为先进文化。于是，融入了科学精神的道德文化体量开始恢复自己应有的边界。我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人的体能强健，特别是得过大病的人，那是需要长期的调理，才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钓鱼岛只是中国农耕文化道德展现的一个坐标点。顺应天地则为道，生养这个岛的父母是天地自然，它是大陆板块的自然延伸，其次它是中国民族发现、利用，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祖产；顺应社会就是德，今天的世界的主题就是和平发展。

美国是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他知道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主要是国家实力的相互比较，只有在实力弱化的时候，才需要投机取巧，留下钓鱼岛争端，就是一个取巧的最佳点，可以通过这个点引发争议，带来中日双方紧张，他就可以成调停主导者，在调停中既可以从日本获得利益。同时，他还会转身朝中国伸手，再次获取利益。如果中日大战，就超出钓鱼岛争端始作俑者的调停愿望，美国就会失去许多已经到手的利益。说日本人连这点都看不明白，那肯定是低看了这个民族的精明，他要利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依靠他人势力来实现自己国家核心利益，于是，就有了玩火的行动。

至于说美国在钓鱼岛上干不干涉出手不出手，事实上这个利益至上的国家，为了利益已经干涉了，出手了，下一步，就看他是否愿意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红利，还是想彻彻底底与中华民族为敌。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人为善的民族，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钢刀。无论谁干涉谁出手，反击挑衅的坚决就要像和平崛起的坚决一样毫不动摇。中华民族有自己清醒的战略和战略定力，捍卫中华民族的祖产，是实现一个伟大民族复兴必备条件。

弘扬中华民族农耕文化中那种顺应天地规律、顺应社会潮流的道德正能量，这是14亿炎黄子孙的责任和使命。

然而，日本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有理性的人士说不出话来，如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站在日本的国家利益上说了一句实话，就被国内的右派说成卖国。这个民族的政客却没有看到天地运行规律、世界发展潮流，顺应规律潮流才是大智慧，对抗规律潮流是愚蠢，看似精明，顶多是小聪明。翻一翻历史，就知道这是一个太有小聪明的民族。甲午战争，也就是1894年7月25日，日本人不宣而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日本也没有事先宣战；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九一八”，鬼子半夜偷袭北大营，侵占东三省；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制造了不宣而战的经典战例。“悄悄的干活，打枪的不要！”战术娴熟是典型的小聪明，缺乏大智慧的民族，往往就会给自己带来重大灾难。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让中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给中国造成困扰，一而再地向外发出遏制中国的信号，很容易让日本产生一种误判，以为美利坚民族就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分支，美利坚民族必为大和民族而战，心生一种侥幸，再玩一次偷袭。其实，眼下的美利坚有太多的难题需要解决，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民族，做世界霸主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头等大事是解决国内的问题，其次是世界的钱流向自己，绝不是日本的一点小钱就可以的。对生命的同情，是所有文化的根和本，农耕文化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期盼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对抗其实是卑怯，被放大成了的强大，是一种虚妄。学会顺应，顺应中有一种平和，当对立转化为融合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大从容。

我坐在台北议员王正德先生身旁，我端起酒杯说：“王先生您是与我同庚的兄弟，做过军人，还热心两岸的文化交流，可谓

文武双全。我乃一介书生，知道钓鱼岛是祖产，更晓得祖产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丢失，我们兄弟俩的灵魂就进不了祖庙，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为了我们的灵魂将来能走进自己的祖庙，干一杯。”

王先生端起酒杯说：“这杯酒我喝。有我们兄弟在，就不怕外人欺。老俗话说，兄弟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王正德先生对我们说，天气好，透过飞机的窗口就可以看到钓鱼岛。其实根本不用眼睛看，钓鱼岛就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维护祖产钓鱼岛也许就是民族融为一体的最佳时机。

炎黄文化要温暖世界，必须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展示能量的意志。其实我们都明白，中华民族的巨大能量首先来自民族的团结。两岸间有共同的文化已经渗入我们的血液，这是我们共同的根脉。当文化的根深深扎进民族的土壤里面，任何一个离间者想进行清理，都是不太可能的。

钓鱼岛应该就是中国的炎黄文化能否走进世界的一个重要边界，一种文化连自己的最基本权益都不能保障，说去保障人类世界的公平正义，谁也不会相信。中国最擅长的是共生共荣，这也是人类道德和国际法共同鼓励的方式。但有人想用非经济手段改变竞争规则，企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再次失去最佳的战略机遇期，必将启动炎黄子孙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当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把自己的能量奉献给这个民族的时候，人类世界就会更加温暖。

后来人的拜谒

上车后才知道，今天是为有着中国高层文胆之称的刘亚洲将军介绍随州文化。我曾经给许多高级别领导讲解过随州文化，心中从来没有过忐忑。当我听到刘亚洲的名字时，心里顿时有点紧张。刘亚洲将军为人为文皆是值得文化人敬仰的师长，我时常以能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追求自居，在真正的文化人面前，才知道自己离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还有一些差距。读过刘亚洲将军的文章，知道他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不仅仅是文章写得好，骨子里透着一种叫人仰望的高贵。

文章写得好只能说有才情，很多有才情的文人在我眼里并不高。真正的文化人具有高贵的人格。“德”是人的品格。古人说：“德配天地”，“德”要像天地一样至高至大，具有宽容、博大、深远的境界。好比所有的收藏家都不会去收藏秦侗和蔡京的书法作品，秦侗和蔡京虽然有很高的书法才情，但这才情已经被自己卑劣的人品所淹没，作品中的书法才情因为人格品质的低劣、阴暗变得毫无收藏价值。我敬仰刘亚洲的人格，他清廉得连公家一张稿纸也不占用，看到稿纸的背面没有写字就用来写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替他收拾行李时，住酒店要拿走自己出过钱的信封信纸。我很向往清廉，但我做不到他那样。我用公家的稿纸，写了一辈子，没写出多少篇像样的文章。

读过他的文章才知道，原来不是自己的写作才情少了，而是自己的人品修炼还要继续。

国防大学的李明海主任是随州人，是一个对工作很负责的人，怕我在首长面前讲错了话，给我讲了许多注意事项。我点头。我很理解军人那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工作态度，我虽然不是军人，但很敬仰军人。我接到的指令是对首长解说随州文化，在文化大家刘亚洲将军面前怎样讲，确实叫我有些作难。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古乐编钟的出土地。前者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后者涉及中国文化的高度。给首长讲中国文化，真是班门弄斧。我还没进文化之门的时候，他就写过长篇历史小说《陈胜》。读过他写的《农民问题》，感到他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根与本弄的很是透彻。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有着本源性特征，在他面前说中国文化的源与本问题，真是贻笑大方。刘亚洲将军登上随州接待办的中巴，我有少许的慌乱，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我知道心中的忐忑，是因为对师长的仰望。很快我就明白一个人真正的敬仰，应该坦诚地向自己的师长，报告自己的学习心得，有可能还能得到师长的指点。心态平和了，话语也就顺畅了。

我从随州之“随”说起。“随”字在造字之初是一个“阜”和一个“人”，就是今天“队”的写法。是由“阜”和“人”构成，其中隐含着一座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上坠落。《说文解字》“阜”的解释是“大陆山无石者象形”。随州的一座大山就是中国中部的大洪山，这座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而落。这是一座无宗无脉的大山，今天的地质学解读，中国中部的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在这里碰撞，大地发生塌陷、隆起，塌陷出现了两个盆地，就是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两个盆地的边缘隆起的这座大山，好像突然从天上降落下来的。“队”就是“坠”的意

思，通“陨落”。这座山古代就叫陨山，因为植被好，先秦两汉的时候叫绿林山，山中有大湖，在唐宋时期叫大湖山，后来生态破坏，常有山洪暴发，才叫大洪山。今天这座山里流出来的水仍然叫涑水，随州境内所有的水都被称为涑水流域。“随”因这座山而得名。随字的“阜”加一个从天而落的“人”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认识。

坠落的“队”字怎么变成了“随”？随州的“随”字，从“队”到“随”，就体现了文化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是人们眼光伸展的结果，认识提高的表现。人们的眼光伸展之后，知道“随”这块土地处在两大流域之间。于是，就有了表现这种认识的写法，这个新的写法是“隋”。也就是隋朝的那个“隋”。有人解释隋文帝忌讳“随”字中“走之”有跟从的意思，而改“随”为“隋”的说法。实际上，在春秋时代，“随”和“隋”通用，比方成语“隋珠弹雀”的“隋”，就是说用春秋时代的珍宝隋侯之珠，去弹射一只雀鸟，失去的很大，获得的很小。

这个“隋”字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随”的具体方位，它在中国中部的地位和作用。左边的“阝”读音是“阜”，“大陆山无石”是指土层很厚的山坡，从小处看，是一个土丘，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大处望去，就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实际上这是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右边的“有”是简化的写法，篆文写法上面是画的一只手，下面是一块肥肉，中间还有一个“工”，这是辛勤的劳作、按照规则经营，才能获得肥沃的土地，也就是一块能治水稻的稻田，从小处看，“有”是一块稻田，把眼界放高一点，从大处看去，就是田畴相连的整个长江流域。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最为发达的是长江与黄河这两大流域的中部地区，这两大流域的中部地区交汇处就是随州。

“随”字中间有“走之”，这涉及炎帝与黄帝一次重大的融合。相传，炎黄之战，双方争帝，反复厮杀，双方死伤惨重。历史文献记载：“黄帝三战不得其志”，双方“血流漂杵”。炎帝和黄帝看到自己的部下伤亡惨重，不希望这仗再打下去了。黄帝能“服牛乘马”，所以称为“轩辕黄帝”，借助骏马的力量和速度，骑马南下，跨过黄河，进入长江，必然占据主动。占据主动的人才拥有话语的主导权。所以，轩辕黄帝对炎帝神农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中央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觉得，战不下去就要妥协退让，妥协退让能拯救自己的子民，是上上之策，经过仔细思考答应了轩辕黄帝。炎帝神农经过思考的妥协退让是一种诚心诚意，是实力不济的内心服气，是真心实意地跟随轩辕黄帝，就在自己的故地“隋”字之间加上一个“走之”变成“随”。“走之”的篆文写法是画的一个足，跟从的意思。“随”字在《辞海》和《辞源》中有多条解释，核心意思都是跟从的意思。这个字的核心含义，就是两块土地的结合，它真实地记录了炎黄融合的这个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一国两制”，但这次的炎黄融合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为这次炎黄双方的妥协退让，形成了大一统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从此成为一个民族永恒的主题。历史上，长江与黄河曾有过分裂，然而，无论分多久，都是一种不同形式的“一国两制”，分裂的双方都时刻为统一积蓄力量，时时刻刻都怀着结束这种分裂的雄心。其实这种内心的统一比形式上的统一更有价值。它从客观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性基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次融合就是中国南北的融合，“随”这个字真实演绎着中国南北地域融合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个有“走之”的“随”字，从根本上揭示了文化发生发展的过程。文化的发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发展需要条件。发展是很难走的上坡路，就好比一个人出生很容易，长成一个真正的人，要跨越许多坎坷和障碍，迈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一种文明的成长更是不易，其中最需要的是营养。文明的成长获得营养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需要同另一种文明反复交融碰撞。只有在这种碰撞中进行筛选，剔除糟粕，留下精华。这种吸收有时是很痛苦的。炎帝神农为什么实力不济，物质上缺少骏马的机动和力量，精神上也少了北方人的那种粗狂和豪放。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将军在论述军事艺术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将军认为划时代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很多时候是侵略者创造的，被侵略者往往要花费九倍的血肉代价，进行消化吸收，最终击败侵略者。最后还得继承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犹如他们活在我们的体内、活在我们的兵器上。其实，“和”不排斥不同。因为有矛盾有冲突，才能去寻找化解方法，就出现和谐、完备。

刘亚洲将军的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研究最多就是美国，他认为我们中国和美国处在同一时代，是不幸又是大幸。不幸是因为美国太强大，大幸是因为美国真强大。自己要强大就必须从真强大的对手那里吸收营养，所以他以一种特别的眼光审视着对手的强大。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他有亲美倾向。对于自己是否有亲美倾向，将军有很深的感慨：“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是美国，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工夫。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们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将军说自

己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一个批判者。从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来看，他也是西方文化的批判者，更是西方文化的吸收者。真正的思想强健者，必然有吐纳天下的胸怀和气度。他的继承和批判、批判与吸收，是一种吞吐古今中外精华的气度。敢于吸纳天下的一切营养，这样才能够强健自己的民族。

随州文化能够发生，在于随州的地域有产生物质与精神的条件和土壤，随州文化得以发展，也在于随州的地域能够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积淀。地球的板块碰撞为中国中部万物的生长创造了最佳的条件，也为农耕文化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板块碰撞中隆起了大洪山与桐柏山两座千米左右的高峰，两山相对峙形成的谷地，长和宽均为百公里，约有万余平方公里，两峰依次而下，是低矮而破碎的山地，再往下就是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这是一种适合植物生长的地形，这样的地形有着天下最为丰厚的生产力。既可以生长千姿百态的大山灌木乔木，也可以生长可供动物生命食用的五谷杂粮。

这个谷地超过30公里以上长度的河流达到109条。构成完整的沮水水系，呈叶脉状分布于这个生命之谷。这就是中国中部著名的“随枣走廊”，也是真正的生命之谷。《道德经》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不存，用之不勤。”就是说谷地才是万物生长的地方，这是玄妙的生养之门，天地生成的地方；绵绵不绝地存在着、它的使用价值无穷无尽。这里被人们称为炎帝神农故里，虽然有人统计140多种历史文献记载，我觉得天下能让文化发生的地方很多很多，能成长的地方绝不能在中国的一隅，必须在中国的中心。随州就处在中国鄂、豫、皖、晋、湘、赣六省的正中心，东南西北从不同的方向往这里输送营养。

这时，李明海主任走到我跟前，与我耳语道：“说一说九口堰。”将军似乎知道李主任说了什么，言语中对李主任有些责怪的意思：“让包主席继续说，他讲得很好。”接着，将军问我：“被称为炎帝神农故里的地方在全国有好几处呀。”我很坦然地说：炎帝神农是史前人物，史前的特点是口传性。口传就肯定是多样多样的，历史文献也是根据口传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文字。目前中国有历史文献支撑的地方，是这么几处：陕西的宝鸡、山西的高平、湖南的炎陵、湖北的随州。炎帝神农作为一个文化英雄，人们把许多美好的业绩放在英雄的身上是有选择的，选择的最佳对象首先是自己的祖先。南方人有祖先，北方人也有祖先，这就必然出现多地炎帝神农故里。炎帝神农的多种多样是历史的必然。多地依据历史文献来争论其故乡，这种不可避免的争论在今天更多的是在争取文化利益。任何人也无法阻止各地争取自己的利益，这种争论几千年来没有结果，今天也不会有结果。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地方能跳出利益的拘囿，牵手研究炎帝神农文化内涵，让祖先的事业得以传承。

炎帝神农作为开创中华文明的文化英雄，学术界把时间定位在炎黄传说时代。这个时代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的后期，下限应是龙山时代。这就是说，炎帝神农应该在东方文明跨入文明门槛的前夜。文明最重要门槛是国家的建立。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立国，是公元前2070年。炎帝神农是国家出现之前的农耕部落代表。仰韶时代后期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龙山时代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时代应该是距今5500—4500年间。文明的出现肯定是依靠累积，不可能昨天是野蛮，今天就跨进文明。北京猿人学会了用火、制造工具就是文明，但我们谁也不会说那就是文明时代。文明是通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厚度

时，发生质的变化。这就叫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学术界认为质的变化点，历史的分割应该在炎黄传说时代。中华文明5000年就是因此而来。

吃穿住行用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受惠者总是会感恩吃穿住行用的创始人，于是人们在炎帝神农创造这些业绩的条件上寻找依据，结果炎帝神农故里越寻越多。人们很少去寻找思想层面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民的最美好的、最珍贵的、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到哲学思想里。”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仅是吃穿住行用，最重要的是思想和思维方式，这是中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人生活的根基。人类思想、人类文明的地基是思想和思维方式，才是智慧的的激情、抑制不住的渴望，有这样一种想要追求根源的渴望，才会有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将军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农耕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蕴涵着无数先哲辛劳与智慧。这种文化与天地的运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要顺应天地，就必须认识天地，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一定要仰望天空。“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前总理温家宝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这句充满哲理的话，引领我们走进一种智慧境界。仰望是一种观察，观察引发思考，思考渗透理性，观察的现象负载理性，观察、深思就会有长远的目光。

随州有三件出土文物说明这里是一个代代有人仰望天空、产生智慧的地方。大洪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冷皮垭，随州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豆，豆柄上镌刻着北斗七星。考古专家在1986年第一期《农业考古》鉴定这件文物的文化内涵距今6000年。涇水流域的一条支流叫漂水，漂水河岸边有一个地

方叫浙河西花园，距随州城东十公里。1983年，将军的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组织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发掘，其中有一件陶纺轮有阴阳鱼图案。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经过十年的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确定这里的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还有一件文物，将军在武汉看到过的湖北博物馆曾侯乙衣箱盖上的二十八星宿图案，这件文物的准确年代公元前433年。

《吕氏春秋·圜道》说：天圆地方不是两种形状，而是规则和秩序。一是天的圆周运转循环，二是地的厚重稳定。人类在静稳沉着的土地上生存，听从天命，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对天地秩序的遵守就是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北斗七星在运行过程中与农耕生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斗柄指向正东是春分，斗柄指向正南是夏至，斗柄指西是秋分，斗柄指北是冬至。

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事物的现象、个体、特殊性和偶然性，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就能够获到事物的本质。天地在运行中，是遵循对立统一、圆融和谐的规律，这就是事物的本质。炎热的夏天与寒冷的冬天是对立的，炎热转变为寒冷需要时间和过程。感性能看到的是热天的白天很长，冷天的黑夜很长，热和冷的转变理性是看不到的。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夜晚最短，但这种长与短的对立是相互转化的，这一天也可以说是白天最长的结束，也是白天最短的开始。感性和理性就是现象和本质的思考。真正的哲学思考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通过经验和常识的总结归纳，获得特殊的智慧，其实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变化，是天地运行的现象，但揭示出天地运行的本质规律。这种运动规律中蕴含着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元素，这种矛盾对立，在运动中会向着对立的方向转变，冷天和热天构成完整的一年，宇宙的永恒运动就出现一个圆融和谐的境界。这个圆

融和谐的太极圆，分界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北斗七星的“s”形状。从冷皮垭的黑陶豆柄的北斗七星、到随州浙河西花园的阴阳鱼陶纺轮、再到曾侯乙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案，历史文物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重要的思维方式在随州的形成过程。

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能在随州出现，就不能在别的地方出现？今天的科学知识证明，观测北斗七星的最佳观测维度在北纬 28° — 34° 之间。北纬 28° 以下因为地表大气抖动，就看不清或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到到“s”形的北斗七星。北纬 34° 以上虽可在较长的时间内看到高纬度带的恒星，但如果北斗七星的赤纬低于其地理纬度，“北斗星”不是“s”形状。因为太阳系在运行中，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高纬度地区的观测角度不断发生变化，而大熊星座始终不变。也就是说在这个最佳纬度之外仰望的，天地运行规律可能就是另一种天象。

北纬 28° — 34° 最佳的中间值是北纬 31° 。随州地处北纬 $31^{\circ}19'$ — $32^{\circ}26'$ ，是观测地球围绕北斗七星运行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中国境内北纬 31° 左右的地域，东部是江河淮汉地区，不堪旱涝困扰，难以进行理性思考；西部高山大川太多的地质灾害之苦，没有文明积累需要的必备条件。中央电视台有个《北纬 30° 探索》栏目，探索这个纬度的许多不解的奥秘。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人，能够吸收到人间最丰富、最稀缺的精神营养。看不清楚北斗七星的地方，仰望星空的时候，就会出现茫然。没有仰望，就难以发现天地运行规律，难以获得精神营养。

天地运行规律就是“道”，“道”是不可改变的。道的本意是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这个世界一种真正的价值和秩序。太阳的东起西落，不可能变成西起东落，

冬冷夏热，也不能变成冬热夏冷。人顺应这个规律就是“道”，有人偏不信这个邪，到了晚上不睡，到了早晨不起来，可不可以？短时间看不出什么，长时间就会折自己的阳寿；又好比，冬天冷的时候，穿单衣，夏天热的时候，穿棉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难受的自己。“道可道非常道”是弄的很玄妙，其实“道”是说得清楚的。我觉得知道顺应天地的运行规律就是道，所谓“德”，就是大家都希望顺应的事，你不能违反这个潮流。所以我觉得炎帝神农的“道德”，就是带领大家做顺应自然规律的活，办适应社会潮流的事。

看到将军对我的认识有些认同。我接着往下说：随州是典型的丘陵地域，最高的山峰也就千米，眼前起伏的崇山峻岭，海拔高度大概只有两三百米的样子。我记起《兰亭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随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炎帝神农、有青铜编钟，还有走进中国历史第一个以“隋”地方命名的王朝，李白在随州的寿山写下了千古名句“床前明月光”。我陪余秋雨先生游历随州，余先生说，炎帝神农一个巨人在随州迈出最伟大的脚印，随州的青铜奏出令全世界全人类仰望的声音，随州的月光照亮沉醉了整个民族的诗人。

我们的中巴进入随州境内，深秋的随州，不像古人描绘的那么凄凉萧条，枯黄之中有许多的青翠，山峦起伏，表情丰富，历尽世事沧桑，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午时分，天空空的，太阳懒懒的，山色却远比春色丰富，苍翠之中偶尔有几许的桔红、橙黄、绛紫，远山近岭的秋色就有了一种成熟、一种富饶、一种繁荣。随州是一种典型的丘陵地貌，实际上最能与人亲近的不是高山峻岭，也不是大江大河，而是这四面八方的丘陵山地。这样的

地方有透迤的群山，湍急的溪流，于是就有了丰赡多彩的生命力，千姿百态的灌木丛木，可以放牧、可以开垦、可以兴修水利，错落其间的村镇，万千丘壑就有了一团云蒸霞蔚的文化氛围。中国文化就与我们栖息的丘陵密不可分。农耕文化起源于家，家首先栖居于丘壑。中国文化的话语中，家、国、民族、天下这四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同时，中国的天下就是丘壑。我们的民族利益就是这个丘壑，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家与这丘壑一样，都有着相似的结构模式，但细细体味，没有一个家和另一个家完全一样，也没有一座丘陵与另一座丘陵能够重叠。

老一辈的革命家能投身革命，就是要保卫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丘壑。这时我想起了刘亚洲将军写的《瞿秋白的梦境》。我敬重刘亚洲将军为师长，一是他年长我三岁，二是他的思想境界确实高我许多。我也到过九寨沟，虽不能称作文人，但自认为是一个有着文化追求的人，要是搜索枯肠，也许能写出词句很华丽的文章来，但境界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将军文章的那种高度。将军在九寨沟看到的美景，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夕阳明灭乱山中”，郎士元的“落叶寒泉听不穷”，是杜甫的“已忍伶俜十年事”，是郎士元的“心持半偈万缘空”。这是瞿秋白梦行小径中，在诗的王朝与众多的诗人相会，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秋白在1936年6月18日，即将就义的前一天晚上，一个革命家做的一个梦，想提笔把这个梦境中与唐代诗人会晤时唐人吟诵的章句写出来，无奈，行刑的命令已经下达，甚可念也。幸亏，“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荷枪实弹的军队，枪口对着文弱书生。书生手挟香烟，神态自若。书生知道一

个文化人走进天堂，最需要的是从容和儒雅，不能失了文化的翩翩风度。没有真正的内心强大，断然做不到这点。瞿秋白选了一块草坪，觉得甚好，盘膝而坐，然后，对失去人性的刽子手点了点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们开枪吧！”这一刻，瞿秋白36岁，生命何其短暂，然而，历史有这样年轻的生命，就有了波澜壮阔。

瞿秋白的躯体入了地狱，心灵却升上了天堂。刘亚洲将军走进的就是瞿秋白诗中描绘的场景，是今日九寨沟的那清幽美景，更是神州大地的壮丽河山。将军感到自己变成了三十六岁的瞿秋白，一袭白衫，手捧唐诗，款款行于曲径。思想通幽，万事皆空。天地间空无一人一物。在向这多情的山水告别。明天将远行。一个人想通了生死，就真正领悟了生命的意义，他就会把自己的个体生命融入到民族的整体之中去。连绵不断的5000年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民族中无数像瞿秋白一样的英雄，英勇不屈的精神追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富有梦想的人，是对历史和未来的充分自信，使得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坚守精华、吸纳营养，才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李先念是1939年元月20日跨进随州，随州是他的生命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是我们湖北省的老省长、共和国主席，我们与他老人家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知道在将军您面前讲他老人家，无论从何角度来说都不够资格。我只能说一个普通百姓视野里的共和国主席在随州的辉煌岁月。

随州的元月，还是隆冬时分，如果正在下雪，随州的的山水就一定迷迷蒙蒙，丘陵山壑若隐若现、若幻若真。人在这种景象

面前，精神性情也能够得以陶冶、净化、升华。李先念可能没有像瞿秋白那样进入和唐代诗人会晤的梦境，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已经和瞿秋白一样透彻领会了生命的价值意义。一个人的生命境界是装不出来的，如果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重一点，军政委去做营长，没有一点的情绪，绝对做不到。毛泽东问李先念：听说要你到129师去当营长，有这个事吗？“有！我很高兴。”看到毛主席微笑中有些讶异，就说：“因为我能扛起枪打击日本侵略者。”扛枪意味着年纪轻轻就丢性命、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大事就是要捍卫的就是中国民族的根和本，根和本是家、国、民族、天下，是神州大地的万壑千山。一个人由自然境界提升为天地境界，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以天理的高度行天道。

有人说，国民党打了“随枣会战”，是抗日的骨干。前面的半句有部分历史事实，后面半句是对历史的无知。论断历史的人，时刻被历史论断。中日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比，更是两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较量。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是简单地借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没有形成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政党组织也很松散，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000人敢于面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事变。1937年7月7日，华北驻屯军仅仅8400人，敢于面对10万兵力29军发动事变。19万与10万都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守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面前，一个没有自己理想的政党，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衰弱得连灵魂都没有的政党，能指望给民族带来出路和希望。

整个抗日战争就是按照共产党设计的思路在进行。只有几千万人口的日本，敢对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发动战争。就是日本的战

略研究者认定中国是一盘散沙，不能聚全民之力进行战争，就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但他们没想到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捐弃前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国家的战争其实就是两个国家能量的比较，日本的能量是一时的强大，中国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消耗他的能量，这种能量的大小就能够发生变化，当中国的能量大于日本时，就是中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日本能量最为强盛的时刻写下的。国民党那么多的精英对这场战争悲观失望的时候，一个政党领袖的思想闪烁出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心灵。这个政党不仅仅是有思想和精神，更有一群敢于现身、勇于牺牲的战士。

李先念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三岁就跟着表亲袁学福学木匠手艺，聪明的李先念，只用一年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木工技能。一个山村的小木匠，应该走乡串户，为父老乡亲制造生活的舒适和便利，这是他的责任；这个国家和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需要一个小木匠挺身求助，军人在哪里？木匠承担军人的责任，是谁颠倒了责任。小木匠义无反顾、舍身忘死走过了本不该属于自己去的地方，为挽救民族的危机与苦难，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李先念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走过雪山草地的人就是英雄，他两次穿过雪山草地。红军西征，两万多人西路军惨遭重重敌军围剿，他没有泯灭希望和理想，以超乎寻常的意志，依靠指北针，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粮绝弹尽，惨遭失败，艰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为党成建制地带回了一支417人的队伍。这是一个为共产党立过大功的人，毛泽东觉得这样安排太不公平，应该让他到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华中地区去担大任，问他认不认识高敬亭，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所以毛主席建议他去新四军高敬亭任司令员的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能让一个山村小木匠成长为英雄的政党，必然知道遵循天地运行规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这种遵循和顺应才是真正的道德。唯有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世界的发展潮流。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是逆世界潮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严重破坏，历史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列，这个民族就担负起拯救人类社会前途和命运的责任。担负领导中华民族责任的政党必须有世界的眼光、民族复兴的理想。同时，这个政党肯定有人才成长合理的机制。李先念往华中地区的路途中恰好和刘少奇、朱理治等人同行，时任中原局组织部长的朱理治觉得李先念是一个帅才，可以统领一个方面的工作。朱理治向刘少奇报告后，再报中共中央并获得批准。于是，李先念就成了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的军事部长，接着就成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离开竹沟到中国最核心的区域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时，李先念带着160人的武装。

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是“努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四万人枪”。刘少奇告诫他：“宣传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共产党的统一政策凝聚人心，落实在行动上就是第一抓武装，第二是抓武装，第三还是抓武装。在抓武装的过程中，可以是八路军旗帜，可以是新四军旗帜，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是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必须记住，那就是保持党的领导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绝对不能有一点的马虎。”政党的活力来源于昂扬的精神、高贵的灵魂。共产党穷的是物质，富裕的是精神。一个人带着160人的武装，深入日本侵略军强大的敌后，建立自己的武装，这不是李先念个人的强大，而是一个政党的英明伟大。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是动员全国民众的广泛参与，老百

姓组织起来了，拧成一股绳，才是战胜日本的根本，才能够弥补军事、经济上与日本的差别。

李先念从西路军回到延安，曾在抗大学习，他要求转到马列主义学院。他转学就是喜爱哲学，从哲学中知道，阴和阳对立统一，发生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人在看问题的时候能分清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局部和全局、现实和可能，最重要的不在于血缘，也不在于经历，关键在思想和思维方式，自然规律的“道”，就是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正义战胜邪恶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战争是野蛮的、非正义的，无道而寡助。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上看到这场战争的本质。中国近代没法摆脱屡战屡败的命运，就是始终没有一种力量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中国虽是弱国，但处在进步的时代，共产党能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够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这种凝聚就好比冷天变热天逐步发生变化，民族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家和军队的最重要支撑就是人民，以为仅仅靠国家和军队就可以战胜日本是十分可笑的。一个政党精神力量的衰弱，物质的力量是难以弥补的。战争就是能量与能量的对抗，中日战争首先是思想能量的对比，然后才是物质力量的对比。毛泽东的理想性的、超越性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创造性的思想牵引着李先念，一个山村小木匠的思想有了巨大变化，当一个人成了一个理想性的、超越性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创造性的存在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热量点燃成为火炬，照亮和温暖整个民族。

李先念走进随州的那天晚上，与国民党的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在一个碉堡里进行了彻夜长谈。我根据《李先念年谱》里“在一碉堡里会见李德纯达成合作抗日意见”几句话写出自己很深刻的感慨。李德纯听到的不是山村小木匠的谈话。李先念宣讲的是

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思想，共产党出了有叫毛泽东的英明领袖，还有许多像瞿秋白那样优秀的人构成的一个领袖集团，他们对世界潮流的把握是那么精准。中国共产党通过抗大、马列学院，把一个政党对“道”与“德”的精确认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分析，灌输到党的高级干部，由他们去实施一个政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这种把握其实就是这个领导集团对历史未来的透视。

“共产党凭什么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力量军队那么少，武器那么落后。”李德纯的疑惑，也正是今天自认为有学识敢论断历史的人的疑惑。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头脑反复出现的是物质力量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的研判。李先念说：“《西游记》取经的队伍中，本事最小的是只会念经的唐僧，力量最小能够让几个有本事的人修成正果。所以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核心，这个力量最小的人有思想和意志，能够引领几个本事大的人取到真经。”

碉堡中的彻夜长谈是李德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国民党的县长到信任共产党，这需要一个艰难的心路历程。在一颗心灵深受煎熬的时候，一个山村小木匠拯救一个受煎熬的灵魂，是李先念帮助李德纯完成了思想的升华。李德纯从李先念手里接过《论持久战》，细细研读，终于领悟了“道”，事物发生、发展、消亡的自然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就缺少领悟和把握的智者。很多人以为看到的東西就是“道”，真正的“道”是看不到的、无形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写出《论持久战》，说明共产党的领袖集团领悟和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看上去国民党握有几百万的军队，是可以看到的形，能看到的東西只是器，是表面现象。《易经》里说，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李德纯的灵魂升华之后，带着信阳县常备队的大部和一部分警察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个人也就在这一年的4月入了共产党，进入握有“道”的团队，他的人生也走进了一种新的境界。解放后，李德纯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重工业部改为中南工业部，再任部长。1952年调任中央财委重工业组副组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华民族这一阵营里，诸种力量中最大的一股力量。他成为领袖应该明白中日战争是两个民族的能量比较，他这时最需要的是凝聚民族一切可以聚集的能量。凝聚是中华文化的根与本，炎帝神农成为一个民族的始祖，就在于他能依靠道德的力量凝聚一个民族。凝聚的核心是给予，神农尝百草，肯定知道尝错了要死人，但自己死，能够让部族不死。炎帝神农自己的能量奉献给这个民族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个民族的能量。一个人不想给予只想索取，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能量。

当时的共产党具备这种慧眼，知道怎么凝聚民族的能量。这个政党能够给予的只有精神和思想。李先念的觉悟很高，“觉”就是觉察辨析比较、“悟”就是思索领会醒悟，在觉察中明白、在思索中开窍。李先念挺进敌后，一驻扎就组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想着法凝聚各种力量。这时我想起了刘亚洲将军的许多文章，对中国今天各种力量的凝聚进行了很是深刻的阐述，而且令人信服。其中对台湾的战略评估，认为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目前还不到要进行最高形式的时候。政治是什么？毛泽东说过：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弄的多的，反对我们的人弄的少少的。在政治斗争中，在两岸来讲，大陆是主动进攻方，在中美双方来讲，大陆是被动防御方。祖国的统一

是我们的信仰，这是不能讨论的，中国当下仍然是二流国家，不管你服不服气，都必须承认。

真正的强国就是能在逆境中聚集能量。首先是国内的能量，再就是台湾人民的力量。台湾人民中认同“台湾共和国的人”叫“台独”，认同中华民国的人叫不叫“台独”？中华民国成立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在后，前者治理过大陆，后者从未治理过台湾。处理台湾事务时，要想法把拥护我们的人聚得更多的。刘亚洲将军也许得到了岳父李先念的真传，认为处理好台海问题是我国另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将军的思想时常影响着中国高层的决策者。

李先念在抓武装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则的。国民党的部队看到共产党的队伍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的景象，羡慕得不得了。桂军的一个连长找到我军的干部，想把一个连的队伍拉过来参加共产党，报告给李司令员。李先念说：“我们在国民党的第五战区活动，要争取李宗仁抗战，万万不能拉他的队伍。那几百人枪在他手里比在我手里强，起码，在他手里可以获得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饷，在我手里一分钱的军饷也没有。告诉他们，在哪支部队都是一样打日本侵略者。”

李先念领会党的思想和精神是极为深刻的，他周边聚集了有智慧的各种人才，弄清楚华中豫鄂地区的敌我态势，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达到25万，退守到华中地区的国民党武装达到40万，共产党希望能在华中地区与日本侵略军抗衡，必须能凝聚能量。李先念能领会党的指示精神，国民党虽然骨子里反共，但也反日。想办法延长国民党军队反日的时间，延缓其反共的时间，就是自己的生存发展策略。他觉得处理好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就是发展自己的机遇。所谓机遇，就是无数机缘的巧妙相遇和叠加，抓

住了这个相遇和叠加点发展自己，就是抓住了民族的未来，政党的未来。阶级的核心是政党，执政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到死也没弄明白，共产党人总是剿灭不绝。其实他没明白阶级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种动力，要聚集自己的阶级能量，尽可能让自己的阶级用能量去温暖别的阶级。

共产党把一个山村小木匠派到华中地区，是因为这个人有质朴的阶级感情，最知道中国最大的阶级需要什么，他就创造条满足这个阶级。这个阶级把自己的亲人送到这支队伍里也就最放心。我在八十年代搞“三民集成”收集的时候，收集到—首《送儿把军参》的民歌，是这样唱的：满天星斗亮闪闪 / 娘送儿郎把军参 / 投奔李先念。走—山来过—湾 / 送儿送到涇水边 / 话儿万万千。今日从军去征战 / 莫忘阶级仇和冤 / 英勇杀敌顽。撑—篙来划—船 / 送儿送到水中间 / 娘话重三遍。要学河水流不断 / 革命不胜不回还 / 愿做好儿男。回—步来望—眼 / 送儿送到河南岸 / 临别嘱—言。穷人永向共产党 / 跟着红军打江山 / 娘盼喜报传。雄鸡三唱日出山 / 娘送儿郎把军参 / 东方亮了天。

讲到这里，随州市委书记刘晓明打出叫我停—下的手势。他对将军说：“李明海主任的亲舅舅叫熊义荣，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九里岗人，参军的时候影响很大。熊义荣敏而好学，资质聪颖，读过12年的私塾。在兵慌马乱的年代，供—个孩子读12年的长学，对于—个穷苦人家来说，其中的艰难辛苦是难以想象的，含辛茹苦的父母寄托了多少希望和梦想，邻里乡亲是多么敬佩和羡慕。父母能够把这样有出息的儿子送到新四军第五师，顿时惊动了四邻八乡，乡亲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国民党得知—情况，找到他的父母，要老人们把儿子找回来参加国民党的部队。国民党的部队是国军，国军就是国家的正规军队，比共产党的部

队有出息。不然全家人不得安生。老人觉得共产党实在，对老百姓好，让儿子跟着这样的队伍心里踏实。国民党的狗腿子经常去找老人，被逼无奈带着家人四处逃荒，始终没有去找大儿子。熊义荣在参军的第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识字，又写得一手好字，在五师机关做文秘工作，曾给师长李先念做过文书。1948年曾回家过一次短暂停留，后在随县封江江家河战役中牺牲。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兴衰绝对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将军很是认同，说：“今天的党成为执政党，更不能脱离群众。”刘晓明书记示意我继续说。

我接着说：“李先念的部队得人心，就是因为这个部队的人大多数人是穷人老百姓，他们知道穷人老百姓心里想什么，总是去做穷人老百姓最想做的事。比方熊义荣烈士这件事，部队知道烈士家里的情况后，先后多次派人到家里慰问救助。乡亲们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参加那个部队不死人？看到共产党部队来了，就会说，参加国军的那么些人，就没看见一个来慰问的。”

有人民的支持就能存在，存在就能够发展，李先念在日本占领的敌后存在，就是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有存在就能够实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不了你的成建制的部队，十个二十个出来了，我瞅住机会就干掉你。动物世界中，老虎狮子是兽中之王，应该是最有实力而且性情凶狠的野兽，它获得食物的过程就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最弱的对手，站好最有利位置，把握最好的时机，突然间跃起，以最快的速度捕获。战略的耐心首先是存在，存在就是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必然势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四万人枪”。懂得“盘枪”首先学会“盘人”。“盘人”就是凝聚能量，这种凝聚没有技巧，只需要诚实。一个山村小木匠，可能缺的是能说会道大道理，最不缺的是诚实厚道。

一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能够创造出丰功伟绩。李先念领着160人走进随州这片土地，六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四万人枪”的战略任务。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豫鄂边区建立了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民间武装力量。李先念建立的这支钢铁队伍，始终存在并面对这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进行的战斗达126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43000余人。对国民党军反共的自卫作战878次，毙伤俘顽军和顽军起义投诚32000余名。部队在英勇战斗中伤13000余人。解放土地9万多平方公里（时湖北省总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和1300余万人民（时湖北省总人口2200万），建立了8个专区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真正的炎黄赤子，舍命保卫的就是炎黄开创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追求，中国人的完整的家、无限的丘壑。

这时我想起了刘亚洲将军许多关于凝聚政党力量、国家力量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国内，中国的中产阶级越大，中国社会越稳定。邓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想让另外一部分的人永远的穷下去。中产阶级的成长是一个长期而且痛苦的过程，很多人希望快一点成为中产阶级。然而，万事万物有自己的规律，这事快不得，太快了，不光是侵害其他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没有足够文化修养准备，不仅仅是不会感恩社会，还会危害社会。“六四风波”其实就是暴发的中产阶级希望通过制度的改变，让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中国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的富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将军当时还是上校干事的时候觉得“得益者造反，这是历史上的怪事”。新兴阶层想保住自己的所得，非要夺权，人民处心积虑要

摧毁这个新兴的阶级，政府要调和其中的矛盾。三方缠斗，终于兵戎相见。政府制定出一套治理整顿的政策，更是触犯新兴阶层的利益，他们再也不能等待了。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就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就需要继续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需要资源，更需要朋友，需要一切支持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的北方、西方、南方、东方，特别是美方，将军都有精妙的论述。看一看将军十几年、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其中许多思想正在成为今天的国家发展战略。将军的思想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与血缘无关。一个人的功业，首先是志向，其次就是勤奋努力。将军能进入国家战略的决策层，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国家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真正的精英管理国家，就可以少犯错。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只要人是人，不是神就可能犯错。但有思想又有精神、有激情又有理性的人犯错的概率要低。真正的人才需要实践和业绩证明，不是选票能够证明的。选票只能证明最能蛊惑人心的政客。

将军不仅仅是一个有思想和激情的热血男儿，更是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自觉者。他时时刻刻把祖国的命运装在自己心中。1988年将军还是上校的时候，以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南朝鲜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敏锐地感觉到南朝鲜有与中国结好的意愿，回国后就把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建议和对策上书给决策机构，受到重视后，将军再次以作家的身份实践着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与韩国的建交获得重大突破，在苏联解体，整个西方社会施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刻，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军用自己的行为作了最好的诠释。

在凝聚国际能量上，将军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美国在

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做对手，不等于美国在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对手，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其中找到两个大国的共同利益，用双方的共同利益，延缓我们对决的时间，这样才有利益于我们的能量凝聚。日本希望通过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日本，未来我们不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日本永远不会服气。但不是现在就要打一仗，现在打的结果只能把日本打得更加靠拢美国，多了中美竞争中，美方的筹码。现在要寻找的是日本与中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刚有一点结果，中日互相持有国债刚刚有了个框架，美国就慌了。钓鱼岛冲突恰恰在这两件事以后发生，难道不奇怪吗？前两件事干成了，谁最紧张？一个中日韩加上中国的台港澳，经济总量可与欧盟经济体、北美自贸区媲美，再加上东北亚自贸区、东南亚自贸区。谁最高兴？这样对世界有益的事被中断，只需要理性和逻辑，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领会出其中的奥秘。就是有证据只能证明人家的高明，自己又能怎样。我们必须从容应对，坚定自己的战略定力，不可以随随便便中断自己凝聚能量的进程，这种凝聚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尽可能大的空间。凝聚能量为什么？就是让中国人的家更加兴旺发达，中国的丘壑无限壮美。将军不仅仅是革命先辈血缘的延续，更是一种炎黄精神的传承。

话说间，随州接待办的中巴就来到了李先念当年宣誓就职的广场上。“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4月5日，李先念就在九口堰这个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典礼，率全军将士于随南北兆山通电就职。从车上下来的刘亚洲将军举目四望，群山环绕，曲折有致，山色斑斓，浓郁浑厚。在横无际涯、大无可方的空间，在无尽无休、永无尽期的时间里，最重要

的是生命。这里被称为生命的山谷，是因为目光所及之处，满山遍野的银杏，伟岸挺拔、华贵典雅。这种树木不论环境，不择土壤，生命力极为旺盛。这里银杏组成的群落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古银杏群落。远远望去，会被那种古朴厚重、扎实内凝的气度所震慑，细细品味，就可以品味出生命的那种莽苍之态，雄烈之韵，挺拔之势，从而体悟出生命的高贵，原是这种柔韧、刚烈、执著、质朴构成。将军径直走向了岳父李先念的雕像。李先念就是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他站立在那里就是千年的时间 and 无限的空间在这里完美的交融，是丰富的世界和美好的生命在这里聚集，是高贵的情怀和深刻的体验在这里集合。雕像两旁，松柏苍翠。刘亚洲郑重地走上前去，向李先念像敬献了花篮，并恭敬地三鞠躬。

雕像是2005年洛阳九口堰的居民为了纪念李先念而塑。有了先烈的奋斗，才有了农家的安逸。炎帝神农的伟大，就在于他和他的氏族部落创立了稻作农耕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是聚集，聚集的本质其实就是政治。家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炎帝神农的牺牲奉献就是让他的子孙有了一个家，有家才有国，有民族有天下。东方的农耕生活就是从家开始，以家长为核心，一家人紧紧围绕着家长，这个家就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也有了民族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围绕家长这个中心，因为家长用自己的能量温暖了家庭的每个成员。怎样把大家聚在你的身边？首先你必须舍得吃亏，愿意让别人来沾你的光。炎帝神农精神很丰富，但随州话用两个字就说明白了。“揽憨”这个随州土得掉渣的土话，就是把憨厚实在的哈巴事揽在自己怀里，是“吃亏”的意思。你多吃点亏，大家就服你，就聚在你身边。你吃的亏越大，你的感召力越强，你的凝聚能力就越强大。

看一个人能不能交朋友，就看他身边聚了多少人，聚了些什么人。交上了朋友，就要对得起朋友，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没有血缘的兄弟。自己多吃亏，对别人有利，就是一个圣人。李先念带着160人的队伍走进随州，几年时间就带出了一支5万多人正规军队，还有30万人的地方武装。一个山村的小木匠不是一个圣人，然而，一个英明的政党把他培养成一个具备高尚道德的、具备巨大凝聚能力的伟人。

我们跟着将军久久凝望，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种强调整体的社会科学，诞生在欧洲，西方社会对整体的强调不是很看重，所以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在马克思的故乡进行实践。我觉得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太阳理论，太阳温暖太阳系，太阳系的行星就围绕着太阳转。又好比树木的年轮有许多的圈，没有中间的那一圈，就没有后来的许多圈。这和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化相同相近，因为炎帝神农文化是从天地运行规律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科学当然符合天地运行规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得以实践，就是因为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我读过将军的文章，知道将军勇于继承和批判，也能够批判和吸收。我也觉得西方文化是一种“人人都是太阳”理论，这种文化对人的个性的张扬有弊端，但也有营养。这是主张人人都能成为太阳，人人都可能成有能量的太阳。虽然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大树的树纹也不能围绕两个中心展开，然而，人的个性的发展在成长的时候，这种“人人是太阳”的环境和氛围确实确实可以让人产生能量。这就要引领这种能量服务于社会、造福于整体。

将军仔细看岳父李先念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当他听到李先念把裤子一挽，帮助九口堰的农民赶秒子，有些疑问。“秒

子”是用来平整稻田的一种耙。我们随州的方言“赶秒子”，就是用双手扶着这种专门平整水稻的耙，在灌了水的稻田里把稻田耙平。这“赶秒子”是种田里面的技术活，很多人种了一辈子的田，不会“赶秒子”。李先念师长这么大的首长会“赶秒子”，在农民眼里那就是顶呱呱的种田好手。九口堰的乡亲说：共产党里真是能人多。房东很尊重敬仰这些共产党的能人，房东表达尊重的方法，就是给首长留一碗鸡蛋油盐饭。后来，李先念当共和国主席了，心里也没有忘记那鸡蛋油盐饭香甜的味道，还特别问候炒饭的房东身体可好，要地方政府照顾好那些把共产党当亲人的父老乡亲。

感受岳父的艰辛，就想和岳父照一张照片，站在岳父睡过的床前，站在岳父的照片前。得知司令部旧址的房屋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他关切地问：“下雨漏不漏啊？”“每年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检修、维护，保护得比较好。”看到我市新四军研究会为新五师撰写出版的作品，刘亚洲细细翻阅。拿起一本还没编好的《李先念在随州》说：“编好了，一定要送一本我看看。”作为后辈，深爱自己的长辈很正常。人类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组成起来的家有着天下最合理、最自然的关系。

然而，这时的将军不仅仅是对自己长辈的敬仰，更是对先辈革命精神的继承和传递。这种继承和传递是要付出感情和精力。李先念在随州九口堰的精彩岁月，其精神、文化、行为，其核心价值观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是精神状态上的积极主动，是一种对自己前进方向道路的自信自觉。须臾不可丢掉的东西，丢掉了，就会在重陷精神文化上的被动，就会回到整个世界都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去。《尚书·周书》中说：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取得伟大的功业，是有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功业，在于辛勤不懈地工作。走进随州，了解中国历史，才能从心灵上去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将军看到门口摆放着文房四宝，就欣然提笔题下“英勇不屈，前赴后继。”落款是“后来人刘亚洲”。

走出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将军看到旁边的“五师食堂”，就想进去看看。于是他来到农户孙猛政的家中，喝农家茶，与他们拉起了家常，还和“五师食堂”的老板孙猛政合影留念。陪同将军的随州市委书记刘晓明说：“我们正在新建新四军纪念园。”

将军说：“走。去看看。”

我们步行来到新四军纪念园工地，看到基础已经清理出来，很是高兴，表示一定要来看看建设完工后的新四军纪念馆。将军明白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能够进入居高望远的境界。到了这样的境界，才可以扫除惶惑、浮躁、狭隘和悲观，在各种利益面前保持镇静从容的心态，从先辈的奋斗历史中吸收各种有益的精神营养，保持一种强健的精神状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想。所以，将军叮嘱随州市委书记刘晓明道：“抗战中，新四军为民族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这支军队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财富。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要积极打造成全国著名旅游景点。”

将军希望能在更大范围里传承革命先辈的思想和精神，一个人有思想和精神，就一定能够获得巨大的能量。将军一张稿纸背面没写字舍不得扔掉，不愿意浪费，拿来自己写稿，这不是吝啬。他得一笔稿费，三十万送到岳父的故乡红安建一所希望学校。听说再得一笔相同数量的稿酬，还没拿到手里，他就连忙捐

赠出来去栽树。生命的能量来源两方面，精神能量来源于知识和自己的修养，建希望学校，就能够让一代人获得知识，人必须具备知识才能够提升修养。物质能量来源于宇宙深处，苍天对我们的仁慈和恩泽，把无限的光辉注入生命之中。但人不能吃太阳，唯有植物可以把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绿色植物转化的化学能就是葡萄糖。葡萄糖是活细胞的能量来源和新陈代谢中间产物，是生物的主要供能物质。绿色植物还制造氧气、过滤和涵养水分。能多种树，就能够凝聚宇宙深处的能量。可见，在他眼里，人要凝聚能量，最重要的两件事，读书和栽树。读书能凝聚思想精神能量，栽树能吸收宇宙深处的能量。

将军时间很是紧张，依然来到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大殿里，炎帝神农目光和蔼，流溢着无限的仁爱，昂首远望，潜藏着深刻的智慧，胸膛挺起，蕴含着永远的英勇。拜谒者的灵魂顿时被这仁、智、勇的光芒照亮、溶解、征服。将军敬献了花篮。礼毕后，沿逆时针方向行走，认真观看炎帝伟大功德的浮雕。临别之前，他对随州市委书记刘晓明说：“不虚此行，明年来攀登随州的大洪山！”尽管我解说随州文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我仍然坚持送将军到下一站。我觉得一个人真心作对文化追求，不只是停留在嘴上，需要用自己的行为表达内心深处的敬重和仰慕。同时，我从将军能走进中国高层，感受到中国的希望，一个有思想的中国文人，能成为军人，能成为将军，能成为绝对制高军种的空军上将，就表明中国执政者认识到文化是军队力量的灵魂，这不仅仅是文化人的希望，更是人类的福音。中国的“武”是由“止”与“戈”结合而成，说明军队存在的最高境界是不是武力对比，不是为了打仗，“止戈”就是制止战争，为了获得和平。走向文明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最能代表这种追求的文化人，能走

进中国的领导岗位，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

从随文化发生发展探其地域文化特质

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是出土曾侯乙编钟的地方，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还有首创“民为神主”说的思想家季梁；有不断出土面世的青铜器。远的不说，近期内安居镇羊子山的噩侯青铜器和正在发掘中的淅河镇叶家山曾侯青铜器，无不令人震惊。有人说随州才是出土量最大的“中国青铜器之乡”，其实也不过誉。随州已有了“编钟之乡”称号，随州人也就顾不上去计较是否“青铜器之乡”的称号了。不过，随州确是一块神气的土地，令人神往。以下将就随文化发生发展的情况来探讨随文化的地域特质，企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随文化深处的隐秘。

一、大自然赋予随州兼得南北特点的宜居条件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生命的关注。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体的文化。人类生命依靠山水草木而存在，自然山水的主题思想、观念就进入人类的灵魂。因此，我们解读依居山水而生存的人类生命的主题思想、观念，那么这里的山水就有了生命的张力，或者说这就是山水的活力状态。这种活力状态所孕育出的一种文化，就是地域文化。

我们知道大地构造板块碰撞产生了中国中部的秦岭。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淮河是一条独特的河流，在北方，它被称作为河，在南方，它被谓之水。这条河流的发源就在随州境

内的桐柏山山中。随州处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在中国南北分界线中轴位置从南边贴近这一分界线。这里有山有水。大洪山依次而下是大量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似乎完全没有雄伟浩大的景观，也没有恢弘巍峨的气度。大洪山中几泓清泉依山而下，也没有浩浩荡荡的激烈，也没有豪迈苍茫的英姿，但依山而下的过程中，宽容地接纳了股股叠叠的清泉。于是它有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涇水，这是一条有大小支流103条的小河，103条支流呈叶脉状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贯穿随境。河岸的两边有适合生长稻谷的沃土。也成为动物植物生命的乐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说这里是天地最好的地方，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这四大因素的相关数据很枯燥，也难以让人信服。而《中国救荒史》有一份十分完整的资料，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根据隋唐年间，国家粮库用于赈灾的粮食出库记载而整理出版的一本书。这上面详细记载了全国县一级区域动用国家赈灾粮的出库情况。它从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到唐哀宗天佑四年（即公元907年），共326年，随州共有12次动用国家粮库赈灾粮，这就是说326年的时间里，随州共发生12次灾荒，其中水灾2次，旱灾10次。相当于163年发生一次水灾，32.6年发生一次旱灾。而这一时期，全国各州县平均2.7年发生一次水灾，2.4年一次旱灾。^①也就是说，生在随州，按人一生活60岁计算，你可能是一辈子遇到一至两次灾荒，而在随州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23次以上的灾荒。中国古代何为灾荒？那是易子相食，饿殍遍野。只有这时候，才可以动用国家的赈灾粮。因为欺哄国家骗的赈灾粮食是灭九族的大罪，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3年影印版

应该说，这个数字是可信的。

随州境内有大量的陂陀岗地，类似于中国北方的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同时也有103条河流构成的沮水流域。是叶脉状的河流两岸是浩浩长江的缩影。旱地歉收有水田补充，水田歉收了，有旱地补充。随州有小灾小丰收，大灾大丰收的俗语。其实就是讲两种农业体系的相互弥补。旱、水两种体系象双子座一样，拧在一起，支撑这片具有南北特点的宜居的土地。

二、随文化亦南亦北的混合性

已故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认为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是地域文化的融合。他觉得讨论中国史前文化有一个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只有引入西方交互作用的概念才能更便利地讨论中国文化形成问题。“交互作用圈”是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在1964年所写的《史前史上的交相作用圈》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于《霍普威林文化研究》一书。考德威尔认为，霍普威林文化史北美东部分布很广的史前文化，他把这个文化的分布范围称之为交互作用圈。其中许多各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交往与影响，特别是墓葬仪式和随葬物品上，反映了交互作用圈内部各文化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交互作用圈内部各文化在更高一层上看成为一体而又区别于圈外文化。张光直针对中国史前文化这种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向国人介绍了两个英语概念，一个是interaction sphere，用汉语讲，它就是“互动领域”，张光直将它译为“交互作用圈”；一个是area co-tradition，可以译成“区域合作的传统”，张光直称之为“地域共同传统”。并说明，这种交互作用圈或地域共同传统是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张光直借用“交互作用圈”的含义就是地域相联而各具特征的区域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彼此之间的交互作

用使它们对于其他地域兼联较远的文化来说形成了一个整体。^①实际上，张光直^①的交相作用就是地域文化融合过程。

在地域文化的发展中，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往往很强势，不易感觉其他文化的冲击。而文化的交互作用圈往往就是两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的区域。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两种地域文化，随文化就是典型的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圈。

随文化以“随”命名，一是它的地理特征，二是它的文化特征。随州的山川存在、分布、走向上，被称为“荆豫要冲”，“汉襄咽喉”、“鄂北门户”。北有桐柏山拱卫，南有大洪山雄峙，东与大别山相连，西与襄阳接壤。这种地理区位就决定了它的交互作用性。“荆”是长江文化阶级性历史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的核心所在，“豫”是黄河文化阶段性历史地域文化中原文化另一个核心区域。随是这两个地域性文化最重要的通道。

随州境内外的出土文物基本构成了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交相而生的状况。它表现为北方文化向西北到东南，南方文化东南向西北交融。这个结果构成了随州境内外新石器石器文化的本质特征。

参与随州西花园和庙台子的新石器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的考古专家们认为，随州的出土文物是由南北的两支原始文化频繁接触，相互交融的地区。武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方酉生先生在《西花园与庙台子》里说：“随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南面的信阳交界，在桐柏山及东北面的大别山南北两侧，分布着众多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这四种文化

^①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

的相互激荡，交融，相互吸收融合，具有不南不北的地方特色。构成南北交融的规律性现象。”

与随州相邻的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个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0年开始发展、发掘报告认为早期文化距今约6000年，二期文化约5500-5300年，三期文化在5000年以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性质。其中第一期的文化遗存与河南淅川下王岗的仰韶文化接近。第二期有仰韶文化元素，又与大溪文化因素，第三期多表现出屈家岭文化的特征。这种亦南亦北的混合性质给考古和历史学界带来了较大困惑。他们在命名时就发生了困难，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在发掘报告的表述上用“混合”、“融合”等术语概括雕龙碑遗址的文化性质。^①事实上，他们认同南（阳）襄（阳）盆地与江汉盆地边缘的随文化就是具有这种文化性质。

随文化兼有南北文化之长，这也正是随文化一种文化特质之所在。作为随文化这个整体，它的各种文化元素吸收了它域文化的优势和特长，加上了自己的特色，这就不是兼有的文化特质，而是获得突破性的原创性内容。这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文化的原创性就是在广泛地吸它人的优势和特长中形成的。

三、农业文明与天人合一

炎帝神农氏诞生于随州，古史传说中有“炎黄之战”，说炎帝与黄帝激烈的冲突之后，对抗的双方融为一体。炎帝神农也把精细农耕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文明的生生不息，产生了重要影响。炎黄的融合也就是黄河文化与长江

^①《枣阳雕龙碑遗址》，中国社科出版社。

文化的融合，这才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真实，这在随州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宇宙天地大自然赋予随州美好的自然条件，这里留下人类生存活动过程中的遗物就是历史的必然。古史中虽有炎帝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但我们知道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是需要长时间的创造和累积，绝不可能是一人在朝夕间完成。考古和相关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活在随州这块土地上。1957年6月，湖北省文管会文物调查组在距随州市区约5公里的坡地上采集到一件陨石打制的石器。该石器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平，石片角为 118° ，放射线较清楚，器物大部分边缘都作了粗糙的第二步加工，刃缘呈明显的弯曲状，石器左侧，从台面到末端均保留着天然的砾石面。1960年5月经裴文中先生鉴定，确认这件石器是旧石器，这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①在漫长的旧石器时期，我们的先祖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用一个千年和又一个千年积累着人类的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1958年，随县隶属襄阳地区管辖。襄樊地区考古队在随州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发现并说明随州境内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6处。^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反映的内容比任何一部历史文献的记载都令人信服。

目前已经发掘的较为重要的有三里岗冷皮垭西和西花园，洛阳金鸡岭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近3000余件。^③这些

①王善才：《湖北随县发现旧石器》，《考古》1961年7期。

②《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

③《文化随州》，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土文物的文化内涵为我们认识随州地域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和丰富的资料。

过去，我们认识地域文化往往从历史文献去研读。殊不知研究先秦历史，历史文献形成的传统充其量是一种文化小传统，特别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这是人类跨进入文明的最重要时代。通常我们把它叫炎黄传说时代。

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我们依据这些历史文献去认知历史，总有一种被历史牵着走迷宫，绕来绕去，绕的专家和学者都迷糊，更不说普通众生。专家都认为中国文明的起始是炎黄传说时代，目前大家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下限不晚于龙山时代。^①这就是说炎黄时代的上限为距约5500年，下限约4500年，即5000年前后。这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来历。

然而，这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我们知道文字形成完整的体系并运用是甲骨文，目前已发现的文字约有4500个，但能够辨识的仅有2000余文字。尽管这些文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它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说文字构成的文献是历史文化传统，它最多是一种文化小传统。什么是历史文化大传统，这就是宇宙天地万物大自然。而文化小传统因为历史的原因可能对历史的真实形成遮蔽，唯有出土文物能拨开这种遮蔽，还原历史的真实。

这里举例随州境内新石器石器的出土的三件文物，一是三里岗冷皮垭出土的黑色陶豆，豆柄上有七个透雕的北斗七星图案，这些新石器石器的文化内涵距今约6000年。^②二是浙河西花园一

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刘玉堂、黄敬刚：《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农业考古》1986年1期。

件有太极图形状的陶纺轮。这处文物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①三是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的衣箱。这件文物有精准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

这三件文物出土在随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它证明随州的先民为了生存，已准确地掌握天地的运行规律。或者说只有掌握了事物运行规律的人才镇静、从容、平和、大气。我们知道，随州是一片适宜水稻种植的土地。水稻的种植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掌握季节的变化。

北斗七星是人类观测天体运行的原型天象。现代科学表明，恒星赤纬的高低影响着不同地理纬度的人们的观测效果。比方我国的广西，或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低纬带的人因地表大气层抖动而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唯有中原地区的先民称之为北斗是最贴切的。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一年之中，它由正北向东，向南渐升、至正南后又向北渐降。斗柄指向正东时，这一刻就是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的时候，祖先们把它定为春分。斗柄指向正南时，为夏至，正西为秋分，正北为冬至。如果把它作360°旋转时，正好对应一年的360天。祖先们不仅仅认为北斗七星是人们的万年历，更重要的它启示着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二分现象认识。比方说，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从这天起，白天就开始渐渐缩短，而且一天短一天。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渐长。或者说，长与短的对立也是相互转化的。如果在北斗七星之外画一个，它就是太极图案。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83年在随州西花园发掘的有两黑两白四条阴阳鱼相交的太极图

^①方酉生：《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

纺轮就是太极图祖型。还有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案，这些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完整的天文学资料。

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总和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它是涵养一个区域文化特性的丰厚土壤。这种环境和土壤必然孕育一定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就必然催生一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所谓天圆地方，其实是说天地的规则。天的法则是周圆运转循环，地的道理就是稳定，天地就形成对立的动和静。人类对随州天地动静的认同和遵从农耕文明，希望产出更多的粮食为生存繁衍提供坚实的基础。需要认知规律，遵从规律。这三件文物出土在随州，充分张显出随州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特征。

读一读这片土地上的地名就知道这是一片人生福地，长岗、三里岗、安居、涇水、万和、万福……随州地理对随州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也说明随州人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这种紧密关系浸润着随州人的身心。随州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实际、轻玄想、重家族伦理，安土乐天的农耕精神特质就是显得极为浓烈。

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期出土文物除了三里岗冷皮垭的黑陶豆柄上的透雕北斗七星，浙河西花园的太极图案的陶纺轮。还有众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选址，一般选择临水而居，以过渡性地貌为首选，一边是小型冲击平原，一边是低岗。遗址的“岗”、“岭”、“堰”、“台”、“墩”都是小高地称呼，说明有洪水时，可在高地居住，洪水退后，可在冲击平原进行农耕活动。这是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的生境。^①“生境”说明能进能退，借着地利是理想的居住地。说它

^①游修龄、曾雄文：《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是产生文明的温床一点也不过份。

5000年前随州人已经懂得“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与整体的和谐。实际这句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元素。随州在新石器时期是人群居住的高密度区域，从整体分布看，有三个中心，一是西南的大洪山地区、二是随中的均川、安居地区，三是随东南的淅河、府河地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认为，随州新石器时期遗址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形成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聚落群。在聚落的格局中，有一个大的遗址居群落的中心位置，其余的作为附属群落而存在。很显然，随州人已成熟地把稻谷种植的经验用在了聚落群中心的建设上。

因为水稻增产的潜力来源于天地的生气与活力。阴阳平衡和谐就是生命的活力，草木就是欣欣向荣而生长。住宅、村庄、聚落、城市能得到阴阳平衡和谐，当然能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从随州之大聚落中心的选择看。避风、向阳、近水、背水面水，山南水北的阴阳概念，承接山水地脉以养人的观念十分显着。这些说明，随州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天地的阴阳太极观念。的特征阴阳和谐、平衡、对称，就有生命与活力，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四、从青铜器铭文看随文化的包容性

炎黄融合之后就是尧舜禹时期，随州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就是三苗地区。著名学者张良皋先生潜心多年考证，舜葬九嶷山就是今天的大洪山。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证据强雄、条理清晰。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历史的真实是夏的实力不可能到达湖南永州。那么夏的影响通过南阳盆地沿随枣走廊达到达汉水及长江之滨则是历史的真实。^①支持张先生这一观点的仅有随州的民风民俗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还有一块汉碑，其令人信服之力

量有限。

历史进入西周。随国是中原联系南楚的重要通道，也是掌控南楚的桥头堡。南楚有丰富的青铜资源。周昭王南征时把大量的青铜器运到了王城，铸成钟鼎，称之为“俘金”。

礼乐政治的重要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来支撑周王朝。西周初年，除了在全国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的子孙为诸侯来管理广大的地区。其目的是“以藩屏周”。同姓的诸侯，多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后裔，是在周公摄政时分封的。这就是说随国的立国时间最晚不过康王，即公元前1020年。^②

随州东城义地岗出土过两件铜戈有铭文“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武用戈”。^③这是春秋中期曾国同姓大臣的用戈铭文。称周王孙进一步证实曾属于周王室的同姓，始封时与周王有很近的血缘关系。

新近发现的浙河叶家山曾侯墓群，出土的千余件各类文物。根据出土器物形制特点，这些器物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大量西周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亮点。绝大多数青铜器上有铭文。多座墓葬的青铜器上有“曾侯”、“曾侯谏”铭文，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说明这是早期曾国和曾侯的墓地。^④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黄凤春对一期出土文物的初步解读恰好证实了我们的推测，曾国是周初封国。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合，近年在随州有了重大发现。这就是羊子山四号墓的发掘。这次发掘是因盗墓而进行的抢救性发

①张良泉：《华夏宗缘新探》，《炎黄文化与名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拙作：《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钟鸣寰宇》，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09、11365号。

④《随州日报》2011年8月22日

掘，出土弥足珍贵的鄂国青铜器27件。相关专家用震惊学术界、震惊世界，连用了两个“震惊”来形容这次发掘的影响。信史之前的一个文字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何况这27件文物中带有铭文的文物达14件。其中一件提梁卣的盖内有铭文二行：“噩侯乍旅彝”。这众多的铭文的文物清晰地告诉我们，墓主人就是噩侯本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少华认为，这器物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周康王，周昭王时期。^①按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周康王钊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020年之前。

根据这些文物形制、内容来判断，羊子山古墓就是噩侯本人。墓地相邻的安居遗址，应该就是鄂侯生活的地方。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距今3000年前后，鄂国的中心地或者鄂国的都城就是安居。居住在随州安居的噩侯，为姞姓。姞姓是黄帝的子孙，当来自黄河流域。噩族的南迁应该称作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体现，这个噩侯墓可以说明，安居是整个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个“噩”就是湖北省的简称“鄂”的源头。姞姓是高贵的黄帝后裔，在殷商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位于“三公”之列。西周武王的父亲西伯昌与鄂侯、九侯并列为“三公”。纣王无道，三公规劝，结果，九侯、噩侯被杀，西伯昌被囚。^②噩族、噩人的去向如何，文献无载。

在才淦水与涇水交汇的安居，噩侯的后裔躲避政治灾难定居在这里了。这里是“随枣孔道”的中心位置。“随枣走廊”是荆楚与中原地区联接的重要通道。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南方的铜资源多经过这条通道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即黄河中游地区。关于

^①2010年8月2日随州电视台《家在随州》专栏。

^②《战国策·鲁仲连列传》、《史记·殷本记》。

噩侯与西周的关系，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出土的文物却有清楚的显示。

根据《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我们知道，周厉王南征角夷。返回到祛的地方，噩侯驭方献礼并宴请厉王，周王亲自赏赐噩侯财物、弓矢、马匹。噩侯以此为荣，铸宝鼎记载了这件事。这说明噩国和周王室有很好的关系。

《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叛周。是因噩侯的实力强。噩侯的反叛引起周王朝的恐慌，周王朝动用精锐之师的西六师和殷八师来平叛，依然没能平叛，又派武公率王师扑伐噩侯，并把噩王王族的老小铲除光。从此，噩国从此不再出现于史籍，也没有比噩侯驭方鼎更晚的铜器了。周厉王是公元前877年—841年。这是西周中晚期。西周灭了噩国，但不可能放弃整个南方，尤其是不能失去对铜的需求。这样，西周就把让早年分封在随的姬姓随侯发挥更大的作用。

曾随为一国二名。考古材料证明，随国君侯为姬姓已无疑问。曾有自谦的含义。晋平公曾对周天子说：“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①彪是晋平公的名字。晋平公在这里自称“曾臣”是“小臣”“微臣”的意思，是对天子的敬重而言的自谦之词。姬曾任首任诸侯可能自称曾侯，也是对周天子的尊重，亦有自谦的意味。后世随侯按敬祖的体例，是可以先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或作为自己的封号。随侯的继承者世代均自称“曾侯”，一是对先祖的敬仰，二是对周王朝的尊崇，三是对平民炫耀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而史官绝不会把一个诸侯王的自谦称谓录于史籍。这就是随国境内外出土的文物均有“曾”的铭文，而史籍中

^①《左传·襄公十八年》。

只有“随”记载的原因。

这就是说，随的土地上，西周早期同时存在着一个噩侯，一个随（曾）侯。分封的随侯借用着噩侯的力量控制着南方，保证着西周王朝的战略物资供应。噩侯因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就南逃到随立国，噩侯不仅承认而且拥护西周新政权。西周也需要异性贵族的支持，就册封了噩侯直到周厉王时国灭，在随地与随（曾）居处了相当长的时间，再次证明随这片土地的包容性。

随着叶家山古墓群的发掘发掘的进展，新面世的文物将给我们破译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难题。或者证明我们的许多猜想，或者纠正和弥补我们的猜想。但他们会引导我们走向历史的真实。

五、重人事的民本思想

先秦各国均有史书，唯有鲁国的史书传世。《春秋》就成为专称。《左传》是对《春秋》全书内容详细的阐述和补充，故名之为《春秋左传》。《春秋》、《春秋左传》都是我国编年体史书，《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0年），《春秋左传》下限时间略为延长。该书意蕴深刻，因而被列入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随随州季梁闪光的民本思想就见载于其中。

季梁的出现与楚伐随相关。楚最初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氏族社会，楚武王以前的君主都是亲自参加社会劳动的。楚发达起来了，就想通过随向周王朝讨要政治地位。随是周王分封在汉水之东监控、教化荆楚蛮荒之地的封国。随真去了周替楚说了话，周不允许。两年后，熊通自立为武王。楚对抗周天子，敢于自封为王，必有自己的实力和底气。不要以为这只是楚随的对抗和冲突。这实际标志着春秋时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结构重组。^①楚地的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格局的改变。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失落，必

然催生一些新的思想，这是季梁思想产生的社会大背景。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由于随人的妥协，两军谈判和解，楚人欲以假象诱惑随军追击。随侯将要允许少师追击楚军的请求。季梁及时谏止。《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照耀千古的季梁就在中华文明最关键的时刻出场了。其中的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那么丰赡厚实，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春秋左传》中平静简洁地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季梁那赤诚的爱国情怀，重塑社会灵魂的精深思想，这就是那重人事的民本思想。

季梁和随侯论述怎样让随国这样一个小国化解大国的威胁，就应该建立一个有道的随国。怎么才能有道呢？就要总想到对老百姓有利，这就是忠。什么是信，就是真实不欺地祭祀神，就

①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是信。现在老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现在司仪是在欺哄神，随楚对抗中，随肯定会灭亡。随侯听了季梁的话，说：“我祭神的时候，规规矩矩，真心诚意，为什么神灵不帮我？”季梁说：“你以为神灵是谁，神灵就是老百姓（夫民，神之主也）！你只有先团结老百姓。老百姓认为你不诚心，是因为他们不幸福。老百姓是神的主人，主人不叫神帮你，神怎么可能帮你？你应该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就可以化解随楚这场冲突。”随楚这场对抗前后十余年，因为季梁的存在，终于让险恶的抗争顺利化解。我们可以从《春秋左传》中读出季梁的这些思想和认识的普世性。

随州人觉得季梁是大贤。其实，是天地宇宙大自然造就了随州，随州适宜耕种的土地必然孕育农耕文化的圣贤。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就出生在随州。追记中必然带有神话和传说，但传说不会凭空而起。炎帝神农开创的稻作精细农耕让“道”普遍存在于随州这片土地上。历史从漫漶走向清晰，季梁在这片富矿开采出高品位的思想珍宝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把创立这种文化生态的炎帝神农称为圣人，把从这种文化生态中寻找到的规律总结为“道”的季梁称为“大贤”，而且两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所谓天圆地方，其实是说天地的规则。天的法则是周圆运转循环，地的道理就是稳定，天地就形成对立的动和静。人类对随州天地动静的认同和遵从，就必然产生炎帝神农、季梁这样的文化英雄。

在炎帝神农故里，季梁是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贤。只要读过中国文化经典的文化人，就知道大贤是什么样的份量。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克将军到随州，第一件事就问，季梁祠在哪里，我要去拜一拜。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说，发蒙

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只要读了中国文化的经典，就会读到季梁。是这些经典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处世。拜谒季梁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自觉。

季梁就是中国信史阶段冷静观察社会现实，深入探讨社会发展，创立最适合文明发展的原创性思想家。我们可以遗忘许多历史故事，但只要你想做中国的文化人，就不要忘了这位对社会进行教导的开山祖师。他的重人世的民本思想不仅体现了随文化的特质，而且具有极大的普世性。

六、结语

归纳以上所论，就随文化发生发展过程来看，随文化的特质大体有五：其一，其地域兼得南北特点，水田与旱田农作物互补，宜居条件佳。其二，随文化具有亦南亦北的混合性，但混而不杂，自成体系。其三，农业文明具有天人合一特点较突出。其四，随文化的包容性较强。其五，较早具有重人事的民本思想。

《永恒的神韵》后记

《永恒的神韵》付梓，我有一种很温暖、很圆融的感觉。甲午年过去就是乙未年。我是乙未年出生，马上就要走过一个甲子，我确实确实有些不敢相信。我出生在随州古城一个铁匠之家，家境很是寒微，在我的记忆里，能吃饱米饭就是人生的大幸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不太记事，大人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扒家，也有些霸道。

我确实确实不记得这些事，根据大人人们的描述，还原当时的状况。我四五岁的时候，就晓得到农业队的菜地里，去抢菜根和老菜叶。我小时候住在随州城南关坟茔附近，就是现在的随州中心人民医院旁边。在我的记忆里，县医院只有天主教堂和旁边的一两排平房，现在的医院基本上都是二街农业队的菜地。老县城三个街道都有农业队。农业队收菜的时候是用刀子砍，不是连根挖，田里就会留下一些菜叶和菜根。看到大人去捡，可能我跟在后面也捡了。老菜叶和菜根洗干净了，剁碎糊一点面，是可以吃的。大人们说我霸道，就是说我拔过但没有拔起来的菜菔，谁也不许再拔了，谁拔起来了我会撒泼打滚要来。别人看我那么一个小娃子，叹口气也就算了。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经常是煮碎米饭吃，但还是有许多的快乐，躲猫猫的时候偷偷摘生产队的黄瓜、香瓜。今天的中心医院

住院大楼就是建在随州的古城墙上，城墙上种着桃子、苹果、梨子、枣子。照树的是个老头，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躲猫猫的娃娃。但我们不怕他，有跑得慢的被他逮住，也不过训斥一番。那时候，一斤粮票能买两斤碎米，碎米不是谁家都能买到的。需要找许多关系才能买到。我的爸爸会用打铁的吊锅煮碎米饭，那饭吃的满嘴跑，多数时候是煮稀不稀干不干的碎米饭，现在已经忘记了那种味道。倒是城墙内外的瓜果却有一年又一年的快乐，让我时时忆起。

我的碎米饭还没吃出味来，初中就毕业了。下乡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下乡知青的头三个月，吃的是45斤供应粮，顿顿吃上米饭，沾点盐，就香的不得了。后来，和农民一样去抢工分粮，十几岁的娃娃，肯定抢不过别人。我记得1972年的冬天生产队出外工挖渠道，我们生产队小，那一年出外工是五个人每人半斤米，煮在一口大锅里。挖渠道是很下力的活，放工后，我把锅盖一揭开，两斤多米的饭只盖住了锅底。我说：“怎么只煮这么一点点米？”做饭是轮流的方式。做饭人说：“这是两斤半米，我当他们的家，你吃完了，我们莫事也不找你要。”我一辈子也记得，那是一顿真正的饱饭，吃完锅巴之后，我还喝了两碗米汤。

做饭的郑老头说：“十几岁的娃子，下这么大的力气，正长身体的时候，又有得油水。遭孽呀。”他自己说只当过国军的班长，队上的人说他当过国军的军官，多大的官说不清。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那天晚上，他死不让我睡，说我吃多了，睡早了不好。他告诉我，村上的人都晓得城里的娃子，这么一丁点就自己做家顶门户，不容易。也晓得是你们知识青年偷的鸡子扯的菜，剜的红薯，骂几句就过去了。公社的知青干事

来的时候，冇得一个人说你们的拐话，就是想到你们遭孽。

这些事想起来有些苦涩，但更多的却是温暖。我的父老乡亲厚道而宽容伴随着我的成长，这种温馨时时刻刻滋润濡养着我，让我的身心也有了温暖，复述这些细节，其实就是想让这种温暖滋润濡养更多的人。我一辈子没离开随州，从随州普通市民家庭，走向社会，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乡亲们送我读了随县师范，从乡村教师到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到专业创作者，最后还被随州的父老乡亲搀扶成领导干部。

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和不知起始、永无尽期的时间里，任何个体生命，来到这个时空都是那么偶然，也是那么珍贵。人生百年，是漫长的时光，未来可能能够一百多年，然而和历史、宇宙相比，一百多年也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瞬间。在一个甲子的时候，我感到生命的珍贵，越是珍贵，越是要知道感恩。感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先，祖先的生命来源于这片天地。随州这片土地就是我另一个层面的父母，今天我用这本《永恒的神韵》来感恩随州。

这份感恩得益于自己分管文史工作。我认为文史由文化和历史两个部分组成。文化的核心是爱与善良，有爱与善良就会有“仁义礼智”。孟子说：仁发端于恻隐之心，义发端于羞恶之心，礼发端于辞让之心，智发端于是非之心。随州人“生活的样法”里肯定蕴含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每个随州人的生活中就蕴含着这“四心”。如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一定会有许多发现。能把感恩情怀当做一种做人的基本准则。就能从普通平凡中发现伟大和崇高，是因为心中对这片土地有了敬畏，这种敬畏是一种尊敬到生怕弄坏了境界。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爱，就自自然然能从普通和平凡中发现许多神奇。

历史是由历史真实和历史观构成的。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对于随州的历史我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觉得认为随州的社会存在，决定着随州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关于随州炎帝神农故里的重大问题，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能够很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炎帝神农是人类即将跨入文明门槛之前时代的文化英雄，文明的门槛就是中国的国家建立。中国断代工程已经完成，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建立时间。文明的建立是文明的各种元素已经齐备的结果，炎黄传说时代，就是国家的各种要素已经齐备的时间。这个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迟。云南元谋人早，距今180万年，元谋人也有文明的元素，因为这时人类已经从树上下来了，直立起来、走出丛林，手握树枝，驱赶野兽，谁说这树枝不是工具？能使用工具的人当然有文明。但这时不是人类的文明时代，因为文明的各种要素没有完全齐备。专家们认定国家的要素基本成熟最早不过仰韶文化后期，最迟不过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5500年—4500年，距离夏代的始年1000年前后。这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来历。

随州5000年前后的历史真实，是农耕文明已经十分发达，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是随州的山水地形、环境生态所决定的。而且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用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随州地区有一个先进的农耕部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余秋雨先生进一步说，生活中蕴含着价值，很多人认同这种生活和价值，并形成共同体。所以他对文化的解说是三个核心词：生活、价值、共同体。

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随州陶豆

的北斗七星雕刻、太极图案纺轮，是5000年前后历史实物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存在就是随州先民圆融和谐思想意识的反映。叶家山许多文物的和谐圆融思想意识、季梁“民为神主”思想就是远古圆融和谐思想意识的延续。

我认为自己是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因为我是以大量历史实物存在，来表明自己对这种实物的“认识”和“判断”。年轻的时候，读过几本历史文献，就感到随州的炎帝神农，有一百多种典籍，应该很厚实。年纪大了，看到许多地方也能拿出历史典籍，方知必须用历史的真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才叫学问。我没能生在读书的时代，读过那几本书，要证明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的唯一性，有很大困难。我就从网上的网民提出的问题，开始思考问题。回答不了，就证明随州炎帝神农文化的接受度不高。我为了提高这种接受度，会花很大的气力，努力说明自己的观点。我从不认为网上的问题荒谬，网民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果能以尽可能丰富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认识”和“判断”，取得别人的共识，是人生一种乐趣。

我的很多认识是站在提出问题的人角度，去思考的，尽可能用他的人生经验来回答。从自己的心灵出发，走进别人的内心，就有可能找到跟别人相通的地方。如果连自己都没有被充分说服的观点，就要别人接受，是霸道和无知。今天，别人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接受你的认知，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其实形成共识，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过程，所以我尽可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话，来阐述随州文化。随州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地域文化，随州地域的唯一性，也就证明了随州文化的唯一性，然后用这种唯一性，解说它在荆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解说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州文化的核心是炎帝神农文化。有人觉得这个重大课题，不是一本书就能说得清楚的。实际上这是对炎帝神农文化的内涵理解的分歧。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群众有自己的认知，专家学者有自己的理解，领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做一种融合与调解。比方，普通群众认为炎帝神农就是一个具体的人，生于何时何地何日，死于何时何地何日，清楚得很。专家学者感到炎帝神农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由蛮荒走进文明时代的文化英雄。政府希望能让这两者为自己所用，“世界华人寻根节”的举办，采用民间传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是炎帝神农的誕生日，活动中庙会更多的是敬重民间的炎帝神农文化认知。炎帝神农高层论坛，论述的是专家学者对炎帝神农文化的理解。专家学者的炎帝神农文化概念与普通群众认知的炎帝神农文化概念，两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相容的地方。如果放大其中不相容的地方，就带来了混乱。这种混乱不光是两者的融合出现了问题，也降低了炎帝神农文化的价值。

不能觉得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炎帝神农文化认知，有学理上说不通的地方，就贬低其文化价值。恰恰这种情况正好说明炎帝神农文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崇高。人民群众感恩自己的衣食住行，从何而来，当然是从自己的祖先那里来的，所以就把人类的所有的物质创造、精神创造功绩，归功于自己的祖先。当无数的美好归结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说不通。如果站在人民群众敬仰自己祖先的那个角度去理解，这种种的不通就全通了。

正是有了普通群众的无限敬仰，才有了随州古代的“至今神农庙，年年赛村鼓（《随州志》）”的民俗，也就有了今天的祭祀大典，它被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庙会”到“祭祀大典”有明显的延续，这是一种“活态传承”。庙会让炎帝神

农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也让老百姓有了炎帝神农文化的记忆，人民群众有了炎帝神农文化的情怀，节庆就成为人民的盛会。节庆用一种仪式来安顿、抚慰自己的灵魂，探访久违的祖宗和先人，实际上是从东方文化的发源地找回民族的深厚情感，找回断裂的文明。

专家学者认知的炎帝神农文化有更多的理性，从字面上包含着“炎帝”、“炎帝神农”、“炎帝神农文化”三层。我理解这三层是有区别的，“帝”不是群体，只能是个体；“农”不是个体，必须是群体，应为男耕女织最少也是两个人；“文化”有一个核心，就是共同体，人口很稠密的时候，才能形成共同体。专家学者定位的“炎黄”时间来看，国家建立前的千年左右，也就是距今5000年。国家建立的各种要素，通过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的厚度，这时已经到了发生质变的时候了。这就是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也就是说，炎帝神农的出现不是越早越好。出现的早，只能是准备阶段。就好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绝对不是共产党，但为共产党的建立做着准备。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天帝，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域指向，这个指向牵引着我们的思维走向中国文化形成的多元。这种多元让中国文化呈现出成长的态势，多元的不断融合反复为中国文化这个主体输送着营养，这是中国文化具备永久生命力的根本。南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稻谷的种植，稻作农耕是一种精细农耕，这种种植方式衍生出的三个因素，对于中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聚、二是序、三是理。稻谷种植必须聚集更多的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稻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要良好的社会秩序；稻谷的种植要按照稻谷的生长规律，就有极大的增产潜力，

就促进科学理性的发展。

随州恰恰是种植稻谷的最佳地域，说这话许多人也许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袁隆平是当今世界的杂交稻之父，他对世界的粮食贡献令全世界仰望，说他是当代的炎帝神农一点也不为过。他和他的团队在中国所有适合种植稻谷的地域都有试验田，其中产量最高的出在随州均川镇的100亩。我曾向相关部门建议，请袁隆平先生在炎帝神农高层论坛宣读自己在随州均川镇杂交稻试验田的实验数据，这个数据具有重大的指标性意义。他有没有常驻随州，已经不重要，他的团队常年有人在指导随州农民按照袁隆平的稻谷种植方法，实际上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随州人的内心深处。今天我们祭祀炎帝神农，绝不是要延续炎帝神农那个时代的生活，而是继承这种生活中蕴含的价值。

《永远的神韵》主要是解读炎帝神农文化在随州的发生发展，随州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以为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农耕生活，这就必然与炎帝神农有某种关联。《台湾印象》一文看起来似乎与炎帝神农文化联系不紧密，组织上安排我担任随州市炎黄研究会会长一职，市委书记代表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特别交代，炎帝神农风景区会被授予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随州的炎黄文化研究，要在夯实这个基地上动些脑筋，因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中国报告文学》刊载后，其中部分章节先后被多个刊物刊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开了一个头。

我对市委书记说：我感到自己是炎帝神农文化的最大受益者，炎帝神农搀扶我走过生命的大坎坷，组织上安排不安排我担任这个职务，我都会感恩炎帝神农。何况随州文化的研究是一件积善积福的事，《周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做这种积德行善的事，恩泽及于子孙。《永恒的神韵》的出版，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圆融温暖感觉，更是生命的活力。一个甲子六十年，走过一个甲子的人是一种成熟，更是一种觉悟。所谓成熟就是六十岁的人对利益的得失应该看得淡一些，这种看淡就是一种大成熟；所谓觉悟就是觉察思考，能够领悟生命的意义就是觉悟。能获得这种成熟与觉悟，就一定能让自己的生命的品质质量得以提升。

2014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神韵 / 包毅国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4

(随州文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5034-4910-9

I. ①永… II. ①包…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0150号

责任编辑: 梁 洁

特约编辑: 李 倩

装帧设计: 纯粹图文策划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武汉市华康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24.25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永 远 的 神 韵

策 划：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梁 洁

特约编辑：李 倩

—— 2014 ——
随州文史研究系列丛书

卷一 炎帝神农氏新探
卷二 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
卷三 大洪山志艺文选译
卷四 古随文化之活体遗存考
卷五 永远的神韵

ISBN 978-7-5034-4910-9



9 787503 449109 >

定价：58.00元